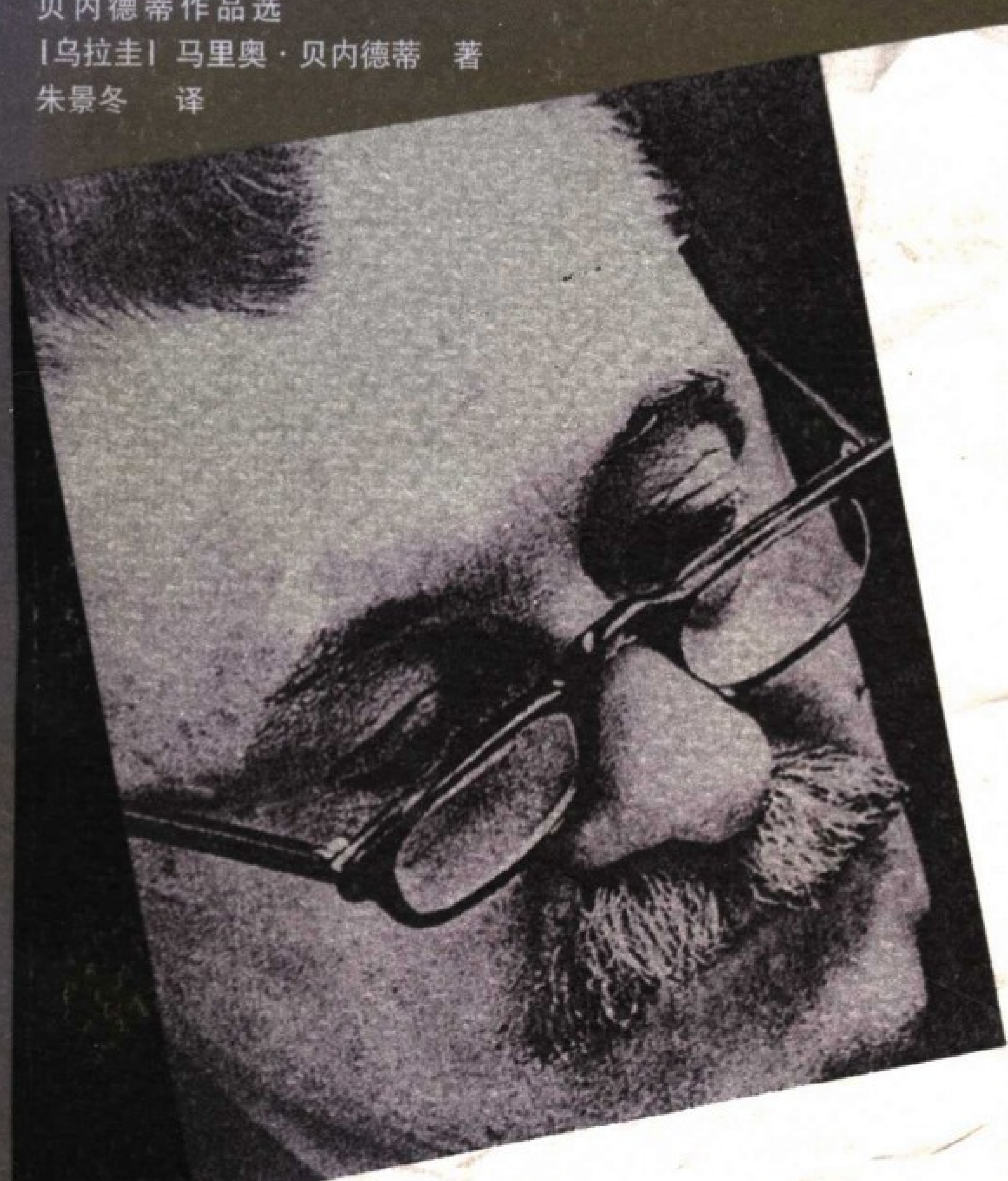


拉美短篇小说大师

贝内德蒂作品选

「乌拉圭」马里奥·贝内德蒂 著

朱景冬 译



让我堕落 坠入诱惑

TEMPT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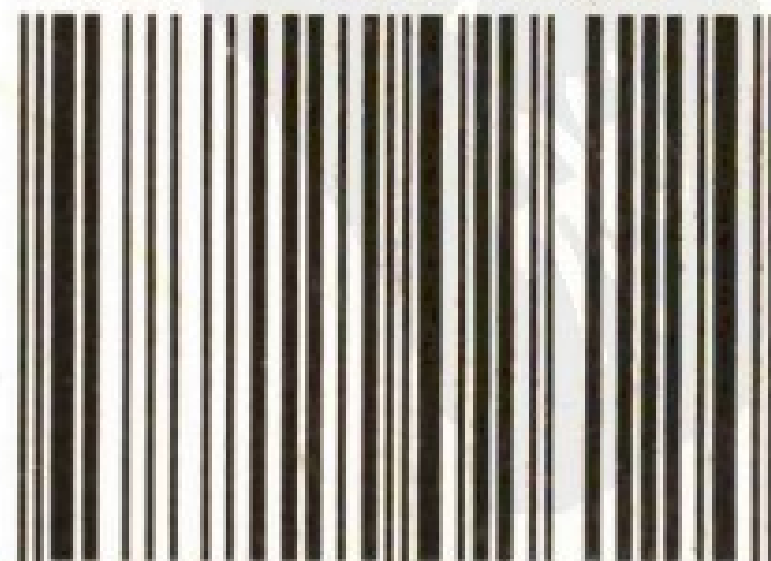
云南人民出版社

Let's fall
into
Tempt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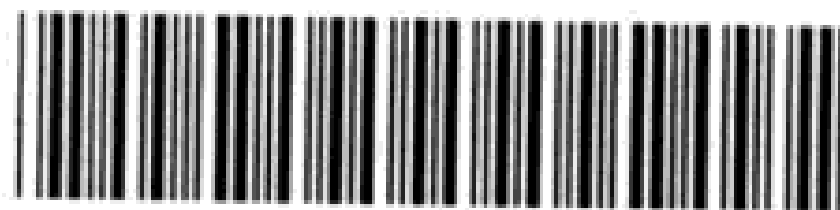
ISBN 7-222-02612-6/1 · 722

定价: 25.00 元

ISBN 7-222-02612-6



9 787222 026124 >



90222209

让我们

坠入诱惑

Let's Fall In To Temptation

[乌拉圭] 马里奥·贝内德蒂 著

朱景冬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SB404/09

I 782.4

1001

Mario Benedetti
Montevideanos

根据古巴美洲之家出版社（Casa de Las
Amérilas, Habana）1968 年版译出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让我们坠入诱惑
马里奥·贝内德蒂作品选
朱景冬编选

※ ※ ※

责任编辑 黄 惠	开本 850 × 1168 1/32
封面设计 王玉辉	印张 15.5 字数 330 000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印装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222 - 02612 - 6/I·722 印数 1 - 5 000

定价：25.00 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前 言

马里奥·贝内德蒂，乌拉圭著名作家，1920年生于塔瓜雷姆博省一个名叫洛斯·托罗斯的小镇，三四岁时随父母迁至首都蒙得维的亚。父亲开了一片药房，由于经营不善而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双亲的感情也因此出现裂痕。这对孩提时代的贝内德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曾去一所德国人办的小学读书，上过几年中学。18岁时离开父母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谋生，在一家出版社当速记员。1946年回到蒙得维的亚，在政府部门供职。为了谋生，有时不得不在三个地方工作。童年的不愉快的生活和青年时代的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贝内德蒂上小学时就开始写诗歌和短篇故事。十二三岁时还模仿大仲马写了骑士小说《王位与生命》。1945年，他以诗集《难忘的前夜》跻身文坛，成为乌拉圭文学界的中坚和先锋（后来他和当时崛起的其他作家被称为“四五年一代”）。他主编多种文学刊物，为乌拉圭、阿根廷和墨西哥等

国的多家期刊撰稿；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不仅写诗、散文和剧本，而且写长篇和短篇小说、文学评论和幽默小品。194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今天早晨》，第二年出版诗集《只是与此同时》，不久又相继出版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旅行和其他故事》（1951年）和文学评论集《普鲁斯特和其他》（1951年）。1953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们中间的谁》。这时他已担任文学周刊《前进》主编，但仍坚持文学创作。后来出版的各类作品有诗集《办公室的诗》（1956年）、《清点——1948至1963年诗歌精选》（1963年）、《祖国的概念》（1963年）、《近在咫尺》（1965年）、《日常的诗》（1979年）、《信口提问》（1986年）、《石灰与歌》（1995年），短篇小说集《蒙得维的亚人》（1959年）、《关于一位鳏夫的材料》（1967年）、《死亡和其他意外》（1968年）、《有无乡愁》（1977年），长篇小说《情断》（1960年）、《感谢这儿》（1965年）、《胡安·安赫尔的生日》（1970年）、《破碎街角的春天》（1982年）、《被遗忘的记忆》（1988年）、《脚手架》（1997年），中篇小说《咖啡馆杂议》（1993年），随笔散文集《青草尾巴的国家》（1960年）、《古巴笔记》（1969年），剧本《佩德罗与船长》（1979年），文学论著《20世纪的乌拉圭文学》（1963年）、《混血大陆的文学》（1967年）等。粗算起来，贝内德蒂出版各类体裁不同的作品40余部，在近20个国家出版150多个版本，被译成至少15种文字。鉴于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他曾三次获公共教育部授予的奖金，两度获乌拉圭国家文学奖。

下面着重介绍一下贝内德蒂的小说创作。

贝内德蒂的小说创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和一个过渡时期。

第一个阶段为蒙得维的亚阶段，即从 40 年代末到 60 年代中期。这个阶段的代表作为《今天早晨》、《蒙得维的亚人》和《情断》。《今天早晨》是“一本年轻的、承诺性的书”，但这并不是说它尚不成熟或缺乏自己的风格。相反的，它以独特的表现力打破了乡村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和地域文学统治乌拉圭文坛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局面。从此后，乌拉圭出现了“强有力的、破除神话的城市文学”。这种文学抛弃一切陈旧典型，将笔触深入到城市和更加典型的城市居民的内心。其中的作品《高高的人行道》、《今天和快乐》和《像个扒手》至今仍然保持着其题材的生命力和风格的严谨。在表现童年的生活、各种各样的爱情、死亡和宗教信仰等普遍主题方面，作者的勇气依然值得称赞。贝内德蒂的这本集子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清新而真实地尝试复杂而严肃的主题；二是严格而精心地构思故事和运用语言。《蒙得维的亚人》是作者第一部赢得读者和批评界广泛欢迎的作品。许多人把它比作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批评家安赫尔·拉马更准确地指出，“书中的那些人物不是都柏林人，而是以作者的既温柔又气愤、既是批评又是一时胆怯的目光观察的真正的乌拉圭人。”其中的作品《预算》、《光荣的星期六》、《伊里亚特一家》和《巧克力杯》等就是这种观察的产物。贝内德蒂这个阶段的全部短篇小说的三大主题“陈规陋习、破坏和失望”也来自这种观察。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蒙得维的亚人》包含着对五六十年代乌拉圭处在上升时期的中产阶级的分析。那时，这个阶级得到了和平发展，经济状况比较繁荣，基本上无忧无虑。但是这个社会阶级当中却存在着虚伪的道德，隐藏着一种随时会流露的犬儒主义，一种未成熟的

存在主义的怀疑态度和一种正在腐蚀着自身的胆怯心理。从文学上讲，《蒙得维的亚人》是一本考察有血有肉的蒙得维的亚人的心灵和处境的书。他们怀着幻想，过着表面而有限的幸福生活，准时享受着微不足道的、建立在别人痛苦基础上的利益。作品表现的都是小人物，除了小小的野心和不满足，他们没有什么大志气。作者的锐利嗅觉及其采用的丰富多彩的手法使这部作品获得了普遍而永恒的价值。《情断》写的是一位行将退休的私营商行老职员、守鳏 20 年的马丁·圣托梅和年轻女职员劳拉·阿维亚内达的恋爱悲剧。马丁年近 50，妻子早亡，和三个儿子住在一起，生活并无什么乐趣。他深感苦闷、孤单和沮丧。不料，年轻姑娘劳拉闯入他的生活，给他带来光明和温暖。但好景不长，疾病夺走劳拉的生命，致使马丁的心境更加孤独和悲观。小说采用日记体形式，叙述中忽东忽西，忽前忽后，无拘无束，自由驰骋，生动反映了乌拉圭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夫妻、父子、恋人、同事、朋友、上下级等）和价值观念的变化。男主人公内心深处的隐情剖析得深刻、细致；女主人公的形象刻画得十分生动，被认为是那些年“拉美叙事文学创造的最动人的女性形象之一”。

从《死亡和其他意外》（1968 年）出版起，贝内德蒂的小说创作进入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也是乌拉圭的过渡时期。政治和经济危机、图帕马罗游击战的爆发、1973 年发生的军事政变和乌拉圭人民生活的迅速贫困化，这一切给乌拉圭以致命的打击，从此它开始一个所谓“国家拉美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改变了乌拉圭社会中全部十分牢固的价值观念。敏感而机警的贝内德蒂及时抓住这些变化，通过文学手

段予以表现。《死亡和其他意外》在保持作者原有的风格基础上用更为有力的笔触反映乌拉圭的新现实：残酷而无情的社会现实——文明和野蛮、民主和独裁、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尖锐斗争。70年代是乌拉圭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在军人独裁政权统治下，人民失去了民主、自由，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到迫害，不得不离开祖国流亡国外。贝内德蒂也是如此，他辗转拉美各国，曾长期在古巴文化机构任职。从此后，在继续表现他的存在主义的忧虑的时候，流亡就成了他的作品最重要的主人公，即他第二个阶段的文学创作的第一主题。

贝内德蒂的第二个阶段始于7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乌拉圭的独裁政权已经巩固，人民的思想受到禁锢，知识分子无立足之地。贝内德蒂被迫在阿根廷、秘鲁、古巴和西班牙生活和写作，在困难的条件下出版《有无乡愁》、《地理学》等作品。作品中的人物比《蒙得维的亚人》中的人物勇敢一些，他们对机械而平淡的生活感到不满，想前进一步，因而受到驱逐、迫害，但是也有人安于乌拉圭一时难以改变的现状。流亡为作家带来新的表现角度：乡愁、爱情、死亡和恐惧是两部作品的永恒主题。背景也全然不同：巴黎、马德里、墨西哥城和哈瓦那的景象与生活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相反的，失去的祖国变成了回忆和怀念的对象，同时也是充满着种种恐怖形象的现实和梦幻。这场恶梦只有到乌拉圭独裁政权倒台、漫漫长夜过去、流亡者归国才能结束。这个阶段，贝内德蒂的作品在国外得到广泛流传，使作者获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

贝内德蒂小说创作的第三个阶段始于80年代初，代表作为《迷惑与坦率》和《破碎街角的春天》。从艺术风格上

讲，短篇小说集《迷惑与坦率》标志着作者的成熟。其重要主题是表现曾被忘却的现实，找回昔日的感觉。人物在国内和国外都经历过同样黑暗的长夜。他们在精神上虽然焕发了青春，但是他们的面容却已衰老。《破碎街角的春天》忠实地再现了乌拉圭人遭受压迫、拷打和流亡的情形。小说的章节短小精悍，从一个人物跳到另一个人物，叙述得颇为生动。作品描写的事件，无论是镇压、拷打还是流亡，并非为描写而描写，而是因为这是他的同胞蒙得维的亚人遭受的，因为这些事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受到痛苦的折磨，长久地被关在监狱里。小说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他受到监禁，人们根据他的信件才了解了他的思想和愿望。而他的父亲、女儿和妻子、他的好友要流亡国外。有一天，他获释出狱，和亲人团聚。但是他的女人和他的朋友之间产生了爱情。大家克制着内心的痛苦前往机场。小说到此结束。结局如何，读者可以随意去想象。但是蒙得维的亚人的生活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无辜的人受到囚禁和肉刑，决非某个人的过错，而是独裁制度的罪恶。至于结局，可以忘记人物受监禁的事件，让所有的人物象征性地回到春天。但是这样的春天已经不完美，因为它破了一个角。在这里，问题显然不仅是事件的野蛮和悲惨，更是事件留在人们心灵上的创伤。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将自己的传记片断不时融入小说的章节。这为故事增添了几分真实，也使人物更贴近现实生活。

综观贝内德蒂的小说创作，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特点。在思想内容上，他的众多作品恰似一个万花筒，从各个角度展示了蒙得维的亚人的生活，特别是蒙得维的亚中产阶级的真实面貌。作者从伦理观念、人际关系、心理因素、道德思

想、人性善恶等多方面剖析了形形色色的都市居民，不加修饰、原原本本地记述了他们生活中的失落和挫折，他们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和屈辱，甚至最残酷的折磨和死亡。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去那个被誉为“南美的瑞士”、“民主的王国”的美丽面纱，暴露了给乌拉圭人民带来无情灾难和痛苦的独裁统治的反动本质。在表现手法上，贝内德蒂受到莫泊桑、契可夫、卡夫卡等欧美作家的影响，同时继承了塞萨尔·巴列霍、奥拉西奥·基罗加等拉美作家的文学传统。其作品，构思、布局独具一格，故事结尾常常出人意料；情节简单，不注重细节；风格质朴，不事雕琢；笔触简洁，犹如照录日常生活场景；表现手段不囿传统，独辟蹊径；刻画人物性格善用回忆、内心独白和对话。

贝内德蒂不但写了大量优秀小说，而且发表过不少关于小说创作的文章。他在《现实与语言》一文中指出：“短篇小说总是取自现实中的一个片断。这个片断可以展示一件事情，一种精神状态，或者某种看去平静的事物：一张面孔，一个形象，一种景色……短篇小说不限于艺术地描写一个人物；相反的，它总是一种生动的或有力的写照。奇闻轶事是短篇小说不可缺少的弹簧……作家可以写一个坐在咖啡馆桌子前静静地望着窗外的人，可以用恰当的风格描绘他，但是仅此还不能构成一篇小说。这是一个静止的肖像。然而叙述者只要再加上一点颜色，譬如说，他在等待，描绘就充满了可能性、预兆和未来。”

1994年，西班牙“阿尔法瓜拉”出版社将贝内德蒂的全部短篇小说汇集起来，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全集》。其中包括120多篇作品，严格地按照年代顺序排列。《全集》

反映了贝内德蒂短篇小说创作的全貌，从中可以看到其创作的发展过程、题材的变化、运用的艺术手法和对语言的忠诚。令人信服地说明，贝内德蒂的确是当今拉美文坛上具有非凡造诣的短篇小说家。

朱景冬
1998年2月

目 录

短 篇 小 说

星辰和你.....	3
大迁徙	10
预算	16
预感	23
这里空气新鲜	30
恋人	36
难道无法弥补吗?	60
阿内西阿美女皇后	72
安魂曲	78
如同格林威治	84
告别单身汉聚会.....	101
让我们坠入诱惑.....	108

一片茫然	118
幻影	141
咖啡杯	148
欣赏莫扎特	155
权当证词	163
伊里亚特家的女人	172
玛格丽特·苏亚文的鳏夫们	181
百叶窗	185
他没有让步	191
报应	202
收藏	205
看马戏	214
天真无邪	217
格洛丽亚的星期六	223
午餐和疑问	231
主人的狂怒	238
他们如此友好	242
艾莉莎的照片	248
佩克布	256
惜别	262
布洛梅街上的小客栈	270
死	277
顶楼	284
戏弄的愿望	289
消防队员	296
表情	298

丑陋人的黑夜	300
另一个我	305
我要把毛里西奥叫来	307

诗 歌

每个城市都可能成为另一个	315
你有	317
罗多尔弗把现实变成	319
诗人们	321
不吓鸟的稻草人	323
打在窗上的小石块	324
缓慢但是到来	326
天堂	329
维护快乐	330
天真的国家	332
综合症	334
四面	335
宣传者何塞·马蒂	336
海上的瓶子	339
英雄	340
陈词滥调	342
那场战斗	344
可能性	346
新的洋际运河	347
回击	348

让我们破除关于银河的神话	349
当场	351
另一个天空	353
异常状态	355
手风琴	356
郊外	358
做什么?	360
语义学实践	362
两种语言的时间疗法	363
没有时间的时间	364
踪迹	366
遥远	367
日常生活 (一)	368
日常生活 (二)	370
我在彼岸	372
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	379
明天	384
鲁文祖父	386
我和小蜥蜴一起	389
恒久的蟋蟀	391
现在一切都清楚	393
儿子	395
唉叹	397
挖掘记忆	398
沙	399
地震	400

谜	402
岩石	403
仇恨	404

随笔 文论

纪念卡彭铁尔	409
纯真的加夫列尔的可信可乐的故事	414
开幕词	418
忧伤的诗人	426
半个世纪的纪念	431
关于胡利奥·科塔萨尔	433
巴尔加斯·略萨和他的小说	452
守寡的美人鱼	475
一个见过海的玻利维亚人	478

短篇小说

(朱景冬等 译)

星辰和你

罗萨莱斯是个干净的小镇，居民全都识字断文，工作勤恳。镇上有两家外国人开办的规模颇大的工厂。正方形的厂区内成天烟雾腾腾。有了这两家厂子，小镇的前途就更加明朗了。奥利瓦的父亲是小学教员，母亲是裁缝。奥利瓦长得又高又瘦，两眼漆黑，一双手软绵绵的。旁人很容易把他误认为是罗萨莱斯的一个普通居民，其实他是小镇的警察局长。他本来可以当个泥瓦匠，要么成为银行家。就是说，他是碰巧才当上警察局长的，并非生来就是合适的材料。再说，在罗萨莱斯镇已多年没人触犯刑律，警察局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就人们记忆所及，最后一次犯罪活动至少发生在二十年前。那是一桩典型的“情杀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仓库保管员堂埃斯特维兹的老婆身患癌症，无药医治。几个星期的垂死挣扎，搁在谁身上也受不了。为了让妻子少受点罪，堂埃斯特维兹索性把她杀了。还有就是深夜在广场——教堂和镇政府给广场增添了一派庄严肃穆的气

氛——上，偶而出现两三个微醺的醉汉。对他们，警察压根儿不予理睬。这些家伙醉得挺快活，嘴里哼着古老的朱隆加小调^①，把一些不三不四的笑话又拿出来谈论一番。对他们来说，这些笑话无疑都够放肆的了。其实呢，不过是些小孩子的玩意儿。

过去警察局长时常光顾咖啡馆，找牙科大夫或药店老板玩玩纸牌。有时候，甚至还上俱乐部，跟新闻记者阿罗约有说有笑地讨论体育比赛和国际政治。其实，阿罗约的本行既不是报道体育消息，也不是评论国际政治。他搞的是聪明机智又令人捉摸不透的占星学。在他主编的每日占星专栏（标题是《星辰和你》）里，阿罗约时常就近期内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谈些看法。这些看法很具体，完全可以得到验证。阿罗约涉及的领域有三个：国际、国内、本镇。他的预言往往应验，因此罗萨莱斯的妇女们，以至全镇居民都怀着敬佩的心情，注意阅读《玫瑰刺》^② 日报的占星专栏。

有件事也许值得说明一下。小镇本来不叫罗萨莱斯，现在也不叫罗萨莱斯。笔者所以给它起了这么个名字，只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如今，在乌拉圭，不但政治团体、工会和个人失去合法地位，就连某些市区、小镇和乡村也成为非法了。

由打 1973 年政变以来，警察局长奥利瓦完全变成另外一副样子。第一个惹人注目的变化是他的外表。以前，他几乎从来不穿制服。夏天，人们常见他只穿件衬衫。眼下他是

① 流行在拉普拉塔河一带的民间小调。

② La Espina de Rosales: Rosales 音译为“罗萨莱斯”，含意是“玫瑰”。

制服不离身。这样一来，他的面容、姿态、步履、行为举止都显得僵挺挺的，颇有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这在一年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再有，他很快就发胖了（拿罗萨莱斯人的话来说，就是“长膘”了），而且长势不可阻挡。

起初，阿罗约看到奥利瓦的变化，还将信将疑，以为警察局长无非是逢场作戏罢了。一天晚上，奥利瓦下令逮捕了三个常见的喝得微醉的年轻人，指控他们“扰乱治安，有伤风化”。实际上他们和往常一样，只是说说唱唱而已。当天晚上，阿罗约明白了，对警察局长的变化切不可等闲视之。第二天，他在《星辰和你》专栏里预言说，罗萨莱斯近期的命运凶多吉少。

罗萨莱斯镇上只有一所学校，学生们第一次宣布罢课。和内地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学生的年龄也是参差不齐。有的几乎还是小孩子，有的简直就是成年人。在首次罢课中，学生们抗议政变，抗议中止议会活动，抗议查封工会，抗议刑讯逼供。他们根本没料到奥利瓦已经变了，还是高举标语牌，在广场周围游行示威。没等走完第二圈，参加游行的人纷纷被捕。警察（其中有的人是“捣乱分子”的叔叔或教父）一再向学生们道歉。他们害怕说实话，可还是咕咕哝哝地说了出来：这都是“奥利瓦的主意”。不到二十四小时，警察局长从六十个被捕的人当中释放了五十个。释放前，狠狠地呵斥了他们一顿。局长说：“要是有什么拖鼻涕的小子胆敢管我叫法西斯，我可绝不答应”等等。剩下的十个人都是年岁比较大的。他们被关押在警察局里，和外面断绝了音信。黎明时分，人们清楚地听到呻吟声、求救声和撕肝裂肺的喊叫声。孩子们的爸爸，尤其是孩子们的妈妈，无论如何

不敢相信警察竟会严刑拷打孩子，可又不能不相信这是事实。

翌日，阿罗约在占星专栏里做出更加阴沉可怖的预言。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有人将采取狠毒的镇压手段，要把罗萨莱斯的生活毁于一旦。这势必引起流血牺牲，但从长远来看，他必败无疑。”镇上只有一位开业的律师。孩子们的父亲找上门去，求他为那十个年轻人辩护。波哈博士急急忙忙去找法官，到那儿一看，法官也被捕了。这可滑稽了，然而却是事实。于是，波哈博士鼓起勇气来到警察局。他刚一提到“人身保护权”、“罢课权”这类词儿，局长立刻让人把他撵出了警察局。律师决定上京告状。为了不让作父母的抱有奢望，他事先讲明，奥利瓦在蒙得维的亚很可能有靠山。果不其然，波哈博士一去不返。过了几个月，罗萨莱斯的乡亲们只好前往卡莱塔斯角监狱去探望波哈博士，给他送去香烟。阿罗约预言说：“蛮不讲理的时刻来到了。仇恨在善良的灵魂中淤积起来。”

这时候，又发生了跳舞事件。这在小镇上是史无前例的。有家工厂建造了一座供本厂职工使用的“社会交际中心”。当初建立这座“中心”的目的（这一点没有公开）是防止工人闹事。不过，应该说罗萨莱斯全体居民都在使用“社会交际中心”。每逢星期六晚上，年轻人，还有成年人，聚在一起聊聊天，跳跳舞。周末舞会兴许是小镇上最重要的社交活动。在“社会交际中心”里，大家议论一周来发生的笑话，说说谁生病了，谁康复了；许多青年男女结成良缘；还举行洗礼、婚礼。政变前，奥利瓦是“社会交际中心”的常客。大家把他当作普通镇民，实际上他也是普通镇

民。自从事变以后，警察局长整天坚守在办公室里（晚上也多半睡在警察局里“值勤”），不再去咖啡馆、俱乐部（这是故意和阿罗约拉开距离），更不去“社会交际中心”。一个星期六，他突然带着卫兵来到“社会交际中心”。只听得手风琴吱啦一响，可怜的乐队演奏的乐曲戛然停止，正在跳舞的一对对男女愣住不动，就连接着舞伴的手臂也没有松开，仿佛一只八音盒突然断了弦似的。

奥利瓦问道：“哪个娘儿们想跟我跳舞？”大家一听就知道他喝醉了，谁也没有搭腔。奥利瓦一连又问了两次，还是没人说话。屋里一片死寂，在场的警察、乐师、镇民听见一只蟋蟀从容不迫的嚯嚯声。这时候，奥利瓦带着卫兵走到克劳迪娅·奥里维身旁。克劳迪娅和她丈夫坐在靠窗的一条板凳上。她很年轻，满头金发，性情活泼，挺讨人喜欢。克劳迪娅怀了六个月的身孕。这是第一胎，她觉得身子很沉，一举一动格外小心。大夫说啦，弄不好可能会流产。

“你想跳舞吗？”局长一上来就用“你”字称呼克劳迪娅，边说边拉住她的胳膊。克劳迪娅的丈夫阿尼巴尔（他是个建筑工人）倏地站起身来。他气得要命，脸都白了。克劳迪娅连忙回答说：“不，先生，我跳不了。”

“跟我跳就跳得了啦。”奥利瓦说。

阿尼巴尔当即大声嚷道：“您没看见她的肚子吗？让她安静会儿，好不好？”

“我没跟你说话，”奥利瓦说，“我在跟她说话。她会跟我跳的。”

阿尼巴尔扑了上来，三个卫兵立刻抓住他。奥利瓦命令说：“带走。”卫兵把阿尼巴尔架走了。

奥利瓦伸出被制服裹得直僵僵的手臂，揽住克劳迪娅变了形的腰肢。他把眉毛往上一挑，冲着乐队使了个眼色。乐队重新奏起音乐。音乐根本不成调，仿佛在不住地唉声叹气。奥利瓦把克劳迪娅拖到舞池当中。大家看得很清楚，克劳迪娅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谁也不敢上前阻拦。原因嘛，就用不着说了。别的不讲，卫兵们个个都把枪亮了出来。奥利瓦和克劳迪娅一口气跳了三个“探戈”、两个“博莱罗”和一个“伦巴”。跳完“伦巴”，克劳迪娅差一点昏厥过去。奥利瓦又把她拉回板凳上，说：“你看，你不是能跳吗？”说罢，他扬长而去。当天晚上，克劳迪娅·奥里维流产了。

阿尼巴尔被囚禁了好几个月。奥利瓦居然兴致勃勃地亲自审讯他。奥里维兄弟中有一个医生，和某副部长是表兄弟。医生率领一个由本镇名流组成的代表团进京找到副部长。副部长只是劝说他们：“依我看，这件事顶好还是别闹大了。奥利瓦是政府信得过的人。你们一定要他赔礼道歉，治他的罪，他准会挟嫌报复。你们仔细瞧瞧我在干什么。我在等待，是不是？”

然而，在罗萨莱斯，阿罗约却等不下去了。跳舞事件以后，他接二连三地发起攻势。星期一，在《星辰和你》专栏里，他对罗萨莱斯作出如下预言：“某人还债的时刻即将到来。”星期二，又加了一句：“谁对弱者炫耀武力，谁就不会有好下场。”星期四，又说：“当权者马上完蛋，这是他罪有应得。”星期五，他说：“星辰无情地宣告小徒弟——暴君的小徒弟——的末日来临了。”

星期六，奥利瓦亲自光临《玫瑰刺》编辑部。阿罗约没在编辑部。奥利瓦立刻赶到家里去找他。快到他家的时候，

奥利瓦对卫兵说：“我一个人去。对付这么个婊子养的，我一个就行了，绰绰有余。”阿罗约打开房门，奥利瓦使劲推了他一把，一语不发地走了进来。阿罗约没有跌倒，也没露出吃惊的样子。他和警察局长保持一段距离。阿罗约走进门厅内权作书房的那间屋子。奥利瓦尾随在后面。记者面色铁青，紧闭着双唇，走到一张带抽屉的桌子后面，没有坐下。

“这么说，星辰预言我的末日到了？”

“是的，”阿罗约说，“这怪不着我，是星辰那么说的。”

“有件事，你知不知道？你不光是婊子养的，还是个骗子。”

“我不同意，局长。”

“还有件事，你知道不知道？你立刻坐下，写篇文章，明天发表。”

“明天是星期日，不出报纸。”

“好吧，那就星期一发表。你这么写：星辰说暴君的小徒弟长命百岁，一辈子吉星高照，身强体壮。”

“可星辰没那么说啊，局长。”

“我操他星辰的妈！你写，马上写！”

阿罗约动作十分敏捷，奥利瓦根本来不及防卫、躲闪。阿罗约只开了一枪——贴近奥利瓦的身体开了一枪。警察局长睁大两只惊恐的眼睛，慢慢倒了下去。阿罗约平心静气地说了一句：

“星辰从来不蒙人，局长。”

大 迁 徙

十分明显，这次大迁徙是由于政治原因。在国外，有的记者写道：那个小小的国家笼罩着一片令人窒息的气氛。的确，在这儿呼吸起来挺费劲儿的。外国记者又写道：那里正在进行一场骇人听闻的镇压。的确，是够骇人听闻的。可是，这些真实情况是外国记者收集起来，公诸于众的，政府认为这正是鼓吹民族自豪感的大好时机。政府把鼓吹的任务交给了总统，这也许是个失策。近来，每逢元首的声音和形象出现在收音机里或电视屏幕上，人们总是忙不迭关掉收音机、电视机。所以，居民压根儿不知道政府正在提倡民族自豪感，他们还是陆续出走。

最早出走的是所有还没被关押起来的嫌疑分子。接着，在押的和不在押的嫌疑分子的亲朋好友也开始外迁。起初，尽管移居国外的人很多，到码头和机场送行的人总归更多一些。到后来，有只船载走了一千名移民，前去送行的只有二十四个人。一个外国摄影记者冒冒失失地用照相机拍摄下这

件百年不遇的怪事，并把照片发表在一家享有国际声誉的周刊上。于是总统又不得不立刻再次出面呼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听众和观众像预防传染病似地连忙关上仅有的几台收音机和少得可怜的电视机。真有意思，政府硬是没法子惩治百姓中间的这个新习惯。自从闹石油危机以来，政府一直号召老百姓要不惜一切牺牲，节约燃料，当然还要节省电力。于是老百姓说：忍痛放弃收听总统令人心明眼亮的清晰明白的讲话，不就是最大的牺牲吗？八成儿正是因为这个偶然的原因，老百姓还是不知道最高当局号召他们发扬民族自豪感，他们还是继续不断出走。

不在押的嫌疑分子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全都移居国外以后，食不果腹的人又开始纷纷出走。这批人可不算少。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最近公布的数字，挨饿的人占人口总数的72.34%，其余27.66%的人当中绝大部分是军人、大庄园主、银行家、外交人员、“和平队”队员、摩门教徒和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这么一比，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和嫌疑分子以及“心存疑虑”的人相比，因饥饿陆续出走的人在人数上大体相等，甚至还更多一些。然而，政府还没有明白过来，相反还通过官方电台和电视台播出了一套“节食减肥”节目。

有一天，谣传澳大利亚需要大批熟练工人。马上就有三万多名工人渡海跑到大洋洲，每个人都带走了妻子儿女和专门技术。众所周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大工业家都善于迅速捕捉时机。那个小小的国家的工业家们心里明白，没有熟练劳动力，他们的工厂就难以为继。他们也立刻抓住时机，紧急改变计划，停办工厂，带着机器、美元、汽车、家

属和情妇远走高飞。只有两三个厂家留下个把职员在国内清理税务，只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交得起税。

又有一天，谣传澳大利亚还需要大批家仆，立刻就有四万名女仆、男仆等等（这“等等”当中包括一名管家，自从英国大使被绑架以后他就失业了）乘船奔赴悉尼。在牧业大寡头家里，女主人们（她们分属四至六个世家大族）心里明白，没有家仆，她们得自己做饭、洗衣服——顺便说一句，洗衣房、洗染店几个月前已经搬到国外去了——打扫房间和厕所、刷盘子洗碗。她们也迅速抓住时机，说服丈夫赶快把家搬到某个中等文明的国度。在那儿，只消按按电钮，会讲英语、法语的女佣人立刻就会应声而至，这些佣人身上没有虱子，身边没有孩子。可这儿呢，按下电铃，顶多会招来群虱子，还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有个变化。

应当承认，军人是坚持到最后的一批人。一方面军纪不可违。另一方面，当然了，他们还领取丰厚的津贴。出于对故土的留恋，他们利用合适的时机发表了一份充满乐观精神的公报。公报说，近一年里，由于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下降了35.24%。外国报刊历来居心不良，硬要出来煞煞风景。报纸指出：这一明显成就其实并非什么好事，因为在该国国土上可以被车辆压着的人愈来愈少了。国内只有一家报纸转载了国外报纸居心叵测的评论，结果被彻底查封。

是啊，军人一直留到最后。当然还有囚徒，不过他们留下来的原因和军人不同。迁徙逐渐达到惊人的程度，军官们感到愈来愈难抓到年轻人可用来施以酷刑了。不错，为了弥补这个缺欠，有时候还可以把受过审刑的犯人再拉出来收拾一顿。可在某种程度上，军官自己也失业了。他们开始寻找

借口搬到国外去住。“北方大国”在运河地区开办反游击训练班，很多人拿到了奖学金。现役军官中大约有一半人被吸引到运河地区。余下的一半人分成两派，争权夺利。双方打来打去，直到一天下午一位头脑还算清醒的上校把战友们召集到军营的俱乐部里，对他们说：“眼下没什么人可指使了，咱们还争哪门子权啊？有了权，冲着哪个倒霉蛋儿去使啊？”问题提得很尖锐，一下子把大伙儿给问住了。这个问题富有哲理，其实际结果是：第二天留下的军官中百分之九十乘船跑到国外去了。剩下的都是些新近提拔的年轻军官。头儿走光了，他们挺惬意，决定在练兵场上组织一场足球赛。可他们发现“祖国的忠诚卫士”加在一起还不够国际足联规定的人数——二十二二人。于是，只好放弃比赛，第二天也先后出走了。

军人中最后一个出走的是典狱长。离去的时候，他只向普通犯人告别，没向政治犯告别，连监狱的大门也没有关上。过了一个小时，犯人们还不敢走近大门。

“他们在耍花招儿，谁过去谁没命。”年岁最大的犯人说。

“别是看花眼了吧？”眼神儿最差的犯人说。

“这叫心理折磨！”心里最透亮的犯人说。

大家一致同意不要去冒险。又过了一个小时，外面还是静悄悄的。年纪最轻的犯人说：“我可要出去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都走吧！”

犯人走出监狱，大街上阒无一人。他们看到有两支手枪和一支冲锋枪撂在大树旁边。“要是能捡到块烤肉该多好！”最胖的犯人说。也许是出于职业的偏好，他捡起一支手枪。

一开头，犯人们小心谨慎地朝前走。后来胆子慢慢大了

起来。

“都走了。”年纪最大的犯人说。

“但愿他们把女犯留下！”心里最透亮的犯人说。大家刚要哈哈大笑，他连忙补上一句：“你们别往歪处想啊！我说这话，主要是担心咱们这儿没人传宗接代。”

“瞎说！瞎说！”有几个人高声喊道。

犯人们花了两个小时才走到市中心。广场上也不见人迹。“祖国的英雄”骑在健壮的青铜马上，多少年来第一次露出笑容。八成儿鸽子也飞走了吧，这座青铜雕像多少年来第一次没落上鸽粪。

拿枪的人缓缓推开宽大的木门，慢腾腾地走进政府大厦。其他人跟在后面。从前这座大楼是很难进入的，大家心里都不免有些发怵。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他们碰到了总统。总统站在那儿，一声不吭，两手插在黑外套的口袋里。

“您好，总统！”年岁最大的犯人说。有人悄悄地把路上捡到的手枪递给他。

“你们好！”总统说。

“您怎么没离开啊？”年岁最大的犯人问。

“我是总统啊。”

“噢！”

“越狱”的犯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用眼光询问着：“怎么处置这个家伙呢？”大家一时没找到答案。这时，年岁最大的犯人把手枪递给总统。

“先生，我们想求您件事儿：您给自个儿一枪吧。”

总统接过枪。大家注意到他的手在发抖。不过有人认为这是他抽烟抽得太多的缘故。

“我是基督徒，不知道你们知道吗？基督徒是不许自寻短见的。”

“噢！”年岁最大的犯人说，“您也不必太拘泥了。话是不错，可您只说对了一半。您是基督徒，总统先生。不过您是个狗屁基督徒。这类次等品，没人不许它们自杀。”

“您这么看？”

“我有十足的把握，先生。”年岁最大的犯人说。

总统擤了擤鼻涕，又正了正领结。

“至少让我把眼睛蒙起来吧？”

岁数最大的犯人看了大家一眼。

“让他蒙上眼吗？”

“可以！蒙吧！”大家说。

总统擤鼻涕的时候把自己的白手绢弄脏了。一个“越狱”的犯人从桌子上拿起一块餐巾，给总统蒙住眼睛。总统举起手枪，用嘶哑的声音说：

“永别了，先生们。”

说罢，他把枪口对准右边的太阳穴。

“永别了！”在场的人一起说。他们眼睛里既没有泪水，也没有流露出欢悦的光芒。

枪声很怪，仿佛子弹打进一堆烂草里。

暗哑的枪声过后，立刻响起了第一批回归祖国的青年人的击鼓声。

预 算

自从 20 世纪 20 年代，也就是我们多数人还在奋发学习地理和爬习字格线的那个时代起，我们办公室的预算就没有增加过。但主任总惦记着预算。有时，工作少的时候，他就随随便便坐在我们的办公桌上，翘着二郎腿，裤管下露出两只一尘不染的白袜，用他用惯了的五百九十八个单词娓娓动听地给我们讲述那个遥远而美好的日子。那天——那时他是首席办事员——他的主任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小伙子，我们有新的预算啦！”他讲述时满脸得意的笑容，让人觉得他已经计算过预算增加后他可以购买多少件衬衫。

追求新的预算政府部门每个办事机构的最大奢望。我们知道，其他办公室，即使人员比我们少的，也每两年或三年就能得到预算。可我们只能以鲁宾逊注视地平线期待船队出现的那种既绝望又忍耐的心情，在我们这个孤零零的行政小岛上眼巴巴地遥望着那些办公室。我们知道，不管是表示不满还是羡慕都是毫无用处的。我们的羡慕抑或不满都不会

起什么作用，因为我们办公室在最忙碌时也只有九个人，没有人关心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办公室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我们深知，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事或什么人来增加我们的报酬。因此，我们只将希望寄托在逐步减少支出上。我们实行合作主义，只购买一些必不可少的用品，这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例如，我付马黛茶钱，首席办事员助理付午茶钱，二级办事员助理付糖钱，首席办事员付烧面包钱，二级办事员付奶酪钱。两位女打字员和门卫免费，主任挣钱稍多一些，因而他付我们每个人都要读的日报钱。

我们将个人的娱乐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一个月看一次电影，并且特别注意每个人看不同的影片，以便回来后在办公室里讲述。因此我们对正在上演的电影都了如指掌。我们养成了玩那类需要思路集中的游戏，如跳棋和国际象棋，因为这不仅花钱少，而且能使人长时间不打哈欠。我们从五点一直玩到六点，因为窗口的告示牌上写明五点之后不再受理“事务”，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不可能送来新的公文。那块告示牌我们读了不知多少遍，但始终不知道是谁发明的，甚至也不知道“事务”这个词的确切含意是什么。有时有人来问他的“事务”的号码，我们就告诉他公文的号码。那人高高兴兴地走了。因此，一件“事务”可以是，譬如说，公文。

其实我们办公室的生活并不坏。主任有时甚至认为，有必要向我们指出政府部门办事机构同商业部门相比好处有许多。每逢这种时候，我们不少人觉得，发表不同的看法为时已晚。

主任的理由之一是不变性。这种不变性表现为永远不会让我们失业。要让我们失业，参议员们必须开会。而我们知道，参议员们只是在他们要向部长提出质询时才开会。因

此，从这层意义来说，主任是不无道理的。这种不变性是存在的，但另一种不变性显然也是存在的，那就是我们的工资永远不会增加，我们永远不可能用现钱去买件上衣。尽管主任也买不起上衣，但他认为现在既不是去非议他的职业也不是去非议我们的职业的时候。总之，他总是有道理的。

我们办公室呈现的那种固定的、几乎是永恒的沉静使我们满足于自己卑微的职业，但也使我们显得有点呆头呆脑，因为没有失业也就不会有失眠。然而，有一天二级办事员带来的消息打破了这一沉静。他是部长办公室一位首席办事员的侄子。消息说，那位叔叔——这样称呼没有任何蔑视，而是为了贴切——已经得知，部长办公室正在谈论给我们办公室拨一笔新的预算。起初，由于我们不知道是谁或什么人在谈论我们的预算，所以我们对此嗤之以鼻。我们很少如此嘲笑别人，好像二级办事员有点疯了或者我们以为他把我们当成了一群傻瓜。但是，当他向我们补充说，据他叔叔说谈起预算的正是秘书，也就是部里实际上的中心人物时，我们顿时感到自己每月七十比索的生活正在发生细微的变化，就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终于拧紧了那些已经松动了的螺母，仿佛有人搥了我们几下耳光，将我们从得过且过、逆来顺受的麻木中打醒。

就拿我这个例子来说吧，我首先想到并脱口而出的是“自来水笔”。直到那时为止，我从不知道自己想买一支自来水笔。但是，当二级办事员宣布的消息为哪怕是最小的可能性都开辟了广阔的未来时，我不知从什么愿望的地窖中想到了一支银笔帽的黑色钢笔，并且笔上还刻着我的名字。上帝才知道这个愿望是从什么时候起扎根在我脑海里的。

再拿别的例子来说，我目睹首席办事员助理是如何谈论

自行车，主任是如何目不转眼地瞧着他那双后跟已倾斜的皮鞋，一位女打字员是如何既眷恋又蔑视她那只用了五年的手提包。我还目睹我们是如何立刻振作起来交流自己的设想。我们确实毫不在意别人会怎么说，我们的愿望已被扼制、被遗忘了不知多少时间，因而需要绞尽脑汁想一想有没有遗漏了。我也目睹了那个非同寻常的下午，我们是如何决定用储备金去购买饼干来庆祝那个好消息的。

用储备金购买饼干仅仅是听到这消息后迈出的第一步。接着，主任买了一双皮鞋，我以十次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支钢笔。我买钢笔后，二级办事员买了上衣，首席打字员买了手提包，首席办事员助理买了自行车。一个半月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已负债累累，痛苦万分。

此时二级办事员又传来消息。消息先是说预算报告正在部秘书处传阅，后来又说不不对，不是在秘书处，而是在财务处。财务处处长病了，可是必须先听一听他的意见。尽管我们只知道这位处长叫欧亨尼奥，但我们所有的人对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关切，因为我们的预算得由他研究决定。我们多么想搞到记录他每日健康状况的病历卡啊！然而我们每天能听到的只是二级办事员的叔叔令人失望的消息。财务处处长的病情每况愈下。我们为这位患病的处长痛苦了那么长时间，以致他去世那天，我们都像这位重哮喘病患者的亲戚一样，产生了一种轻松感，因为我们不必再为他操心了。不仅如此，我们一度曾自私地快活起来，因为他的死意味着可能会任命另一位处长来填补他的空缺，而这位新处长最终可能会研究我们的预算。

欧亨尼奥先生去世后四个月，任命了另一位财务处处长。那天下午，我们暂停了下国际象棋，喝马黛茶和办理行

政事务。主任唱起了《阿依达》中一段咏叹调，而我们由于种种原因，心情紧张，以致不得不走出去浏览了一阵玻璃橱窗。我们回来时，等着我们的是一则令人气愤的消息。那位叔叔通知我们说，我们的预算报告根本还没准备交付财务处研究决定。事情完全搞错了，实际上报告还没传出秘书处。这个消息一下子使我们眼前的景象变得十分暗淡。如果有待研究的预算报告已经在财务处，我们就不会惊慌失措了。我们就可认为报告之所以迟迟没有得到研究，是因为处长病了缘故。如果报告确实一直在秘书处，而秘书处的最高领导——秘书的身体又健康无病，那么这次拖延就没有什么原因，而且可能会没完没了地拖延下去。

令人失望的时期就这样开始了。起初我们都以往常那种绝望的目光默默地相视片刻，然后再问：“你们知道什么消息吗？”后来我们干脆只说：“那事？……”最后，我们仅仅皱皱眉就算提问了。谁也不知道什么。如果有人知道些什么的话，那肯定是预算报告仍然在秘书处有待研究。

自从第一次传来那消息起已经过去了八个月。我的钢笔两个月前就不能用了。首席办事员助理由于骑自行车，已经摔断一根肋骨。二级办事员助理购买的书籍早已更换了主人。它们的现主人是一位犹太人。首席办事员买的手表一天就慢一刻钟。主任的皮鞋已经补了两次补丁，一次是缝上的，一次是钉上的。二级办事员的上衣已穿得破旧不堪，竖立着的翻领仿佛两只出了毛病的小翅膀。

有一次我们得知，部长大人亲自过问了我们的预算。一个星期后他通知了秘书处。我们很想知道预算报告说了些什么，但那位叔叔不能对此进行调查，因为那是“绝密”文件。我们

觉得这种说法简直太愚蠢，因为我们在处理那些上方夹有“特急”、“优先处理”或“绝密”字样的纸条的文件时，总是把它们同其他文件同等对待的。看来部里的人同我们不是所见略同。

又有一次我们得知，部长大人已同秘书谈论过我们的预算。由于这次谈话记录没有特殊的标签，结果那位叔叔获悉了全部内容并通报我们说，部长同意了。但部长同意了什么，同意了谁？当那位叔叔打算去调查部长同意了谁时，部长已经不同意了。于是用不着任何解释我们就明白，以前他一直是同意我们的。

又有一次我们得知，预算报告已经作了修改，将在下星期五的会议上处理。但是即使到了下星期五之后的又一个星期五，也就是说十四号那天，预算报告还是没有处理。于是我们开始注意下几次会议的日期。每个星期六我们总说：“好吧，现在我们就看下个星期五啦！看看到时会怎么样。”星期五到了，没怎么样。因此我们星期六都相互安慰说：“好吧，看下个星期五吧！看看到时会出现什么情况。”那个星期五也没出现什么情况。总之，日复一日，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生。

我已负债累累，不能再无动于衷了，因为那支钢笔打乱了我的经济节奏。自从那时起，我的收支一直未能做到平衡。为此，我的脑海里出现了我们去拜访部长的念头。

我们花费了几个下午的时间排演这次会见。首席办事员扮演部长，而主任经大家欢呼，被指定去代表我们讲话，向部长提出我们的要求。在我们都对排演感到满意后，我们便向部里申请会见。会见安排在星期四。星期四那天，我们办公室里只留下了一个女打字员和门卫，其余的人都跟部长会谈去了。同部长谈话不同于同别人谈话。为了同部长谈话，

一般得等两个半小时。有时即使等了两个半小时也没能同部长谈话，就像我们恰巧遇上的那样。我们只见到了秘书，他记下了主任讲的每句话。后来，他带着部长的答复回来了。部长答复说，我们的预算将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处理。那次会见，我们的表演比最糟糕的排演还要差许多，因为即使最糟糕的排演也没有人讲话结结巴巴。

当我们相当满意地走出部长办公大楼时，看到了一辆轿车停在门前。从车上下来的恰巧是部长。

我们感到有点奇怪的是，部长人都不在，秘书却给我们传来了他的亲口答复。但是当主任说秘书肯定已经打电话问过部长时，我们确实感到更有信心了。那时我们都心满意足，宽慰轻松。

第二天下午五点钟，我们的心情相当紧张，因为下午五点是让我们去询问结果的时刻。那天我们没怎么干活，因为我们太忐忑不安，唯恐事情不妙。谁都没有说话，甚至主任也不哼他的咏叹调了。为了慎重起见，五点之后，我们又让时间过去了六分钟。后来，主任拨通了我们都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号码，请求秘书接电话。谈话持续没多久。在反反复复的“是的”、“噢，是这样”或“噢，好的”之中，可以听到对方模糊不清的沙哑的讲话声，因而当主任挂上电话时，我们都知道了答复。只是为了确认一下答复，我们都集中注意力听主任讲：“好像他们今天没有时间。但部长说，预算一定在下星期五的会议上讨论。”

王玉林 译

预 感

我两次按响门铃后，便立刻预感到我会被录用。这些预感是我从父亲——愿他安息吧——那儿继承来的。门上有一根粗大的铜制横穿。那时我心里琢磨，如果将它擦亮，一定十分漂亮。我稍等了一会儿，门就打开了。接待我的是我的前任，或者说是将要离开的那位女佣。她的脸长得像马脸，头戴束发帽，腰系围裙。“我是看了广告后找来的，”我说。“知道了，”她咕哝道。她将我领进前厅。我扫视了一眼地上的瓷砖，接着又观察了一阵四周的墙壁、柱墩、八只灯泡的吊灯和一道板壁墙。

片刻后，太太出来了。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圣母似的笑了笑，但仅仅是像圣母的微笑而已。

“您好！”

“叫什么名字？”

“塞丽娅。”

“塞丽娅什么呢？”

“塞丽娅·拉莫斯。”

她打量了我一番后，又问我的履历。

“请介绍一下以往的工作情况吧！”

于是我结结巴巴地念履历表上的第一行：

“苏亚雷斯家，马尔多纳多街 1346 号，电话 90948；波雷略家，加夫列尔·佩雷拉街 3252 号，电话 413723；公证人佩洛内家，拉劳尼亚加街 3362 号，无电话。”

她毫无表情地问道：

“停职原因？”

于是我念第二行，声调也较平稳：

“第一家，吃得不好；第二家，大儿子的缘故；第三家，干的活太苦。”

“可我家，”她说道，“也有许多活要干啊！”

“这是可以料想到的！”

“不过家中还有一位姑娘。再说，我和我女儿也会帮你的。”

“是的，太太。”

她再次扫了我一眼。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不停地眨巴眼睛。

“多大了？”

“十九岁。”

“有恋人吗？”

“有过。”

她皱了皱眉头。为此，我只好作了一番解释来消除她的疑虑。

“是个伤风败俗的家伙，因此我们吹了。”

太太莞尔一笑，但仍没罢休。

“我喜欢这样爽快，也喜欢你的理智。我有一个年轻的儿子，所以请你既不要跟他嬉皮笑脸，也不要朝他扭屁股。”

“理智是我的特性。请放心吧，太太。”

“屋里屋外都得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忍受不了肮脏。此外，你不得有私生子，成不成？”

“成，太太！”

“乌拉·马洛拉，请您把她带进去吧！”

起初三天我只好逆来顺受。不管什么事情，只要太太瞪一瞪圆突突的眼睛，我的神经就会绷得像弦一样紧，因为太太的目光仿佛能把人的五脏六肺都看透。她的女儿埃斯特西塔却跟她不一样。她虽然已经二十四岁，但纤瘦，寡语，如同对待一件家具那样对待我。她很少呆在家里。老爷塞尔索先生更是特别。他长相粗俗，戴着眼镜，一张猪脸，身着伊里亚尔式服装，比无声电影还沉默。有一次我还发现他有越轨行为，偷偷地盯着我的乳房。相反，二十岁的小伙子蒂托却不是这样。他开门见山地向我问长问短，待我如一家人，从不借口要找张报纸什么的来同我攀谈。我可以发誓自己听从了太太的忠告，没有存心朝他扭屁股。不过我承认，我的屁股在走路时有点扭动，但确实是自然的扭动。有人曾告诉我，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位日本医生能矫正屁股的扭动，但我不能去扼杀我的禀性。久而久之，这给那小伙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起初他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屁股，后来发展到在走廊的尽头动手动脚，想干越轨行为。为了服从太太的命令，同时，我不否认，也为了我自己，我不得不制止了他十七八次。但我十分小心谨慎，决不让他觉得我太叫人讨厌。

我掌握得很有分寸。至于家务，简直太多了。太太曾说：“还有一位姑娘。”那是说有位姑娘可以帮我几天，因为到了那个月的中旬她就走了，所有的家务都得我一个人操持。“我和我女儿会帮你的，”她曾这样补充说。但她们只会帮倒忙，把锅碗瓢盆弄脏。太太挺着三层垂肉的大肚皮，并且爱管闲事，能帮谁的忙呢？我喜欢伊索利纳和布尔格尼奥两位太太，她们说完就没事了，不像她那样。可她不仅对她们不屑一顾，还装模作样地阅读《读者文摘》和西班牙语版的《生活》杂志。对此，我现在不理解，将来也不会理解的。埃斯特西塔姑娘能帮谁的忙呢？她整日忙于爆米花，在卡拉斯科网球场打网球，在霍特尔公园掷骨牌。我像我的父亲，有灵敏的预感。因此六月三日那天（那是万福的圣锥节），埃斯特西塔同小戈麦斯·塔伊波在一条不知什么小溪里洗裸体浴的照片落入了我的手中。虽然那照片没什么了不起，但我立刻藏了起来，反正不会有人知道。她们母女俩会帮谁的忙呢？所有的活都由我来干啊！我得保存好她们的蛛丝马迹。因此，当蒂托，那个年轻的蒂托眼神痴呆、手脚日益鲁莽时，我让他把我们俩的事挑明是毫不奇怪的。我用拳头教训他，理直气壮地跟他说，我可不答应你两只手在我身上乱摸，因为我们穷人唯一的珍宝便是贞操。我们有贞操就足够了。他听了，十分老练地笑了笑。正当他启齿说“小婊子，你等着瞧吧”时，太太突然走了出来，像打量死尸似的瞥了我们一眼。蒂托这白痴垂下目光，一溜烟地逃了。那时太太的脸涨得通红，仿佛跳独舞的演员演出结束时那样。她狠狠地拧了一下我的耳朵，好像我是共产党员或妓女。我对她说：“您不该拧我，刚才发生的一切恰恰与您所想的相反。”

但她哪肯罢休，又拧了我一下，可正是她拧的这第二下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缄口不言，不过把这一切都记在心上了。那天夜晚我对太太说，到月底我就辞职不干了。那天是二十三日，我还要在那里再混七天饭吃。我知道，塞尔索先生在写字台中间的抽屉里放着一张灰色的字条，我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偷读过它。二十八日下午两点钟，只有我和埃斯特西塔姑娘呆在家中。她去睡午觉后，我便寻找那张灰色字条。那是一位名叫乌尔基萨的人给东家的一封信，信里写着这样一句话：

“……”

我将那字条装进了放着照片的那只信封。三十日那天我去华盛顿街，投宿在一家既整洁又便宜的小客店里。我没有把地址告诉任何人，但我不能不告诉蒂托的一个朋友。我在那里足足等了三天。第四天夜晚，蒂托终于来了。我当着唐娜·卡塔的面接待了他。唐娜·卡塔几年前就是那家客店的主人。蒂托不仅请求我谅解，而且还带来了糖果，并问我是否愿意回去。我没有答应他回去。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对，因为自从那时起，他每晚都来看我。我们经常出入电影院，他甚至还想带我去逛公园。但我对他说我害臊。一天下午，他打算直截了当地问我究竟想怎样，那时我产生了一种预感：我什么都不想，因为我不敢去想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是他从我嘴里听到的第一件中听的事，因而很受感动，甚至愿为此去干蠢事。“为什么？”他大叫大嚷道。“如果这就是原因的话，我向你保证……”那时，他好像已说出了他下面还没说的话，因此我问他：“你当然不会有问题，可你家里呢？”“我就是我全家，”可怜的蒂托回答说。

自从我们俩关系密切后，他经常来看我。他来时总带着鲜花、糖果、杂志，但我依然如故，没什么变化。对这一点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一天下午他走进我房间时，脸色是那么苍白，以致招来了唐娜·卡塔的议论。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他同他父亲谈过了，塞尔索先生回答他说：“这正是我家所缺少的。”但后来他的态度软了，没了主见。他真是个软骨头！埃斯特西塔姑娘嘲笑了我们约有两年时间，但她的嘲笑对我来说有什么要紧呢？太太总是骂骂咧咧。她骂蒂托是个白痴，骂塞尔索先生是个窝囊废，骂埃斯特西塔是个道德败坏、恶习难改的坏姑娘。后来她干脆说：“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她每次都要唠叨约摸三分钟。“她大概疯了，”蒂托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知道该怎么办。周末太太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家里，因为塞尔索先生总去埃斯特角^①，埃斯特西塔总去打网球，而蒂托总带着巴斯孔加达客店的情人外出。有个星期六他没来，晚上七点我便去铸币商家打电话。拨完 97038，便传来她的声音：“喂……”她的声音依然那样鼻音浓重，令人难忘。此时她一定刚从绿色的床上跳下来，头上扎着裹头布似的毛巾高高兴兴地抓起电话。“我是塞丽娅。”在她还没挂电话前我抢先说道：“请您别挂。太太，我说的事您会感兴趣的。”那时她连个“嗯”字都不会吭一声，却认真地听着。于是我问她是否知道塞尔索先生的写字台里放着一张灰色的字条。她沉默不语。“那我告诉您吧，字条在我手中。”我接着再问她是否知道埃斯特西塔姑娘同小戈麦斯·塔伊波一起洗澡时拍的照片。

① 乌拉圭的旅游胜地。

她又沉默了一分钟。“那好，照片也在我手中。”我等待了一会儿，看她有什么疑问，但她仍然默不作声。此时我便说：“太太，请您好好考虑考虑吧！”一说完我就挂电话。电话是我挂的，而不是她。她一定还愣愣地呆在电话机旁，头扎毛巾，嘴里骂个不停。我干得真棒！一个星期后，蒂托得意洋洋地来到我房间，还没到门口就嚷嚷起来：“老婆子让步啦！老婆子让步啦！”她确实让步了。此时我也差一点叫喊：“太好啦！”我太激动了，让他吻了我。“老婆子不反对了，但要求你不要上家门。”她不让我上家门？这事真是第一回听说！好吧，我们二十五日结婚！两个月前的今天，我们结了婚。虽然没有神甫，但有律师证婚。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塞尔索先生签了一张一千比索的支票，虽然数目不大，但表达了他的一份心意。埃斯特西塔给我发了一份贺电，尽管我将它公之于众不太礼貌，但我还是得那么做。她让我仔细考虑考虑。“你别以为自己胜利了。紧紧拥抱你们，埃斯特。”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回忆。昨天我在商店里遇见了太太。当时我们都站在柜台前，手腕碰着手腕地在付钱。她突然撩起头巾，偷偷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此时我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假装不认识，要么窄路相逢。我选择了第二条路。

“您好吗？”为了侮辱我，她用“您”同我打了声招呼。此时我灵机一动，紧攥着尼龙伞，镇定自若地回答说：“我很好，妈妈。您也还好吗？”

这里空气新鲜

“我们坐这条凳子吗？”老头子问道。

“坐那条更好。那里树荫更多。”

尽管没有人想同他们抢占那条凳子，但古斯塔沃还是觉得应该跑过去才能确保占领它。父亲则将上衣搭在胳膊上，不慌不忙地跟在他后面走过去。

“这个幽静的地方空气真新鲜！”老头子说道。为了表明这一点，他有意吁了口气。接着，他挪了挪身体，抽出烟袋，在叉开的双腿间卷了一支烟。

那是一个星期三的早晨。上午十点钟，普拉多公园里空无一人，十分幽静。有时，由于四周太静，以致能听见的最近的噪音是米兰街上一辆电车发出的金属撞击声。一阵阵令人心旷神怡的微风吹得两棵孪生兄弟般的松树不时轻轻摇曳，也吹得洒满阳光的草坪上的几片树叶四处飘舞。除此之外，见不到别的东西。

“你什么时候又要去工作？”

“明天。”父亲舔着卷烟纸，愉快地笑了起来。

“你如果能像这几天一样总呆在家中，那该有多好啊！”

“那你喜欢跟老头子呆在一起啰！”

古斯塔沃领取奖金似的接受这番充满情谊的话语。一种亲切感使他非说些什么不可，哪怕随便聊聊。

“你在办公室做些什么？”

“我……我工作啊！”

“但……你做什么工作呢？”

“起草公文，签发决议……”

霎时，古斯塔沃眼前仿佛看到父亲趴在一张高大的办公桌上，签发、起草着一本本厚得像《圣经》的决议和公文。他立刻将这一影像搬到了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

“那你还是个头！”

“当然！”

小伙子向后仰了仰身体，双手搁在腰间，爱不释手地抚摸着蓝色松紧皮带。老头子经常给他带回一些小礼物。他总能猜到儿子最想要的小玩意儿。

“只要我通过入学考试，准能进你的办公室工作。”

父亲得意地笑了起来。

“你疯了，你这年纪还不能工作。再说，我想让你读书。”

老头子凝视着那两棵孪生兄弟般的松树，吞云吐雾地抽着烟。古斯塔沃十分清楚父亲对他的期望。

“你喜欢哪门功课？”

“历史。”

古斯塔沃撒了个谎。他喜爱数学，但承认这一点无疑等

于让自己继续学习建筑学，或者像蒂托的哥哥那样学习工程学。

“没有任何专业是以历史为基础的。”

“正因为这样，最好是你的办公室雇用我。”

父亲纵声大笑。显然，他对自己儿子的这个诡计感到很开心。

“这样，历史就……如果一个人不能像一台机器那样会加减乘除……”

古斯塔沃顿时两颊通红。他经不起夸奖。他想进办公室工作，坐在父亲高大的办公桌旁边，递给他需要批示的公文并在他的签名上涂上催干剂。

“我不会向办公室推荐你的，”老头子费了很大的劲才吐出一根烟丝，说道。

就在这时，小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穿黑色衣服、走路像鸭子似的摇摇晃晃、慢慢悠悠的人。他肯定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妈妈曾说，读书无用。”

“你可怜的妈，她累啦！有时她自己都不知道她在胡说什么。”

“但是……”

“而你的日子过得并不累。所以我不喜欢听到你这样说。”

父亲说完便板起了面孔，使古斯塔沃感到自己很渺小。此时那个鸭子似的走路的人已近在咫尺。他收住脚步，打量着一棵南美杉。

“难道我读书不成，跟你一起工作也不成吗？”

“难道我真的不能让你过上安宁的日子吗？”老头子既带嘲讽又深思熟虑地自言自语道。“全部加起来，充其量我们再有八年的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古斯塔沃知道，父亲同往常一样总是对的。他觉得自己在扮演傻瓜的角色。但此时，父亲也心领神会地笑了起来。不过，那微笑只是映现在他薄薄的双唇上和两只充满慈爱的眸子里。

那个鸭子似的走路的人已经站在他们跟前。

“您好！”他打了个招呼。

“您好！”老头子应声道。显然，他没有见到他走过来。

“这是您儿子吧！”

“是的。”

看得出老头子很讨厌他。那个鸭子似的走路的人长着两只小眼睛。他向古斯塔沃伸出了一只粘乎乎的手。

“您瞧，今天能在这儿遇见您真是太巧了！您放假了？”

“是的。”

“我要去拉劳尼亚加收几笔数目不大的款子，但阳光太美，我就穿过马路到这儿来了。”

“确实，这儿空气很新鲜，”老头子为了说点什么，插话道。

那时古斯塔沃也感到很不自在。如果那家伙肯走开，他愿意给他任何东西。但是他没有走开，而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于是古斯塔沃盯着他仔细打量起来。那人上衣口袋里露着一块大概是白色的手帕，裤子的膝盖上有一块既粗糙又显眼的补丁。

“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呢？”

“明天。”

“那好，明天我去看您。”

父亲显得激动不安。他扔掉了烟蒂，又用脚踩了一下。他突然做了个怪相，好像是做给儿子看的。古斯塔沃虽然没有领会那动作，但完全明白父亲讨厌那个家伙。相反，那家伙却一点没察觉。

“是不是我得给您送件小礼物您才会按那种方式付款？”

此时父亲脸上露出了绝望的表情。

“我们明天再谈吧！明天……”

古斯塔沃觉得自己几乎失去了理智，只剩下可怕的好奇心。有一次，他曾朝满脸雀斑的法里亚斯的鼻子狠狠地揍了一拳，仅仅因为法里亚斯说：“昨晚吃晚饭时，爸爸说你家老爷子是个老奸巨猾的东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一张面值一百比索的发票……您觉得怎么样？”

“我们明天再谈吧！明天……”

古斯塔沃发觉，父亲仿佛一下子衰老了十岁。父亲又穿好上衣，合起双腿后俯下了身子。

最后，那家伙终于有点明白了。

“那好，我走了，再见，朋友！”

老头子没有作答。古斯塔沃几乎没有碰那家伙既发软又粘乎的手。那个鸭子似地走路的人摇摇晃晃、慢慢悠悠地走开了，享受着阳光，背上搭着那件衬里已经绽开了线的上衣。

父亲毫无表情地站起身，朝和那家伙相反的方向走去。此时，古斯塔沃发觉自己的手拉着老头子既干燥又粗糙的

手。有时母亲会取笑他，因为他仍然喜欢别人拉着他的手走路。

父亲头也不抬，一个劲儿地干咳。小伙子凭直觉意识到，某些事情需要父亲作出解释。他多么希望请求上帝来替父亲把某些事情解释清楚啊。

“你最好别告诉母亲我们遇见了这个人。”

“不会告诉。”

古斯塔沃确实还不清楚父亲出了什么事。突然，他松开自己的手，将它插进裤子口袋。他咬着嘴唇，直到咬出鲜血。

王玉林 译

恋 人

一

起初，我总在自己这边的人行道上隔着马路同她打招呼，而她总是慌慌张张地挥挥手作为回答。随后她用指关节叩着墙壁，蹦蹦跳跳地走了，走到拐角的地方，她头都不回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从一开始我就喜欢她长长的脸、傲慢的神态和那件令人难忘的蓝上衣，因为这件上衣更像是男孩穿的。玛丽娅·胡莉娅左面颊上的雀斑比右边的要多。她十分好动，似乎永远处于娱乐之中，而且玩起来不要命。她也扎辫子，把她麦秸色的头发扎成几条扫帚式的小辫，额前还爱留个刘海儿。

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那时我们家的老头子已开办小百货店，妈妈总开着留声机抄写《金黄的披肩发》的歌词，而我则坐在朝里院的五级大理石台阶上纳凉。星期一、三、

五的家庭女教师安东尼娅·佩雷拉常常在用紫墨水写得清清楚楚的分数运算题下画一条侮辱性的红线。有时她还低声抱怨说：“哎哟，我的上帝！你都十二岁了，还不知道公分母是怎么回事。”那年我十二岁，因此是1924年。

我们居住在中心大街上，但整条七月十八号大街在一个拥有八十个街区的城镇中算不了什么。我是唯一不睡午觉的人。我透过百叶窗向外张望，有时耐心地瞧上一刻钟都不见有个活人从这条街上走过，甚至连科米萨里奥先生家的那条狗也不来这里。正如黑人埃乌塞比娅经常唠叨的那样，那条狗远不如科米萨里奥先生恶毒。

一般来说，我不会把时间白白地浪费在无精打采的观望上。用完午餐之后，我就爬上阁楼，但不是去研究公分母，而是如饥似渴地去阅读儒尔·凡尔纳^①的作品。我总是坐在地上极不舒服地往前探着身子读书。这样读书带来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不是腿肚剧烈痉挛就是肚皮肌肉受到严重挤压。但这有什么要紧呢？不管怎么说，关闭同外部世界和妈妈联络的大门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这绝不因为我是个性情孤僻的人，更不是出于害臊或身体不适。这样做仅仅是伪装而已，目的是想让自己支配这两个小时，在粗糙的白色四壁中间建造一个自己的内心世界，并静静地坐在一束束阳光下读书，仿佛守护着凡尔纳，让他呆在阴影之中。

那些下午，甜蜜的酣睡和死一般的沉静由于远处的喧嚣、近乎窃窃私语般的叫喊声、难以辨清的嘈杂声以及汽车喇叭声（那种龌龊气的喇叭声我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而变

① 儒尔·凡尔纳（1828年～1905年），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

弱了。眼前是一望无际、万里无云的天空，仿佛是又一道墙壁。有时，天空单调得令人发困，两张眼皮沉重得好似压着铅块一样。最后，我的脑袋终于倒向一侧，靠在墙上，直到石灰粉塞满了我的耳朵。

我对自己的童年没有太多的留恋。相反，对那间空空荡荡的阁楼怀有一种痛苦的回忆。那是一间既没有摆放家俱又没有书架、墙壁粗糙、天花板火热、铺着甜菜色细砖的阁楼。

孤独是友谊不牢靠的替代物。我没有多少朋友，只有阿拉姆布鲁孪生兄弟、药剂师维埃特斯的儿子、蒂托·拉戈马西诺、阿尔贝托堂兄弟俩以及华盛顿·卡尔多纳经常来我家作客，因为他们的母亲同我母亲长期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的纽带是她们共同的习俗、你来我往的玩笑和她们共同加入的社团。就如今天人们谈论同届毕业的专业人员一样，1924年省城的妇女感到，自从在一次历史性事件中相遇后，她们就成了朋友。那个事件便是第一个社团的成立。例如，如果有人“我同埃尔维拉和特雷萨是一起加入第一个社团的”，这话虽说平平淡淡，却意味着一条几乎是坚不可摧的纽带将她们三人连结在一起。有时，如果社团的一位伙伴由于一件料想不到的事情不得不去旅行或做她不愿做的事情而脱离了集体，这种不恭的态度马上会使她被列入最不可信赖的背叛者名单。

尽管我们的这些母亲是朋友，而且在广场、乌拉圭俱乐部、古铁雷斯大百货商场和客厅里仿佛长毛绒那样的昏暗中见面时总是吻个不停，但这却不能决定她们最杰出的后代能够和睦共处。我们每一个人都曾陪伴母亲去作每周的拜访，

但总是一说完“我很好。堂娜恩卡尔纳西翁，您好吗？”那句客套话，就主动走进里屋，同女主人家的孩子们一起游玩去了。玩得最多的是朝树上掷石块，或者不失时机地厮打，在地上滚作一团。结果是口袋扯破了，衣领再也竖不起来了。如果说我不常滚打，那是因为怕玛丽娅·胡莉娅知道。玛丽娅·胡莉娅虽然脸上有雀斑，但常以微笑来面对这个世界。她的微笑总流露出令人心满意足的谅解。令人好奇的是，那种谅解也包括对成年人的谅解。

玛丽娅·胡莉娅比我小一岁。但是每当我同她讲话时，我不得不先克制住自己的腼腆，因为这种腼腆会把我同父母亲、安东尼娅·佩雷拉以及所有我尊敬的人的关系搞复杂。

她住在三十三号街，离广场只有四个街区。但是她经常路过我家小百货店，每个下午至少三趟。我至少听到别人跟妈妈和埃乌塞比亚说过这事，但关于她父母亲的死始终是一个不准谈论的话题。蒂托·拉戈马里西诺向我提供了在他家厨房里流传的说法：她父亲曾是共和国银行分行的资深雇员，伪造了四份文件，诈骗了区区二万五千比索，在还没有被人发现时就自杀了。据同一谣传，不久后“她母亲也悲痛而死”。

因此，镇上的人在同玛丽娅·胡莉娅接触交往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几乎是矛盾的感情：既同情她又蔑视她。她是诈骗犯的女儿，因此声名狼藉。所以即使在省城这样一个不大的地方，她也并不是一个特别令人向往的伙伴，更不是女孩子们能够接受的玩耍伙伴。但不管怎么说，她是无辜的。这一说法由奥古斯丁神父做了适当的传播。奥古斯丁是个大腹便便的加利西亚神父。他利用对虔诚的大力赞扬来严厉鞭答

自杀者，又说：“没有同情心的人是不可能踏上天堂的门槛的。”这种双管齐下的做法带来的结果是，那些善良的人在街上遇见玛丽娅·胡莉娅时总是笑脸相迎，甚至伸手抚摸她蓬乱的头发，然后低声说道：“真可怜！她可没什么过错啊。”这样，他们就算尽了一个基督教徒应尽的仁慈之心。但同时这也使各家各户积蓄力量，以便在时机来临之际猛力关上大门，将她拒之门外或赶出儿童游乐园，让她感到自己已被打上诈骗犯女儿这个烙印。

二

如果事情仅仅取决于我母亲的话，我相信我就不可能经常同玛丽娅·胡莉娅见面了。一般来说，我母亲能够同情和宽容别人，而不是埃乌塞比亚所说的那种铁石心肠的人。但是，她囿于那些由批发商、药剂师、店主、银行家和公职人员组成的高傲的“杰出人物”编造的条条框框。还有，事情也取决于我父亲。他可能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是个胆小鬼，神经衰弱患者，但他绝不容忍那些变着法子不讲正义的三教九流。当然，他执仗正义时，也有一点固执己见。对于那些没有明确界线的事物，一个人不可能有绝对的把握。再说，只要他固执己见，他就不再会是正确的。

因此，有一次我们用晚餐时，妈妈流露出镇上贵族见到诈骗犯女儿时那种嫌弃她的态度，便足以使老头子主动地站到那小女孩一边为她辩护。

这样，我的孤独就结束了，但不是后来我三十岁时沾上恶习后产生的那种既悲伤又痛苦的孤独，而是诱人的、四处

寻觅的孤独。那是独特的孤独，它每天下午都在多面堡似的阁楼里等待着我。这种孤独一直持续到城里的人午睡正酣时发出的平静的脉搏声传入阁楼。有一天，穿蓝色上衣的玛丽娅·胡莉娅闯入了我心灵的最深处。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件蓝上衣，因为上衣的影子映在石灰墙壁上，好像投影在一个天蓝色但轮廓恍惚不定的光环上。

一天下午，她征得我父亲的同意后来到了阁楼同我一起玩。让她呆在阁楼里是则令人惊讶的消息。此外，我担心她会征服我的胆怯。但起初这并没有使我懂得那件事意味着我做事糊涂，因为玛丽娅·胡莉娅进入了 my 征服的领地并在那里扎下了根，好像她和我对那阁楼拥有同等的权利。而事实上她是刚进入的，我却在那里花费了一年半时间才想象出这块坚不可摧的藏身之地中的每样东西与什么相像。那边墙壁上的每一个斑点都具有我觉得与什么东西相像的轮廓：一个老奸巨猾的走私犯的脸蛋，一只没有耳朵的狗的侧影，一艘双桅帆船的船头。确切地说，玛丽娅·胡莉娅的闯入只对蓝色的天花板、客观存在的四壁和窗户产生影响。那块地方只不过被她临时征服，因而在她这个闯入者的靴子下面，阁楼里的每件事物依然没有改变。我就是这样在秘密的监视中保护着阁楼里我想象出来的事物。玛丽娅·胡莉娅虽然能够看到四面的墙壁，但她无法懂得每个斑点代表着什么。也许，她也能望着天际出神，但在寂静中不会辨别远处的喇叭声和已经减弱了的断断续续的叫喊声。有时，我仅仅为了确认自己仍拥有这块私人小天地，总问她这个或那个斑点像什么。她先是瞪着眼睛瞧一瞧那墙壁，然后像一名颁布法律的人那样，用简洁、准确的嗓音宣布：“那是一个马头。” 尽管我知

道那实际上是一只没有耳朵的狗头，但我的脸上并不因此而流露一丝讥笑，嘴里也不说一句瞧不起她的话。

在那段时期内，并不总是她摆出一副支配人的架势而我则施展计谋摆脱别人的支配。玛丽娅·胡莉娅偶尔也会出人意料地让人信赖。我觉得尽管她又激动又自豪，但心里还是承认我的地位和权利的：我是她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我知道全城的人都把我视作一个小丑。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爸爸在银行搞了个小骗局，后来他自杀了。”她是这样称呼那次诈骗的：不是诈骗，而只是个小骗局。她讲话时那种精心伪装出来的自然令人觉得她在讲述的好像不是死亡和犯罪，而是玩具或圣诞节。“姨妈常说，人们谴责我爸爸的不是那次小小的诈骗，而是他的自杀。”

她讲的那个话题使我感到迷惑不解。我家没有说话开门见山的习惯。我妈妈最拿手的好戏便是说话转弯抹角。而我家老头子总是过分沉默寡言。为此，天知道为什么，我确实没有养成直率的习惯。因此当玛丽娅·胡莉娅用这个问题威逼我时，我没能直截了当地回答她。“你是怎么想的？难道自杀是一种胆怯行为吗？”当年她才十一岁，但十一岁的女孩就问那样的问题了。当然，她使我陷入冥思苦想。有时她走后只留下我一个人在阁楼里时，我左思右想，总也琢磨不透。半个小时过去了，我非但没能解决任何一个关于儿童心理变态的问题，反倒像个大人似的感到头痛不已。

我最终没能想象出自杀是怎么回事，也没能把平淡无奇的死亡想明白。但是我知道，死亡至少是总有一天会来临而用不着去寻觅的事情。相反，自杀是因为对没有太大意义并

令人厌恶的虚无有好感。那是可怕的，几乎是神经错乱。这种神经错乱究竟是勇敢还是胆怯，对我来说仅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但是请不要以为我们是两个变态的孩子，是那种在随便什么时代、随便什么家庭会突然发动叛乱来改变儿童性格和习惯的小妖魔，是那种不去玩布娃娃或陀螺而去绞尽脑汁开方求根或谈论演绎推理的怪孩子。不，我们不是那样的孩子。只有现在我才觉得，那些严肃的话题具有一种那时并不具有的重要性。只是后来我同神秘或死亡有了接触，我们那时的对话才具有死亡或神秘的光环。当年我只有十二岁，她才十一岁，自杀、虚无还有其他更令人不寒而栗的话题仅是书本或游戏中一段简短的插曲。

这种暧昧的局面终于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被打破了，但不是在阁楼里而是在广场上。那天，我跟母亲一起从古铁雷斯大百货商场回来，而玛丽娅·胡莉娅同姨妈一起上那家商店去。在阿蒂加斯^①半身塑像前，我妈同她姨妈打了招呼，所以我们都在大庭广众之下站停下来。其实她们仅是寒暄而已。当她们讲话时，我和她都默不作声地老老实实站在一边，仿佛两台器械。当时我对此并不理解。我胆子小，这是很清楚的，可她呢？就在那时，她姨妈突然扫了我们一眼，对我妈说：“您瞧，阿美莉娅太太，他们真是分不开啦！”真该死，她在我母亲面前那样说我们。“确实，他们是好朋友，”我母亲痛苦地同意道。但我妈妈的话并没有把对方的

① 何塞·赫瓦西奥·阿蒂加斯（1764年～1850年），乌拉圭军人，被称作乌拉圭独立之父。

话题扯开，她姨妈反而变本加厉地说：“他们何止是好朋友，他们实际上已经形影不离了。”接着，她又令人讨厌地挤挤眼，以示我们之间的暧昧关系，并且补充说道：“阿美莉娅太太，谁知道他们以后会发生什么呢？”此时，玛丽娅·胡莉娅臊得无地自容，整个紧贴着蓝色上衣领口的颈脖涨得红斑点。我的耳朵也突然感到火辣辣地发热。这时，她姨妈又以刺耳的放肆声音说道：“阿美莉娅太太，您瞧他们脸都红了！”那时我妈重重地按了按我的肩膀说道：“我们走了！”我们都道了再见，可我在道再见时，眼睛却紧紧地盯着阿蒂加斯半身像。只是在我和妈妈走进布里格诺莱药店去买薄荷醇白垩时，我才意识到她姨妈说的话是正确的。

两天后在阁楼里发生的事恰巧证实了她姨妈说的话。那天，我在阁楼里阅读《贝托尔多老子、贝托尔多小子和卡卡塞诺》。那本书很有趣，但我没笑出声来，因为我在默读时从不笑出声。我猛然抬起头，不想遇见了玛丽娅·胡莉娅的目光。我看到她抿着上嘴唇，激动不安地朝我笑了笑。“你是不是不能念出声来？”我当然能念出声来，但我念头一转，觉得为什么要和她唱反调呢，因此我点了点头。“你知道吗？”我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她的回答。“因为我们是恋人。”我合上了书，将它搁在一旁，接着又叹了口气。

三

“一个右派分子，”阿米尔卡·阿雷东多指着棺材说。我本想抬头看看那家伙，但仅仅为了瞧一眼他的模样和他脸上飞扬的神采。他是个不露声色的人，不仅使我家老头子倾家

荡产，而且还让他病得卧床不起。

“他不适合移居。他是个离不开故土的人。大家让他从镇上搬到城里，现在看到他完蛋了吧！”此时，我扫了阿雷东多一眼并替我的教父帕拉西多点了支烟。阿雷东多的脸半是内疚半是傲慢。“婊子养的，真恶心！”我低声骂道。他大概注意到了我的目光，因而走过来抚摸我的后颈。“鲁道夫，得忍着点。得学一点你家可怜的老头子的勇气。”我确实应该听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我到哪儿去学可怜的老头子的勇气呢！

可这跟阿雷东多有什么干系呢。他像这里或内地许多人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无赖。他早看透了老头子的弱点。或许也没有看透。或许老头子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条道路会使他倾家荡产。阿雷东多同许多人一样，是个十足的无赖。不是所有的受害者都会死去，但我那位总是沉默寡言的老头子却死了。

老头子没能适应移居生活，这是确凿无疑的。在蒙得维的亚，他感到百无聊赖，因为他没有了摆在磨损得破旧不堪的柜台上的各种商品，没有了在柜台前对挂满彩带的物品挑三拣四的老主顾，也没有了购买丝光线的老处女。三十年中他渴望过休息，但一旦真的得到休息，他已经老态龙钟，目光滞呆，越来越沉默寡言，不爱动弹了。

当时我能够理解他，但妈妈却不能。移居后，她一度曾念叨自己对乡镇生活的留恋，不厌其烦地诉说城市如何让她感到窒息。但是十五天后她就结交了许多朋友。她的朋友都是些戴长柄眼镜、横宽竖高、精力充沛的太太，她们七嘴八舌地开玩笑，全心全意地做善事。她们心平气和，因为她们

的儿女经常出入“神圣之家”，丈夫经常去“木球俱乐部”，因而她们总是更乐意原谅自己小狗拉的粪便，而不是女佣们的回答。那些女佣都是心地善良的家庭妇女，她们总是坐在各自的门厅前，眉飞色舞、指手画脚地评论街区里三四个活泼可爱的姑娘发生的身心变化。

妈妈没能理解他，因为她总是病态地爱交际。但是我确实理解老头子。我不需要花多大的劲，只需轻描淡写地描述一番自己在移居后的最初反应和不适并将其夸张到滑稽可笑的地步，我就能理解他了。

自从堂西尔贝贝格买下那小百货店之后，一度出现了一段节日般的时期。妈妈吃饭时总是高谈阔论，做各种各样的计划，摆设想象之中的家具，设计未来的地毯。此时，爸爸总是笑个不停，但那是一个虽然不厌恶劳动但已退了休的人发出的没有欢乐的苦笑，他的表情既可爱又沮丧。他退休，仅仅是因为他该休息了。他在乡镇那边进行的最后一次盘店、朋友们的告别和他的继承人开始掌柜，所有这一切依然是他生活的支柱。老头子来到蒙得维的亚之后，在塞罗拉尔哥街租了套房子，但他的精神却垮了。我认为，他大概觉得生活已经变得既没意思又没了支柱。

有时我故意走近他，试图同他聊聊。我打算带他去看足球比赛，看电影，或者就出去散散步。他只同意去散步，而且还是每十天才去一次。我们总是乘坐商业公司嘈杂的电车去布拉多公园。路上他沉默寡言，乐观主义者会以为他完全被行人、汽车和街道两旁浓密的树林深深地吸引住了。其实他什么都不去看。他只不过是听人摆布而已。他同意去散步，仅仅因为他喜爱我，让我相信他在消遣解闷，让我真正

地感受到自己是有影响力的，不仅有自信心而且也有极大的感召力。

一天下午，他在树林中漫步一阵之后，坐到一张凳子上。那时他问了我一个问题。由于他从来没有这样问过我，我感到很痛苦。他问：“对了，现在你已经二十岁，你已经可以投票了，你是个成年人了。你有什么担忧的事吗？”我的回答是空泛的，因为他对我的回答不会在意。他提了这个问题就算完事了，他不想在同一良知上撞击两次。

当阿雷东多手里捏着一叠伪造的信件出现时，他行骗的条件已经成熟。他之所以出现在我家，是因为他想用老头子在小百货店里做买卖赚来的为数不多的几千比索、老头子证券的红利和另外一笔保险费去赚大钱。那保险是以我的名义投的，那几个月已快到期。我家接待了他，老头子被他那一套花言巧语说服了。要不是老头子而是换个别人的话，那番话早让人烦透了。那天夜晚，用完晚餐后妈妈在厨房里忙活，我问她：“你没见到他长着蠢驴似的脸吗？你没看出他是条寄生虫吗？”“可能是吧！”她说完后便未再发一言。她没有再说什么。仅仅是四天之后，我家就同意了阿雷东多的计划。他听到这消息时，笑得嘴都合不拢了，两只眼睛不知不觉地透露出他肮脏的灵魂。其实他自己都没料到能交那么好的运气。

自然，从菲埃科萨公司的股票到系列贷款不仅没赚钱，而且赔光了老本。妈妈大叫大嚷了四个小时，后来得了一场大病。她身体刚刚恢复，就自早到晚指责老头子投资不当。或许，老头子没有把那种唠唠叨叨、喋喋不休放在心上。或许，他相信自己的直觉已经一下子全部被摧毁。确实，大赔

本使他形容憔悴，精神垮台。从此他一蹶不振。当妈妈意识到不能再指责他时，医生也宣布说他患了血栓病。

眼下，老头子就躺在阿雷东多和我身旁的棺材里。我的忧伤超过了精神能承受的程度，因为这种忧伤也是肉体上的。我瞅着自己的双手，而那两只手也沾满了忧伤。直到那时我才听说“愁眉苦脸”这个词。我的心里掀起了一股罗曼蒂克的波浪，领略着一种令人惬意的忧郁。我感到悲伤，沉重，忧愁和空虚。此时，我感受着的忧愁有点令人窒息，具有黏性，宛似一种难以从脸上刮下来、从肺里和胃中取出来的冰冷的东西。或许，我本该为他盼望一种美好的生活，而且最好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我知道，如果他的生活中有充满活力的激情、令人振奋的仇恨，以及能使他的双眼见到，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力量的某种东西就好了。这股力量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让他感到自己掌握着一个真理。

确实，我们俩情意深厚。但这有什么用呢？也许我们俩互相一点都不了解。我们俩的精神没有能够互相沟通，这使我们一直小心谨慎地保持一段距离，总是推迟我们之间坦率真诚的思想交流。要是换了其他种种原因，我们是完全可以进行交流的。眼下，他僵硬地躺在棺材里，既没得到安息也没彻底地死去。所有的关心照顾都将是徒劳的，就像最后一次延期也已不可挽回地过了期，这时任何雄辩的理由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一样。

我睁开眼睛，阿雷东多已不在。我舒心地吐了口气。但是我感到有一只手按着我的肩膀。那只手很轻柔，或至少说它没有想压迫我。我没打算去猜，也没打算预测那是谁的手，可我想准是那个人，那个人就是她。总之，我想到是玛

丽娅·胡莉娅，尽管这很不正常。也许因为我累了。自从我们搬来省会后我就没见过她。但是那人就是她。我先是握住了她的手，后来让她坐在我身旁的沙发上。我没有哭。“她真能体贴人，”我想。当时我感到自己十分可怜。一只感情的楔子在忧愁中渐渐打了进来，它使我回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一段童年生活。眼前玛丽娅·胡莉娅长得更文静了，当然也更高了，但或许对自己更没信心了。她脸上的雀斑少了，并且也不再穿蓝色上衣。

她沉默了一阵。她的目光流露着不寻常的悲哀。显然，她在打量我，但眼睛里也流露着热情。她已经寻回往事，正确无误地回忆着过去。

从那时起，我感到自己的情绪好多了。

四

玛丽娅·胡莉娅的家在但丁街。去她家，我总是坐同一张椅子，面朝同一幅寓意画，手指总是叩着同一张橡木桌面。那幅寓意画上画着一个裸体妇女，脸色苍白，只能见到两只眼睛。她安然无恙地屹立在一堆可怕的火焰中，无数的火苗仿佛一个个魔鬼的脑袋。我总在晚上九点到她家，接待我的一般都是她姨妈。她总是穿着无可挑剔的黑色衣服，衣服的胸口绣着花边，让人隐约见到她非常松弛的肌肤，还显眼地露出两条紫色的凹痕和两个对称的疣。它们极大地损害了上帝或至少是教皇在漫无目的地创造人体时的美感。

“姑娘，你未婚夫来了！”姨妈一边说，一边回头朝屋里张望，将浊音“V”发得只有某些一年级女教师才能念出来

的那么准确。玛丽娅·胡莉娅总是在房间里大声回答说：“鲁道夫，我马上就来！”那时，我不得不跟姨妈进行十五分钟的一问一答，因为她总是一个劲儿地询问我的工作、政治以及桀骜不驯的野牛。

其实她并不需要我一一作出回答。只要她干咳一声，我们的话题就会终止。因此她的干咳声几乎还没有在平淡无奇的花边上回响，她就能在所有落入她视线、知觉和幻觉的事物中找到某种罪恶的东西。她的幻觉确实不丰富，甚至也不集中，但蕴藏着一种加工提炼流言蜚语并使之重新传播的积极作用。

玛丽娅·胡莉娅终于走了出来。“她今天是不是很漂亮？”姨妈问了一遍又一遍，而我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沉思，连客套话都没有说。那是一位正在脱去稚气，逐渐走向成熟的二十八岁的漂亮姑娘。她的头发又短又乱，两条胳膊光溜溜的，穿着清一色——一般是墨绿色或咖啡色——的朴素连衣裙，头上扎一条色彩鲜艳的束发带，腰间系一条有金黄色卡子的宽腰带。

她摸了摸我的手，但立刻又把她的手收了回去，马上坐在第二张椅子上。椅子的坐垫污迹斑斑。那时姨妈总会对我说：“鲁道夫，请你让一让！”她猛力迈出步子，那步子似乎到厨房前是收不住的，其实刚到隔壁房间前就收住了，她站在那里监视我们，随时准备在我们第二和第三个吻之间走出来。

姨妈的防备措施实在没有必要，因为她侄女懂得自我保护，并且始终自我保护着。诚然，那不一定是谴责或假心假意的腼腆，甚至也不是绝情的冷漠。她的自我保护办法比所

有这一切更精明，或许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感情的一次不屈不挠的抵抗或者是从外部观看整个感情传递过程中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她自己也受到牵连。例如，她在亲吻时从不闭眼睛。还有，如果我们站着拥抱，我发觉她总是在我肩膀的上面偷视着墙上的镜子。她的格言很可能是：她的身体只能接受亲吻和抚摸，“决不能失身”，这条线她是一定要守着的。

此外，她并不抵抗。当我松开她那双姨妈称之为钢琴家的手时，她总是温顺地扑向我的怀抱，甚至在我抚摸她的头发时，她还流露出快意。现在，她的头发比麦秸色扫帚黑多了。但糟糕的是，那种态度正阻碍着某种更为重要的事情的发生。我自己觉得我进入了该是做爱的场景。

我们也经常聊天。她常提起一个她偏爱的话题，那就是我家老头子的死。当然，她不仅仅详细叙述我父亲的死，而且还追溯到阿雷东多及其天真的、可以预见得到的诈骗。她似乎认为“诈骗”这个词使我们成了伙伴、同行甚至朋友等等。她父亲是骗子，我父亲被人骗了。她好像打算用自己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来的热情使我相信，她和我差不多都是“诈骗”的儿女，因为不诚实不仅玷污她父亲，也玷污了我父亲。“你爸爸被人骗时，”她常常这样开始叙述阿雷东多的计谋，并且总是使用十七年前她在阁楼里叙述她父亲自杀时使用过的“小骗局”而不说“诈骗”。

我每个星期二、星期四的夜晚去看望她们，星期六我们还去看电影，是三人一起去。我不知道姨妈为什么总不坐在玛丽娅·胡莉娅旁边而坐在我身旁。或许从监视的效果看，坐在我身旁的可见度较好。不管怎么说，姨妈同我们那么近

乎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看电影时她先是长吁短叹，后是像哮喘病患者那样咳个不停，甚至在电影中出现那些最能调动观众感情的镜头时，她会打着快噎哭泣起来，引起周围的座位一阵令人不快的颤动。幸好玛丽娅·胡莉娅的感情不是那么脆弱。有时，银幕上会出现最令人动情的镜头，比如，一位身旁围着一群难以形容的孙子们的纯朴的老奶奶，或者在婚礼之夜引起先驱性咳嗽的结核幽灵。那时包厢里的贵夫人们为英俊的中尉没能从战场上归来去热情地拥抱已经怀孕的未婚妻而大擤鼻子。所有这些都是非常撼人心弦的。但是，当电影院里的灯光亮起来时，玛丽娅·胡莉娅的眼睛肯定比灯光还要明亮，同时又是干巴巴的。此外，她还会发表一番严厉的评论：“什么玩意儿！我始终觉得他们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演戏。”

在我同玛丽娅·胡莉娅、姨妈以及她全家的关系中，有些障碍我永远无法逾越。对此我深信不疑。我永远不会明白她们究竟想在我身上得到什么。姨妈很像塞特纳里奥区的那些岳母，总在我面前说玛丽娅·胡莉娅的好话，比如她的发型有多么漂亮啦，她多么爱干家务活啦，做的饭后点心有多么好吃啦，但她对我们的婚事却从来不着急，也从不关心。而她外甥女呢，也不操办嫁妆。当科拉莱斯姐妹或乌斯伦杰姐妹同她开有关嫁妆的玩笑时，她只是说：“会有时间考虑的，会有时间的！”有时我到达但丁街玛丽娅·胡莉娅家的门口时，那两对姐妹正好要离开。我有这样的印象：玛丽娅·胡莉娅和她姨妈这两个女人把我当成了永远不会变心的人。这种态度并未让我感到厌烦，因为在我自己准确无误的心灵深处，我不得不承认这是真的：我是一个永远不会变心的候选人。

当然，我有自己的疑虑。我一度曾疑虑重重，尤其怀疑自己的感情。我爱玛丽娅·胡莉娅吗？更明确地说吧，我是把她当作自己将来的妻子来爱的吗？或许我的爱情理论和对爱的解释是肤浅的，但不管怎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而在梦境中，一个人永远不是肤浅的。对了，她不符合我梦中的她，但我需要她，并且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例如，我几天见不到她就会感到烦恼，莫名其妙地焦急不安。这种情绪使我渐渐感到，不论做什么事，不论在什么地方，我的日常生活都不是那么称心如意的。我随时随地会想起我早已了如指掌的事，那就是除了玛莉娅·胡莉娅发表的一番虽很有涵养但并不坦率的评论外，人们在她身上找不到别的回响，别的反应。尽管如此，我得跟她交谈，得知道她是否在判断我的行动，我的反应，因为她终究是我的行动和反应的见证人。但到了星期二、星期四，当我们面对面坐在厨房里开始谈论我的微妙变化时，只要瞧一下她的眼睛，我需要她的这种感觉便会立刻烟消云散。

希望是存在的。当然，那是我的希望，因为她没有那些忧虑。对于我的双手来说，她是个女人，也许就是那个女人。我们触摸到的第一个女人，在其余的日子里，尤其是在夜晚，很有可能会变成愿望的统一体。我希望得到玛丽娅·胡莉娅，但这个愿望有多大呢？又到了什么程度呢？如果我亲吻时没有睁开眼睛的话，我也不会发现她亲吻时睁着眼睛。

有一次，我妈对我说了句让我讨厌的话：“玛丽娅·胡莉娅让你幸福的那天，别忘了告诉我一声！”显然，我妈从来没有容忍过她。

五

我三十七岁生日那天，在梅塞德斯大街和里奥布兰科大街的路口遇见了蒂托·拉戈马西诺。当时他很高兴，因为内里达·罗尔丹的女儿玛尔塔通过了一场极为重要的考试。我们俩走到十八街和埃希多街的路口，内里达和她的女儿就在那里。我大约有五年没见到玛尔塔了。我祝贺她取得的成绩，而她给我们讲了她在紧张地考试时铅笔如何从她嘴里掉到地上，班主任和她如何同时弯腰去捡，他们俩又如何如何在桌子底下面面相觑。“我觉得那可怜的家伙之所以让我通过了考试，仅仅是为了让我别跟其他老师讲他在桌子底下的那副滑稽可笑的模样。他在桌子底下时，假发都斜到了耳根上。”

我突然感到自己笑了起来，这几乎使我大吃一惊。这笑声好像不是我的，而是某个过着幸福美满、高度满意、几乎可以说是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的人的笑声。那时我意识到，用一种同自己格格不入的笑声笑个不停是不合适的。因此，我的神情立刻严肃起来，并显得有点茫然不知所措。玛尔塔则相反，她显得信心十足，对自己讲的趣事感到洋洋得意。当我瞅她第三眼时，我突然发觉她和蔼可亲，漂亮温柔，性格开朗，聪明过人等等。这时蒂托提出三点一刻他们得去参加一次什么会见，我不得不同他们道别。我握了玛尔塔的手，并郑重其事地允诺，我会再次去看她的，并且不带任何碍手碍脚的旁人。

但是，直到两个月后我才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在蒙得维的亚大学对面的一家咖啡厅里碰巧遇见了玛尔塔。我们聊

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我再次以不属于自己的笑声笑了起来，但这次没那么多顾虑。在一个半小时里，我了解了她，她了解了我，这种了解远远超过了我同玛丽娅·胡莉娅恋爱那么多年的相互信赖。一切是那么顺当，那么随意，那么自然，以致在我突然将手搭在她手上、我们像两个善男信女或者白痴似的相互凝望时，谁都没觉得有什么可奇怪的。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个星期后我们竟睡在一起了。我父亲的愿望第一次实现了，我也感到自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应该承认，玛尔塔首先是一个躯体，一个完美无缺的躯体。玛尔塔的性格对什么都不在乎，因为她能极好地适应无可挑剔的一切事物。将她紧紧地或轻轻地搂在怀里，然后用手抚摸她身上的各个部位，总有一种滋润心田的感受，给人无限的欢乐和信念。最初几次，我既天真又惊奇地发现我原始的愿望是何等的不足。但是，我很快学会了怎样成倍地提高自己的欲望。

几乎像是奇迹，我的双手，往日那双粗俗笨拙的手，如今突然变得如此灵巧、敏捷和富有创造性。我终于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女人，一个谈得来的姑娘。玛尔塔从不询问我的未婚妻。不，不对，请原谅。我现在记起来了，她曾问过我：“你同她睡过吗？”我回答她说没有。我的声音是如此之大，以致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的否认仿佛是一声巨响，将她震住了，又仿佛是在驱邪。玛尔塔先是愉快地笑了笑，然后既慈悲又惊讶地扫了我一眼。

后来，有时星期四我也不去但丁街了。玛丽娅·胡莉娅既没劝我又没责怪我，姨妈倒是给了我一次冗长的规劝，说厌烦会导致罪过。我几乎完全同意了她的说法。

姨妈给我端来一杯咖啡。同往常一样，咖啡里糖放得不多。我用一把仿秘鲁银器的小匙慢慢地搅咖啡。同以往一样，杯子烫了我的手指。

两年前，她们俩摘下了墙上那幅象征火焰和只能见到眼睛的妇女的画像，挂上了一本显示一九五二年一月瑞士风光的挂历。挂历上都是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和漂亮的小别墅。这些小别墅只要上发条，就会奏《平安夜》这首曲子。椅子用一块绿灰相间的条布重新铺了坐垫。这种条布同这间坐在里面会把它当成餐厅的走样的英式房间很不相称。

姨妈也不是没有变化的。她不再穿胸口绣花的衣服了。眼前，她母鸡般的颈脖上围着一条涤纶和羊毛混纺的围巾。她的目光暗淡忧郁。当她右手端着杯子喝咖啡时，左手不停地颤抖，弄得小匙在盘子里叮当作响。她已有好几个月用“您”来称呼我，并且不再表扬侄女如何会干家务活了。

她仍然保持着提问题的习惯，但现在提的问题十分零乱。在她提的一长串问题中会包括这样一些问题，例如下次交通工人罢工的情况，我年终放假的日期，还有我母亲珍藏的嫩玉米包饺子配方等等。

又是一个星期四。那天我在姨妈的眼里看到了一丝痛苦的目光。后来她以一个将一枚硬币珍藏了很长时间，但突然发现它已毫无价值的人那种无可奈何又垂头丧气的神情向我吐露了真情：“鲁道夫，我和玛丽娅·胡莉娅都搞错了。她一直认为可以永久地控制您，但您赢了。当然，时间帮了您的忙。”

我听了她那番坦诚的话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尽管我没有说出口，但似乎早已意识到这就是我最好的办法。姨妈不是

已经领教它的厉害了吗？她不仅已经领教了它的厉害，而且还将它公开了。我本想问问她指什么，但也纯粹出于形式罢了。那时姨妈的思维已恢复到过去那种混乱状态。她只是迫不得已地补充说：“洗衣房的价格上涨得真可怕。日子不好过啊！”

现在她变得沉默寡言，只是在呷咖啡时不停地发出啧啧的响声，甚至不喝时也是这样。我觉得已经毫无疑问，玛丽娅·胡莉娅这个骗子的女儿骗了我这个被骗的人的儿子。在我家老头子去世时，她的欺骗表现为对童年的回忆和相互的理解；在我们那么多年的恋爱中表现为无声无息的忍耐；在我流露出激情时表现为既含情脉脉又消极被动的态度。她的欺骗也表现于她在我们俩关系的四周围绕了足够的爱情和欲望的替代物，让我相信我们确实恋爱了二十年。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记忆中，这二十年的光阴早已由于我们病态的修改补充和长期的厌烦倦怠而变得畸形了。如果再深入地分析一下，可以发现她的欺骗是对这个有八十个街区的城镇的一次报复，因为这个小城议论过她，蔑视过她，更糟的是容忍了她。她用不着去寻找，我就是那个小城现成的替罪羊。在她眼里，我早已成为一个象征。现在，并且只是在现在，我才看清她是如何打自己的小算盘，如何想方设法欺骗我的。这可以从她在阁楼里发表那则精心炮制的声明到她对阿雷东多的诈骗显示出极大的兴趣中得到证实，可以从我同老头子一起在小城里度过的最后一天中她友好地用手按住我的肩膀到这二十年内我们在厨房里可怜的亲吻中得到证实。她在阁楼里曾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是恋人。”显然，她那把小算盘的珠子便是我的怯懦和耐心。如果说玛丽娅·胡莉

娅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要求，也没有反对我们俩的关系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是因为她总是盲目地相信，我既不会倡议结婚也不会提出解除婚约。

这就是她取胜的王牌：我的怯懦使她在我身上报复了所有那小城的人对她的不公正，但同时也使她把我当作了一个废物，永远毁掉我的生活。显然，玛丽娅·胡莉娅没有把玛尔塔放在眼里，也许这是她唯一失算的地方。噢，这不过是几个月前才发生的事。现在，玛尔塔在派桑杜，已同建筑师兼承包商特奥菲洛·卡雷拉斯结婚。但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她——愿上帝保佑她——完成了一项令人钦佩的事业：拯救了一个该死的家伙，使他的感情——我的感情——远远超出了人家所估计的价值。显然，玛丽娅·胡莉娅在这方面失算了：她对我的估价太低了。

表面上一切依然如故，但她干瘦的躯体和令人困惑的贞洁已体验到，我的手已不是从前的手，她的消极被动，也使我产生了厌恶的征兆。对她来说，一切都变得那么新奇。但任何转变，甚至亲吻时闭上眼睛，都为时已晚。不过，让她凭直感意识到某个决定行将作出尚为时不晚。相反，对我来说一切都为时不晚，绝对不晚。

那时我喝完了咖啡，将杯子还给姨妈。她说道：“天凉了。到这个时候，天气总很凉爽。”她说完便站起来，留下我一个人呆在屋里。五分钟后玛丽娅·胡莉娅走了出来。玛丽娅·胡莉娅，我四十岁的未婚妻！她在我身旁坐下来。她十分疲倦，连续眨了四次眼睛。她的手搁在橡木桌子的角上，手背上长满了风疹块。她由于肝功能不良，吃油炸食品后经常发风疹块。

她谈论她的朋友乌斯伦杰姐妹俩。“克莱迪斯想让我陪她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你说行吗？”我当时感到自己恨透了她。我感到自己不需要她了，永远不再需要她了。我感到玛尔塔已经赶走了我可怕的恶梦，替我卸掉了压在心头的令人厌烦的重负。我已经伤心透了，已经变得冷漠无情。

“你说行吗？”她以被判了刑的女囚犯的声音重复问道。她确实像是被判了刑。自由有其好处，但此时此刻，她已断定我离开了她，被我的拒绝吓得茫然不知所措，既然如此，自由换成报复不更好吗？因此，我决定泰然自若地把所有的一切告诉她，就好像谈论气候或工作一般。“不行。你最好别去。这样你就可以迅速做好准备，我打算七月中旬同你举行婚礼。”

我的话说得结结巴巴，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唾沫。但同时，我既感到高兴又觉得自己可悲。小小的诈骗已经完成。

王玉林 译

难道无法弥补吗？

一听到扩音器里宣布中美洲航空公司的 914 航班将推迟 24 小时起飞的消息，塞尔希奥·里维拉做了一个很不耐烦的动作。当然，他对常规的辩解词不是不清楚的：出于谨慎目的推迟飞行总比带着隐患强行飞行（难道无法弥补吗？）要好得多。但无论怎么说，这一耽误将使他下一站的活动计划变得复杂化了：他在第二天中午的几个会谈早已约定。

他决定强迫自己去承认这一现实。扩音器里一个拖着长音的女子声音继续通知说现在航空公司准备给每位旅客分发去离机场不远的国际大饭店用晚餐、早餐和住宿的各种票证。里维拉先生从未在这个斯拉夫国家呆过，有机会看看这个国家也绝不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但仅仅为了这一夜，他就不打算去换外汇了。（尽管机场的银行仍在为过境旅客服务。）他径直走到中美洲航空公司的窗口前，排队领取了票证。他下定决心吃晚饭时不额外添加任何东西。

当大巴士把他们送到饭店门口时，正下着雪。他想这是

他有生以来第二次看到下雪，另外一场雪是大约三年前当他突然决定旅行时在纽约看到的。（跟这一次一样，也是由股份公司为他掏的钱。）零下 18 度的刺骨寒风向他耳朵袭来，一会儿工夫把他全身冻得透凉，他突然记起了留在飞机上的蓝色围巾。幸好，他还未触及玻璃大门，大门却自动开启了，一股暖流顿时使他感到舒服多了。他突然想起了他妻子克拉拉和他五岁的儿子爱德华多，要是现在在他们身边该有多好啊！说到底，他是一个十分恋家的人。

在餐厅里他看到有二人用餐的桌子，也有四人和六人的。他挑了一张二人的桌子，暗暗期待着自己独自占着桌子吃顿饭，然后静静地看上一会儿书。几乎同时，走过来一名顾客问他：“我能坐在这儿吗？”还未等他回答，这名顾客就在空位子上坐了下来。

这位不速之客是个阿根廷人，他一生最怕坐飞机。“不少人坐飞机总希望带个护身符，”他说道，“我有个朋友如果不带一个镶有绿松石的钥匙链是绝不会坐飞机的。我还有一个朋友每当坐飞机旅行，必定带上一本马丁·菲耶罗的旧版书。而我呢？出门总是带上我在旧金山华人街买的二枚日本铜板，您看，就是这两枚铜板。您可别笑话我啊！我还没有找到使我放心的护身符。”

开始时里维拉只是哼哼哈哈地简单应付几句，过不了十分钟，他书也不看了，却与他的同伴认真地谈起自己的护身符。“您看，我的迷信想法刚刚遭到了最倒霉的应验。每次出门我总是带上一支不灌墨水的西菲斯牌钢笔。这里有二层意思：一方面不让钢笔里的墨水弄脏衣服；另一方面我预感到我带着一支不灌墨水的钢笔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可是，

这一次我忘了把钢笔里的墨水挤掉，现在您看到后果了吧！尽管我还凑合活着，”当看到他的同伴不解地望着他时，他认为有必要再作些补充说明：“实际上我是个地道的宿命论者。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命该如此，坐波音飞机可能掉下来，一个从七层楼某处掉下来的花盆可能会把你砸死。”“是的，”这位不速之客说：“要是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让花盆砸一下，因为保不住花盆把我砸成白痴，但命还是保住了。”

阿根廷人没有吃完甜点心就回房间了。（谁说欧洲人擅长做巧克力甜饼呢？）里维拉再也没有心思继续读他的书了，他点上一支香烟，等着土耳其式咖啡稍微沉淀一下。他在餐厅又坐了一会儿，看着桌子一张一张地腾了出来，他真不愿意自己成为餐厅里的最后一名顾客，马上站了起来，回到了二层自己的房间里。因为他的睡衣随着箱子留在飞机上了，他只好穿着衬裤睡觉。他又读了一会儿书。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早已解开了书中的许多迷惑之点，但他仍然迟迟不能入睡。他用他儿子的一张照片当作书签，从遥远的皮纳尔镇的小沙丘那头，爱德华多露着肚脐眼，手里拎着一个水桶，向他微笑着。受他儿子的感染，他也笑了起来。接着他关掉了卧室小灯，打开了收音机，从收音机里传来了一种莫名其妙语言发出的古怪声，他干脆把收音机也关了。

电话铃响了，他的手摸索了好一会儿才抓住了话筒。电话里用英语告诉他现在是八点整，并向他道了早安，接下来告诉他乘坐中美洲航空公司 914 航班的乘客将在九点三十分在旅馆大门口乘车去机场，飞机起飞时间“原则上”定在十一时三十分。看样子还有时间洗漱一下，并吃点早饭。他讨厌洗完澡还得穿上在蒙得维的亚已经穿着的内衣。他一边

刮着脸，一边盘算如何在本周剩下的几天时间里调整没有完成的会晤计划。他自言自语道：“今天星期二，五号。”他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根据轻重缓急重新安排计划。他果然这样做了。他记起董事长对他最后的交代：“里维拉，别忘了你的下一次提升将取决于你和萨佩斯公司的谈判结果。”他当即决定推迟几场不太重要的会谈以便腾出精力专门对付星期三下午与萨佩斯公司热情好客的企业家的会谈，当天晚上东道主也许还会邀请他去夜总会观看脱衣舞表演，两年前那次脱衣舞表演简直让瘦子费雷拉神魂颠倒。

他独自一个人吃了早饭。九时三十分大巴已停在旅馆门口等候了。雪下得比头天晚上还要大，街上冷得实在难以忍受。在机场候机室，他走到一扇宽大的玻璃窗跟前，透过玻璃窗户他懊丧地看见中美洲航空公司的飞机被一帮穿着灰色工作服的人团团围住。十二时一刻扩音器又一次宣布 914 航班不得不再次推迟三个小时左右起飞，并宣布公司将给乘客在机场餐厅用午餐提供餐票。

里维拉感到一团疑惑向他袭来。与往常一样，只要一紧张，他就要连续打两个嗝儿。他感到腮帮子难受异常。接着，他就到中美洲航空公司窗口去排队。十五时三十分扩音器以特别平静的声调宣布：“因技术故障，中美洲航空公司决定 914 航班将推迟到明天十二点三十分起飞”。一下子尖刻的抗议声此起彼伏。里维拉耳朵很尖，他很快听清楚人们在喊道：“简直受不了啦！”“太卑鄙无耻了！”“太不像话了！”几个孩子哭了起来，其中一个因挨了一记歇斯底里的耳光而突然停止了哭泣。阿根廷人从远处看了看里维拉，并晃动着脑袋，噘着嘴，似乎在告诉他：“你瞧我说对了吧！”

在他左边的一位妇女绝望地评论着：“至少也应该把行李发还给我们。”

这时候，扩音器又接着宣布说中美洲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窗口为旅客分发晚餐、住宿和早餐等票证，这一切都是航空公司慷慨解囊的。里维拉听了这些话，顿时怒火冲天。正在窗口分发票证的可怜小姐不得不与每一位旅客进行愚蠢的、徒劳的争吵。里维拉只是对她讥讽地笑了笑，然后接过票证，他认为这样做最合适不过了。他觉得只要对小姐瞥上一眼，她就会对他这种特殊的报复方式感激涕零的。

此时此刻，里维拉得出的结论是他的厌恶情绪已经得到发泄，便坐到一张四人桌上用餐。“枪毙了他们也不够解恨，”一位歪戴着不易被人发觉的假发套的妇女一边咀嚼着，一边说道。坐在里维拉对面的一位男士慢慢地打开手帕擤了一下鼻子，接着拿起餐巾擦了擦胡子。“我认为他们应该把我们转到另一家航空公司去。”戴假发套的妇女坚持说，“我们人太多了。”那位刚用过手帕和餐巾的男士反驳说。里维拉也鼓起勇气提出自己的异议：“这恰好是冬天旅行不方便之处。”但很快又意识到这一假设纯粹是题外话。此时这位妇女赶紧抓住话题继续说：“据我所知，航空公司从未提起过气候问题。难道你不认为这是技术故障吗？”同桌第四名旅客操着既沙哑又带着浓重德语腔调第一次说话了：“一位空中小姐解释说是无线电系统出现了故障。”“是啊！”里维拉赞同说：“要是果真如此，推迟飞行的理由还是站得住脚的，你们同意吗？”

在餐厅的另一头，阿根廷人正慷慨激昂地演讲着，根据里维拉的理解，他正在拼命地抨击航空公司。喝完咖啡，里

维拉在对着电梯处坐下。在上面的七层楼的大厅里大概正在举行一场舞会，因为很多人从外面进来，脱下了大衣、帽子、围巾，寄存在存衣处，一群穿着做工考究深色礼服的小伙子和穿着半透明的招眼服饰的姑娘正等着上电梯。不时几对年青人一边说着，一边笑着从楼梯走下来。里维拉弄不懂到底什么事情逗得他们如此之乐，他感到有点遗憾。突然他感到空空荡荡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真希望有一对或几对年青人走过来向他借个火，或拿他取乐，或用他根本听不懂，但又觉得很风趣的语言给他提一个荒唐的问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他跟前停住，甚至不屑看他一眼：他们实在太专心于用他们神秘的语言交谈，太热衷于这种独特的、愉快的松弛方式。

沮丧之余，他只能对自己光火。里维拉上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次轮到他住八层楼了。他脱光衣服，钻进被窝，拿出了一张纸准备重新制定下一步会谈计划。他写出了三个人的名字：科恩菲尔德、布鲁内尔、弗里德。他还想写第四个人的名字，但怎么也写不出来了。他已忘得一干二净，只记起第一个字母是E。这一突然的忘却太使他恼火了，他干脆闭了灯，希望赶快睡着。在床上躺了好一会儿，他预料多年前经常折磨他的倒霉的失眠症今晚必将重演，更糟糕的是手头再也没有别的书可看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另一本书还留在飞机上。于是他思念起他的儿子，突然他惊异地发现已经整整二十四小时一点也没有想过他的妻子。他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入睡。电话铃又一次响了，他发誓自己只睡了三分钟，但实际上他已睡了六个小时。电话里仍然用英语通知他十二点一刻大巴士将把他们送去机场。他为了不能换一下内

衣而生气，为此他决定不洗澡了。但勉强强刷了刷牙。吃早饭时，心情却好多了。他从口袋里把航空公司发的早餐票取出来压在雕花的糖罐底下，此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妙的惬意。

在机场餐厅吃完了航空公司提供的午餐，他坐到了一张挨着盥洗室门口的大沙发上，因紧靠着盥洗室，谁也没有想往那里坐。突然他发现一个长着一头金黄色头发、脸上有点雀斑、手里抱着一个布娃娃、大约五岁左右的小女孩在他旁边停住了脚步，并不时地望着他。“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用最简单不过的德语问他，里维拉想告诉她他叫塞尔希奥，但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于是他编造说：“我叫科尔。”“啊！”小女孩说：“我叫热尔特律德。”里维拉显得非常关注：“那么你的布娃娃呢？”“她叫洛泰。”热尔特律德回答说。

另一个也是金黄头发，手里也抱着一个布娃娃，约莫四岁光景的女孩子走了过来。她用法语问德国小姑娘：“你的布娃娃会闭眼睛吗？”里维拉把问话翻译成德语，然后又把答话翻译成法语：“是的，洛泰会闭眼睛。”不一会儿就弄清楚了法国小姑娘叫马德莱娜，而她的布娃娃叫伊韦特。里维拉不得不极其用心地向热尔特律德解释说布娃娃伊韦特不仅会闭眼睛，还会喊妈妈。接下来她们两人谈论了巧克力糖、小丑和他们的父母亲。里维拉当了一刻钟的即席翻译，但是两个小姑娘根本没有理会他的重要性。他在脑海里把这两个金黄色头发的小姑娘跟他的儿子作了一个比较，他客观地承认他儿子爱德华多一点也不比她们逊色，他满意地倒吸了口气。

突然马德莱娜向热尔特律德伸出了手，而德国小姑娘的第一个反应则把手缩了回来，后来她好像思索了一会儿，就把手伸了过去。热尔特律德的蓝眼睛里闪烁着光彩，而法国小姑娘满意地轻轻喊了一声。很显然从现在开始她们两人再也不需要翻译的介入了。洛泰和伊韦特的小主人手挽着手走开了，最后连向为她们忙活了半天的翻译招呼都没有打一声。

“中美洲航空公司通知，”扩音器又一次响起来了，声音显得没有头天晚上那么温柔，但很有神秘感，迫使人们不得不静下来听听到底有什么新消息要发布，“由于技术故障仍不能排除，所以决定把 914 航班推迟到明天，具体时间另定。”

里维拉冲着就向中美洲航空公司的窗口跑去以便在排队领取餐票和住房证时抢占一个好位置，他对自己反应如此敏捷感到诧异。尽管如此，他还只是占了第八名。当航空公司女职员把他已经非常熟悉的小票递给他时，里维拉觉得自己有了相当长进，此种感觉犹如自己在股份公司获得了提升，或通过了一场性命交关的考试，或纯粹只是确信自己获得了某种保障和保护。

他又一次在已经相当熟悉的旅馆餐厅里就餐，这一顿晚饭他吃了鲜美的芦笋奶油、维也纳式煎肉排、奶油草莓，还喝了在他记忆中从未喝过的如此好喝的啤酒。当他快要吃完晚饭时，他发觉自己高兴得简直有点莫名其妙。再一次推迟 24 小时起飞，这就意味着将要取消若干次会谈，其结果就要取消若干个合同。他和第一天晚上见过面的阿根廷人交谈了一会儿，对这个人来说，除了庇隆主义的危险以外，没有

更感兴趣的话题可谈，但这一话题丝毫也提不起里维拉的兴趣，他借口有点累，就躲回房间里去了，这次轮到住五层楼。

他企图再一次列出要会晤人员的名单，但只记住了两个人的名字：弗里德和布鲁内尔。他对自己如此健忘感到恼火。他一阵狂笑，其笑声之大足以使睡床颤动，但邻室竟没有人出来抗议又使他感到惊奇。他突然想起还留在飞机上的箱子的某个角落塞着一个记事本，在那里记载着这些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心情宽慰了许多。他的身子在钉有扣子、絮着棉花的陌生的被子里面翻转了一下，感到非常舒适。这种感觉与他幼年时，冬天里经过一天玩耍，把身子蜷缩在毯子里面所经历的感觉很相似。在入睡前他又凝视了一下照片里站在沙丘上、手里拿着一个小桶的爱德华多的模样。但他昏昏欲睡，再也没有精力去思念他妻子克拉拉了。

第二天清晨，他近乎亲切地看了看脏兮兮的内衣，特别是内裤的裤边和内衣的领口、袖口实在脏得够呛。他悄悄地洗了洗眼睛，但马上决定不刷牙了。他重新钻进被窝，一直躺到电话铃响，电话里又传来了习以为常的通知。他一面穿着衣服，一面腾出五分钟时间专门用来回顾航空公司因非人为因素而推迟飞行时对旅客所做的种种慷慨大方的举动。“我以后只乘坐中美洲航空公司的飞机。”他大声地嘟囔着，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不得不使劲把眼睛闭上。当他重新睁开眼睛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本他以前从未留意过的挂历，这上面标着星期三、十一号，而不是星期四、七号。他掐着手指算了算，判定这一页挂历肯定是另一个月的，或者是另一年的。这时候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作风大为

不满。接着，他起了床、吃了早饭、坐上了大巴士。

这一次机场里确实有点骚动。一对智利夫妇和一对西班牙夫妇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延误大声地抗议着，他们认为他们各自都带着一个不满周岁的男孩和女孩，本来一开始航空公司就应该设法给他们提供适宜的尿布，或者为他们取回滞留在飞机上的行李箱子提供各种方便，因为这纯粹是航空公司的过失。中美洲航空公司的女职员只是用基本上处于守势的声调回答旅客道：“公司领导将尽力解决因非人为因素而造成飞行延误所带来的个别问题。”

“非人为因素而造成的延误，”塞尔希奥·里维拉听到这些词，精神为之一振。也许这就是他一生中一直要寻找的托词。它完全不同于以前常用的一些说法，如：非人为的紧张状态、不必要的忙碌、困境、始终处于困境状态。他用目光环顾了机场上用不同文字书写的标记牌：Sortie（出港，法文）、Arrivals（到达，英文）、Ausgang（出口，德文）、Douane（海关，法文）、Departures（启程，英文）、Cambio（兑换处，西班牙文）、Herren（男洗手间，德文）、Change（兑换处，英文）、Ladies（女洗手间，英文）、Verboten（禁止，德文）Transit（转机，英文）、Snackbar（快餐馆，英文），这与他的国家的机场太相似了。

扩音器里一个女子的声音一直不断地报告着某航班飞机降落和某航班飞机起飞的消息，然而根本听不到中美洲航空公司 914 航班起飞的消息。那架一动不动瘫在跑道上的飞机周围簇拥着越来越多穿着工作服的技师，长长的水龙带到处可见，吉普车来回穿梭着运送工作人员、器械或带来新的指示。

一位坐头等舱身材高大的意大利人喊道：“这简直是颠覆活动。”里维拉小心翼翼地向中美洲航空公司窗口靠拢，以便一当扩音器再次宣布因非人为因素而推迟飞行时，可以第一个排队领取晚餐、住宿和早餐票证。

热尔特律德和马特莱娜擦着里维拉身边而过，仍然手挽着手，但手里的布娃娃已经不见了。这两个小女孩（他不能肯定是不是原来那两位或者是另外两个与她们长得很相似的小姑娘）似乎很习惯这一切，犹如里维拉先生已习惯因非人为因素而推迟的飞行一样。里维拉想不可能再有任何会谈了，更不知道会跟谁会谈。他试图回忆起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哪怕只是一个人的名字也好，但是当他证实他现在什么也记不起来时，反倒兴奋起来。

他又一次看到跟前挂着一本挂历，但上面的日期乱得一塌糊涂：星期一，七号。他索性不再去理会它了。就在这个时候，宽敞的机场大厅里拥进了一帮刚刚下飞机的旅客。里维拉看见了一个小伙子，顿时产生了一种似乎相识的感觉。然而小伙子擦肩而过，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年青人始终与一个穿着绿色灯心绒长裤和黑色靴子的姑娘边走边聊。小伙子径直走到柜台旁，拿来两瓶桔子水。里维拉惊异地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

“我哥哥说我们将在这里停留一个小时左右。”姑娘说。小伙子用手帕擦了擦嘴唇，“我希望早一点到达。”“我也同样希望早一点到。”姑娘回答道。“以后你会不会给我写信？说不准我们以后可能还会见面。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住得很近。”“现在我们相互留下通讯地址吧！”姑娘提议道。

小伙子握着一支圆珠笔，姑娘打开了一本红色记事本。

在离他们两米远处塞尔希奥·里维拉咬着嘴唇，木头人似地坐着。

“你记一下，”姑娘说，“纽伦堡，科尼格斯特拉塞大街二十一号，玛丽亚·埃伦娜·苏亚雷斯。而你的地址呢？”“维也纳，三区，拉热尔加斯大街九号，爱德华多·里维拉。”“你在这里将呆上多久？”“从现在看来，至少得呆上一年。”小伙子回答说。“你多幸福啊！你的老爹不会有意见吗？”姑娘感叹道。

小伙子又说了些什么。从他的坐位塞尔希奥无法听清他们的谈话，因为这时候扩音器里仍是那位女子，但声音压低了许多，又一次宣布：“由于技术原因，中美洲航空公司决定 914 航班推迟到明天，具体时间另定。”

只有当扩音器停止播音以后，塞尔希奥重新听清楚小伙子的说话：“此外，那不是我老爹，而是我继父。你知道吗？我父亲已在几年前的一次空难中死去。”

刘家海 译

阿内西阿^① 美女皇后

姑娘睁开了眼睛，顿时惶恐不安。她什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自己的名字、年龄以及身体特征。她只看到自己身上穿着一条咖啡色的裙子和一件奶黄色的上衣。她没有带手提包。手表的指针指着四点一刻。她感到舌头麻酥酥的，太阳穴跳个不停。她看了看自己的手，发现指甲上涂着一层透明的釉质。她坐在绿树成荫的广场中的一个长凳上，在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个古老的喷泉，装点着几个小天使和三个平行的水泥盘子。在她眼里，这一切显得异常恐怖。从她坐的长凳那头可以看到几块大招牌：诺加罗商店、俱乐部电影院、波尔莱依家具店、马尔查商店、民族主义党。她看到在她左脚边上有一块呈三角形的镜片，便把它拾了起来。当在镜子

① 意为缺乏记忆、健忘。

里看到自己这张脸时，她意识到她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病态的好奇心所驱使。她好像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张脸，它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回忆。她试图估摸着自己的年龄。“我难道有十六岁或者十七岁了？”她想道。奇怪得很，她居然还能记起事物的称谓（她知道这是长板凳，那是柱子，那是喷泉，远处那个是广告牌），但是她怎么也无法确定自己所处的空间和时间。她再一次大声地说着：是啊！我应该有十六岁或十七岁了。但她这样做无非是要证明这是一句正确的西班牙语句子。她又问自己：你还会说其他什么语言？但她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尽管如此，她却得到了一种宽慰的、宁静的甚至天真烂漫的感觉。当然她也感到很吃惊，但这一惊讶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不悦。她模模糊糊地感到这一来倒比发生其他别的事情要好得多，但愿那些卑劣、可怕的东西永远置于脑后，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在她的头上树叶的绿色呈现出两种色调，而天空几乎一点也看不到。一群鸽子向她走来，很快又失望地离去。实际上，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喂它们。人们从她坐着的长凳子旁漫不经心地走过，谁也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只有几个小伙子关注地看了看她，她准备和他们说一会儿话，甚至于深谈一阵子，但是那些反复无常的观赏者最终克服了他们的犹豫，又继续走他们自己的路。就在那个时候一个人从人群中走来。这是一个五十岁开外的男子，衣冠楚楚，头发梳得铮亮，领带上别着一个夹子，手里拿着一个黑色公文包。凭直觉她意识到他会走过来同她说话。她想：“难道他认出我来了吗？”她真害怕这个男子重新又勾起她对往事的回忆。她沉醉于这种惬意的忘却之中。但是这个男子只是走过来问她：“怎么啦，小姐？”她看了他好一会儿。这个男子的脸给了她一

种信任感，事实上，所有的一切都能给她信任感。“刚才，在广场上，我一睁开眼就什么也记不住了，过去的一切一切我都忘得一干二净。”她认为没有必要再做更多的解释。当她看到这个男子冲她笑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也笑了。他向她伸出手并自我介绍道：“我叫罗尔丹，费利克斯·罗尔丹。”“我记不住自己叫什么名字。”她回答道，并握了握他的手。“没有关系，您不能老呆在这里，跟我走，好吗？”当然，她是很愿意的。她站了起来，看了看又一次向她围拢过来的鸽子，心里想：“我够走运的！”那个叫罗尔丹的男子轻轻地挽着她的胳膊肘，并向她提议他们应该去的地方。“这个地方离这儿很近，”他说道。对这位小姐来说近一点远一点根本无所谓，此时她感到自己是一名观光客。这里的一切对她来说并不陌生，然而，具体细节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她本能地用自己瘦弱的胳膊去挎那男子粗壮的胳膊。他穿的衣服很柔软，好像是用一种精梳布制成的，肯定贵得要命。她仰着脖子往上看去（这个男子个儿很高），并对他笑了笑。他也冲着她笑了笑，这一次他微微地露出了牙齿。她看清楚了他镶有一颗金牙。她并没有问他这座城市叫什么，倒是他主动地告诉她，他们现在在蒙得维的亚。他的话犹如沉石下井，没有得到丝毫反应。现在他们走在一条狭窄的马路上，两旁路砖七高八低，正在施工的工地到处可见。汽车贴着路边奔驰而过，溅起不少泥水。她伸出手擦了擦溅在腿上的泥点，这时候她看到自己没有穿袜子，突然她记起了袜子这个单词。她抬起头看见了一些空荡荡的旧阳台，那里晒着几件衣服并站着一个穿着睡衣的男子。她突然喜欢上了这座城市。

“我们到了。”那个叫罗尔丹的男子站在一座大门前说道。她第一个进了门。在自动电梯里，那个男子按了按指示

五层的键。他一言不发，只是死死地盯着她看，她却用充满信任的目光回报了他。当他取出钥匙打开房门时，她发现他右手上带着一个结婚戒指，还带着一个嵌有红宝石的戒指，她记不清红宝石这个词怎么说了。房间里没有别人。房门一打开，从房间里面发出一股类似牢房的臭味，那个叫罗尔丹的男子打开了窗户，把她让坐在其中一把大椅子上，然后拿来了酒杯、冰块和威士忌酒。她记起了酒杯和冰块这两个单词，但怎么也想不起威士忌酒怎么叫法。喝了第一口酒，她咳嗽了，但感到很舒服。她用目光把屋里的家具、墙壁和壁画打量了一番，她认为尽管从整体上看布置得不够协调，但布局还甚为生动活泼，因此她没有提出异议。她又一次看了看他，心里很坦然，很有安全感。“但愿从此以后再也记不起过去的往事。”她想。这时候，这个男子一阵狂笑，着实把她吓了一跳。“喂，小妖精，现在在这个屋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你得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她重新咳嗽了起来，并把眼睛睁得圆圆的。“我不是已经跟您说过了吗？我记不清自己的名字了。”她发现这个男子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得越来越粗俗，越发缺乏绅士风度，就好像从他领带夹子下面或从他穿的精梳布制成的衣服下面散发出一股俗不可耐的味道，流露出一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厌恶感。“你是阿内西阿美女皇后，对吗？”而这是什么意思呢？她一点也不懂。她开始感到害怕，既害怕目前所处的荒诞的处境，也害怕深不可测的往事。“嗨，阿内西阿美女皇后，”男子又一阵哈哈大笑。“你知道吗，你很有魅力？我发誓我是第一次交如此桃花运，你太诱人了！”那个叫罗尔丹男子的手开始向她伸来。难道这是连着刚才在广场上她主动搀扶过的强壮胳膊的那只手吗？严格说来这

是另一只手。这是一只毛烘烘的、多情的、极其有力的手。她吓得不知所措，陷于完全无能为力的境地。他的手已摸到她的衣服领口，还企图往里面伸进去。但是四粒扣子挡住了他的邪念。这时他的手用力向下一拽，三粒扣子一下子被拽掉了，其中一粒扣子一直滚到墙角撞个粉碎。就在发出这一声响的同时，两人都呆住了。姑娘利用这一突如其来的短暂时刻，一下子坐了起来，手里还握着杯子。那个叫罗尔丹的男子又一次向她扑来。她意识到那家伙想把她推倒在一张绿色面子的大沙发上。他嘴里不停地喊道：“小妖精，我的小妖精。”此时她感到那个家伙喘着粗气先是啃她的脖子，然后啃她的耳朵，最后咬她的嘴唇。她意识到那双强有力的、令人作呕的手企图解开她的衣服。她预感自己快要窒息而死，再也动弹不得。这时她看到了她手里还紧握着盛有威士忌酒的杯子。她再一次以超人的力气半坐了起来，用手里的杯子砸罗尔丹的脸部。他往后踉跄了几步，终于跌倒在绿面子的沙发旁。姑娘害怕极了，她从男子身上跳过，最后扔掉了杯子。（杯子掉在地毯上，却没有破碎。）她向门口冲去，开了门，走过走廊，胆战心惊地下了五层楼。当然她是从楼梯走下楼的。在街上，她靠着仅剩的一粒扣子把衣服整了整，然后一溜烟地跑了。怀着恐惧、焦虑、悲伤的心情，她一直思考着：“我应该把这一切都忘掉，我应该把这一切都忘掉。”她认出了广场，认出了原先在这儿坐过的长凳子。长凳子还空着，她就坐了上去。其中一个鸽子在打量着她，她却没有任何心思去答理它。她心中只有一个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念头：“我应该把自己彻底地忘掉。上帝啊！帮我把这耻辱忘掉吧！”她把头往后一仰，似乎感到自己快要昏厥过去。

姑娘睁开了眼睛，顿时惶恐不安。她什么都记不起来

了：自己的名字、年龄以及身体特征。她只看到自己身上穿着一条咖啡色的裙子和一件奶黄色的上衣，但上衣缺了三粒扣子。她没有带手提包。手表的指针指着七点二十五分。她坐在绿树成荫的广场中的一个长凳上，在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个古老的喷泉，装点着几个小天使和三个平行的水泥盘子。在她眼里，这一切显得异常恐怖。从她坐的长凳那头可以看到几块大招牌：诺加罗商店、俱乐部电影院、波尔莱依家具店、马尔查商店、民族主义党。她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尽管如此，她却得到了一种宽慰的、宁静的甚至天真烂漫的感觉。她模模糊糊地感到这一来倒比发生其他别的事情要好得多，但愿那些卑劣、可怕的东西永远置于脑后，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领着孩子、带着公文包、拿着雨伞的人群从她坐的长凳旁走过。这时候，有一个人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走来。这是一个五十岁开外的男子，衣冠楚楚，头发梳得锃亮，领带上别着一个夹子，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在一只眼睛上贴着一块白纱布。“难道这个人认得我吗？”她想道。她真害怕这个人又重新勾起她的回忆。她沉醉于这种惬意的忘却之中。但是这个男子只是走过来问她：“怎么啦，小姐？”她看了他好一会儿。这个男子的脸给了她一种信任感，事实上，所有的一切都能给她信任感。她看到他向她伸出了手，并听到他自我介绍道：“我叫罗尔丹，费利克斯·罗尔丹，”在这以后，名字已经显得不重要了。这时，她站立了起来，本能地用自己瘦弱的胳膊去挎那男子粗壮的胳膊。

安魂曲

是的，我叫爱德华多。您几次打听我是要想方设法找我谈谈，这一点我很清楚。好久以前，尽管我们没有见过面，您已经知道我了。自从您和我妈妈在拉腊尼亚加·里维拉咖啡馆或者就在这家咖啡馆见面那时起，我也已经知道您了。您千万别以为我在盯你们的梢儿，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可能您会这样认为的，这是因为您不曾了解事情的原委。也许我妈妈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您了？我早就想跟您谈谈，但我不敢这样做。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感谢您对我采取主动。您知道为什么我要找您谈谈吗？这是因为您给我的印象是位好人。当然，我妈妈也是一位好人。我和她从来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在家里，要么寂静无声，要么我老爹一个人说个没完。我这位老爹几乎每天晚上只要一喝醉酒总是唠唠叨叨说个没完，与其说是在说话，还不如说他拼着命在喊叫。在家里，我、我妈妈、我妹妹米尔塔我们三人都非常怕他。现在我十三岁半了，已经懂得了很多事情，当然明白那种整天冲

着人喊叫、教训人和辱骂人的家伙实质上都是一些可怜的魔鬼。但是，那时候我还小，根本不懂得这些道理。而米尔塔呢？到现在为止她还不懂得这些道理，因为她比我小三岁。我记得有几个晚上她自己把自己哭醒，她实在太害怕了。您曾经有过害怕的感觉吗？米尔塔随时随地总是感到我老爹醉醺醺地回来了，抽出皮带就要揍她。她根本没有适应家里的变化，而我呢？则与她不同，总是想着法子来适应自己。您是一年半以前出现的。而我老爹比这早得多就开始酗酒了。他一喝醉酒就拿我们三人出气：抽出皮带狠狠揍我和米尔塔，握紧拳头打我妈妈。他打人无非都是为了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不是汤太烫了，就是汤太凉了；或者是我妈妈没有在凌晨三点等着他回来，或者是见我妈妈因哭泣过度而眼泡肿胀。以后，随着时间的推延，我妈妈不再哭了。我搞不清楚她是怎样克制住自己的，后来我老爹再打她时，她连嘴唇都不动一动，根本不再哭一声，这就更激怒了我老爹。她意识到这一点，但依然一声不吭。您认识我妈妈的时候，她已经饱受了难以忍受的皮肉之痛，但是四年前（这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她长得非常漂亮，气色也很好，此外她还非常健壮。有几天晚上我老爹醉倒在地，鼾声大作，我和妈妈一起把他抬到床上。他沉得要死，我们抬着他就好像抬着死人一样。每当这时刻出大力气的总是我妈妈，而我只是负责扛他的一条腿，他穿的裤子上沾满了脏东西，脚上套着一双咖啡色松了鞋带的鞋子。您一定会认为我父亲一生穷困潦倒，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是一个事先设置的圈套把我父亲给毁了。这个圈套是我妈妈的一个在市府工作的堂兄弟策划的。我从来就没有搞清楚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圈套，但我妈妈总

是为我父亲的脾气骤然变劣而开脱，因为她或多或少因自己同族人的过错而感到内疚。我压根儿也没有弄明白到底他们给我父亲设置了个什么样的圈套，而实际情况则是我父亲只要一喝醉酒就拿我母亲出气，好像她就是唯一的罪人。在这以前，我们家生活得还蛮不错，倒不是因为我家有钱，我和我妹妹都出生在靠近多洛雷斯镇的一间屋里（这里简直是个大杂院），我父亲的工资从来就不够用，我妈妈总要挖空思想着把日子对付过去，还时不时地给我们买点衣服、鞋子。但保不住有时候我们还得挨饿（您体味过挨饿的滋味有多难受吗？），然而那个时候家里的日子至少过得还算太平，我们的老爹还没有沾上酗酒的恶习，也不打骂我们，相反，如果钱稍有富余，某个星期天还带我们去看上一出戏。我知道爸爸和妈妈从来就没有认真相爱过，他们两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在陷入圈套之前，我爸爸没有酗酒的习惯，但已经是一个神经兮兮的人。有时候一直睡到晌午才起床，一个人闷声不响呆着，跟谁都不说话，但至少那个时候还没有发展到打骂我们的地步。要是能这样太太平平地过上一辈子该有多好啊！后来，倒霉的事终于发生了，我爸爸彻底垮了。他开始整天泡在酒馆里，到深更半夜才回家，嘴里不时地喷发出令人作呕的格拉帕酒酒气。最近一段时期，情况发展得更加厉害，连白天也酒瓶不离手，简直弄得我们一点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我相信周围邻居肯定能听到他整天的吼声，但是谁也不敢出面过问，因为我父亲身材魁梧，大家都惧怕他。我也非常怕他，倒不完全是为了考虑我自己和我妹妹米尔塔，而更多的是为我妈妈着想。有时候我索性不去上学了，并不是因为我想逃学，而是想呆在家里看家，怕我爸爸喝醉

酒突然闯回家来把我妈妈揍个半死。您看我现在身材矮小、弱不禁风，而那时比现在还单薄得多，我根本没有能力去保护我妈妈，我只想离我妈妈近一点，以便及时报警。您一定知道无论是我爸爸还是我妈妈原先都不是这样的。我奶奶家和我姥姥家虽然都不是暴富人家，但是至少住的地方还很体面：她们家都有朝街的阳台，都有带浴盆的卫生间。我们家出事以后，米尔塔到我奶奶胡安娜家去住了，而我现在住在我姥姥布兰卡家里。现在她们两家都争夺着我和我妹妹米尔塔，但当我父母亲结婚时，她们都极力反对这桩婚事（现在我想她们当时反对也许是有道理的），并和我们断绝了关系，在这里我之所以说和我们断绝了关系是因为当我父母亲结婚时，我在我娘肚子里已经有六个月的生命了。这件事是在学校里有人告诉我的，为了此事我还揍扁了贝托的鼻子。后来我问过我妈妈是否有此事，她也承认确有其事。是的，我早就想找您谈谈（但我不清楚对此您会有什么反应），因为您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确切地说，您对我妈妈关系重大。当然，我一直非常爱我妈妈，但是我无法直接告诉她。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怖气氛中，始终没有时间相互诉说母子之情。然而，每当她没有留意我时，我偷偷地看她一眼，顿时我感到一种我也说不清楚的激情油然而生，它绝不是怜悯，而是当看到她还那么年轻、那么完美，却被一个完全不是她的过错而折磨着，受到一个原本不应她受的惩罚时产生的一种既同情又愤慨的混合感情。也许您也察觉到了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妈妈聪明过人，比我父亲强得多。因此当我知道无论是清贫的日子、皮肉之痛还是受饥挨饿的日子都没有使她屈服，但却要让她睁大着眼睛面对这可怕的现实时，我难

过极了。确实她很悲惨，有时候我看到她眼圈发黑，问她怎么了，她就发火。事实上她是装着跟我发火，她从来没有和我过不去的时候，也没有和任何人过不去的时候。在您出现之前，我感到我妈妈越发消沉、越发憔悴、越发孤独。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更能察觉到她的变化如此之大。有一天晚上，她回家稍微晚了一点（尽管比我爸爸回来早得多），她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我，神态如此之特别以致于我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好像头一回发现我已经明白了这种事情，她羞愧地使劲拥抱我，接着冲着我笑了笑，您还记得她的笑容吗？我却记得十分清楚。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我非常担忧。为此，我几次旷了课留下来跟着她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最近一段日子我在一家小商店帮人家送点货物）。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您和我妈妈在一起，我觉得很高兴。人们可能会说我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我为我母亲对我父亲不忠而感到高兴，也许这样做不对，人们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去吧！我也不反驳。但是对您，我还是要说的，因为您与众不同。您爱我母亲，因此这一事实对我来说简直是命运的安排，因为她值得有人去爱她。您爱她，是吗？我多次看到你们在一起，您对她的爱我是确信无疑的。当然，我还得想尽法子去理解我老爹，这一点很难做到，但我要努力去做。我绝不会恨他，您理解我吗？因为不管他做过些什么事情，说到头来他仍然是我父亲。尽管当他打我和打米尔塔时、或者当他揍我妈妈时，恐惧之余，我感到非常遗憾。我为他遗憾，为我妈妈遗憾，为米尔塔遗憾，也为我自己遗憾。直至今日，我依然为我父亲遗憾，尽管他把我妈妈杀了，谁也不知道他将在监狱里呆上多久。一开始他不愿意让

我去监狱里探望他，但是一个月前我去米赫莱特监狱看他时，他同意见我。看到他处于没有喝醉的自然状态时，我大吃一惊。他望着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一声不吭。我相信他出狱以后不会再揍我了。另外，我也长大成人了，也许我已经结了婚，甚至可能还有了孩子，我是绝对不会打我的孩子的，您相信吗？此外，我确信，要是我父亲不酗酒的话，是绝对不会做出那种事的，您不这样认为吗？那一天下午我父亲因为跟踪我并要惩罚我，结果偶然发现了你们两人呆在一起，您是不是认为我爸爸非要把我妈妈杀死呢？我可不那么认为。您应该看到我爸爸对您可没有任何伤害。只是那天下午，他比平时多喝了点格拉帕酒，才向我妈妈下了毒手。我想，在正常情况下，我爸爸应该懂得我妈妈需要爱护，需要同情，而他呢？除了拳打脚踢以外又能赐于她什么呢？我妈妈确实是个好人，您应该跟我一样明白这一点。所以刚才您向我走来并邀我在您与我妈妈会面的这家咖啡馆里喝一点卡皮奇诺酒和吃一点烤面包片时，我觉得有必要把一切都告诉您。可能您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或者只知道点皮毛，因为我妈妈经常沉默寡言，从来不喜欢谈论自己。我确信我这样做是对的。现在您哭了，而我妈妈已经死了，这一点对于从来不哭的她来说也许是个安慰吧！

刘家海 译

如同格林威治

“您不是马略卡人，对吗？”邻桌的那位少女说。

“怎么？什么？”金尼奥内吃了一惊，差点被酒呛着。

“我吓了您一跳吗？”那姑娘似乎感到很开心。

“有点出乎意外，我承认。在帕尔马这里我没有熟人。我是路过这里。”

“这么说您的确不是马略卡人，也不是西班牙人。”

“让我们互相调查一番吧：我是阿根廷人。”

“看得出来。”

“为什么？”金尼奥内愈加仔细端详着那姑娘，她下穿黑裤子，上着白衬衣，尚未发育成熟，但将来一定会很有风姿。

“不知道。从您的裤线，划火柴的动作，观察女人时的目光看出来的。”

“真是一大进步。以往人们只能通过听口音来辨别。”

“我猜您有四十三岁。”

“四十一岁。”

“您少说了吧？”

这女孩子无拘无束，有点与众不同。金尼奥内喜欢这样。

“我是乌拉圭人，今年十四岁。”

“很好。”

“您不觉得新鲜吗？”

“为什么不？不过，说实话，这几年在欧洲碰见拉普拉塔河两岸的人已经不足为怪了。”

“我叫苏姗娜。您呢？”

“金尼奥内。”

苏姗娜面前摆着一杯柠檬水，但她却尝也不尝。

“您这杯柠檬水都要变热了。别忘了现在是八月份。”

“我不喜欢喝冰镇饮料。”

她用一只手抓住杯子试了试温度，然而仍旧没有喝。

“您喜欢波尔纳这里来来往往的瑞士女人、荷兰女人和德国女人吗？您都看人迷了吧？”

“嗯，这要视情况而言。荷兰女人也并不都一样。”

“什么样的女人最能吸引您？乳房小巧的还是乳房丰腴的？”

金尼奥内惊奇地看着她。

“你是从哪儿学的这类术语。”

“噢，我们用‘你’相称了，太好了。”

“是的，很好。”

“告诉你，我可不是文盲。”

“要我说，你十四岁的年纪可有点识字太多了。”

苏姗娜不语了，她盯着自己瘦削的手臂，似乎在察看皮

肤上的汗毛孔。

“我只要晒太阳多一点，身上就会起斑点。”

“我也一样。”金尼奥内无话找话地应酬着。

“雀斑二重唱。你会唱歌吗？”

“我一唱就走调，像只哑嗓公鸡，你呢？”

“我就像小提琴那么爱跑调。”

“不要一概而论。有不走调的提琴。”

“所有的提琴都走调。这我知道得最清楚。我叔叔过去是提琴手，每天都吱嘎吱嘎地锯。还是不谈二重唱的事吧！”

“你为什么说他过去是提琴手？现在不是了吗？”

“他现在是木匠。现在走调的是他的手锯了。这是流亡的结果。”

“噢，你是流亡者。”

“这很清楚。”

“并不清楚。有许多乌拉圭人和阿根廷人不是流亡者。”

“至少有一半是流亡者。”

“可是另一半……”

“是流亡者的子女。实际上，我就属于这另一半。你呢？”

“我属于前边那一半。”

“你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多久了？”

“是离开图库曼。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不代表整个共和国。”

“就算这样吧。”

“四年了。”

“你目前在帕尔马做什么？”

“眼下在渡假，不过，平时我经商。出售广告。跑遍了西班牙各地。”

“真有意思。我住在德国。”

“那儿怎么样？”

“不错。尽是德国人。”

金尼奥内微微一笑，顺手拿起杯子呷了一口烧酒。

“你说说，你为什么主动跟我讲话。”

“不知道。也许因为我不认识你。”

“仅仅是因为想聊聊吗？”

“不完全是。说实话，我想自杀，但必须把这消息告诉某个人。一个人默默地去死可太难受了。”

忽然间，姑娘脸色变得严峻了。金尼奥内这回咽了一口唾沫。

“你孤身一人来帕尔马的吗？”

“不，还有我们家老头子。”

“谢天谢地。”

“还有老头子的一位女朋友。过一会儿他们就会来找我的。”

“你妈妈呢？”

“留在德国了。他们早就不在一起生活了。她也有一位男朋友，一个陪伴她的男人，谁知道是什么。”

“你是为此而想到自杀的吗？”

“嗯，我想是的。”

“你是开玩笑吧？”

“一点儿也不开玩笑。不过，我想不会有人相信我的话。不，不是因为这件事。”

他又转过目光去看来来往往的游客。平时，他总是坐在“迈阿密”咖啡店门外的桌子边，直到从马德里来的送报纸的卡车出现。于是，他就走到报亭跟前，买上两份报纸或者杂志，以此同外界保持联系。

“你还想对我讲点什么吗？”

“很可能。看来你这个人还不错。虽然名字起得非常难听：金尼奥内。”

“你不喜欢这名字？”

“说实话，这名字让人讨厌。当然，名字是不重要的。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认为是好人。”

“看来的确如此。如果你不是好人，一定会说你保证是好人。”

“你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是的。必须善于动脑筋。”

侍者拿着空托盘走过他们面前，金尼奥内乘机又要了一杯烧酒。

“他一定以为我是个勾引少女的教唆犯。”

“也许以为我是个勾引成人的女教唆犯。”

“的确有女教唆犯。”

“当然。你坐过牢吗？”

他又大吃一惊。故作镇定地摘下眼镜，并用一块脏手绢擦拭着。

“蹲了三年。”

“你孤身一人在西班牙吗？”

“孤身一人。”

“你没有妻子和儿女吗？”

“妻子。不过，你别忘了，想自杀的是你而不是我。”

“你说得对。但是我觉得你并没把我的话当真。”

“我对你讲的都是实话。我很想把你的话当儿戏。那样会更轻松些。但是不行。”

“我小小年纪就想自杀，你不觉得奇怪吗？”

“如果你说话时少用点新闻采访的方式，我将十分感激你。不，我并不觉得奇怪。”

“这事谁也不知道。”

“怎么谁也不知道？我就知道。”

“但是，你不会背叛我。我是说，我觉得你不会。”

“为什么你不去向父亲讲明呢？”

“他根本无法理解。”

“我能理解吗？”

“难说。我正在试探你，如此而已。你已经有点老了，但是，你的眼睛还年轻。因此，你也许还能理解我。”

“幸亏还有这点理解你的余地。”

“我的眼睛怎么样？”

“你眼睛里透着慌乱。”

“你也有你的一套看法。”

“是的，必须善于动脑筋。”

她双手在裤子上抚弄了一下，那动作是不假思索的，几乎是习惯性的。

“你吸过毒吗？”金尼奥内尽量用很随便的口气问道。

“吸过，但是不起作用。它们并不能使我上瘾，而我也对它们没瘾。脾气不合。”

“这样更好。”

“也许更坏，谁不知道。反正不起作用。”

金尼奥内看到卡车已经到了，马德里运来的报纸也卸了下来，但是他没有站起身去买报纸，还有时间呢。此刻他得待在这里，和这位姑娘在一起。

“你爸爸也坐过牢吗？”

“嗯。”

“吃了不少苦吗？”

“嗯。告诉你，我不叫苏姗娜。”

“别开玩笑。”

“我叫埃伦娜。”

“这是为什么？”

“我刚才不知是否可以信任你。”

“现在呢？”

“现在我认为可以信任你了。”

“可是，遗憾得很，我仍旧叫金尼奥内。”

“真遗憾。我一直希望你的名字也是假的。”

“sorry。”

“你从来没有防人之心吗？”

“有时候有。但是你并不像中央情报局的特务。”

金尼奥内决定品尝一下这第二杯烧酒。

“怎么样？好酒吗？”

“是的。”

“我从未喝过白酒。”

“我给你要一杯好吗？”

“不。我一喝酒就起荨麻疹。酒和探戈我都受不了。”

“告诉我，允许我询问你想自杀的原因吗？”

“不是想自杀。而是决心自杀。”

“下决心总要有原因。”

“咱们怎么进行？你来问我？”

“好吧，你为什么下这个决心？”

“有多种原因。因为我家老头子，因为我家老太婆，老头子的女朋友，老太婆的男朋友，他们和另外一些人讲述的那边的一切，以及我和另外一些人在这里遇到的一切。”

“这里是指哪儿？”

“德国。欧洲，整个这块地方。你喜欢读书吗？”

“喜欢，但并无嗜好。”

“音乐呢？”

“一样。你呢？”

“一样，一样。不过这并不重要。”

“你从哪开始讲？”

“从头开始，就像经典著作那样。我们来欧洲的时候，家里已经四分五裂了，那时我八岁。我弟弟仅有两岁。”

“这么说你还有个弟弟，真没想到。”

“为什么？”

“我几乎已肯定你是个独生女了。”

“实际上，我有独生女所常见的缺点。但是，我的确有一个弟弟。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当时他还小。我却记得那是一座二层楼的宅院，带花园，坐落在蓬塔卡莱特街。你熟悉蒙得维的亚吗？”

“去过两次，那是很久以前了。不过，我知道蓬塔卡莱特街，那儿的灯塔和别的东西。”

“我声明，从我们家看不见那灯塔。却能看见一所监狱。”

“那是‘鳄鱼’监狱，鳄鱼。”

“当我们来到德国的时候，父母还在一起生活，但是关系已经很紧张了，总是吵架。好在他们晚间还过性生活。”

“你怎么知道，是你的猜想，还是你偷看了。”

“我是从弹簧床发出的声音推断出来的。对我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征兆。这不是由于我性早熟而对此好奇，你明白吗？而是因为这说明他们相互都需要对方。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发育正常的女孩子，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不喜欢他们关系破裂。”

“但是到底破裂了。”

“他们没完没了地吵架，特别是在政治问题上。他们俩全是左派，但是糟就糟在他们参加的不是同一个组织。因此，他们都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对方，等等。我不懂他们的事，反正不是好事。我堵上耳朵也没用，仍旧听得见。我弟弟不一样，他拼命地哭，最后，他们只好休战以便使他停止哭叫。”

“你弟弟也在帕尔马吗？”

“不，他和老太婆在一起，他们把我们瓜分了，一人一个。”

“后来呢？”

“这样过了一段，直到突然有一天晚上，那床不再响了，我明白那不是好兆头。换句话说，那天下午他们下定决心后对我说：我说，孩子，你应该明白，生活就是这样，爸爸妈妈要分开了，等等，当时我并不吃惊。最坏的事是那个

‘等等’。”

埃伦娜，先前的苏姗娜，终于喝下半杯柠檬水，这时，金尼奥内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你听腻了？”

“不，姑娘，这天气太热。”

“如果你听腻了，咱们就到此为止。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讲我父母的这些事吗？因为咱们今后再也碰不到一起了。”

“你能肯定吗？”

“你看着吧。后天我们就要离开，而我在几天之内也就完了。我不在这里自杀，因为在这里老头子有些事会不好办，再说，我也不想在他渡假期间使他扫兴。所以，这次谈话就算与世诀别吧。”

“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这个世界的存在。”

“自从老头子与这位谁知道是他的女朋友，还是女同志的女同胞关系暧昧之后，他索性也不在乎了，而老太婆呢，可以想象，也同她的男朋友或是男同志的男同胞同居了。于是这个家里便各得其所，既有祖国又有坟墓。他们有祖国，而我只有坟墓。”

“那里有许多同胞吗？”

“有一些。他们互相来往，无时无刻不在谈论那边。说那边贫困，失业，说那边关闭报社，禁止唱歌，没收书籍，说那边盯梢，迫害，杀人。”

“的确如此。”

“我知道。不过，这是令人反感的事，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仅仅听说而没有经历这一切的人来说。很快我们就仇恨那边了。我说的我们，是指来这儿时还是孩子的一辈人。你

想，在德国，老头子安安稳稳地工作，老太婆也一样，没人会迫害他们，杀害他们，我们也可以上学，交朋友。”

“既然这么美好，你那自杀计划又从何谈起呢？”

“别急呀，金尼奥内。”

“我洗耳恭听。”

“我弟弟如今已有八岁了，我来这里时就是八岁，有一天他站在老头子面前对他说他永远不回乌拉圭了；你猜怎么样？老头子差点跌坐在地上。未等他问原因，我弟弟就对他说，那个国家是个狗屎不如的国家，这一来老头子不是‘差点’，而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为了不使你厌烦我简单说吧：正是老头子和老太婆以及他们那东方集团的其他人使弟弟得出这个结论的。你知道吗？他们口若悬河，争吵喊叫好像我们根本不存在，好像我们是石头，而不是海绵。但是，我们是海绵。我们会吸收。”

“你也是块海绵吗？”

“当然，不过有区别。我来这里时比弟弟大，因此我至少记得蓬塔卡莱特街家中的花园。但是，我理解弟弟，我相信他的理由很充足。”

姑娘滔滔不绝地说着，很兴奋，金尼奥内十分喜欢她那双晶莹闪烁的绿眼睛。他忍不住要讲几句奉承话。

“你愿意听我说句话吗？一旦你不去自杀，再过五年，你会在小伙子们中间引起纠纷的。”

她轻吁了一口气，露出开心的样子。

“你是说在联邦德国的小伙子中间。”

“在任何地方的小伙子们中间。”

“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奉承话。喂，你可别爱上我。”

“不会的，孩子，你放心，接着讲吧。”

“尽管我记得那小花园，但这毕竟太少了。我不像弟弟那么断然地下结论。然而，事实上我却不属于那边。也许可以说我属于蓬塔卡莱特，但却不属于那个城市，更不用提那个国家了。”

“这就是说你觉得自己是德国人。”

“从来没这么想过。你是否觉得我像一盘土豆沙拉子。”

“对不起，我挺喜欢土豆沙拉子。”

“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就是不一样。”

“是图库曼人。”

“反正是有点特别。”

“你不觉得自己是德国人吗？你没有交上些男、女朋友吗？”

“当然有，很好的男朋友，很好的女朋友，还有好玩的小狗，好玩的小猫，不过，就连小猫也知道我从来不是德国姑娘。”

“你讲话有口音？”

“我的德语讲得比社会党总书记威廉·勃朗特讲得还要好。不过我缺少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是什么？德国人的精神吗？”

“天啊！你不要这么俗气，这让我恶心。”

“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到底是什么呢？”

“另外一种东西，如此而已。难道必须给它起个名字吗？你看，这就是证明，你虽然眼睛还年轻，但的确是个四十出头的人了。你们这一代人喜欢给所有的东西起名字。”

“不错。这一代人离不开字典。不好吗？”

“历史并不那么简单。”

“我深有体会。”

“有时我也到老太婆和她的男友那里去住住。那位公民给我的印象不错。有点家长作风但为人诚实。其余时间我同老头子和他的罗莎瓦生活在一起。可以说罗莎瓦给我的印象不好。我承认这是一种偏见，但并不过分。”

“可终归是偏见。”

“不过，在这半个家和那半个家之间，我体验到某种无家可依的失落感。”

“这是你要自杀的最终原因吗？”

“耐心点，金尼奥内。每当一方外出时，我就到另一方家中去住。但是有一次他们四个人全走了，确切点说是五个人，因为我弟弟也跟着去旅行了。两个人往东去了，三个人向西行了。我留在了中间，如同格林威治一样。诺大个城市摆在我面前。这是第一次。于是出事了。”

金尼奥内注意到姑娘稍稍失去了她那 20 世纪黛安娜式的姿态。

“出了什么事？”

“小事一桩”她用阴郁的语气回答：“我被强奸了。”

“你说什么？”

“我被强奸了，金尼奥内。晚上，我一个人回家，突然从黑暗处窜出一条大汉。就像电影里那样。这是老套子了。他把我拖到一个建筑工地上。用他的大手掌捂住我的嘴。其实，这个动作毫无必要，因为我早吓得喊不出声了，根本不可能呼救。他很快干完了事，看得出他是个老手。我却是第一次遭此厄运。你说怪不怪，当那肮脏行为进行过程中，我

想起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老头子和老太婆那张弹簧床发出的声音。真荒唐，对吗？另外，那坏家伙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懂，不是德国话。”

“是什么话？”

“无从晓得。他讲的话带颤音。不过那颤音粗哑。怎么说呢，相当可怕。”

“你讲得很清楚了。后来你怎么样了？”

“当那位先生满足之后，给了我重重一击，然后跑掉了。我挣扎着爬起来，浑身是伤，血迹斑斑，但是，伤都不重，因此，我终于回到了我那半个家，老太婆的家，那儿离出事地点只有两个街区。当然了，家中无人。因此，谁也不知道此事。到现在也无人知道。当然，你知道。你是第一个。”

“你怎么连你母亲也不告诉呢？”

“告诉她干什么？”

“应当请医生给你检查一下。”

“也许应该，不过，我可不喜欢这种检查。有一段时间我很担心自己会怀孕，于是我才做出这个决定。我是说自杀。”

“但是，也许你没怀孕。”

“当然没有。所以我才决定自杀。假如我怀孕了，就必须活下去。为了孩子的一切，你明白吗？这种情况下，家庭和社会的一切问题我全都不在乎。不过，既然没怀孕，我则必须自杀。”

“我一点也不明白。”

“这我早料到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没对任何人讲这件事。看到你那双年轻人的眼睛，我以为你会理解的。看来我

搞错了。”

“但是，苏姗娜、埃伦娜，怎么说呢。你听我一句话。”

“我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我一直没哭，这是为了不让别人以为你在纠缠一个女孩子，而抓你去坐牢。”

“谢谢，我很赞赏你这种态度。但是，你听我说。”

“这并不难理解。我不属于那边。也不属于这边。有人从上面向我扑来并强奸了我，而他既不是这里人也不是那边人。也许他是个火星人。可他连个孩子都没使我怀上，如果有了孩子，他至少是属于这里的。或者属于那边，属于那堕落的国家，换句话说，就是那个陌生的畜牲祖国。我已经为自己打好了绳结，这你已经看到了。”

“如果我们来把它解开呢？”

“不可能。或者说，到了这步田地，我不想解开了。”

“至少可以试一试。”

“怎么，你还不理解吗？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似乎失去了一切，与这个世界诀别了。你看见我们面前这些来来往往的瑞士人、荷兰人和德国人了吗？他们个个红光满面，悠闲自得，但他们全都与我无关。”

“他们也与我无关。而且他们也没强奸我。”

“是的，我承认这理由不太充分。但是，我认为我母亲和她的同志，我父亲和他的女友，甚至包括我弟弟，和我的乌拉圭朋友以及德国朋友全都与我无关了。因为我已经与这个世界诀别了。他们抛弃了我，就像抛弃了一样东西。一件用过的、破损了的、无法修复的物件。”

“别忘了你说过你不哭。”

“免得使你坐牢。你应该赞扬我的牺牲精神，因为我实

在非常想大哭一场。”

“尽管如此，有一件事你应该觉察到了。你满脸哭相，很想大哭一场，仅这一事实就说明你并未与世诀别，并没成为一个局外人。如果你真的成了局外人，你就会感到麻木不仁，甚而至于万念俱灰。”

“你怎么知道？”

金尼奥内抽出一支香烟，划着了火，但是，由于持火柴的手无端地抖动，费了很大劲才点着烟。

“你是说我怎么会知道？因为我就麻木过，万念俱灰过。”

她又做出一副哭相，但已不是 14 岁而是 5 岁孩子的哭相。当她再次控制住自己时，终于一口气喝完那杯柠檬水。她正要说话，金尼奥内发现她突然神情一变，换了一副面孔。

“注意，他们来了。”

这真是当头一瓢冷水。老头子和一位妇人，那一定是罗莎瓦，就像赴约晚到的人那样大步流星地走来。

“噢，你在这里真太好了。”罗莎瓦喘着粗气说：“我们还担心你等得不耐烦了。”

“我们耽搁了很长时间。”老头说道：“都没顾得上喝口水。我们在旅馆里会见了爱尔格塔一家人，你还记得吗，就是那几个智利人，是那天晚上在巴塞罗那认识的。”

“爸爸，罗莎瓦，”姑娘边说边收拾着自己的东西。“对于等这么长时间，我不仅感到高兴，而且还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罗莎瓦微微一笑，笑得不大自然，但是老头子却爆发出一阵大笑。

“先生，您尊姓……”

“金尼奥内。”

“金尼奥内先生，请您原谅我这个女儿。年轻人说话没遮拦。”

“我看她很聪明可爱。”

“谢谢您的好意。”老头子又说。“现在我们要带她走了。她会平安无事的。”

“谢谢你，金尼奥内。”姑娘说道。

老头子和罗莎瓦的注意力转到一辆朝这儿开来的出租汽车上，姑娘乘机将两个手指贴在嘴唇上，偷偷向金尼奥内递了个飞吻。

“请吧，咱们该走了。”老头子说，此刻他显得有些神色不定。

“对，你父亲说得有理。”罗莎瓦说。“咱们走吧，伊内斯。”

丁文林 译

告别单身汉聚会

当奥特加俯身凑在套菜中的第二道菜奶油面卷上时，他看见面包屑捏成的小球飞扬而至。他还来得及向后闪身躲开。“子弹”打在席尔瓦前额上方。席尔瓦光火，把无数次告别单身汉聚会上乱扔面包屑小球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抄起了半个“马赛”面包予以回击。桌子的另一端，酒在流淌，裤子被搞得一塌糊涂的卡纳雷斯跳着脚站了起来。

同一时间，有人在往房顶上扔黄油，“瘦子”早就拿起了弹弓把橄榄果弹射出去。

“让戈麦斯讲话！”不是戈麦斯的人说道。

“让戈麦斯讲话！”人们齐声叫喊，打着隔儿，发出智利酒的气味，与此同时，一个长着亚麻色头发、眼神苍白的年青人第四次将所有的酒杯斟满。

呆在角落里的戈麦斯站起来，有人摔打着餐巾纸把他按下，满脸长着小疙瘩的总管发出心领神会的微笑。

“让他讲，让他讲话！”加纳雷斯喊道。他们让他讲话，

满足于这个不言而喻的“休战”可以让他们把羊肉干掉。

戈麦斯，天真质朴，敦敦实实，向来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他甚至认为还是有可能把他那讲演家的风度展现一番的。从早晨开始他就准备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祝酒辞，其内容，与他记忆中尚有的、他本人的向单身汉告别的聚会上所讲的内容大同小异。

“我……好吧……其实……我能说些什么呢？……我不认为自己是最适宜的……如若不是在这里向鲁伊斯朋友表示最美好的幸福的祝愿……在开始这个新的阶段的时刻……和他所选择的伴侣……”

“好，胖子，好！”人们齐声喊道，“就这样讲！”

尽管有人轻轻拍打他的后背，响起热烈的掌声，而戈麦斯还想说下去。面对这个“危险”，奥特加还是决定站起来。他咳嗽一声，表情严肃。那少数几个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的人，发出有节制的笑声。他慢条斯理，用庄严的、举行仪式时使用的极其隆重的口气开始讲话。

“这位同伴的一席话是如此恳切而又充满人情味，没有任何虚情假意的装饰，再一次使我深受感动。我知道，鲁伊斯朋友（这些美好祝福的话是送给他的，）是极其谦逊，十分真诚的，但是，如果我是他的话，我认为我讲这一切，无非是表达一下他的感受，我早会用那首古老的南方歌曲来回敬这位同伴。”讲到这里，他停下来，依然保持严肃神态，突然，像被弹簧弹起，他带着一个狂怒之人的真实表情，放声吆喝起来。“拉…拉…拉…拉屎，拉…拉…拉…拉屎……”

全场大哗。鉴于笑声、打嗝还不至于碍事，大家都齐声唱起了那首古老的南方民歌。贡萨利托手托住自己的胃，像

个要分娩的妇女一样呻吟着，把头靠在席尔瓦汗涔涔的胸脯上。席尔瓦自己也笑得难以自持了。正在喝酒的卡纳雷斯被眼下的玩笑弄得发懵，他噎着了，急剧的干咳骤起，智利酒流了出来，于是，巴尔德斯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借口在他的肩头揍上几拳。戈麦斯，那个可怜虫，早已坐了下来，嘴唇蠕动着，像是在祈祷什么。而他却什么也没祷告。

事实是，此刻谁也没有注意鲁伊斯，而无论如何他才是被庆贺的对象。当戈麦斯开始说话时，四个或者五个人回过头来看看他，他脸红了，那不是由于酒，因为他只喝矿泉水。后来，人们就把他忘了。最好不过。他不喜欢这种喧闹的快活方式。他二十三岁，明天就要结婚了，还依然秘密地保持着童贞。七年前他和埃米莉亚不期而遇，便许诺把这件礼物送给她：保持纯洁之身直至婚礼。当然，他是怯懦的，这有助于实现他的想法。有时他不知道，对他来说，接触一个女人比避开一个女人需要做出更大的牺牲。

“你说说小女仆的故事。”贡萨利托请求奥特加，手里举着余下不多酒的酒杯。于是，奥特加讲了小女仆的事情，当他最后说到，“没有，老太婆，我跟哥儿们在一块儿呢！”几个人敲起了桌子，另有几个人笑得难以自控，坐在椅子上的身体向后仰去。风头出尽。

埃米莉亚，十九岁，看上去显得还要年轻。翘鼻子，面颊光滑细腻，没有黑痣，也没雀斑，灰绿色的眼睛，很漂亮。特别显得青春靓丽。

“哎，鲁伊斯，你得喝点什么。”

他们又想起他来了。倒霉蛋。而他是那样安然自得。

“我喝酒不舒服。”

“喝了又会怎样？难道，你……一朵小嫩花？”

“你知道我从不饮酒，由于肝的原因。”

“可是，老夫子，如果你今天还不及及时行乐，我不知道你要等到何时了。你的时间所剩无几了。”

埃米莉亚，像个易碎的小东西。在影院里她时而欢笑，时而微笑或哭泣，看上去总是值得爱怜。他喜欢一只胳膊搂着她的双肩，她喜欢这种被护爱着的感觉。私生女，继父，——狂暴之徒，——总是惩罚她。明天，意味着解放。他已经几次重复讲述未来他会多么温存地待她的细节。

“我就喜欢你这样……这就对了，我们算什么？男子汉还是小蝌蚪？”

“小蝌蚪！”有人尖叫。

“再喝一小杯，对第一次喝酒的人来说，这个智利酒是最合适不过了。”

他感到面颊发热，并随之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乐观心情。埃米莉亚，万岁埃米莉亚。所有人都是可亲的、豪爽的、愉快的。他们是他的同伴，他的兄弟，他的生活。再来一杯，我喜欢这个样子。

“现在该说说你的‘忠告’了，瘦子。”贡萨利托说道。

“对，该你的‘忠告’了。”另一个人附和道。

没有人不知道那些“忠告”，但是人们准备再次大笑一场，只要能大笑，他们不惜做出任何牺牲。比如说，奥特加，已经在一张空椅子上呕吐起来。瘦子从衣袋中掏出一张纸，依然坐在那里，拿着那张写有几行文字，在他的眼镜前晃来晃去的纸头，读了那有名的“十诫”。

“婚姻是一种体制，必须十分小心地‘进’去，用温存、

体贴的神奇软膏剂，把那强烈的愿望加以润滑……”

显然，鲁伊斯已醉醺醺，他一把扯下了那正人君子的面纱，那下面掩盖着的是古老的淫秽下作。他和别人一起在为之狂欢，大笑着，冒出一声怪腔，就像是在改变笑声。

于是有人拉着他的一只胳膊，是他的某个豪爽的、快活的哥儿们。埃米莉亚万岁。又打碎了一只瓶子。“我们走吧。”谢天谢地。他们踉踉跄跄地在空椅子中穿行，就面对着那位满脸小疙瘩的总管，他不再微笑，倒像是在和这位满头金发，长有一双明亮眼睛的侍者在说：“这帮傻瓜蛋喝下四盅，就觉得必得呕吐。”

明天，意味着解放。他第一次从“性”的意义上想起了埃米莉亚。她会是什么样子？一切会怎样？他，非常谨慎地，早已拜读了《凡·德贝尔德》^①共三卷。谁也不会受罪。

“有种的跟我来，”奥特加说道，他已从呕吐中恢复过来，“我们去轮盘赌。”

“假如让你进去的话。”

“你们去吧，”席尔瓦说道，“我们带这个孩子去见识一下什么是夜总会。”

瘦子和贡萨利托赞同。戈麦斯以惦记家里为理由溜走了。

他们费劲地钻进席尔瓦的小车里。鲁伊斯在旁看着他，在收音机播送的米隆加^②音乐的陪伴下，行驶在科洛尼亚大街上。他看着他驾驶自如。原来就是这么简单的傻玩艺

① 淫秽作品。

② 一种民间歌舞。

儿。连他也能去攥攥那方向盘，竟然是这样容易。

桌子周围坐不下这么多人，一共四男四女。他感到女孩那金黄色、粗硬的头发在他那几乎无髭的下巴蹭着。瘦子和那位小个头姑娘在舞场中心跳着舞，他竖起一个指头，装成小孩的样子。席尔瓦那火热的呼吸紧挨着黑白混血姑娘那张无动于衷的面孔，无论如何他也要摸摸她的左侧乳房。而贡萨利托呢，他用出人意料的语言在向他的女伴进行“说教”：“谁也没有给你解释过‘三圣一体’的秘密？所谓玛丽亚的贞节完全是由于人们的误传。”耳光像枪声一样清脆。“你别污辱我，混蛋。”

于是，鲁伊斯，像捧着权杖一样端着一杯香槟酒，他清清楚楚看到了一切。她的贞节缘于一个误传。短小衣服下，那女子的腰肢裸露，完全可以用手去抚摸，这就更使他了解了这个秘密。那是个误传。贡萨利托，他的忠诚的兄弟，他的老朋友向他揭穿了这个秘密。

瘦子此时在和一位议员就加德尔^①的四个阶段进行讨论。小个头姑娘厌烦了，他为了讨好她，拍拍她的屁股，给她斟满威士忌。颇有胆量的席尔瓦早和混血姑娘溜走了。

突然，鲁伊斯跳起舞来。这个女人笑的时候露出了少了两颗牙齿。如果她保持严肃，还不算难看。她后背上的汗水淌在他的右手上。埃米莉亚。

“我们找个地方你觉得怎么样？”瘦子问道，“我和小个头在那儿，你呢？”

他们什么时候进来的，怎样进来的？和他面对着的姑

① 阿根廷著名探戈音乐家。

娘，肚子上有一条深深的疤痕，但那是条陈旧的疤痕。

“你怎么落下的疤痕？”

“唉！别提它了！要弄扫帚时划的。”

穿着衣服她显得更瘦弱。但不是这样，有肉可以抓到。通过镜子还可以让他看到，她腰部周围有一圈风疹块。她二十二，也许二十一岁。埃米莉亚十九岁。

“告诉我，你是醉糊涂了，还是真的是童男？”“真新鲜！我把你介绍给我的姑姑，她是教育家……”

他当然是童男。正是如此。埃米莉亚配这份纯洁。

由于女人的份量，弹力床发出无奈的声响。她的胳膊压得他差点透不过气来。他是童男。真的！

“几点了？”他大声对自己说，他坦然自若。

从那叼着一个发夹的牙齿中发出声音，似乎她在说：“三点。”

一日的三点。可怕，一切都完了，没有什么可奉献了。埃米莉亚，埃米莉亚，埃米莉亚。解放，就是在今天。只有今天，只剩下今天了。啊呀！真遗憾！

李红琴 译

让我们坠入诱惑

您是冯·达尔乔夫？非常高兴认识您。那么，是阿雷奥萨把我的电话给了您？他好吗？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他了。他在这张卡片上说您想找个题目写篇故事，他认为我能帮助您。好吧，不用客气，只要我能做到，乐意效劳。阿雷奥萨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您说安娜·西尔维斯特蕾？我肯定认识她。至少是从 1944 年开始。她现在做了未婚妻。真有意思！怎么会没有故事的题材？但您那点说得对，您得把人名改动一下。再说，您不是此地人，您要在您的国家发表，那是自然的。那很好，那样好得多。安娜·西尔维斯特蕾，像个戏剧的名字，我不喜欢。我永远也搞不清她为什么不愿意保留她的真名：玛丽亚娜·拉腊比德（请放些冰，不要苏打）。1944 年她还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只有 17 岁。总是那样瘦弱，不安静，头发蓬乱，但是即使在那个年代，她已经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会令男孩们，甚至令更大一些年纪的男人，比如我，感到骚动不安的东西。您

认为我那时多大岁数？没这么大，没这么大，前天我刚满48岁，是的，先生。天蝎星座，非常荣幸。是的，17年前玛丽亚娜是个小姑娘，她身上最美好的，向来是她那双眼睛，黑色的，黝黑黝黑的。那时她正是天真无邪的年华，那双眼睛天真纯洁极了，而在她那另一个时期，那双眼睛看上去可就充满淫乱放荡的眼神了。那时候，她还是个预科的学生。当然，是法律系的。她和苏尼卡兄弟们在一起学习，和小黑子阿里斯蒂穆尼奥，埃尔维拉·罗加，还有小可爱安塞尔米在一起。他们从不分开，是个混得很熟的小团伙。六个人从路上走过来，您必须从人行道上走下来，因为他们即使用棍棒打也分不开。我非常了解他们，因为我是阿里亚加的朋友，他是哲学教师，小团伙的哥儿们姐儿们把他奉若神明，因为他随和直率，而且骑摩托车来上课。在卡布罗和德拉贡内斯街街口，他和22路有轨电车相撞，电车把他送到玛西埃尔医院，他的一条腿折了，另一条也断了，自打这总算彻底结束了他那唐璜式的作风。但是在那个时候，阿里亚加做梦也没想到还会架上双拐。有时，他和我一块儿在咖啡馆坐坐，我们看着“小团伙”的人进进出出，互相推推搡搡，高声嚷叫着无聊的玩笑，那些玩笑也只能引起长青春疙瘩的孩子们发笑罢了。我完全明白，阿里亚加对玛丽亚娜很有欲望，而她呢，对他所感兴趣的东西，从来不让他占半点便宜。她把他当成教师，因而崇拜他，仅此而已。埃尔维拉·罗加和安塞尔米比她大一岁，她们已经能和所有人上床。而那时的玛丽亚娜却保持着自己的贞洁，深谋远虑地把自己和别人的关系限制在友谊的范围内，使那些“动手动脚”者也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大概在整個自由世界的历史上，贞

洁的重要最为人所熟知，连咖啡馆里的侍者们也会给一位处女送上牛奶咖啡。值得注意的是，她宣称，她并不是有所成见，很简单，她只是不为性的事情所驱动。我敢向您保证，如果说她不为性的事情所驱动，但她却很懂得通过自己那极为低矮的领口，巧妙安排的大腿交叉的动作而吸引人们的目光。永远也无法知道到底谁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小可爱安塞尔米传言巴斯克斯酒吧中的一个老主顾是，而——您看看，有多么凑巧，——这位正巧也叫巴斯克斯的男人，一天晚上，在喝下四杯酒后，说出实话，说他是第二个（谢谢，再放一块冰，好了）。实际上，有可能获得这份殊荣的人有好几个，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事实是玛丽亚娜在每次放纵之前，对所有人都会说只有过“一个男人在她的生活中”。有的人，完全是出于愚蠢，在她那儿寻个心满意足，因为是第二个人和是第一个人几乎完全一样，而且还少掉了许多“首次”所带来的麻烦。有一点必须承认，那就是玛丽亚娜有她自己的作派，无论是天真无邪，还是放荡不羁，无论是逢场作戏，还是偶尔悲伤。她享有绝对的自由，因为她的父母在奥里玛尔省桑塔·科拉拉市。她和她的一個姑姑住在这里，这位姑姑过去也曾很风流。房子在布达·卡雷达，离监狱很近。在建筑上属于贝约和雷沃拉蒂式的混合形式，它使我经常想起小时候玩的砌房子的游戏。姑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呆就是几个星期，玛丽亚娜就成了这个拥有各式大阳台和走廊的房屋的主人和贵妇人。于是就有机会组织豪华的聚会，有美酒、爱情和迪斯科舞。阿里亚加是聚会上的常客，我作为他邀请的朋友也开始参加。那时候，我爱上了小可爱安塞尔米，喝上三杯圣·马丁酒后，她就变得风情万般了，这时

我就急忙陪她到阁楼去平抚一番。想一想那时她还是个小尤物，丰满适中的小宝贝。时至今日，虽是市政职员非常般配的妻子，看上去邈里邈遑，而在过去的岁月里，她有着曾是多么迷人的胸脯呀。好了，我早就想说这个了。很多那种私人聚会的参加者都是带着极大的使命感去娱乐的。因为是个聚会，所以必须大叫，因为是个舞会，所以必须狂跳。一切都在意料之中。那时候，玛丽亚娜已经不再是个小姑娘，她并不是用满脸的微笑来等待我们，不，先生。我们一到的时候，她总是板起严肃的面孔，就好像聚会的主意不是她出的，而是我们在强迫她娱乐一番。我们可是了解她的，我们清楚她需要营造一种气氛，慢慢进入“笼子”之中。苏尼加的小兄弟搜肠刮肚说出了个笑话，是那样离奇怪异，于是等到有人搞懂时，人们已经不耐烦地打起连天哈欠。小黑子阿里斯蒂穆尼奥是“美好联盟”省的人，他讲述边境的轶闻轶事。埃尔维拉·罗加开始感到发热，她脱掉衬衫和其他衣物，阿里亚加，既会教授发音又掌握用声技巧，他开始背诵古代罗马文化中淫秽的轶闻轶事。于是玛丽亚娜一点点开始高兴起来，随时可以听到她那有节奏的、底气十足的放声大笑。雷蒙德·奥尔蒂斯也曾是这样一次欢闹聚会上请来的客人，他亲临了这种逐渐升级的气氛，由于他是一位杰出的从事话剧的人士，他把这称之为“高潮”，他建议玛丽亚娜加入他的“拉班巴里娜”自主剧团。真是好眼力！从一开始，——我似乎记得她第一次登台是在奥尼尔的一部小剧——她就是评论界的宠儿。那时，评论家少，而水平又不高。首先是奥尔蒂斯，其次是奥拉斯夸加（在一部当时是先锋派的剧目，当今已早已落伍的话剧中，玛丽亚娜从贝芭·

高尼的手中抢下了四号妓女一角色的晚上，贝芭抓伤了她，她便离开了“拉班巴里娜”，加盟“深处的幕”剧团)，他们做了盈利的大买卖。他们让她来演各种剧目中的各样妓女。说到舞台，我敢向您发誓，她就像刚刚从“蓝色的星”或“大西洋”夜总会中走出，迈着同样步子，相似的堕落的眼神，一样的扭动屁股的节奏。（谢谢，杯子里还有，那么，既然您坚持，就再加一点，不要忘记放冰，好极了。）他们从来不把有个性的浪漫情调的角色给她，她也从不要演那种角色。演完那个娼妓的角色（那是继耶尔玛之后最被演技派演员渴望的角色），她感到很有自信心，得心应手。在日常生活中，她精心装扮出一张如此纯洁的面孔，而她走上舞台时，她把那层叫做“乔装”的脂粉抹下，早熟的“老手”的表情便生灵活现地展示出来。只是表面上对她有所了解的人，可能会相信，她在剧中的形象是属于“塑造人物”，但是，事实是她只塑造一个人物，那就是她不在舞台上时的安娜·西尔维斯特蕾。我是逐步地了解了她的整个混事经历，我敢肯定地对您说，玛丽亚娜天生具有恬不知耻的德行，从不认真严肃地思考什么。她蔑视世界上一切最神圣的东西，比如说宗教、祖国、母亲和民主。我记得在布塔·卡雷达的家中（确切地说，1958年的2月3日），她突发奇想组织一个“世俗弥撒”（她称之为“灰色弥撒”），她双膝跪下，厚颜无耻地祈祷：“让我们坠入诱惑”。我认为她太过分了。至少，我可以对您肯定从那时她就开始自暴自弃，开始了她后来的可悲的堕落。因为上帝——您懂我的意思吗？——应允了她的话，让她堕入了诱惑。您可能要问是什么诱惑？既然我已经统统了解。您听我说，听我讲给您听。奥拉斯夸加的

剧团正在上演国内作家的一部小剧，那年由于市政府的资金补助，剧目大肆泛滥，您真幸运，那年您不在。国内剧作家多得分文不值。有一次我们“乔乔”一组剧目中的六个人，倒有五位是本国的剧作家。多得不得了。只有我保持常胜。好了，“深处的幕”剧团演出的剧恰恰不是最糟糕的。我相信，他们甚至在戏剧节上得了三等奖。该剧有一种感伤主义情调，深深打动了评论家的心扉。对您，我非常坦率，我实话告诉您，我已经记不清故事是怎么提出的、曲折情节、——更不用说——故事的结局了。但是我确实记得剧作的中心人物：一个永远保持纯洁的姑娘。作者（您知道是谁吗？埃德蒙多·索利亚，今日的律师、讲演家，有人说他靠他的反共剧团发了财，总之，一个傻瓜）索利亚把全人类的所有灾难全压在了他的主人公身上。父亲死了，而她是纯洁的；继父殴打她，她仍然是纯洁的；未婚夫侮辱她，她依然是纯洁的；工作被开除了，她还是纯洁的；小无赖们抓住她不放过，她仍旧是纯洁的。不能忍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能忍受。最后，她死了。我相信那是因为死于纯洁。也许我这个梗概介绍有些添油加醋了，因为如果说它是成功的我确实不敢恭维，而且那些我太了解他们的底细、向来很苛刻的人用站不住脚的理由为索利亚辩解，说什么“当一个人打算搞一部通俗剧，那就必须彻头彻尾是一部通俗剧”。事实上，没有玛丽亚娜出演，这个剧会搞得一塌糊涂。可是，您听我说，原来这个纯洁女子的角色并不是由玛丽亚娜扮演的，要是那样该多好啊。阿尔玛·富恩特斯（她的真正名字是：娜塔丽亚·克拉贝巴）已排练了三个月，她所投入的激情和惊人的记忆力让人佩服。首演前三天，阿尔米达出风疹病倒，

奥拉斯夸加面临的繁琐手续问题比艺术问题还要难办。他早已预付了科隆大厅一半的租金——整整一个冬季仅有三周空闲时间——停止演出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天下午，奥拉斯夸加把全体人员集中在一起时我也在，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姑娘们，您们中的哪一位，能够做出牺牲，从现在开始到星期五，把这个角色拿下来，以此来挽救我们的资金危机？”当那六位小美人刚刚开始互相用眼光瞄来瞄去时，玛丽亚娜已做出了回答：“我已经背下了台词。”“你？”奥拉斯夸加带着几乎是傻了眼的表情冒出了这个问题。我看着他，我明白他在想什么，怎么能让剧团中一个向来扮演妓女的演员来扮演一个无可争议的纯洁少女呢？可是我也看了看玛丽亚娜的脸。我看到在那张面孔上开始有变化。这次的表情，我也许不能对您说那就是纯洁，但那确实表达了一种纯洁的愿望。我相信奥拉斯夸加和我看到的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问她：“你真的想演？”“我想演。”她回答。她可真来劲。第一个晚上就让人大吃一惊。我简直不能相信我所看到的東西。跟您这么说吧，就差一个光环，完全是一位圣人，人们所称道的圣人。当演到无赖们纠缠她时，真让人想把他们杀死，这帮罪恶之徒。当演到未婚夫侮辱她时，有个人跑过去喊道：“你死去吧，畜牲。”台词全是蠢话也无关紧要，她倾注了一股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以致于我看了那些“英雄主义”的场面也流下了泪水。演完两个星期时，阿尔米达看到她后（“你是彻底地被排除了。”奥拉斯夸加在先前答应了让阿尔米达出演费德拉一角色后，又这样对她说道），神经和理智展开了一场斗争。您看看，由于嫉妒，她连左颧骨、右眼睑都在发颤。可怜的阿尔米达。可是，更

令人吃惊的事发生在演出的最后（由于获得巨大成功，演出延长到六个星期）。最后一晚的演出，幕布还在降落时，玛丽亚娜宣布退出舞台。所有人都是一笑了之，所有人，除了我和奥拉斯夸加。我们知道她说的是真话。她是要这么去做。奥拉斯夸加问道原因，“这就是我的角色。”她说道，微笑着，摆出了天使般的新面孔。“我不想在舞台上扮演任何其他角色。”然后补充说道，声音这样轻，像是在对自己说：“在生活中也不想扮演什么角色。”您明白了吗？我对您说的是，上帝报复了（哎，威士忌不要了。好吧，再加一点，可是这绝对是最后一杯了。您想着放冰，谢谢）。是的，先生，上帝报复了。上帝让她受到诱惑，但那是受到“好”的诱惑，那可是她唯一缺少的东西。从那时开始，她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不搞聚会了，也不放荡了，甚至离开了她姑姑的家。现在她可爱读书了。还爱听音乐，连莫扎特都听。她甚至学起弹吉它。她变好了，太可惜了。糟糕的是我相信她是真的信服了，这样的话她就没治了。一个礼拜前我在科尔登碰到她，我邀请她喝一杯咖啡，对，她一杯咖啡，我一盅酒，因为我的好奇心促使我听她这样说话，没有观众，面对面，就像我记忆中那样，她也还记得那些情景。喂，您猜她对我说什么？“我是另一个人，蒂托，你能相信吗？在演出索利亚这部戏之前，我对接受一切好的东西是不感兴趣的，我从未体验过自己是一个纯洁的人、一个慷慨的人、一个朴实的人该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当我扮演了索利亚剧中的人物，就像一个人穿上了一件特别合适无须做任何改动的衣裳，我感到那件衣服就是按我的尺寸做的。你看，其实也不是一件衣服，应当说我穿上的是我的命运，你懂吗？从

那一刻起，我知道我被征服了，我被争取过来了，或者说迷失了自我，随便你怎么说吧，反正我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样子了。在阿尔米达生病之前，我是背下了台词，我那样做目的在于自嘲，因为我打算在我们聚会时来个滑稽模仿。但是当我意识到了我能讲出那些话，能来表现出我就是那个样子时，我就有了足够的勇气来抓住‘她’不放。这样，当我站到舞台上，说出那些话时，我向你发誓，蒂托，那些话就是我讲的，我敢对你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发自内心地说出过这些别人让我讲的话。”还有，您千万听好，又让人大吃一惊，她说道：“我做了未婚妻，你知道吗？你别这副表情，蒂托，你不相信我现在是另一个人，但我确实是，我非常自信。他是阿根廷人，父母亲是荷兰人。他戴眼镜，似乎能看到你的心灵深处，但是我对这无所谓，因为现在我的心灵是纯净的。他一点也不知道我以前的生活，他只知道我现在的活，因此我爱他。我不想让他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另一个人。他长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一张好人的面孔。我没有撒谎，我不骗人，因为我确实是另一个人了。他有两米高，因此走起路来总有点像驼背。他很迷人，手很长，手指头很秀气。他是三个月前来的，两个月后他将离开。最重要的是他要把我带走，那我就有救了。没必要把以前的事告诉他，因为他不太坚强。他会受不了那个打击。我们到罗特丹去生活。罗特丹离布塔·卡雷达很远。再有，上帝站在我这边。你知道吗，蒂托？”这个傻瓜哭起来，而糟糕的是，她是高兴地哭起来，简直是个灾难。她更削瘦了，烫了头发，天晓得。我甚至没有勇气像我们往常分手时那样，在她的屁股上拍一拍。我坦白地告诉您我真糊涂了。我唯一想知

道的是谁是那位要把她带到罗特丹的傻瓜。高高个子，金黄头发，戴着眼镜。手很长，手指很秀气。总有点像驼背。这叫什么事，和您一个样子。不会是……真是糟糕透了！这回算是闯下了大祸。糟糕透了！您不该让我连着喝了四杯威士忌。您的名字冯·达尔乔夫。一切像水一样清楚了。请您原谅我做了这件蠢事。还有什么办法？现在是毫无办法了。可怜的玛丽亚娜。至少您得承认上帝不站在她一边。

李红琴 译

一片茫然

朋友之外，一片茫然。

——豪尔赫·纪廉

一

不知什么东西从楼上掉下来，落到他脑袋上，也许是炭火，也许是粪便，他也不想弄明白，只是用一张《先驱论坛》报就手使劲擦了一下。于是，他决定推迟晚上去参观亮如白昼的时代广场。他必须回旅馆去进行一天来的第三次淋浴。

到纽约后的第二天，奥兰多·法里亚斯便处于潮湿和充斥烟垢的炎热之中。尼龙衬衫仿佛橡胶制成的圆筒，老是湿漉漉的，令他透不过气来。

在第五大道和三十三街的路口，红灯亮了，人们不得不

刹住狂跑的车辆。法里亚斯像是受了感染，也收敛一下蒙得维的亚人素来爱违反交通规则的习惯。他一边等待变灯，一边擦去左胸脯淌下来的汗珠。他大声骂了句粗话。身边一位脸上长雀斑、一头金发的太太，提着大兜小包，朝他和蔼地一笑，只是把它当作对天气的诅咒。

正当他感到不好意思的时候，人们已发动了汽车，超过了他。绿灯亮了。法里亚斯暗自思忖：这么快的速度是不合时宜的，至少是和这个季节格格不入的；如此高速的驾驶只适用于零下十五度的天气，而决不适合这种烤炉似的气候。他缓步行走着，比在世界上哪个城市都走得慢。他很不痛快。只在出售清仓矿石收音机的商店橱窗前停留过两次。那是一种导弹型的新颖收音机。这些便是这个城市给他的初次印象。

到旅馆后，有人告诉他，克莱顿先生——他的全名应该是T·H·克莱顿——给他来过电话。法里亚斯是在1956年认识克莱顿的。那年，这位美国评论家抱着了解当地文学和民俗的可嘉意图，在蒙得维的亚逗留了十五个小时，在东角小住了两天。法里亚斯想起了克莱顿对梅林格舞（他叫作“米林科”舞）的那份执着。有人曾使他相信那是南锥体地区^①的典型舞蹈。后来，他躺在摆成一排的三张椅子上，眼睛望着天花板，开始打听如何用电话招呼妓女的事。

直到目前，法里亚斯用他的外国腔英语混得还相当不错。有时他发觉自己讲的是纽约腔，别人照样能听懂。打电话却是另一回事了。T·H·克莱顿先生讲起话来又快又单调，

① 南锥体地区包括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

他只能听懂零零星星几个单词，诸如“美国国会”，“非常荣幸”，“正餐”，等等。是邀请他吃饭吧？他将信将疑地用英语说“非常高兴”，并迅速记下一个他熟悉的地址。

时间紧迫。他上楼到407房间，享受了五分钟空调。接着，打开电视，并开始脱衣服。电视机不知犯了什么病。一位戴眼镜的男子说起话来几乎连嘴都不张，只是咧咧嘴角，开始自上而下地不断翻滚。按哪个钮都控制不住。他在充分享受淋浴时，总算听明白了。那位不断往下掉的先生在不断重复着一句口头禅：“And this is our reality”（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二

“请称呼我特德吧，”T·H·克莱顿说。口气十分亲切。然而，面部表情却显出既心烦意乱又为之感到自豪的那种刻板的严肃。与对他多年前的回忆相比，法里亚斯感到他更消瘦了，近视程度也大有长进。

“对我来说，称呼您的名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尽管他一再力图发准“奥尔兰多”这四个音，然而却只能从嗓子眼里发出一种干巴巴的类似吹喇叭的响声。“我想叫你奥利会更容易些。”

现在，法里亚斯在格林威治村^①的一间地下室里。到处堆放着书籍、唱片和酒瓶子。窗口上排列着一条条小腿：有穿袜子的，有光裸着的，还有布满污垢的。法里亚斯瞟了

^① 纽约市作家、艺术家聚居的地区。

一眼书架，发现书脊的颜色比拉普拉塔地区阁板的颜色还要花哨。

“今天有几位新作家要来，我希望您能结识一下，他们是布拉德利、库克、布卢门撒、阿利皮。但不都是垮掉的一代的成员。……”

“是拉里·阿利皮吗？”法里亚斯问道，“是旧金山的那位？”

“就是他。您有耳闻？”

“不久前，我拜读过他的诗作《多一些还是少一些》”。

“喜欢吗？”

“不喜欢。”

“这就奇怪了。拉丁美洲人不喜欢拉里的诗。我还以为美洲人都喜欢他的诗呢。因为……”

“您说的是美国人吧。”

“当然，当然。我认为美国人之所以喜欢，是因为我们觉得他的诗有拉丁味。”

“还是因为阿利皮是拉丁人？”

“不知道，我不敢肯定。”

“对库克我一无所知。”

“他深受梅勒^①的影响。您没有买一本他的《自我标榜》？”

“还没有。”

“买一本吧。库克的语言无疑是很有个性的。”这时窗口

① 诺尔曼·金斯利·梅勒（1923年~）美国作家。他的作品以幽默方式分析“美国的社会心理官能症”。

上出现两条脏不拉叽的女人的腿。一片陈旧的污垢使脚踝变得有些与众不同。一只脚不时缩起来，踩着另一只脚。有人要是不知道那只是两条普通的腿，还以为是两个胆怯的有生命的妖怪呢。

“您读过这一段吗？”克莱顿把一张《纽约时报》递给他。报纸被折到其中的一页；一个椭圆形的红圈圈着一小段文字。法里亚斯读到这么一条消息：新版的《美国学生词典》已正式收编“垮掉的一代”这个条目。他读出了声：“垮掉的一代：一代人的成员。他们占据了二次大战和朝鲜战争后一代人的大多数。他们结合的共同目的是要使社会人际关系和性关系得到宽松。他们反对规章制度，主张不可思议的解脱，以及物质上返朴归真的价值观。这一切均被解释为冷战所带来的失望和沮丧造成的结果。”

克莱顿表情冷漠。不一会儿，又露出了半是戏谑半是得意的笑容。

“这几乎等于得到了官方承认。”法里亚斯随口说道。

“您知道所谓‘神秘的解脱’是什么意思吗？”克莱顿问道，置一切可能的讥讽于不顾。

“知道得并不确切。”法里亚斯回答。他对此全然不通晓。

“这是垮掉的一代成员的专用语之一。只有团体里的那些人才能听懂。”

“噢——”。

“‘解脱’这个词是芬伦斯·利普顿所写的《国民》一书的几个章节中针对新知识分子这一态度所使用的专门用语。利普顿在约翰·L·刘易斯的碑文上只写了一句话：‘我们解

脱了。’”

“那么，……‘解脱’了什么呢？”法里亚斯问道，他感到自己完全成了门外汉。

门铃响了。克莱顿朝房门口走去。来了两位妇女和三名男子。未等介绍，一位妇女已经脱了鞋；介绍后，另一位妇女（显得更为庄重）也把鞋脱掉了。

“他们是安、乔、汤姆·布拉德利、玛丽、吉姆·布卢门撒。”克莱顿逐个介绍说。法里亚斯发现，只介绍姓的那几位最为引人注目。他喜欢布卢门撒的长相。他显得年轻，顶多二十五岁。戴一付眼镜，留一脸大胡子；但没有小胡子。目光显得格外有神，接触以后便令人无法轻易忘怀。很难说他是一个纯朴的人，还是那种随时可能带着惬意的微笑掐死一个小孩的人。

其余人都是按预定时间同时到达的。“准时得令人讨厌。”法里亚斯心里想。埃迪是个高个子黑人，沿下巴留一圈窄窄的胡子；他注视别人时仿佛是通过一块磨砂玻璃似的。除那位黑人和站在屋角的一男一女，所有人都站在日本式的书架旁，都脱了鞋。法里亚斯的脚指头在鞋里活动着。如果也要他脱鞋，他是会直截了当地拒绝的。说不清为什么，当时他感到只穿着袜子要比只穿裤衩或者干脆什么也不穿更不体面。“简直是嗅觉上的色情。”他心想。他微微一笑，心里想象着《体育报》一定会为他的这一观点喝采叫好。

突然，他眼前出现一只烟盒，一位穿单排扣长大衣的人，从人群里伸出手来，请他抽烟。“不，谢谢，我不会。”他从心不在焉中恍然大悟地说。给他递烟的布卢门撒理解地

放下手去，微微一笑。“对不起，”他喃喃地说，“很抱歉，今天我没带大麻。”

法里亚斯缄口不言。实际上，他现在弄不清楚，到底是感到自己成了局外人，还是感到庆幸。他实在弄不明白，仅此而已。正如是否以后哪一天，有人会使他相信美国佬不嚼口香糖那样。

旧金山的拉里·阿利皮是独自来的。说他像什么都可以，但就是不像意大利人。这难道是他的笔名？他的双手有些颤抖。他是带了大麻的。那些人标榜反权威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法里亚斯是从其他人装腔作势的漠然表情中才认出他来的；而这些“其他人”却正是他的崇拜者。

他们开始放一张贝西·史密斯的旧唱片，几乎连声音都听不到。唱针划在唱片上的声音反而听得十分真切。法里亚斯从未参加过如此冷清的娱乐活动。喂，杰克。喂，玛丽。喂，奥利。对这种类似在机场对他的称呼法里亚斯觉得有些可笑。不以朋友间亲昵的“你我”（而不是礼貌式的“您我”相称——译注）相称呼，很难达到深层次的交往。

“请注意，”一位坐在后排黑沙发上的人说。像是远洋轮上的通用呼叫语。然而现在则是出自一位瘦骨嶙峋、皮包骨头的小伙子的口。他长得酷似人的轮廓素描，双耳招风，象两叶小翅膀，两只手不断地晃动着。

“这星期哪位有过自然冲动？”一个脱了鞋的胖女人问道，一面有气无力地揉擦着毛茸茸的青筋外露的脚踝。

“我！”一位坐在较远处沙发上的人回答。法里亚斯猜想，那大概是早有准备的对话，是为外国来访者设计的台词。“我感到了自然冲动，”“轮廓”接着说，“那是在上星期

三，出现了十五分钟。”

现在法里亚斯总算可以作出结论了。不，他感到的不是庆幸，而是自己是个局外人。他由于从未有过自然冲动而难免有些羞愧。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一种新颖的搔痒，一声咳嗽，抑或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变态反应？他想会不会是某种朦胧的醉态。然而，他很快便断定，不会的。

不会的。他后颈正在出现的湿漉漉的感觉不会是一条舌头吧。他缓缓地转过身去，不仅是怕把杯子里那令人恶心的威士忌洒出来，也是为了逐步适应可能发生的一切。他最终看到的还真是一条舌头。舌头的主人是一位又瘦又高的女人，脸上长着斑斑驳驳的麻坑，或者别的类似的东西。她大概喝了有十杯了吧，法里亚斯不妨给她斟上第十一杯。身后的小电扇使刚才被口水湿过的后颈感到一阵惬意和凉快。

“奥利，”瘦女人说，“我听到过的名字中，除达格·夏尔马·阿格尼·卡尔·哈马舍尔德^①外，您的名字应该是最好听的了。能让我吻你一下吗？”

法里亚斯机械地微微一笑。他自己说不清为什么要笑。他什么也没说。

“不，不是亲嘴。那未免太传统了。只是亲一下耳朵根。就这样。”他又一次感到湿乎乎的。电扇又一次让他打了个寒噤。那女人缩成一团，仿佛要藏匿在他的耳朵下面，便再也不动了。那个拿杯子的手慢慢地放了下来，几滴威士忌洒落到埃及造的烟灰缸里。克莱顿已经不再关照他了。但对面

^① 这是瑞典政治家哈马舍尔德的全名，他曾于1953年~196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死于空难。

的拉里·阿利皮却坐在一张温莎椅^①上，半眯着眼，在冲他微笑。法里亚斯发觉那个女人已经入睡。他喝干手里那杯酒，把杯子放到埃及烟灰缸旁，把那瘦女人抱了起来。他一只手放在她胳膊下面，另一只手放在她大腿部位，以好莱坞新婚之夜的最佳方式，把她抱了起来。灵机一动，他决定对阿利皮刚才的嘲笑予以报复。他走向阿利皮，把手里的女人放到他膝盖上。他终于感到自己从那个女人和她的舌头下“解脱”出来了。然而，阿利皮却在笑，并开始模仿安东尼·弗朗西奥萨的声音，哼哼呀呀地唱了起来。

法里亚斯尽可能离他们远远的，坐到一张沙发上，闭上双眼。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抽出一块手帕，先擦拭一下后颈，又擦了擦耳朵。眼睛虽然闭着，耳朵里却传来阵阵叫喊声、爵士乐声、打碎玻璃杯的响声、鼾声和阿利皮断断续续的歌声。有十多分钟时间，由于他觉得没有人在盯着自己，他感到一种愉悦。说没有人，却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在他对面。他睁开眼睛。那个人便是布卢门撒。

“您累了吧？”

“有点累。大概是因为从来没有像今天听过和说过这么多英语。不习惯，难免有些累。”

“是这样。”布卢门撒说道，用目光打量着他。“在您半睡眠状态时，我专门欣赏了您的小胡子。”

“真是这样？”

“您只写短篇小说？也写诗吗？”

“您问这个干什么？”

① 18世纪流行于英美的一种细骨靠椅。

“不为什么。”

“我不写诗，只写短篇小说。”

“真遗憾！”

“您更喜欢诗？”

“我感到遗憾是因为您应该写一首关于您小胡子的诗。”

法里亚斯笑了，但笑得不那么踏实。布卢门撒变得严肃起来。

“能让我摸摸您的胡子吗？”说着，他伸出了食指和大姆指。

法里亚斯用力抓住了他的手腕。于是，对方显得无可奈何，放下了手。

那时是二点一刻。作为首次见面，时间已经够长的了。他看到克莱顿那摇摇晃晃的样子，已经顾及不了他是否在场，便向门口走去。阿利皮已经趴在那个“睡美人”的身上睡着了。布卢门撒是少数几个没有喝醉也没有吸毒的人之一，他朝法里亚斯做了个手势，毫无责怪他的意思。走出屋子，他吸了口气；接着，又连续吸了好几口。

他向美洲大道走去。突然，发现有人朝他走来。他便是埃迪，那个大个子黑人，三个没有脱鞋的人之一。他也许是唯一对法里亚斯说了一件聪明事的人：“你们拉美人总对美国的黑人问题感兴趣，并对我们表示同情。我曾经问自己，这到底是为什么。我的结论是，大概因为国务院也把你们当黑人对待。”

“对此您有何高见？”埃迪问。

黑人埃迪表现出一种见怪不怪的平静。走路时双手插在口袋里，高昂着脑袋。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现在该法里亚斯提问了。

“哦，这很难说清楚。”

“真有这么难吗？”

“他们不想正视，仅此而已。他们想逃避。”

“可是，……他们想逃避什么呢？”

他们来到了第六大道。埃迪向他做了个手势，表示公共汽车已经来了。法里亚斯和他握握手，跳上了车。

人行道上传来黑人的声音，显得比平时更为庄重：“如果您愿意，可以把它称之为现实。”

三

从凤凰城到阿尔布开克需要飞行一个半小时。开初三十分钟他和邻座用英语聊天。那人又胖又扁，半秃顶，每当遇到气流漩涡总是汗流浹背。令法里亚斯吃惊的是，他们之间竟然沟通得如此之好。好不容易遇到一位没有生僻词语，也没有新难语法现象的说英语的人。蓦然，他疑窦顿生。他统计了一下胖子使用动词 to get 的次数。每三分钟只有一次。他不是美国人。“您是哪里人？”他用英语迟疑地问道。“阿一根一廷一人。”胖子逐个音节地回答道。“什么时候开始生活在阿根廷的？”法里亚斯突然用西班牙语发问，“我们竟然用写传记似的英语扯了半个多钟头。”对方笑了，同时向他伸过手去：“您是蒙得维的亚人？”“是蒙得维的亚人。”法里亚斯证实说。“我是从您说的‘扯’字听出来的。你们用这个词比我们可多得多。”

从此，胖子变得侃侃而谈。他讲了自己的身世，说到他的奖学金，又谈了他的旅行路线。不，他不准备留在阿尔布

开克（法里亚斯松了一口气）。他只在那里逗留半个小时，然后换乘另一架客机去达拉斯。他开始满嘴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方语：“幸亏你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而我们则是……，”又说：“多亏你们只是出产羊毛而已；而我们却命该倒霉。谁让我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呢。”最后又说：“总之，正像这里的人所说，我们是半斤对八两，我们都是世界上的足球强国；而你们还得过冠军。”“大家都得过。”法里亚斯喃喃地说，把头转向了过道。

在胖子眼里，美国只仿佛是一只驴粪蛋。除了那里的桥梁（“即使如此，又怎么样呢？”），阿根廷什么都比它强。“别提那饭菜了，千万别提。怀俄明州的饭后甜食和首都华盛顿的一样，一股子塑料味。”显然，他不久前刚知道另外还有一个华盛顿州，人们称它为“常青州”。“别提那垒球了，千万别提。”“您知道那玩意儿吗？说真的，我认为还不如高尔夫球……。和拉普拉塔河地区的足球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档次。”法里亚斯完全明白，所谓“拉普拉塔地区”这个说法只是他的一种让步，这里包含着总公司和一个经营良好的分店之间的差异。

又一个气流漩涡。阿根廷人喃喃地说：“对一不一起”急忙把脑袋伸到环球航空公司的呕吐袋里。随后，他不再说话了，闭上双眼。十五分钟后，飞机轮子便降落到阿尔布开克机场的跑道上。

“奥兰多·法里亚斯先生，奥兰多·法里亚斯先生，环球航空公司服务台有人找。”对扩音器里的话，甚至用西班牙语大声喊叫，法里亚斯听起来也感到费劲。总得叫四五次才行。“叫您呢！”阿根廷人说。他也下飞机准备转机。

环球航空公司的服务台旁，站着一位很瘦弱的女子，可以说瘦得不能再瘦了，约莫在六十到六十五岁之间，戴一付金属框眼镜和一顶其丑无比的帽子，帽沿上布满了伸向四周的针饰。“您是法里亚斯先生吗？”她问道，“我是阿格尼丝·佩因小姐。我代表阿尔布开克的女诗人前来迎接您。”法里亚斯握了一下那只瘦骨嶙峋的手，有一种一使劲便会被捏碎的感觉。“我们稍等一下，”佩因小姐说，“罗斯·福尔韦尔小姐马上就到。”法里亚斯问佩因小姐是否也写诗。“当然，”她边回答边从她的黑包里拿出一本薄薄的硬皮小册子，“这是我最新出版的一本（一共出版过三本），共有三十九首诗。”法里亚斯瞟了一眼，看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标题：《月亮与狂欢节的泯灭》。“谢谢，”他说，“十分感谢”。佩因小姐接着又说：“实际上，福尔韦尔小姐才是真正的人物。”“哦……。”“是的，她正经当过《星期六晚邮》的正式撰稿人。”法里亚斯心想，一切都是相对的；除了发行量和印刷的精美程度，大约类似于我们那里的《乌拉圭世界》。

“她来了！”佩因小姐突然眼睛一亮，叫了起来。在通向门厅的楼梯上，法里亚斯见到一位已入耄耋之年的老妪（可能有八十岁，或者一百五十岁，反正是一码事），她颤颤巍巍，却一点不驼背。佩因小姐和法里亚斯朝她走去。“这位是法里亚斯先生，”佩因小姐介绍说，“那位是罗斯·福尔韦尔小姐，阿尔布开克的杰出女诗人，《星期六晚邮》撰稿人。”福尔韦尔小姐暂停了一下颤抖，向他绽露出十九世纪的最佳微笑。“我们请他品尝一下墨西哥饭菜怎么样？”福尔韦尔小姐说，把身体转向佩因小姐。“那当然好。”她的同伴附和着说。

法里亚斯手提两件行李，在两位老姬陪同下，缓步走向出口。那个阿根廷人在门厅里以夸张的动作挤眉弄眼地向法里亚斯打着招呼。法里亚斯马上明白，胖子会在学成回国后说些什么：“这些乌拉圭人真是莫名其妙。我在美国认识一位乌拉圭人，他的癖好是和丑八怪一样的老女人鬼混。”

把行李放到旅馆后，只给了他五分钟时间洗梳一下，接着便乘坐佩因小姐的汽车向墨西哥餐馆驶去。菜是由两位老姬（其实是福尔韦尔小姐）点的。服务员都是些印第安女郎，她们不是操英语腔的西班牙语，就是西班牙语味的英语。

佩因小姐说：“罗斯，您为什么不给法里亚斯先生朗诵一首您的诗作呢？”“哦，也许还不是时候。”福尔韦尔说。“怎么不是时候，当然是。”法里亚斯言不由衷地插嘴说。“那您说朗诵哪首更合适些，阿格尼丝？”福尔韦尔小姐问。“您所有的诗都很美。”她边回答边把身子转向法里亚斯，用一种似乎是头一次提到的口吻说：“福尔韦尔小姐是《星期六晚邮》的撰稿人。”“您说《神圣的那伐鹤小夜曲》怎么样？”“太好了！”佩因小姐表示赞同。于是，在上第一道菜之前，福尔韦尔小姐用颤颤悠悠但却是坚定不移的语调朗诵了二十五小节神圣的小夜曲。法里亚斯说，他认为那首诗有意思。福尔韦尔小姐满是皱纹的脸仍然保持着朗诵最后一小节诗时的严峻表情。于是，法里亚斯不得不补充一句：“非常有意思，实在有意思。”显然，对福尔韦尔小姐来说好与坏已经算不了什么。法里亚斯发觉他自己的说法还不够刺激；但看到福尔韦尔小姐总算露出了笑容，心里才踏实了些。

“让法里亚斯先生品尝一下龙舌兰酒吧。”《星期六晚邮》

撰稿人提议道。佩因小姐唤来了印第安女招待，点了龙舌兰酒。接着，福尔韦尔小姐对佩因小姐说：“阿格尼丝，您不是也有很漂亮的诗作吗？给法里亚斯先生朗诵一下您发表在《阿尔布开克报导》上的那首诗。”法里亚斯明白，说发表在《阿尔布开克报导》上，是专门说给他听的，是为了使他注意到《星期六晚邮》撰稿人和《阿尔布开克报导》撰稿人之间的等级差距。“您是指那首《期待至高无上的瘟疫》吗？”佩因小姐毫无察觉地问道。“当然，我指的就是那一首。”“也许不是时候吧。”那位较年轻的老妪脸色微红地说。“怎么不是时候！”法里亚斯插嘴说。他意识到自己的话是在重复刚才出现过的对话。

佩因小姐开始朗诵时，正赶上法里亚斯把一块墨西哥馅饼放进嘴里。他感到辛辣味从嗓子眼、食道进入大脑、鼻腔、心脏，直至全身。“赶快喝一口龙舌兰酒。”福尔韦尔小姐善解人意地小声对他说。这时，佩因小姐正朗诵到饶口令似的“muzzle”（口套）和“puzzle”（难题），以及 troubles（烦恼）和 bubbles（泡沫）。福尔韦尔小姐没有说话。只是以富于表现力的手势告诉他，喝龙舌兰酒时要吃几颗盐粒。她在左手背的食指根和拇指之间放了几粒盐，用舌头舔了一下。“这是在瓦哈卡时他们教我的。”福尔韦尔小姐又一次低声说道。这时，佩因小姐正在多次重复一小节迭句：“有些许虚假，在这里和那里。”法里亚斯觉得龙舌兰酒和辣食一起喝简直是一团火。他想说：“有意思！”可是，他能发出的只是类似断断续续的呻吟声。又过了三刻钟，他发觉阿尔布开克的那两位女诗人正在为他朗诵她们诗的全集。

直到那时，他总算进入了情况。在辛辣与酒精的刺激

下，他的大脑和心脏已变成压延性很强的不定型物质，足以用来对付一切了。一股同情这两位老妪的强大浪潮朝他涌来。在一杯又一杯龙舌兰酒和一口又一口小尖辣椒之间，老妪们慷慨地向他献上自己写的赞歌、小夜曲、悼亡经和伤感诗。他正生活在故事之中，一个无需再次加工提炼的故事之中。因为两位老妪向他提供的是成型的、精炼的、完成了的故事。面对两位精美绝伦的老妪，他内心萌生出一种慷慨而大方的爱心。在一杯接一杯的龙舌兰酒之后，她们居然还如此坚韧挺拔；而自己却已被深深地打动了。像往常那样，酒精使他兴奋起来。他自觉讲话快要不利索了。“哪一首一诗一是一发表在一《星期一六》上的？”他迷迷瞪瞪地问道，连加上“晚报”两个字的力气都没有了。“一首也不是。”福尔韦尔小姐以令人钦佩的镇定利索地回答说。“我一想一听一发一表一在一星期一……”福尔韦尔小姐第一次显得有些羞涩。“只有一首。”她带着令人意想不到的谦恭说。“您告诉他吧，罗斯。”佩因小姐坚持说。“也许不是时候吧！”福尔韦尔小姐说。“是一时一候”。法里亚斯机械地，口齿不清地说。接着，又诚恳地鼓动她：“说吧，罗斯。”

福尔韦尔小姐用最后那口龙舌兰酒湿润了一下嘴唇，清了清嗓子，微微一笑，眨了眨眼睛说：“《今日不潇洒，更待何时？》”。一片沉默。法里亚斯显得有些恭敬地从双唇间噓了口气，表示了他的惊诧。福尔韦尔小姐接着说：“就这首。”又是一声噓气。于是，佩因小姐谨慎而恭敬地补充说：“法里亚斯先生，那是一首名符其实的诗史。您瞧，寥寥数字却包含着多么深刻的寓意呀：《今日不潇洒，更待何时？》。发表在1949年8月15日的《星期六晚报》上。”“太一太棒

了！”法里亚斯接茬说。在此过程中，福尔韦尔小姐曾三次起立，朝洗手间走去。

“阿格尼丝，您一说，”法里亚斯说他估计将是长得多的句子，“你们为一什么这么喜—欢辣—椒和诗—歌？”“奥尔兰多，您怎么把这两样东西放进同一个问题里？真令人不可思议。”佩因小姐以他们间新的信任关系称呼（这里她以名相称，是一种亲昵关系，按习惯应称姓——译注）说，“也许您是对的。您以为那是解脱的两种方式吗？”“那一当—然，”法里亚斯说，“可又是解脱什么呢？”“解脱污秽。解脱责任。”法里亚斯认为佩因小姐是随便选择了两个词，犹如从一堆纸牌中任意抽出两张一样。她叹了口气，又说：“总之，是从现实中解脱出来。”

四

“我们要在乔治敦接一下尼雷达·平托斯，”危地马拉人说，“然后再去哈里家。你们将会看到那是一个多有意思的外国佬。”“尼雷达是谁？”智利人问道。“她出生在特古西加尔巴，但长期以来一直住在华盛顿。据说她炮制地道的田园诗，也会烹制十分出色的肉丸子。此外，她是一名女同性恋者，可怜的……”

法里亚斯从大众牌汽车的后座上听他们聊着，随他们把他带到哪里去。他是在纽约笔会俱乐部的一次联欢会上结识了那个智利人蒙特斯和那个危地马拉人奥尔特加的。蒙特斯在圣玛利亚大学教授拉美文学，目前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进行某项研究。奥尔特加既不是教师也不是诗人，甚至连记者

都没当过。他只是一名被卡斯蒂略派（其最后代表为伊迪戈拉斯）开除的阿雷瓦洛^①的追随者。两年来，人们一直千方百计想在美国，尤其是华盛顿找到他。他在那里有一套住宅，为拉美区的居民争取到各种折扣提供了不少机会。一些被丈夫遗忘的美国女青年经常光顾这套住宅。奥尔特加对两性关系中的这种不幸是如是解释的：“你们要知道，这些外国佬需要大量的马蒂尼酒才能鼓起勇气；然后，最先来到的却不是勇气，而是困意。”

法里亚斯倾听着他们的说笑和出言不逊。他心里想，别看这两个人出生在相距几千公里的地方，可他们之间比他自己和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更为相似。一个来自瓜希尼基拉巴^②，另一位来自瓦尔迪维亚^③，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危地马拉的水果和智利的铜矿都是由美国佬开发出来的；他们都同讲一种语言，互相能沟通的拉美语（指经过变异的西班牙语——译注）。在纽约时，智利人曾对他说：“对你们乌拉圭人来说，美国人不看好羊毛，既是件好事，也是件坏事。他们不收购你们的羊毛，他们没有剥削你们，他们也就不得罪你们。”

“法里亚斯，我告诉您，”奥尔特加带着推荐的口吻说，“如果您想买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机、电熨斗、圆珠笔或者照相机，您千万别上那些折扣的当。那都是些巧取豪夺的强

① 阿雷瓦洛 1945 年 ~ 1951 年危地马拉总统，卡斯蒂略为 1954 年 ~ 1957 年总统。伊迪戈拉斯又为 1958 年 ~ 1963 年危国总统。

② 危地马拉的一个小城镇。

③ 智利的一座港口城市。

盗。您只要对我说，我就能为您搞到质量最好的东西。这还不算，我还能给您一半佣金。我不会对您说，您把冰箱拉走吧。因为你也许会撞上一个不近人情的看门人。那么，冰箱就会被你们的海关没收。你们南方人就是这么假正经……”

一听到门铃声，尼雷达便出来了。她的眼窝（宽大、深邃、紫红色的）给法里亚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说不上是眩晕，还是讨厌，应当说是两者兼而有之。她五十来岁；尽管用了不知几根绑带或者别的代用品来绑束自己，还是看得出来体重在九十公斤左右。她和法里亚斯一起坐在后排。法里亚斯没话找话地夸起乔治敦来了。“乔治敦确实迷人，”她说，“我还喜欢华盛顿，喜欢美国。我想，我大概再也不会回中美洲去了。”“这是因为什么呢，尼雷达？”奥尔特加从前排座问道，“难道我们是野蛮人？！”“那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社会。那些丈夫们都自以为是天王老子，而他们的老婆却只能任他们摆布。而这里则是母权社会。那该有多好呀！您奥尔兰多肯定已经被邀请到一家正宗的美国餐馆吃过饭。难道您不认为那些穿拖地工作服系围裙守在甜点心烤炉旁的美国人是那么动人吗？您没有发现这儿开酒瓶塞的都是女人吗？”她笑得实在太开心了；奥尔特加只好示意她收敛些。“简直棒极了！”尼雷达接着说，“我主张母系社会。要不然，这个国家怎么能达到今天的地步。”“到底达到了什么地步？”蒙特斯问道。尼雷达没有回答。实际上，谁也不想回答。

哈里和他的妻子在列佛旦等他们。法里亚斯坐进这一对夫妇的汽车里。这对说一口蹩脚英语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优惠。哈里会说几句西班牙语，而弗洛拉却只会说“再见”。

她用眼睛盯着法里亚斯，一边做告别的手势，一边用西班牙语说“再一见”。接着便哈哈大笑。有好几次，法里亚斯也莫名其妙地陪着她笑。十分钟后，他感到下巴有些疼痛；于是，他只是有节制的微微一笑。

“我要带你们去一个美不胜收的地方。”哈里说。他的领袖欲总算有了用武之地了。接着他问：“您觉得纽约怎么样？”“引人入胜。原因当然很多。”法里亚斯回答。“其中几条和女人有关？”弗洛拉追问道。法里亚斯笑了笑，摇摇头。“我明白了，”弗洛拉说，“现在您总算离开纽约，与她们说再见了。”哈里第一次陪他妻子哈哈大笑。“您去过无线电城吗？”哈里问道。“当然去过。那是最令我陶醉的地方之一。那种干什么都那么卖力气的劲头，那种为了特色而显示出的毫无特色。哈里，请告诉我，那个在大舞台上走上走下转来转去的庞大乐队，为什么在该由小提琴和管弦乐演奏的音乐会上，却用短号独奏来代替小提琴独奏，演奏员该穿长裤而穿短裤？我认为让美国修女去听摇滚乐，去和那些摇滚迷一起捶胸顿足倒是挺合适的。但是，我无法接受西贝柳斯和那些漂亮的腿肚子的大杂烩。”“奥尔兰多，我劝您别这么认真。”哈里打断他的话说，“我看您是受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影响了。”大家随便地说笑着。“现在我说些正经的。您别以为可以在音乐方面反对帝国主义。不管怎么说，无线电城的配方并不错。多亏那些漂亮的腿肚子，听众才能生吞活剥地接触到西贝柳斯。文化传播嘛，对不？总之，您刚才说的要比去年圣诞节的节目强多了。那天晚上圣诞老人乘着直升飞机在屋子里乱转悠。”

那美不胜收的地方就是马里兰州的大瀑布。法里亚斯不

得不承认大瀑布的景观值得欣赏。“你们瞧，野餐安排得有多精采！”危地马拉人指着哈里说。“哈里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尼雷达补充说。

哈里从汽车里取出一只不大的手提箱，从里面拿出一只小冰箱，可以说是袖珍冰箱，里面放着肉。接着，又拿出一个可拆装的充气烤肉器，只需一分钟便可搭装起来。还有合成燃料（形似煤球）。最后，又取出一罐专门用于煤球的可燃气体。法里亚斯发现，火柴和饥饿是与南锥体地区烤肉的唯一接触点。弗洛拉给几个尼龙坐垫充了气。大家围着那个事先精心准备好的文明火堆坐了下来。如果不是为了欣赏这壮观的大瀑布，野餐本来可以在纽约州大厦第九十二层上进行。

午餐之后，大家看了一会儿专供野餐使用的半导体电视。然而，尼雷达说她不喜欢看西部牛仔片。于是哈里取出立即成像的照相机，把大家集合到合成燃料的灰堆旁，坚持要弗洛拉和四个拉美人合影。他身高一米九三，其余几个人中最高的才一米六九。他于是开了个玩笑：“你们完全可以相信，你们并不低人一等。”不一会儿，相片出来了，大家鼓起掌来。“这就叫文明。”哈里说，法里亚斯无法肯定，那个美国佬是以此感到自豪，还是在取笑他们国家的这种惯常说法；也许是两者兼有吧。法里亚斯觉得哈里还是挺和气和诚恳的。相反，他不大喜欢弗洛拉。他说不清是因为什么。那时，弗洛拉正拿出一瓶四周饰有几个形如鼓得出奇的塑料乳房的威士忌酒。“这是哈里从新奥尔良带来的。”尼雷达朝那酒瓶投去了男人般的贪婪目光。智利人感到很乏味，独自欣赏瀑布去了。这瀑布很像《读者文摘》介绍过的尼亚加拉

大瀑布。

奥尔特加把法里亚斯径直带到大路旁。“哈里可是个好人。您说呢？他至少不是个凡夫俗子。”“是这样，我也相当喜欢他。”“您要知道，他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那么痛快的。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个举动还是拯救了他。我并不是说他很了解我们（在这里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但是，和他谈起危地马拉或者玻利维亚，甚至古巴，他不会犯歇斯底里。这就可以了。至少他不相信罗斯福是共产党人。”“那么，弗洛拉呢？”“弗洛拉可以说是一位失意者。因为在家里是哈里说了算。照尼雷达的说法，哈里是开酒瓶塞的，而弗洛拉只是做饭的。当然，您不应该忘记，他在墨西哥生活了两年。也许他在那里已经习惯……”

弗洛拉和蒙特斯一起在岩石上跳来跳去。哈里在大众牌汽车旁惬意地抽着烟。尼雷达倚在大树上阅读《绅士报》。奥尔特加后来也和岩石上来回跳跃的弗洛拉和蒙特斯走到了一起。而法里亚斯则躺在长满绊根草的草坪上，脑袋枕在卷成一团的西服上衣上。他想，在乌拉圭他总是离这类野餐活动远远的，根本不可能对此形成什么看法。他睡着了。

两小时后，他坐进哈里和弗洛拉那辆克莱斯乐牌汽车的前座上。其他人已经乘着奥尔特加的“大众”车走了。这对夫妇答应把他送到华盛顿。对此他十分满意。“真是好人。”他心里想。弗洛拉翘着二郎腿。“好漂亮的大腿。”他心里想。这显然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下午。

“你们为什么都住在华盛顿以外的地方？”法里亚斯没话找话地问道，“我认为那是一座令人愉快的城市。”哈里的脸色变了。“您怎么想得出让人们都生活在华盛顿？那里百分

之六十五以上是黑人。”法里亚斯忍气吞声地不说话了。“那又怎么样？”弗洛拉柔情地看他一眼，毫无恼怒之意。她肯定对这种不理解表示同情。“怎么？奥尔兰多，您还不明白？百分之六十五的黑人！”法里亚斯还是默不作声。然而，他觉得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沉默。他终于开口了：“请你们原谅。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哈里显得越发生气了。

在马萨诸塞大道和第四街的交叉路口，汽车因红灯停了下来。一家黑人正在穿越人行横道线。走在最后两个小黑孩指着哈里哈哈大笑。他们笑得很放肆，嘴张得连小舌头都露了出来。这对哈里太过分了。他用拳头狠狠地击了一下方向盘，大吼一声，接着对法里亚斯说：“您问我们为什么不住在华盛顿。您看看，您看看，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我们的现实！现在您懂了吗？”“别这么认真，哈里。”弗洛拉说。“懂了，现在我懂了。”法里亚斯喃喃地说。他想到了格林威治村的晚会，也想到了阿尔布开克那两位执着的老妪。

他在民族饭店门前下了车。法里亚斯不得不组织一个长句以表示对远足、野餐、速成相片和被送回旅馆的谢意。哈里和他握了握手，十分平静地说：“认识您很高兴，奥尔兰多，确实很高兴。”弗洛拉在他前额吻了一下。

法里亚斯站在饭店门口等待汽车的发动。在克莱斯乐牌汽车开动的一刻，弗洛拉抬抬手，用西班牙语说：“再——见——！”

张永泰 译

幻 影

——献给迪安娜和胡安以及他们那段幸福的时光

自从豪尔赫故去以后，克劳迪娅每天下午都来这里倚在这根栏杆上，就好像她喜欢观望那来往的人流似的。夹着几乎像是行政官所用的正方形小提箱的成年男子，到了拄拐杖年纪的缓步徐行的老者，优美地摇臂摆腰的姑娘，牵狗抱猫的阔太太，穿工装裤的工人、警察、乞丐全都聚拢而来又走了过去。在那个关键的街角——有多少次她曾在那里等待着豪尔赫走出银行来同她相会，克劳迪娅知道，绝对肯定地知道，豪尔赫，豪尔赫的幻影一定会在某个时刻（从来不是在同一个时刻）出现。他在其他人中间走着，但比其他人可爱得多，漂亮得多。

那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幻影，跟真人只差一点点，只不过是透明的。他身上的一切（衣服、手臂、腿甚至鞋）都是透明的。都是，只有眼光不是。这大概是因为她记得的豪尔赫

最后一点活生生的东西就是他的眼睛了。也许因为豪尔赫生前的那双眼睛又热烈又锐利吧。反正幻影身上那双眼睛不是透明的。确切地说，是当这双眼睛（她对它们是那么熟悉）看她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倒变成透明的了。不仅在现在的虚幻景象中是这样，在过去的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那幻影是如此透明，克劳迪娅竟能透过它分辨出别的行人，就像从一块有色镜片中看到的那样。因为那是一个有色的幻影。比如说，因为豪尔赫穿的蓝衣服是透明的，她可以透过袖子看见胳膊，可是因为胳膊也是透明的，它们也挡不住位于后面的人或一段街道。

克劳迪娅不动声色。她绝对不相信那是什么神奇事物。一天晚上她把这事对赫尔曼说了，赫尔曼微微一笑，用手指一戳她的脑门说：“那是因为你把他藏在这里。”这时她用一只手把他的手指拉到自己胸前，说：“还有这里。”但他们俩（特别是克劳迪娅）知道，这幻影是许多其他事物的一种反映。

当然，当时她曾哭过。哭得非常伤心。可到了现在，她早已在内心里接受了豪尔赫已经死去这个事实。然而幻影每天下午都来，她情不自禁地到这里来等他。“说到底，这是你承受痛苦的一种不寻常的方式”，莉迪娅给她诊断时这么说——莉迪娅只是一位心理分析医生的嫂子，但却以业余爱好者的非凡才智掌握了这套专业术语。克劳迪娅点头表示同意，但心底里却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她已经经历了自己的“悲痛”，感到自己已经完了；她那年少的小侄女说她“变成了一个破口袋”，而当她自己引镜自照，看到这股痛苦不仅在耳朵（这是最典型的），而且也在头发、嘴

角和脖颈上迅速蔓延的时候，她说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堆破烂儿”。她最难以接受的，是豪尔赫正是在他们举案齐眉、你恩我爱的时刻死去的。她从来没有感到过像那个该死的日子早晨那样与豪尔赫心心相印。可就在那天早晨，豪尔赫已不是在每句话中间，而是在每个字中间就突然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她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活生生的音节的声音，但她还没有勇气想象那个死去的、发不出声的音节，也没有勇气给自己发出那个音节。虽然如此，她最终还是连这个被打断了的词也接受下来了。

情绪是一点一点地恢复的，“别自己折磨自己，你要想法自己振作起来”，赫尔曼曾对她说。“你是个充满活力的人。如果你任凭时光过去，也就那么过去了。那你就会看到会很快走上新生活的”。这话真是千真万确。时光过去了，而且就那么过去了。一天早晨她对镜自照，看到自己那么漂亮，还真有点害羞呢。可看看自己，确实很漂亮。过了几天她走在街上，突然觉得有人在专注地看她。看她的人是个年轻后生（走过身边时，她给他“存了档”：“长着一双绿眼睛”）。在过了那么长时间之后，这件事第一次给了她很大鼓舞。又过了两个星期，她感到一天比一天好，而且也不再难为情了。

但是，她还是在每天下午的同一时刻到那儿去，靠在那根栏杆上等待幻影人豪尔赫。幻影以与其他行人一样的速度走近身旁，又和其他行人一起离去，走之前连看也不看她，但那目光还是她熟悉的那深邃的目光。

实际上，知道这个秘密的人不多，只有赫尔曼、莉迪娅和埃克托尔三个人。可是在她刚开始说到幻影时，莉迪娅和

埃克托尔就很担心。大概他们觉得，这种幻觉可能会引起神经官能症，或者干脆会引起脑力失调。于是他们千方百计把这当作开玩笑，紧接着就提醒克劳迪娅，说这可能对她有害，于是赶快改变话题。

赫尔曼却不然，他态度自然地听她讲，有时还问她：“今天怎么样？是忧伤还是欢乐？”克劳迪娅知道，他的问话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嘲笑和讽刺。只是赫尔曼想知道，豪尔赫——豪尔赫那透明的幻影——出现时心情怎么样。出现这种情形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赫尔曼也很喜欢他。豪尔赫死去的时候，赫尔曼感到犹如失去了亲兄弟一样。因此她跟他很投机，因为他们俩在回忆豪尔赫时，都没有任何先入之见（也没有后发之见），甚至在追忆他们三个人都在场的某种尴尬或滑稽情景时，有时还笑起来。

克劳迪娅见过幻影后，有时与赫尔曼相会，两人一起去看电影。她也跟莉迪娅或埃克托尔去，要么同时跟两人去，但都不是在栏杆那儿呆过之后。因为每次在栏杆那儿伫立之后，她都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情绪之中（严格说来不是悲伤，不是怀旧，甚至也不是欢悦，总之是一种特殊的情绪），只有赫尔曼能够捕捉到。他知道，在她去栏杆那儿以后见到她，他必须沉默半个小时，而且一丝不苟地遵守这种默契。有时候时间还没到她先开口了，当然这时候赫尔曼便把话头接过去。但在这种场合他不起主要作用，责任都在她这方面。

在去过栏杆的下午中，有一次他们没有去看电影，而是去了克劳迪娅的家。赫尔曼已经去过多次了，那是豪尔赫在世的时候，在他死去以后他也去过。但那天下午交谈得特别

投机。大概全是从她请他喝一杯开始的。她问他：“威士忌？伏特加？还是罗姆？”他说“伏特加，”但刚说出口几乎就后悔了。她觉察到了：“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我想我喜欢喝冰镇的伏特加。不是加冰，是冰镇的。”“当然了。在冰箱里的，”她说。他对这么大谈喝酒的讲究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

后来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大约四个钟头。有一阵谈到了豪尔赫，由于赫尔曼谈起了豪尔赫的政治见解，所以话题很快就扩展开来。“我喜欢他身上的这一点，”赫尔曼说。“他说话明确具体。他不是把他读过的各种东西硬往你脑子里灌。如果有人用世上出现过的像马克思和列宁这样的人物的话噎得我哑口无言，那我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一套。受不了。我自知人微言轻。豪尔赫就是这点好。他不是压服你。你以为他是在跟你谈像屠宰场工人罢工这样近在身边的问題，只是听到后来你才明白，原来他是在发表他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独到见解。他的谈话就是这样，谈话就是谈话。不是政治文章，还得加脚注。”

克劳迪娅有一会儿似乎在凝神思索。在这方面，她本来也可以说出她自己的回忆和经历。比如有那么几个凌晨，豪尔赫和她展开了讨论（他躺在床上，一只胳膊肘托着脑袋，不停地抽着烟；她也抽着烟；像土耳其人那样背靠墙壁坐着），话题是实践与理论的矛盾，或者是避免陷入先进人物精英主义的方式，或者是找到介乎于劳工第一主义和知识界第一主义二者之间的中点的方式，或者是（这是她非常着迷的一个话题）怎样把人民的正当情趣与另一种情趣区别开来——这另一种情趣也很流行，但却是畸形的、堕落的，是由

一种使人异化的庸俗东西造成的；而这种庸俗的东西是由一个国际性的歹徒和专家集团精心炮制出来的。有时候天亮了他们还在这样交谈，豪尔赫总是在闹钟响前十分钟就把它塞住（“为的是到八点钟不那么歇斯底里地叮叮地吵人”）。然后整个一天都无精打采，但却是值得的。

克劳迪娅正在思考着这些往事，她想得那么出神，竟然没有觉察到赫尔曼的目光。赫尔曼冷不丁地说：“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什么？”克劳迪娅吃了一惊，一方面是因为她心不在焉（正想别的事），另一方面因为有可能恰恰在这个时刻，赫尔曼对她阿谀恭维，所以她对这种讨厌的事感到惶惑无主。但他马上就说：“我最喜欢你的就是你把伏特加镇在冰箱里。”克劳迪娅如释重负地笑了。就从这个关键时刻起，相互信任的加深有了重要意义。

第二天，豪尔赫的幻影出现得晚了一点儿。克劳迪娅倚在栏杆上，并没有不耐烦。她知道他会来的。果然如此：豪尔赫的幻影和目光突然在一个擦皮鞋的人和一个穿灰军衣的人之间一点一点地出现了。目光看了看她，似乎还挂着笑容。但很快就消失了，比平常还要快。

后来她跟赫尔曼见了面，一起去看电影。影片非常凄惨，克劳迪娅没法，只好抓住赫尔曼的手。过一会儿，凄惨部分演过去了，但两只手仍然握在一起。克劳迪娅感到惊奇，原来她的肌肤出乎意外地聪敏起来。赫尔曼的手是有说服力的。也很天真，但特别是有说服力。出了电影院，他们一言不发，走了好几个街区。只不过克劳迪娅还不适应自己的新感觉。

次日早晨，她对镜自照，发现自己像豪尔赫活着时候一

样漂亮。她没有感到不自在。也不觉得有什么罪过。她一如既往到栏杆那儿去了。人们显得比平常匆忙，或者说紧张，或者说神经质。不知什么地方刺耳地鸣叫着警笛，是急救车，消防车，还是警车？她从来也搞不清什么样的是什么车，反正她都怕。几个小伙子急忙跑开了。其他人只是看着，极力想离得远一点，可是办不到。突然，她似乎在一群走近的行人中看出了赫尔曼。最初她不愿相信。但确实是赫尔曼。他朝栏杆望了一眼，克劳迪娅挥了挥手。她很高兴他有胆量到这里，恰恰是到这里来找她。他举起双臂，好像是从老远处让她会意，他很高兴找到了她。他很难走过来。人多车也多。而且又是星期五，每逢星期五世界就好像变大了，同时更加拥挤。

赫尔曼终于挤过人群走近了。他一步两级地跨上台阶，到了栏杆旁。他像平时一样吻了她的脸颊，并把一只手臂搭在了她的肩上。他真高，她想。他俩缓缓地走去。从远处看，像一对夫妻。从近处看，也像一对夫妻。

只是在他们走过两个街区之后，克劳迪娅才意识到，豪尔赫那透明的幻影失约了。于是她明白了，从今以后，尽管她还会到栏杆这儿来，豪尔赫却不会回来了。她确信。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好像是他给自己提出了一项任务，而且现在已经完成了一样。不，他不会回来了。对此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白凤森 译

咖啡杯

咖啡杯有六只：两只红的，两只黑的，两只绿的；再说，都是进口货，打不碎，式样够时髦的。那是玛丽亚娜最近这次生日时，恩里克塔送的礼物，而且从那一天起商店就一直宣传说，一种颜色的杯子可以与另一种颜色的碟子搭配成套。“黑的配红的最好不过。”这是恩里克塔的审美建议。可是，玛丽亚娜为了表示适度的独立性，决定使用时每只杯子都配同样颜色的碟子。

“咖啡好了，我给你端来？”玛丽亚娜问。话语冲着丈夫，可眼睛却注视着小叔子。小叔子眨眨眼，什么也没说，倒是何塞·克劳迪奥答了腔：“先别端。稍等一会儿。我想先抽支烟。”这时她才看了看何塞·克劳迪奥，不知第几次想到，那双眼睛不像是盲人的眼睛。

何塞·克劳迪奥的手开始移动，在沙发上摸摸索索。“找什么呀？”她问。“打火机。”“在你右边。”手转向右方，摸到了打火机。同刚才不断地费力寻找时一样，大拇指哆哆嗦

嗦地转动了好几下小滑轮，但没有打出火来。左手在预先估计好的距离上，企图感受到热度的出现，结果白费力气。这时阿尔维托划着了一根火柴，过来帮他点上烟。“怎么不扔掉它？”他说，面上带着一丝微笑，就像任何对盲人的笑容，也感染着声音的抑扬顿挫。“不扔，因为我珍惜它。这是玛丽亚娜的一件赠物。”

玛丽亚娜微微张开嘴，用舌尖舔了舔下嘴唇。这是她开始回忆的一种方式。那是1953年3月，当时他年满35岁，眼睛还看得见。他们在戈尔达角何塞·克劳迪奥父母家中吃过了午饭，吃的是淡菜炒米饭，饭后就去海滩上散步。他用一只手臂搂住她的双肩，她感觉得到了保护，甚至很可能是幸福，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感觉。他们回到公寓，他像以往一样不慌不忙地、慢慢腾腾地吻了她，并且他俩第一次使用这只打火机，合着抽了一支烟。

现在打火机已经不能用了。她本来就不太相信那些象征性纪念物有什么价值，可话又说回来，那个时期的物品有哪样儿还能派用场呢？

“这个月你又没去看医生。”阿尔维托说。

“没去。”

“听我说句心里话好吗？”

“当然。”

“我看你这是犯糊涂。”

“我干吗要去？为了听他说我身体像牛一样壮实，我的肝功能呱呱叫，我的心脏跳动得很正常，我的肠胃好极了？你就为了这个让我去？总说我这瞎子身体棒极了，这一套我听腻了。”

失明以前那会儿，何塞·克劳迪奥也从不善于表露自己的喜怒哀乐，可是玛丽亚娜至今还没有忘记，在他有了这种忧虑，有了这种不便之前，他那脸色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婚姻有过美好的时光，这她不能隐瞒，也不想隐瞒。但在这场不幸突然降临时，他却拒绝依从她的保护，拒绝到她那里去寻求庇护。他的全部自尊凝聚成了一种骇人的、固执的沉默，甚至周围充满言谈笑语时，这种沉默也依然如故。从那时起，何塞·克劳迪奥已经不再谈论自己了。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应该去，”玛丽亚娜帮腔说。“想想梅嫩德斯一直是怎么跟你说的。”

“我怎么不记得！‘您并不是一切都完了。’噢，还有句名言：‘科学不相信奇迹。’我也不相信奇迹。”

“你为什么不抱希望了？这是人之常情嘛。”

“当真？”他叼着香烟，从嘴角冒出一句。

他早已完全躲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可是，玛丽亚娜不是生来就乐于伺候人，就爽快地去伺候一个内向的人的，她有她的要求。她是那种要人非常精明地屈尊来求的任性女子。不过由于她容易迁就，求她的人还是有很大周旋余地。他双目失明是一场大灾难，但这还不是最大的不幸。最大的不幸是，他随时准备用他所能采用的各种手段回避玛丽亚娜的帮助。他蔑视玛丽亚娜的保护。而玛丽亚娜又是多么想保护他——诚心诚意地、怀着柔情和怜悯地保护他。

哎，这都是从前的事了，现在不同了。变化是缓慢地发生的。起初是柔情蜜意日趋淡薄。当初她的体贴、照顾和帮助都罩着温情的光环，现在已变得机械乏味。她依然尽心尽力，这毫无疑问，但从自己的殷勤中却感受不到乐趣。后来

则是终日提心吊胆，担心动不动就会发生口角。他总摆出一副挑衅的架式，随时准备出口伤人，说最粗鲁的话，冷酷无情绝不让步。即使在最不适宜的场合，不知怎么的，他也随时能找到非常恰如其分的语言去损人，找到刺人心窝子的话，找到带火药味的说辞，真是不可思议。他的失明仿佛成了一面挡箭牌，他总是远远地从那后面发起攻击，而别人的尴尬和惊诧则被挡在另一边。

阿尔维托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近大窗户。

“多讨厌的秋天，”他说，“看见了吗？”这话是冲着玛丽亚娜问的。

“没看见，”何塞·克劳迪奥答了腔，“你替我看看吧。”

阿尔维托看了看玛丽亚娜。沉默中，二人相对一笑。他们回避着何塞·克劳迪奥，然而是因他而笑。玛丽亚娜突然感到自己变漂亮了。每当她看着阿尔维托时，总是变得容光焕发。他第一次对她这样说是在整整一年零八天以前，是去年4月23日晚上：那个晚上，何塞·克劳迪奥对她大吵大叫，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她沮丧地、伤心地哭了好几个钟头，就是说，一直哭到她碰到阿尔维托的肩头，觉得自己得到了理解和安全为止。阿尔维托这种善解人意的能力是从哪里得到的？她跟他说话，或者说只是望着他，立刻就明白了他正在拉她走出困境。“谢谢你。”当时她说。直到现在，这句话仍时常径直发自肺腑直达唇边，不经推理，也不打折扣。最初，她对阿尔维托的爱只是一种感激之情，但这（她对此看得一清二楚）并没有减少爱的价值。她认为，爱情历来就含有一点感激和力求赢得对方感激的意味。在何塞·克劳迪奥风华正茂的时候，她对他就怀有感激之情，因为他是

那么出类拔萃，光彩照人，精明干练，却看上了如此渺小的她。但在另一点上，在争取赢得对方感激这件事上她却失败了，而且恰恰就在说来荒唐的那种有利的时机，就是说，当他似乎更加需要她的时候。

与阿尔维托的情况就不同了，她感激他采取了主动，感激他第一次伸出援手时的一片热心侠肠，使她摆脱了慌乱，特别是帮助她坚强起来。而她呢，当然也赢得了他的感激之情。因为阿尔维托是一个性格沉静的人，一个尊敬兄长的人，一个一味追求稳重的人，但归根到底，也是一个独居之人。多年来，阿尔维托和她保持着一种礼尚往来的亲昵关系，出于自发的谨慎，这种关系只限于以你相称，不曾越雷池一步，只是在屈指可数的场合才隐约地流露出彼此之间更深的关心和体贴。兄长看上去那样幸福，交了桃花运，遇上——一个他认为迷人的女性，对这些阿尔维托或许有点羡慕。实际上不久之前，玛丽亚娜已经使阿尔维托坦白供认：他之所以对独身生活安之若素，是因为每个有可能作他妻子的候选女子都在他心目中心中经受了一次比较，结果全都相形见绌。

“厂里的员工每三个月来看我一次，”这是何塞·克劳迪奥在说，“昨天是特雷列斯来对我进行了老一套的抚慰性访问。我猜想他们是抓阄决定的，输了的自认倒霉，就来看我。”

“也许是人家尊重你，”阿尔维托说，“对你领导大家时的情景保留着美好回忆，确实是关心你的健康。人并不是总像你近来所认为的那样卑鄙。”

“说得多么好听。每天都能学到新道理啊！”克劳迪奥微笑着“哼”了一声，以示别有一番讥讽之意。

过去每当玛丽亚娜求助于阿尔维托，向他寻求保护、开导或亲昵时，她自己立刻就确信，她也正在保护着她的保护者，确信阿尔维托像她自己一样也正需要保护，确信彼时彼刻，她固然因顾忌重重，或许因难为情而紧张不安，对方也同样情有可原地充满失望，而且她开始感到这是由她自己造成的。因为她并不对他彻底坦露心曲，只听任他用蓄积多年的柔情包围她，只让他将忧郁失眠时所见到的她的形象（并非幻觉）同意料之外的现实吻合起来。然而仅仅如此（千真万确）她已令阿尔维托感激不尽。但是他们的感情很快便超出了彼此感激的范围。好像万事齐备，只待两人相互敞开心扉，好像只需四目相遇便可心有灵犀一点通，便能印证和补偿彼此的良苦用心似的。于是，没过几天，最重要的话终于表白了，偷偷的会面频繁起来。玛丽亚娜一下子感到自己的心胸豁然开朗，感到整个世界别无其他，只有阿尔维托和她。

“这会儿你倒是可以热咖啡了。”何塞·克劳迪奥说。于是玛丽亚娜朝简易小桌弯下腰，点燃了酒精炉。有那么一刻，她望着咖啡杯出神。杯子只拿来三只，每种颜色一只。看着杯子这样摆成一个三角形，她挺开心。

接着，她仰身向后坐在沙发上，她的后脖颈遇到了期待中的情况：阿尔维托那热烘烘的手已经弯成一个窝准备接它了。天哪，多么快意呀！那只手开始轻轻地抚动，修长、纤细的手指伸进了头发。阿尔维托第一次壮起胆子这么做的时候，玛丽亚娜曾感到极度不安，全身的肌肉痛苦地收缩在一起，使她无法享受那种抚爱。现在则不然了。现在她心绪平静，可以尽情享受。她觉得，何塞·克劳迪奥的失明是一种

天赐的保护。

何塞·克劳迪奥坐在他俩对面，呼吸正常，几乎很恬适。随着光阴流逝，阿尔维托的抚爱早已变成一种习惯，此时此刻，玛丽亚娜正在等待着下一个预期的动作。像每天下午一样，那只手抚摸了脖颈，轻轻摩擦了右耳，徐徐滑过了面颊和下巴。最后，那只手停在了微微张开的嘴唇上。于是她，像每天下午一样，默默地吻了那只手掌，还把眼睛闭了一会儿。当她睁开眼时，何塞·克劳迪奥的脸色还是那副样子。漠然无知，毫无表情，心不在焉。然而在她看来，这一刹那总是包含着一点恐惧。一种无缘无故的恐惧，因为在进行这种令人难为情的、有风险的、不无侮慢丈夫之意的抚爱时，他俩已经掌握了技巧，既美妙又不动声色。

“别让咖啡煮开了。”何塞·克劳迪奥说。

阿尔维托的手缩了回去，玛丽亚娜又朝小桌俯过身去。她挪开酒精炉，用玻璃盖压灭火苗，直接用咖啡壶把杯子倒满。

她每天都改变颜色的分配。今天，绿的打算给何塞·克劳迪奥，黑的给阿尔维托，红的留给自己。她端起绿色杯子递给丈夫，可是还没有放进他手里，她便看到了那古怪的、勉强挤出来的笑容。除此之外，她还听到几句大致是这样的话：“不，亲爱的。今天我想用红杯子喝。”

白凤森 译

欣赏莫扎特

想想吧，蒙特斯上尉，你本可以继续睡你的午觉。你真的累了。应该承认，昨天夜里的差事真够苦的，一块儿押来的 12 名囚犯早已被打得皮开肉绽，可你们还得再施淫威，非让他们死去活来不可。这种事总是叫你发火，特别是在没法儿使他们吐露一点东西，甚至连鞋子和衬衫的尺码也不肯说的时侯。偶尔一两次有个把人开口，你们以为（可怜，太天真了）这可能预示着烦人的差事会结束时，只有这时，这种肮脏的工作才使你至少得到些微的满足。不管怎么说，人家就是这么教给你的：只要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是正当的，可是你已经不太记得目的是什么了。你的特长当然是手段，而手段就应该是坚决的、残酷的、讲求实效的。人家把一种看法灌进了你的脑袋：这些如此年轻、如此健康、如此坚定（你又加上了如此狂热）的小伙子是你的敌人，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你连谁是你的朋友也搞不太清楚了。至少你还清楚地知道，奥乔亚上校不是你的朋友。从来不干任何令人

作呕的事、免得弄脏小手指头的上校，认为你心慈手软，并且当着贝雷斯中校和法莱罗少校的面这么说你。法莱罗和贝雷斯镇定自若地一场接一场地审讯，原来的仪容一点儿也不变，一粒扣子也不松，一根头发也不乱（法莱罗一头黑发，抹着发蜡；贝雷斯一头红发，梳成波浪式），你时时对此感到费解，闹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你每次午觉醒来总是情绪不佳，不过你今天特别恼火。大概是因为昨天夜里，带着摆脱不掉的、令人失望的紧张情绪求欢作爱之后，阿曼达怯生生地对你说“最好……”惹得你大发脾气，几乎是愤怒地吼叫起来。也许因为你也曾有过同样的念头，可是现在这种时候谁会想到要求退役呢，因为这种事必定会引起讨厌的嫌疑和反感的。再说，在此“内部动乱时期”找借口也得找非常要命的，决不能轻于癌症、视网膜脱落或肝硬化。可叹的是阿曼达已经想好了，想得非常简单。“我在想小豪尔赫，我怕。”她还想干什么？难道你看出有什么光明前途吗？再说，她还不知道每次审讯的细节呢。她还不知道当不得不耐着性子、抖擞精神，把在特哈被捕的那个姑娘的牙齿一个一个地拔掉时你心里什么滋味呢。她还不知道，在你得知仅仅经过一次审讯之后，那胖乎乎的年轻工人就被整得不亦乐乎，不得不摘除睾丸时，你有什么感觉。她什么也不知道。甚至有时候那些搬弄是非者传言说在某某兵营，某某团部用骇人听闻的手段逼供，她还跟你议论那些话是不是属实。她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对你说：“但愿永远别派你干这种事。当然，你一定会拒绝，鬼知道会出什么事。”你一如既往地劝她放心，但却不能如实地告诉她，第一次命令你干这种事时，你连半个“不”字也不敢说，因为你不能向奥乔

亚上校拱手送上这样的把柄。你就是把自己的前程像押宝一样押在这种苦差事上，并且决心不要输掉。可到了夜间，你一呕吐就是好几个钟头，阿曼达被你翻肠倒胃的吐声惊醒，问你是怎么回事时，你却胡编乱造地说是因为床铺不合适。事情还不止于此，许多夜晚你都梦见那个小伙子，每次重新开始上刑时，他都一声不吭地大张着嘴巴，紧闭着眼睛，像树干一样直挺着脖子。现在你在想，当然，干吗再折腾他。一旦你下了决心，那就来个干脆的。不管怎么说，你认为你做你现在做的事是出于道义的理由。但问题是现在你几乎已经不记得什么道义理由了，而只记得一张流血的嘴巴，或一个弯曲的躯体。所以你打开电唱机，随便拿了一张莫扎特的交响曲放进唱盘，显然是非常合乎逻辑的。直到不久之前，音乐还能净化你的头脑，平衡你的心理，纯洁你的心灵，调整你的言行。此时此刻，在这个情绪兴奋的时刻，在这个倾心于消遣的时刻，你远离了那些阴森可怖的形象，远离了那兵营的院子，远离了那撕心裂肺的叫声，远离了你自己的耻辱。小提琴像苦役犯一样在演奏，中提琴像无比忠实的女人一样紧紧伴随，英国管没有多少自信地发出问讯。不过这无所谓，有时候你也是没有多少自信地讯问，你之所以要动用拷打这一着，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你不相信你的那套高论，因为你知道，谁也不会仅仅因为你用了“祖国”这个字眼，或者骂他是婊子养的就立刻会叛变招供。自从你跟阿曼达去索德雷剧院听音乐会时起，你就喜欢莫扎特，那时候还没有小豪尔赫，也没有发生动乱，兵营里最不寻常的事就是喝马黛茶——真的，列兵马丁内斯烧的马黛茶可真香。你喜欢莫扎特，但不是从小就喜欢，而是经阿曼达指点才迷上的。你

看多奇怪，现在阿曼达却没有兴致听音乐了，什么音乐也不听了，不听莫扎特，也不听别的什么音乐家，这都是因为害怕，害怕有人暗杀，于是精心守护着小豪尔赫——听莫扎特时，当然不能怀着恐惧，而应该是逍遥自在，坦然自若的。最好还是关上电唱机吧。这样倒好。不管怎样，你看见了吧，小提琴的声音像慢慢消失的奇妙东西还在回响，就像有时候，犯人停止叫喊以后痛苦的哀号仍在兵营中回响一样。你孤零零一人呆在家里。家里很漂亮。阿曼达看她母亲去了。老太太已经半截入土，可还爱管闲事——你要记住。小豪尔赫还没有从内波图诺学校放学。儿子很漂亮——你要记住。你孤独一人，阳光照射下的花园景象，透过起居室的窗户映了进来。奥乔亚现在大概正跟贝雷斯和法莱罗在一起。上校信任他俩，无非是为了结成一伙儿来对付你。当然，也因为他恨你。对此谁都没有怀疑。你所以恨那些囚徒，可能无非是因为他们奥乔亚才恨你的。这么说可能有点钻牛角尖，不是吗？你干得很出色，可是你知道，这都没有用。不管你多么心狠手辣，或是显出心狠手辣的样子，你非常清楚，奥乔亚绝不会饶过你。因为有一天晚上，在两次审讯的间歇中，有人问他，他的女儿真的“转入地下了吗”？这个人就是你。你问的时候非常小心，而且还带点同情的意思，因为尽管你跟那家伙很对立，但“军人一体精神”在你头脑里还是根深蒂固的。你永远也忘不了他投向你的那嫉恨的目光，因为事情很清楚，那个名叫奥罗拉·奥乔亚，绰号“苏莱玛”的妙龄少女确实已经转入了地下，在8点钟发出的通缉令中要求把她抓捕归案，为此上校已经想好了一句被灾去难的话死死抓住不放：“别跟我提这个堕落的孩子，她已经

不是我的女儿。”可是那次他并没有跟你这样说，这可能是最严重的。他只是狠狠瞪了你一眼，命令说：“蒙特斯上尉，退下去。”而你呢，行了一个军礼就走了。你问时并没有恶意，特别是你明白颠覆活动已经渗进奥乔亚自己家里这种事（对任何一个军官来说都是不寒而栗的）究竟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是当时你却扬长而去，打那儿以后，你就明白了一点：只要奥乔亚领导那个单位，你就休想有出头之日。现在你斟了杯威士忌，尽管你不喜欢这么早就喝这种酒。可是，别折磨自己了，你这个专门折磨别人的人；你想一下子就既不听莫扎特，也不喝威士忌是不可能的。至少喝威士忌不像欣赏莫扎特那样要求高。至少在一口一口地品味时，无需良心安宁。不仅如此，心烦意乱外加两块冰，那才是绝妙的佐酒物^①——半夜时分，在进行过一场电刑、坐飞机、踢肚子的全武行审讯之后，允许你们喘口气的时候，比你思想右倾的卡尔达莱利上尉就是这么说的。你是不是曾想过，如果你拒绝干这种事会怎么样？当然想过。你身边就有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比你左倾的拉莫斯中尉受到严厉惩处，席尔瓦上尉受到丢脸的降级处分。他俩不肯狠下心来干这类肮脏的差事，哪怕下这样的决心会毁掉自己的前程，他们也不答应干这种事。也许他们绝对是正派人，谁知道呢？正派但不守军纪。不用问那么多，只问一个问题就够了：你的纪律性会把你引到什么地步，蒙特斯上尉？会引导你替别人出头犯下更多的罪行？直至你不敢正视镜子里自己的影子？你的纪律性会把你引到什么地步哟？直至你逐步丧失爱的能力？

① 原文系意大利文。

直至你把仇恨变成家常便饭？或者是让你这家常便饭的做法不断侵犯别人，打伤别人，刺穿别人，打断别人的骨头，强奸别的女人，切除别人的器官，掐死别人，使别人变成牺牲品？直至你每制造一个牺牲品，自己也变得更加枯瘦，更加冷酷，更加腐朽，更加麻木？上尉呀，年轻的上尉，你的纪律性会把你拖到什么地步哟？你是否曾经想过，被惩处的拉莫斯和被降级的席尔瓦，即使在记忆中也也许会收听莫扎特或特罗伊洛（或者唱片套子里随便哪个音乐家的作品）？啊，现在小豪尔赫终于回来了，他走近身边去吻你，还不错，你还能想到他。但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儿子会饶恕你所干的、现在他还不知道的事情吗？也许你是爱他的。当然是按照你的方式。可是你的方式也变了。从前你对他很坦率。那时严格的纪律不仅教会你一丝不苟，而且用你不太确切的话来说，教会你真诚。从前你在兵营里紧握枪杆，那只是为了操练，为了演习；你在家紧紧把握住真诚，也是为了操练，为了演习。当你发现小豪尔赫说了句无关紧要的谎话时，就威严地对他大发雷霆。你信奉的三圣一体包括上帝、司令官和真诚。好多次你狠狠地打小豪尔赫，原因不过是他把阿曼达买东西找回的一点点零钱据为己有，或者是他说会背“七的乘法口诀”，但不是真话。你这样大发脾气似乎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可实际上距今没有多少日子。那时候颠覆活动还只是由警方去对付，你们在兵营里继续喝你们的马黛茶。可是，那几回，那个小胖墩一滴泪也不流地忍受了他平生从未挨过的拷打之后，你不可避免地——还记得吗？——一连几个晚上无法继续欣赏莫扎特，如此灰心丧气的夜晚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有一次你竟丧失了冷静，当着

惊愕的阿曼达的面摔碎了那张笛子和管弦乐协奏曲唱片，由于你大发无名之火，结果是不得不把加提德牌电唱机送去修理。不过，你早就把真诚排除在外了。你的三圣一体缩减为眼下还不可动摇的两圣一体：上帝和司令官。而且现在就可以不太冒昧地预言，不久之后就会只剩司令官这最后的一圣。你现在不那么强制要求小豪尔赫对你讲字字无欺的、纯洁的、不加修饰和不加掩饰的真话了，大概是因为你永远也不敢对他讲真话，不敢讲关于你的差事的那些肮脏得令人作呕的实情。想想吧，蒙特斯上尉，年轻的上尉，如果这时候，你没有面对你儿子坐在你对面的黑椅子上对你提出的问题（尽管从来也没有人知道，忘却的诀窍在小孩子心中是怎样起作用的，但也许你明天会面对这样的问题）：“爸爸，你真的对人用肉刑吗？”你可能会继续睡你的午觉，你也不必像现在这样，大口大口地喝酒以后，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这话你从哪儿听来的？”虽然你料到小豪尔赫一定会回答：“人家在学校里跟我说的。”你说，当然，是一字一板地说：“不是真的。人家对你说的不是真的。不过，我的孩子，你要明白我们是在跟非常非常危险的人作斗争，这些人要杀死你爸爸、你妈妈，还有你喜欢的许多其他人。有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供出他们准备干的那些暴行。”可他还是一个劲儿地问：“说的对，可是你……用肉刑吗？”你一下子感到走投无路，理屈词穷，张口结舌。你只能接着问：“那么你说的肉刑是指什么？”别看小豪尔赫只有八岁，但知道的事可多着呢：“还能指什么？爸爸，就是‘坐飞机’呗！还有什么电刑，‘打电话’。”这些话你第一次听着这么刺耳，这么恼火。你感到脸红了，你没法不脸红。

因为气恼，因为羞愧。你急忙想恢复一点镇静样子，但你只能含含糊糊地冒出一句：“能打听一下是哪个同学把这些胡说八道灌进你脑子里的吗？”可是你马上就看到，小豪尔赫丝毫不留情：“你打听这个干吗？为了让人对他用肉刑呀？”这话你听着太过分了。你立刻发觉——你也说不清是由于恐惧还是由于惊愕——你心中的爱顿然全无。你把还剩下一点威士忌的酒杯放在深棕色小地毯上，开始缓缓地、一步一步地走起来。小豪尔赫依然坐在黑椅子上，闪着越来越天真无邪而又冷酷无情的绿眼睛。你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最后停在椅子背后，用双手抚摸那没有保护、没有罪过、长着茸毛和小痣的脖颈，开口对他说：“别理他们，孩子，人们有时候非常坏，非常坏。明白吗，孩子？”小豪尔赫刚刚吃力地说出：“可是爸爸……”，你便一边继续抚摸着那脖子，一边轻轻地掐住那喉咙，接着你永远地（这回是真的）抛弃了莫扎特，用力地掐，毫不留情地用力地掐，与此同时，在那间漂亮而忧伤的房子里，只听到你那没有一丝颤抖的话音：“懂了吗，小崽子？”

白凤森 译

权 当 证 词

神父，今天我头顶两件罪过。您知道第一件是什么吗？就是我有两年没作忏悔、没受圣餐了。第二件比较复杂，要千言万语才能说清。但我一直要向什么人说说。神父，我一定要一吐为快。您可不能对我的女友们说，也不能对我的姐妹们说，因为那是件秘密的事。非常秘密。更绝对不能跟我的未婚夫说——至于为什么，您听过后就会明白的。所以我曾想过：除了莫拉雷斯神父，还有谁更合适呢？首先，因为我在另一个教区时，您就对我非常好。这是第一。还有，因为您有义务对忏悔保密。我说的不错吧？好，那就好，还有一件事：我心里很不坦然。神父，叫我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有罪，而且害怕是罪该万死。您现在有时间吗？要是没有的话，我改天再来。因为这件事说起来有点长，您知道吗？那好，既然您有时间，我就从头讲起了。您知道，从五年前开始，我一直在“随时为您效劳”男子理发店当修指甲女工。顾客们都很好，是文雅人，真有绅士风度。我从手上就看得

出来。细皮嫩肉的，明白吧，神父？再说，老板不许顾客们跟任何一个姑娘交往。这是我这职业的危险所在。因为姑娘们不可避免地得摸顾客的手，有时候顾客就另有所思，想入非非，等等，等等。再说呢，我的肉皮也挺细嫩，这就更加助长他们胡思乱想，以为我的职业性动作不是职业性动作，而是近乎一种爱抚动作。但我们老板非常负责，他一边剪头发，一边不断地监视着姑娘们。他不像另一家理发店，就是欧塞维奥理发厅那家的老板，那家伙倒像是鼓励顾客们动手动脚。所以我才换到这一家来干的。还有一点得说说，到“随时为您效劳”这家来的，不仅有银行界头人、经理、议员、市府委员甚至一两位部长，还有外交官。这些人总要人给修指甲。我也说不清，大概他们更有闲功夫。要不就是更有钱。还有一些人是不公开的外交官。我的意思是，他们说不是外交官，但我看出是外交官。我这麻烦就是从这么一个人开始的。理发店里大家都叫他 Cooper 先生，念“库珀”，可天知道他姓什么。他总让我给修指甲，尽管我们三个姑娘管这种活儿。他非常可敬。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噢，当然了，有些词说得不太准。他偶尔说说天气，要么说电影，要么说他的国家，要么说埃斯特角，但通常沉默不语，我干活时盯着我看。我呢，对这个倒不紧张，因为干了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说起修指甲姑娘，神父，几乎也像个女演员了。只不过观众就是一个人，鼓掌喝采也不过就是用眼睛表示。喏，一天下午，库珀先生对我说：“小姐（别的顾客都叫我克劳迪娅，可他从不这么叫，而是非常尊敬地叫我“小姐”），有一件报酬优厚的工作，必须有两个条件才能干好，就是美貌和谨慎。第一个条件，我知道您完全具备，关

于第二个条件，我还一无所知。”一开始，这话叫我吃了一惊，因为说实话，那话既是恭维又不是恭维。就好像他在对我说：“您很漂亮，可与我无关”。当然，那时候，对我来说，能捞到一笔外快是件大事，我不能让它从手边溜掉。当然，只要是正经的、合乎道德的工作。喏，神父，看见了吧，我没把您的忠告当耳旁风吧。于是我说，关于我是不是谨慎，您可以问老板。“要问的，”他说，“不过我想知道您对自己有什么看法。”多复杂呀。那是一件非常机密、密不告人的工作。他向我问了几个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您明白吧，神父？偏偏问我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什么关于马克思主义呀，民主呀，自由呀，如此等等。对所有这类事情，我向来懂得很少。可是看样子他还满意，因为他约我在办公室见面。“小姐，跟谁也不要说，”他叮嘱我。因此我连跟老板也不能商量了。我幻想那工作大概像是一部间谍电影，那可够刺激的。可实际上简单极了，至少开始时是这样。不过就是跟通常是外国人的这位或那位先生去哪一家咖啡馆，套他说一些情况。那情况一点也不重要，都是些家庭琐事。第一次就这么顺利过关了，库珀先生想知道的，都给问清楚了，容易极了。他们给了我一大笔钱。三个月里，这种小事我干了五六次，工作总是去吃饭或跳舞，搞情况。跟我的未婚夫，我只好编造借口，当然这得到了库珀先生的允许，对他说我已开始为一家接待外国游客的机构工作。我不知道库珀先生是怎么做的，反正为了我的工作，他总是安排得井井有条。干这些小事，比在理发店里挣钱多多了，但我并没有放弃修指甲女工的工作，这倒不仅因为我疑神疑鬼，而且库珀先生也说，我继续干着更好。直到发生了“小古巴”的事情

以前，一切都很顺利。从一开始我就感到，这回事情可不同了。一天下午，库珀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直跟我谈了大约两个小时，然后才坦率地说出是什么事。他先跟我解释半天卡斯特罗主义是怎么回事。又说他对自由世界多么危险，说那些人是共产党，是最凶恶的敌人，他们把孩子从母亲那里夺走，送到俄国去，对于不是共产党的人，他们统统枪毙。当然，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可怕，而且就这么对他说了。他突然不说了，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问道：“请您原谅我提个不礼貌的问题，小姐，但我需要知道这个情况，才能决定把一件任务交给您，这个任务可是比较重要的。我要问的是您是不是处女？”神父，您听这是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哟。我说：“库珀先生……”他本来就很机敏，说到这儿，他非常巧妙地对我说，我没有义务一定要回答他，不过当然，要是那样的话他就不能把那件新工作交给我，而那件工作比平常那些工作报酬优厚得多。说实在的，这类外快我已经拿顺手了。再说，您很清楚，神父，物价涨得多厉害呀，现在的钱一点也不经花。神父，我不是处女，您比谁都清楚，因为我曾经来跟您作过忏悔，跟您说过了。可那只是跟我的未婚夫。我知道，神父，我知道，这不能为我的罪过辩解，不过大概您也不会否认，这罪过要比跟随便什么人轻得多。于是我就对库珀先生，或者随便他叫什么先生说：“喏，先生，我本来没有必要告诉您，但我还是要说我是处女。您还想怎么样？”我知道，神父，这是撒谎，但他不像您一样是教士，因此他没有保守秘密的义务。再说，在间谍电影里，总是把惹麻烦的对话录下音来。可您们，神父们就不录音。至少我是这样认为。这也没什么，神父，只要我心里是

坦然的。我就这么说了。我刚一肯定地回答是处女，他，他就深感满意。这时，他才把这件事的背景告诉我，或者说至少是我当时认为是涉及那件事的背景。原来是有个小伙子在古巴使馆里工作，那是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当然心情不高兴，可虽然他感到是共产主义的俘虏，但还没有勇气把一切都抛弃。怕他们杀死他，真可怜。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负责要害事务的。库珀先生对我说，他们（说实在的，就在他说“我们”的时候，我仍然不知道他确切地是指什么人）要帮助他得救。而库珀先生呢，想让我帮他们一把。怎么帮呢？就是勾引那小伙子。所以我是处女才这么重要，那是为了他不会生疑，就是说，不会把我当成职业间谍。“我们每个人都有些个人的东西可以贡献给民主制度和基督教的世界，”库珀先生对我说。“您可以贡献的东西是您的美貌，这是您最好的武器，也是您最好的理由。”我又一次感到那是一句恭维话，但又不是恭维话。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我说的这话对我是很重要的。神父，对您我可以有什么说什么：我知道我不仅漂亮，而且我——怎么说呢，在谈情说爱方面还挺在行。不是像您说的那种神间之爱，而是人间之爱，就是您们所说的那种肉体之爱。我还想说：有时我很担心，因为我觉得太在行了。喏，消除这种担心有很多方式，其中之一就是赋予它一种道德上的涵义。库珀先生要我做的，是进行一项活动（冷静地观察，这种活动常常被认为是罪过的），这种活动是为一项高尚的而且高度道德的事业服务的。我考虑了五分钟，对他说“行。”不，神父，这不是我在开头说的第二件罪过。我不认为这是罪过。神父，不知您是怎么想的，但我记得当我在另一个教区时，您总是对我们说，

应该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只要是为了基督教的道德，为了反对其他反对基督的形式。这就是我的牺牲。因此我敢肯定，这不是罪过。不，神父，请您现在不要打断我，先让我把整个事情讲完。他们想出的帮助那小伙子，鼓励他离开卡斯特罗政府的大使馆去要求避难的方式之一，就是设法让他爱上我。起码他是这么对我说的。以后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再有，库珀先生有件事干得不怎么样：没告诉我那小伙子有妻子。喏，神父，这么一来就使事情有了很大变化。不，我也不因为这个就认为是罪过。但他总该跟我说清楚。您说是不？下边我就简短地说吧。是的，他爱上了我。而且爱得发狂。当我们去他一个乌拉圭朋友的套房时（是的，神父，我们去了一个套间），求欢之后（当然，神父，我们求欢了），我们躺着呆了一会儿，他跟我说了些非常美好的、充满生动比喻的话，把我比作鲜花芳草，那些花花草草的名字我不知道，也从来没听人说过，现在也想不起来，所以跟您也说不出是什么花草。爱德华多（他姓爱德华多）对于我非常招他喜欢这一点非常担心，以至没有很多机会跟我谈政治。但在一天下午，他对我谈了。当我知道他不想丢掉他的工作，相反他非常拥护卡斯特罗政府，拥护屠杀和所有那一切时，神父，您想想我有多么吃惊吧，他要干的不是甩掉共产主义，而是他的妻子。第二天我就去了，把情况告诉了库珀先生。他肯定地说，爱德华多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害怕我会把事情都说出去。可我知道我没有什么叫他可怕的。一点也没有可怕的。我倒希望真叫他害怕，那又怎么样。请原谅，神父。可从来没让他害怕呀。库珀先生这套解释，我并不信服。爱德华多有时候一言不发，盯着天花板发呆，但决没有心不在

焉到不再同时抚爱我的地步。他抚爱得那么舒服。对我来说，我承认我喜欢这件差事，但我不清楚库珀先生究竟要干什么。星期六我先到了那个套间（我们俩都有钥匙），爱德华多过去对我一向遵守时间，这次却总也不来。最后露面时比约定时间大约晚了两个小时。他脸色煞白，心慌意乱。一开始，他不愿说明出了什么事。只说“工作上出了麻烦。”后来我们睡了。那天他“办事”时有股拼命的劲头儿。后来把什么都对我说了。好像是他正在一个人走，顺着第十八街，在到了亚瓜龙街附近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人从一辆停着的汽车里叫他。他走了过去。车里有两个家伙。这时，一个家伙直截了当地问他愿不愿意跟他们合作。他问：“你们？你们是什么人？”一个人回答：“我们就是我们，就是这么回事，”还拿出一大把钞票朝他晃了晃。据爱德华多说，那至少有五万美元。都是一百块一张的大票子。“要是跟我们合作，这只是你应得的一半。”爱德华多说他当时犯了个错误，问了他们想要他干什么。“机密”，那人说。爱德华多说，那个数不行，多少也不行。这时另一个人，直到此刻一直没开口的那个人，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爱德华多和我，正从一间房子里走出来，不是那个套间，是一间专门供幽会的房子（因为前两次我们去的是一间幽会的房子）。“你要是固执己见不肯帮忙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寄给你妻子。我看你还是考虑考虑。”这时一个人下了车，走到街角处，那儿有个女人在卖香蕉，他买了三根香蕉，重新回到车子旁。他递给爱德华多一根。爱德华多说他当时非常紧张，竟然伸手接了。于是那家伙说：“这个亲热的小插曲我们也拍下来了。”“拍它干什么？”爱德华多问。“为了寄给你的政府，这

样他们就会证实，你是多么高兴地从我们这样的人的手里接过了香蕉。”这时他们让他下了车，把那把钞票塞进他的一个衣袋，然后把他甩在那儿，开车走了。就为这他才来晚的。我明白，他对我一点也没有怀疑。这可怜虫不知道，我以某种方式参加了这个行动。我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说要把钱上交使馆，把一切都说出来。“那么你妻子呢？”“什么他妈鸟妻子！”对不起，神父，他就是这样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我挺喜欢他这么说。后来我就走了。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虽然是星期六，但我想库珀先生大概还在办公室工作，于是就到办公室去找他。果然不错，他在工作。我把爱德华多说的话告诉他，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已经知道了。“这可不合适，库珀先生，”我说，“您不能强迫我干这种事。我从来没感到这么难过，请相信我的话。小伙子是共产党是一回事，我越来越肯定，他愿意当他的共产党，您们用这种讹诈把我牵连进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直到我说“讹诈”这个字眼之前，库珀先生一直是笑眯眯的，可自从我说出这个字眼那一刹那起，他的脸色就变了。一直是那么彬彬有礼的他，不知用英语咕哝了一句什么，后来就怒气冲冲地对我说：“别说蠢话了！”我惊得瞪大了眼睛，因为说实话，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种粗话。他又说：“你可以踏实了。永远也别想再跟我干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太蠢。不过，我相信你虽然智力缺乏，但总还不至于不知道这事对谁也不能说吧。对谁也不能说，明白吗？要是跟什么人说了，我们自有办法调查清楚，那你可要承担一切后果。”我一下子放声大哭，神父，我实在忍不住了。可那个人却无动于衷，的确的确无动于衷。您以为他心软了吗？一点也不软。他又说，声

调甚至更加狂怒：“连跟那另一个笨蛋联系也别打算。禁止联系。明白我的话吗？给你钱。”我看见了往常用的那只信封，大概比前几次装得更鼓胀。但我拿不起来，拿不起来。我把它留在桌子上，一动没动地走出来。这是上星期六，神父。您瞧，现在我想起这件事，还是大哭不止。这是一件丢脸的事。再说我喜欢爱德华多。我再也见不着他了。这可真叫我受不了。这就是我的第二件罪过，虽然我不敢肯定这是罪过。莫拉雷斯神父，请您坦率地告诉我，您认为爱上一个结过婚的共产党人就是死罪吗？

白凤森 译

伊里亚特家的女人

有五家人经常给上司来电话。我上午值班的任务是守电话机，所以我清楚地记得那五种声音。我们都知道每一“家”都是上司的一个情妇，有时我们也常在一起交换一下我们各自的猜测。

比如，我认为卡尔沃家的是一个胖乎乎的女人，说起话来咄咄逼人，口红总是抹出嘴唇的轮廓；鲁伊斯家的是一个没有风韵的做作的女人，额前垂着一绺头发；杜兰家的是一个理智、清瘦的女人，神情倦怠，不带偏见；而萨尔加多家的则是一个嘴唇丰润、富有性感的女人。五家中唯一具有理想女人声音的是伊里亚特家的。她不胖不瘦，美妙的线条令人艳羡，使人感谢上天赐予我们抚摸这一乐趣。她不太固执又不过于顺从，是一个真正的女性，就是说，一个有个性的女人。我想象中的她，就是这样的形象。我熟悉她那真诚、富于魅力的笑声，由此描绘出她的表情；我清楚她的沉默，从中勾勒出她的那双眼睛——一双黑黑的忧郁的眼睛；我听

惯她和蔼热情的语调，由此想象出她的温柔。

对其他几家，我们的看法有分歧。例如，对埃利萨尔德来说，萨尔加多家的是一位无所求的矮胖女人；罗西觉得卡尔沃家的像一枚葡萄干；而科雷亚认为鲁伊斯家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至于伊里亚特家的，我们一致认为她是完美无缺的，我们根据她的声音所塑造的形象也几乎一模一样。我们都相信，如果有一天她走进我们的办公室，轻轻一笑，用不着开口说话，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认出她来。因为她的笑容是绝不会被混淆的。

我们的上司对于公事不太保密，而在和五家有关的问题上却小心翼翼，守口如瓶。在这方面，我们和他的对话总是简短得叫人扫兴。接到电话，我们按一下电钮，他办公室的铃就响了。然后我们就通知他：“萨尔加多家的”，他的回答很简单，“接过来”，“就说我不在”，或是“让她一小时以后再来电话”，从不多说一句，连半句玩笑也没有，尽管他也知道我们都是信得过的人。

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在五家中，伊里亚特家的电话最少，有时半个月才来一次。当然，只要她一来电话，指示“请勿打扰”的小红灯至少要亮一刻钟。如果我能把这温柔、甜美、自信的声音听上十五分钟那该多好啊！

有一回，我鼓起勇气说了点儿什么，她敷衍了几句，我也忘记是什么了。多幸福的一天啊！从此，我总希望能和她攀上几句，甚至希望她能听出我的声音来，就像我能听出她的一样。一天，我突然灵机一动，说了一句：“您能稍等片刻吗？电话马上就通。”她答道：“当然可以，只要您别让我干等着。”我承认，我那天真有点傻头傻脑的，只和她聊些

关于天气、工作和时刻表可能变动之类的话。又有一次，我终于鼓起勇气和她攀谈起来，虽然是一般的话题，但我的话里却含有一些特殊的意思。从此，她就能听出我的声音了，“你好啊，秘书！”她总是这样同我打招呼。我浑身都酥软了。

几个月之后，我到埃斯特角度假。多年来，在爱情方面，我对在埃斯特角度假一直寄予最大的希望。我幻想着能在某一次假期中遇到一位梦想中的姑娘，我将把我心中的一腔柔情奉献给她。我确实是一个重感情的人，有时我也自我责备，对自己说，如今还是自私自利、斤斤计较更吃得开，但这无济于事。每当我走进影院，看到一部有关私生子或可怜的父母这类矫揉造作的墨西哥影片时，明知电影是在胡编乱造，仍禁不住喉咙哽咽。

说到为什么要在埃斯特角寻找伴侣的问题，我是仔细琢磨过的，并找到了一些非感情方面的原因。实际上，只有在海滨疗养地才能见到整洁、洋溢青春气息、悠闲、兴高采烈的女人。当然，在蒙得维的亚也有干净的女人。但这些可怜的女人总是疲劳不堪。裹得太紧的鞋子，爬不完的楼梯，拥挤的公共汽车把她们折腾得汗流浹背，心情烦躁。在都市里，人们根本无法知道一个女人的欢乐是什么样子。这一点尽管表面上看不出来，实际上却很重要。我自认为自己在忍耐女人的悲观情绪方面是有能力的。哭声、叫喊声和歇斯底里我都能忍受。但对欢笑我则比较苛刻。说实在的，有些女人的笑声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而在海滨疗养地，所有的女人从清早起床第一次晨浴到头昏脑涨地从赌场出来，脸上一直挂着笑容，所以你可以知道谁是谁，哪些人的笑声令

人作呕，哪些人的笑声令人心旷神怡。

恰恰是在海滨浴场，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当时我正在露天阳台上跳舞，在小桌子之间穿来穿去，月光洒在我们的身上，谁也无心注意。我的右手扶着我舞伴的微微晒脱了皮的后背，那后背还带着午后的余热。我的舞伴笑了。她的微笑很动人，这一点应该承认。我的目光极力捕捉她耳边几缕几乎透明的金黄色头发，它们确实使我心旌摇荡。她很少说话，每次开口，总是乏味得很，所以我倒更欣赏她的沉默。

刚好在她闭口不语的一个愉快时刻，我听到了那句话，话说得那样清晰，好像是专门说给我听似的：“您想喝点什么？”不管在当时，还是以后，这实在是一句无足轻重的话，但我却记得清清楚楚。当时，一对对舞伴正随着舒缓的探戈舞曲聚拢在一起，我就在那时听到了这句话。说话者近在耳边，但我没有能在那些从我身边擦过去的女郎们中间找出她来。

两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我在赌场输了几十多个比索。于是我孤注一掷，在最后一盘中押了五十比索的赌注。如果输了，我自认晦气，马上回蒙得维的亚去。但是转盘停在了三十三这个号码上，我不由精神一振，满心欢喜地把玩着做筹码用的八个小黄牌，这时，有人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声音像是从电话里传来的一样：“就应该这么玩，就是要敢于冒险。”

我不动声色地转过身，十分清楚我会遇见谁。伊里亚特家的站在我身旁，柔美端庄，一如我和我的同事们根据她的声音想象的模样。接着而来的一切几乎都很简单。我顺着她的话题，大谈其冒险，继而说服她同我交谈，然后一起跳

舞，最后约好第二天在海滩见面。

从此我们俩形影不离。她告诉我她叫多丽丝，多丽丝·弗莱雷。这一点千真万确（我不明白她为何向我出示身份证，而且也合情合理。我一直认为那五户打电话的人家用的都是化名。从第一天起，我就反复思忖。很显然，她同我的上司有感情纠葛，这自然大大刺伤了我的自尊心。但是，请注意这绝妙的“但是”），她是我所见到的最可爱的女人。如果我过分猜疑，很可能会永远失去她，而命运刚让她降临到我的身边。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既然我能分辨出多丽丝的声音，她难道听不出我的吗？当然，对于我来说，她一直是无比珍贵，高不可攀的；而对于她来说，我不过是刚刚闯进她的生活。有一天早晨，我向她跑过去，用欢快的语气对她说：“你好啊，秘书小姐！”虽然她好像对我的玩笑不介意，笑着把手臂伸给我，并拿一位迎面走来的黝黑的姑娘——她的女伴——同我开玩笑。但她局促不安的神色并没能逃过我的眼睛：她像突然起了疑心。但我觉得她很快就泰然接受了这个事实：她给上司打的电话一直是我接的。现在，她的言谈举止，她的令人难忘、充满理解及许诺的眼神处处流露出坦然和自信，这使我萌生了新的希望。显然她很高兴我不提起我的上司。而且，兴许她会很快同我的上司断绝来往，作为对我这种姿态的报答，尽管这种可能性还不很明显。我一惯善于探究别人的眼神。多丽丝的目光尤其坦诚。

我又回去上班了，每隔一天值一次早班，看守电话机。伊里亚特家的再也没来过电话。

我和多丽丝几乎天天在她下班后见面。她在司法机构工

作，薪金优厚，是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所有的人都很敬重她。

多丽丝从不对我隐瞒任何事情。她现在的生活清白正派。但是，以往呢？扪心自问，只要她不欺骗我，我就心满意足了。她同上司之间的风流韵事——或随便怎么称呼吧——实在不会影响我的那份幸福。伊里亚特家的再没来过电话，我还要企求什么呢？我的上司已被我取代。不久之后，他将成为多丽丝生活中一段不愉快的回忆，而每个少女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我让多丽丝别往我的办公室打电话，我忘了我找的是什么借口。说老实话，我是怕埃利萨尔德、罗西或科雷亚接到她的电话后会听出她的声音，并因此做出种种暧昧的猜测。因为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多丽丝总是那样温柔、宽容，并不同我计较。我很高兴她如此通情达理，从不提这一忌讳的话题。我从心里感激她从不强迫我作出什么令人沮丧的解释。因为那种使人难堪的话只会玷污一切，毁坏一切美好的感情。

多丽丝带我去她家，我认识了她的母亲。她是一位神情疲惫、心地善良的女人。十二年前她的丈夫去世，至今她仍未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她总是用慈爱、欣慰的目光注视着我和多丽丝。但有时，她又突然泪水盈眶，也许是回想起了和富里艾勒先生遥远的恋爱时代中的某个细节了吧。每星期中有三天我在她家一直逗留到十一点。但是一到十点，她就知趣地道晚安，然后离开房间。这样，多丽丝和我就有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尽情地亲吻，谈论未来的生活，计算床单的价钱和我们要租用的房屋的租金。在这块国土上，此时大

概有成千上万对情侣和我们一样，正亲昵地偎依在一起，喃喃地谈论着类似的话题。多丽丝的母亲从未提到过我的上司，也没谈起过任何与多丽丝有过感情瓜葛的人。她像一切体面人家对待女儿的第一个未婚夫那样款待我。对此，我泰然承受。

有时，我忍不住为我得到了（为我占有，由我享用）这么一位高不可攀的女人而沾沾自喜。她们本来是部长老爷、头面人物、达官显贵们才供养得起的；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秘书。

每晚我们相聚时，多丽丝一次比一次更富有魅力，这可决不是夸大之词。和我在一起，她总是百般温柔。她抚摸我的后颈，吻我的脖子，在吻我的时候悄声细语地说着令人心醉的话，这一切她都做得别具一格。每次从她家出来，我都被心中的幸福和欲望（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呢？）弄得神魂颠倒。可是，当我在我的单身住所的床上辗转反侧，想到她抚摸我时的老练正说明有人在她情窦初开时对她进行过精心的引导时，便不禁有点闷闷不乐。说到底，这究竟是利还是弊？我不禁想起我的上司，他是那样的威严高傲，令人敬畏，我怎么也无法把他想象成那个令人嫉妒的调教多丽丝的人。那么，是还有其他人吗？多少人呢？特别是他们中的哪一个教会她这样亲吻的呢？每次想到最后，我总是提醒自己，我们是生活在 1946 年，不是在中世纪，现在我才是她最亲近的人。然后，我便抱着枕头沉沉睡去。抱着它，我尽情想象将来把多丽丝抱在怀中的滋味，虽说那只是很勉强的代用品。

直到 11 月 23 日，我一直满心欢喜地觉得我和多丽丝结

婚是势在必行。这已成为既成事实。我们只差找到一套我所中意的空气流通、光线充足、窗户宽大的房子。好几个星期日，我们都出去找我们心目中的理想的住房。但是接近我们要求的，不是租金过高，就是交通不便，要不然就是多丽丝认为房子所处的地段过于偏僻冷清。

11月23日上午我值班。上司已经有四天没在办公室露面了，所以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悠闲地抽着雪茄翻杂志。忽然，我感到背后的门开了。我懒洋洋地回过头，刚好看见多丽丝的可爱的小脑瓜正迟疑地探进来。她走了进来，脸上带着点不安的神情。因为，据她说，她以为我会生气。她到我的办公室来是因为她终于找到了一套布局和租金都符合我们要求的房子。她得意地拿出一张她自己画的详细的平面图给我看。她穿着轻软料子的连衣裙，宽宽的腰带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那苗条的腰肢，显得妩媚秀丽。因为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她坐到了我的写字台上，交叉起双腿，挨个儿问我，哪是罗西的位置，科雷亚坐在什么地方，哪个是埃利萨尔德的办公桌。这几个人她一个也不认识，但是从我夸张的描述中，她清楚地知道他们每个人的特点和趣事。她点着我的一支雪茄抽了起来，一只手还握在我的双手中，忽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说：“你好。”话筒里传来：“你好啊，秘书！”我还没完全清醒过来，只是机械地问：“这么久了，你好吗？”电话那边答道：“我到智利旅行去了。”表面上一切如常；但是在这通话的几秒钟里，一切都千真万确地变了。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在临死前所感受到的那样，我的大脑里飞快地闪过几个杂乱无章的念头，首先是：“这么说，上司和她没有任何关系”，这意味着我保住了我的

尊严；接着，似乎是想到了：“那么多丽丝……”；第三个念头我记得一清二楚：“我怎么会把声音听错了？”

我告诉她上司不在，道了再见，把话筒放回原处。多丽丝的手还握在我的手中。我抬起眼睛，知道我将看见什么。多丽丝坐在我的办公桌上，像所有的时髦女郎那样抽着烟，她微笑着等着我，还想着那张可笑的平面图。不用说，那是一个乏味、浅薄的微笑，和其他所有人的微笑一样。真要让我厌烦一辈子了。也许我以后会设法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但是，此是此刻，在我的内心中，我已将这场误会引起的恋爱一笔勾销。因为，事实上，我爱的是伊里亚特家的女人。

文旭东 译

玛格丽特·苏亚文的鳐夫们

玛格丽特·苏亚文是出现在我最早写的短篇小说中（《田园诗》、《格洛丽亚的星期六》）为数甚少的真实姓名之一。原因非常简单：青春年少的男孩总会不由自主地钟情于一个女明星，这种恋爱对象通常都相当明确。一个女电影明星与其说代表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倒不如当作某种象征。年轻的小伙子在爱上有血有肉的女人之前愿意首先爱恋女人的形象。慢慢地，当他们逐渐真正地进入生活，终于明白根本不存在什么精巧的玻璃娃娃似的女人，她们仅能在视觉和听觉方面同真实的女人们较量；那些生气勃勃的女人，除了有上面那两种能力，还可以让男人享受到轻抚、亲吻的欢畅。

然而那些第一次扼住我们的呼吸，侵入我们梦乡的女演员意味着我们最初的激情畅想曲，我们朦朦胧胧的爱。一些年以后这个模模糊糊的形象会被某个姑娘——或女人——代替，她同起先的形象之间肯定不会有太多相似之处，可是她有刻下生活印迹的可触摸的双手，无需什么手续便能被亲吻

的双唇，那双眼睛不仅仅只让别人去欣赏，也用来注视我们。

可无论怎样，对女演员的爱意味深长。它有点像初恋的前奏。一个小伙子面对散发着无穷魅力的那张脸，那种微笑，那种眼神，那种表情证明自己的力量，心灵出现了第一次震颤，有时异常剧烈。这一切过后，他不再冒更大的危险（爱恋的形象通常都遥遥难及，在好莱坞或是别的什么无法到达的影城），只是任凭自个儿随心所欲地幻想，忍耐着，也很忠诚，但这种一往情深实质是一种虚幻的爱情。

对我来说，玛格丽特曾是这种爱情的象征。当然，我写这篇小说时，已经不是毛头小伙子了。尽管在蒙得维的亚的电影院里还会放一两部她那个时代的电影，尽管我一场都没错过，但我不止一次地忽略了她曾是我的钟爱，我可以保持一定距离，客观清醒地看待它。当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仍旧会怀着一种炽烈的思恋之情，一种欣喜的感激之情重温这个曾在自己追求爱情的征途上给我们启示的形象。

然而仅仅过了几年我就清清楚楚地察觉到《那么现在怎么办？》和《惊奇集市》中那个迷人的、无与伦比的女主角在我心中有多重要。1960年1月我和妻子在纽约。一天下午我们碰到四个乌拉圭朋友，大家决定早点吃晚饭，然后一起去维亚赫剧院看正在上演的多瑞顿·威尔德的《我们的城市》，何塞·金特罗把它译得棒极了。这条广告已经张贴了好几个月，可是每场演出的预售票仍然很不容易买到。所以，当他们另外几个人坐在一家人声鼎沸的意大利餐馆时，我就去了剧院看看能不能买到六张票。

售票员的外貌着实让我大吃一惊。不过要是有人非要我

描绘出来的话，我真不知道如何说出他那张不一般的脸。他挺年轻，精瘦，带一副深棕色玻璃近视眼镜，像个有学问的大学生。剧院的大厅空空荡荡，这给了我希望。然而这种寂静的原因很简单：没票了。当我问他是否有可能买六张票（“只买六张，先生”）时，小伙子把目光从一本皱巴巴的《纽约人》上抬起来，用一种分明是轻视的目光盯着我：“这种时间要六张票？你是在月球上吗？”他说的有道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里。我觉得自己就像被人嘲弄的乡巴佬，因为不敢上电梯或不会打公用电话。尽管如此，我没有立刻就走。我站在一旁看演员们的照片，或许心里还隐隐地希望有人来退六张票，一张不多，一张不少。

电话铃响了。小伙子又一脸不耐烦，因为再次打断了他阅读《纽约人》，或许因为又要噙声噙气地说没票了。他的面孔突然变了，神情惶恐地摘下眼镜，用一种近乎抽泣的声音说：“不！不！不会这样的！”接着他戴上眼镜，一脸扭曲、无助的模样，如同附加上的那么机械僵硬；然后一下子把那沮丧不已的脑袋埋进了干瘦、颤抖的十指里。

我是这个悲痛欲绝场面的唯一见证人。虽然他刚刚对待我的态度很不友好，我想他大概心里非常难受就走近他。我只拍了拍他的胳膊，让他知道我的存在。我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是不是接到一个坏消息，我能否帮他什么，等等。他抬起头，没戴眼镜的双眼注视着我，仿佛隔着一层布满雨水的窗户或一种停滞了的回忆。

“玛格丽特死了。”他缓缓地说，强调每一个音节，好让人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他的无助和不幸的心情，而不是假装。于是，我用另一种语调，另一种语言，好像只对我自己，不

对其他任何人，说：“不，不会的。”那小伙子不懂西班牙语，但肯定明白我的震惊和悲痛。我斜倚在墙上，因为我需要什么东西支撑自己。我和售票员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他，有点吃惊，在那里，剧院，伸出他那瘦骨嶙峋的双手便可触及的地方，出乎意料地遇到了另一个玛格丽特迷；我，只是感到年少时留在心底的最后一点点爱情火花熄灭了。

售票员突然把一只手抬到眼睛上毫不掩饰地擦眼泪，带着抽泣声问我，不过不再那么咄咄逼人：“您说要几张票？六张吗？”他打开小抽屉，抽出六张票，用一枚大头针钉在一起交给了我。我把钱交给他，什么也没说。在那种情形下给他小费无异于一种侮辱，并且对同一个女性形象的两名男性爱恋者来说绝对用不着。我们握握手，拥抱了一下，仿佛亲戚，就像玛格丽特多部电影中的搭档詹姆斯·史蒂文特能够感受到的那样。

回意大利餐馆的路上，我按自己的习惯，不用手掌而是用指关节擦了擦双眼。实际上我并不清楚那个易怒、近视的售票员痛苦的震惊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或是到底为了什么。但对我来说有一点是明确的：我生命中第一次失去了一位相知的亲密同伴。

詹玲 译

百 叶 窗

马尔塞罗像每天晚上一样独自回到了公寓。他缓慢地把东西一件一件从衣服里掏出来，放在桌上：钥匙包、圆珠笔、眼镜、钱夹、一盒避孕套（他总是随身带一盒，因为担心有破了的和不好使的；它们已经搁在他裤子前插兜里很久了）、文件袋、梳子、带日历的手表、塑料牙签、助消化的药片、手帕、身份证（上面贴着一张面部表情极其严肃的照片）。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很难闻的气味，于是他打开了空调，但没有按到最高档（只要一开到这一档，他准感冒），而是噪音最小的最低档。然后他脱下西装，解下领带，卷起衬衫袖子。接着打开了窗子，一阵热风扑面而来。他注视着另外一些建筑群，发现几乎所有的窗子和百叶窗都紧闭着。马尔塞罗费了好大的劲才关上百叶窗。“看来必须换插销了。”他自语道。

两幢居民楼加起来一共是六十四套公寓。说实话，他极

少同其他住户来往。有时，在户主会上他会和人家聊上三五分钟，也就是互相递递香烟，一同抱怨抱怨那总出毛病的管道系统。

他知道，当然（碰巧知道），有一个单身女子住在另一幢楼里，房间正巧和他的相对。尽管她不算年轻了，还是颇有姿色。户主会上，别人叫她“加尔万恩女士”。（因为每一幢楼都有单独的电梯）他们从未在电梯间里遇到过。不过有一两回他们同时开关玻璃窗和百叶窗，就彼此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他有点谢顶，她是红头发。

马尔塞罗打开电视，开始挑选频道。首先出现的是一对金黄头发的性感男女青年，他们在春光明媚的森林中优雅地奔跑，按照惯例，跑步的镜头持续了三十秒后，屏幕上打出了一个牌子很响的洗发水广告。（前一天晚上，马尔塞罗也看了这两个人做的皮靴广告，他们足蹬大、小皮靴在深冬的丛林里漫步。）他换了个频道，是逗人开心的动画节目。于是迅速地转到别的台。荧屏上一位胖胖的先生正用一种做作的腔调采访一名又高又瘦的名人，他如同显贵要人一般只简单地回答是与不是。很显然，面对这种出乎意料的冷淡态度胖记者有些乱了头绪。失望之际，他提的问题一次比一次长，一次比一次复杂，可那位先生丝毫不改变自己的风格，而且说起来荒唐，他的答话越来越短。不明此情的摄影师偏偏给胖记者的额头来了个特写（拳击运动的编年史家会如何评说呢？对，“汗珠点点”），马尔塞罗一心想可怜那胖记者，却又办不到，便赶紧换到其他频道。终于碰上个电视剧。他有意识地定在这个台。他一向无法摆脱这种充满感情纠纷的戏对自己的吸引，尤其是那些理也理不清的场面。他已经摸

透了电视剧的秘密。从3月到10月，所有的情侣都接连不断地出现磨擦。但从11月初开始大部分人就和谐起来。这其实没什么，挺正常的，因为电视剧必须在圣诞节之前，用一个发人深思的结局宣告全剧的结束。像其他夜晚那样，马尔塞罗又玩起了逗自己开心的把戏。他把电视机音量拧小，开始按照自己的想象编造剧中人的对话。男演员有些僵硬地斜倚在道具墙上（或许这种装出来的笔挺只是因为害怕墙倒下来）。那个距男演员有一米半距离的女演员，满脸兴高采烈的样子。马尔塞罗把一些信誓旦旦的话强加在男演员身上，以此取乐。接着又把一些折磨人的不痛不痒的客套话安到女演员嘴里。真他妈的好玩！姑娘深情款款地靠近小伙子，那老练的家伙居然纹丝不动，只是注视着姑娘。好了，马尔塞罗想，现在他们该拥抱了。但是没有。那一记耳光扇得那么重，尽管什么也没听到，他也仿佛体会到了。“至少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我根本理解不了电视剧本。”

正如医治精神错乱的顺势疗法一样，他看够了这些东西。他关闭了电视。随着荧屏上那燃烧的怒火的消失，空气变得凉爽了许多。马尔塞罗脱下衣服，默不作声地冲淋浴（几年前他喜欢一边冲肥皂沫一边哼唱《最后的管风琴》）。他裸着身子回到刚才的屋子，用四方格的毛巾把全身擦干。

像往常一样马尔塞罗站在悬挂在壁橱上的镜子前，他的肚子明显地向前凸起。他已经搞不清楚究竟哪些东西不该吃：他放弃了面包，不喝含二氧化碳的饮料，连饺子也不吃了！少吃盐，也不沾甜食。一切全是白费劲。五个月内腰围仅减去三公分。可说起这五个月的饮食，算得上他三十九个人生岁月中最单调乏味的。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这种牺牲不

值得，并且立即决定第二天午饭吃面包，喝红葡萄酒。他承认这个决定显得很懦弱，不过的确令他激动不已。他重新看了看镜子中的自己，发觉腹股沟处有小包，便又往镜前靠了靠，可仍旧看不清是什么，因为那一片全长满了绒毛。他带上眼镜，重新检查那个地方：原来是颗还没有完全长成熟的小疖子。他放心了。

面对着紧闭的窗子马尔塞罗做了五年的呼吸运动。然后就停了下来，因为他不想出汗。他似乎想穿睡衣，但马上打消了这念头。这么热的天最好还是光着身子睡好。他打开便携式收音机，传来一阵古老、亲切的特奥伊罗风琴声。他仿佛拿自己寻开心，跳了几步探戈（笨拙极了！），孤零零、赤裸裸地舒展每一个动作。

可是风琴声被一个重要新闻打断了（怎么不是只有几句话的简单消息呢？），收音机中不再播放舞曲。假如播音员弗朗哥死了还会播这些要闻吗？但是他会死吗？马尔塞罗躺下来，看了一小会儿书，第七回的内容实在乏味。他给闹钟紧了弦，关上收音机，竭力让自己睡着。偏偏这时候他左脚的习惯性痉挛又出现了。脚趾头缩作一团，仿佛要将床单攥住。他咒骂了一阵，因为身旁没有其他人就停了下来。他开开灯，从床上爬起来，极其可笑地单脚跳着。他在抽筋处按摩了很长时间，那钩在一块的脚趾才完全恢复原状。

马尔塞罗又躺下去，这一次好像要逃避再来的抽筋，他旋即睡着了。梦不算太可怕：他经过一座桥，桥并非建在河上而是在地上；桥下，一簇红色的灌木旁，站着玛贝尔，是他原来的女友；他想叫她，吸引她的注意力，然而他徒劳地启合着双唇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她固执地注视着别的地方，

仿佛在寻找或等待什么人，当然，不是他。

并非闹钟声将他唤醒，新的一天的黎明之光让他睁开了双眼。起初，他还以为自己是从一个漫长的午睡中醒来，但立即就觉察到不对劲。当他明白刺目的光线的来源时，不禁吓了一跳：百叶窗敞开着，更确切地说是他关过之后又开的（“该死的插销”）。可以这么说吧，（他怒火难耐）昨晚他所有的荒唐行为，诸如找疖子，探戈舞步，呼吸练习，抽筋时单腿跳，一切的一切都可能被对面的邻居看到。他已经想象到加尔万恩女士中午给她的女伴打电话的情形：“你知道昨晚住在我公寓对面楼里的家伙做了些什么吗？你绝对猜不出！他跳舞，蹦来蹦去，把头发弄乱散到脸前……你懂吗？”她的朋友将问她：“他该不是有裸露癖吧？”加尔万恩女士会说不，她认识他（当然只是见过面），是个严肃的家伙，不过年纪不小了。她的朋友就告诉她这种人更可恶。好啦！要是加尔万恩女士回答说从未想到过这一点，而他可能真有裸露癖，那么从今往后他怎么见她呢？问题在于光着身子，如果把一个漂亮女人的衣服脱光，那确实叫人心旷神怡，可是这么着敞着百叶窗，像傻子一样展示在别人面前，完全就是闹笑话。

他迅速穿好衣服，洗了脸，刷完牙。夏天他总是愿意晚上冲澡。此外他想早点出去，以防在门厅里撞上加尔万恩女士。出门之前，他把百叶窗几乎全关上了。为什么？可惜已经晚了。

他乘2号电梯下楼，刚到底层，就看见了加尔万恩女士。很显然，这次邂逅吓了她一跳。马尔塞罗不敢正面看她。他招呼了一下，就在临街的门边站了几分钟，谁也不

等。那女人在电梯门旁边呆着。她朝马尔塞罗看，可是当她发觉马尔塞罗也在看她或就要把视线转移到她身上时，便赶忙往别的地方看。最后，马尔塞罗发现她在走近自己。他心里惊恐不已，几乎想拔腿而逃，但还是决心澄清一下事实。应该彻底解决此事。

加尔万恩女士站到他身边，说：“先生，我想对您说我完全理解您的震惊，您甚至不愿看我一眼，招呼也不打。”“我？”马尔塞罗含含糊糊地说。“对，是您。可我不愿让您把我看成坏女人。我是有点放荡，这个我承认，别无其他，您知道吗？我本以为您了解这点。然而您的态度最有说服力，先生。您当然有权把我当作轻佻或爱说谎的女人，可我向您保证昨晚我真的以为自己关上了百叶窗。”

詹玲 译

他没有让步

有多少个夜晚，帕斯夸尔在梦境中都像他现在这样用手按动米利安家古老宅院大门门铃的按钮。梦醒之后，他心里总是怨恨不已。他对自己下意识中表现出来的懦弱无能感到气恼。二十五年来，仇恨和恼怒的火焰很快又在心中升腾起来。他常常身不由己地在梦里又恨又恼地叨念哥哥马蒂亚斯的名字。他确确实实躲过了哥哥的那些辩白。在这种情况下辩白又有什么用？免得让这种卑鄙的行为搅扰了对母亲的思念。也许有人会以为他曾经私下里估算过那枚镶满钻石的戒指以及那条用地道的珍珠串成的项链，还有那对黄金做成的耳环能值多少钱吧？那才是胡说八道呢。他帕斯夸尔只在乎那些珠宝曾经是属于母亲的东西，只在乎那些首饰在她青春年华时曾经确确实实地陪伴过她。当时父亲还在世，母亲面色还是红扑扑的。从他自己来说，他宁愿用分家时分到的特伦塔伊特雷斯省的小农场（他甚至都没有去过那里）来换回这些珠宝。

他不想要求人家把事情说个清楚明白。他只是从此不再和马蒂亚斯讲话。让他留着那些首饰去吧！他要是想把它们卖掉的话就卖掉好了。让他连他的良心也出卖给魔鬼去吧！打定主意闭口不提此事，这事做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总而言之，这样做了之后他感到心里坦然了。他几乎对自己的沉默不语感到很惬意。

而马蒂亚斯呢？对这种局面，马蒂亚斯当然也就默认了，他并不寻找机会把事情说个清楚。帕斯夸尔不记得他们二人究竟是谁躲着谁。哥俩只是不再说话，谁也不去找谁。帕斯夸尔的想法是：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二人不和由来已久。帕斯夸尔还清楚地记得当初他俩在花园里玩耍时的情景。那时马蒂亚斯 14 岁，他自己 12 岁。中午睡午觉时，父亲和母亲在休息，厨房里传来女佣人洗刷锅碗瓢盆的乒乒乓乓的响声夹杂着她们谈论当天的飞短流长的吵嚷声。灼热的空气中，树叶在懒洋洋地摇晃，不时地从树叶上掉下来个把毛茸茸的令人恶心的肉虫子。马蒂亚斯和帕斯夸尔二人躺在凉亭中的长椅上，读着他们的暑假读物。马蒂亚斯个子很小，容易激动。他蜷着身子，不屑一顾地瞟一下帕斯夸尔读的小说（大都是布法罗·比尔和桑多坎之类作者的作品）。帕斯夸尔则不满地浏览一下哥哥手里拿的书封面上的标题。（那些令人恶心的儿女情长的书名为《子爵的女儿》、《母亲和命运》和《最后一滴泪》。）

他们俩当时看的书不同的，后来结交的朋友也不一样。帕斯夸尔很吃力地上到医学系二年级。他的同学喜欢开玩笑，精力旺盛，无法无天。马蒂亚斯的同学对多年来同在一起喝咖啡已经感到索然无味，他们游手好闲，胸无大志，勉

强混成了知识分子。

造成他们不和的因素，还因为苏珊娜那个穷亲戚，马蒂亚斯首先爱上了她。当时帕斯夸尔只是多多少少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位小表妹；于是他决心用他笨拙的奉承话来打动她。然而，归根结底，二人的追求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苏珊娜出人意料地将一个有钱的老耄搞到了手，决心将自己禁锢在一个上等家庭里，这样，待老头子一死便可顺理成章地过上舒舒服服的日子。

确确实实有一次兄弟二人联合了起来，甚至令人惊奇地共同加入了同一个政党，还一同出现在社团的名单上。他们对能够休戚相关感到陶醉。他们常常在一起肩并肩地讨论问题，斥责那些对党已失去信仰的人以及那些记录了党内的名人开出的空头支票和他们个人的过失的脱党者。帕斯夸尔曾经想过，尽管他们二人心存芥蒂，也许不会太久他们就会突然热乎起来。

父亲已经亡故，因此他们每天晚上都留下来陪伴母亲，尽可能地排遣晚年折磨她的无法解脱的种种痛苦。后来，马蒂亚斯结了婚，帕斯夸尔时至今日仍然是孑然一身，而这种党内的一点同志关系也就渐渐地消失了。可是二人对这种不冷不热的同志关系都留有一段酸溜溜的记忆。

可是母亲终于故去了。母亲是维系他们二人的唯一牢固的纽带。对于失去了母亲，帕斯夸尔感情上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转过弯来的。他常常做梦，梦到这个可怜的老太太每当好心人劝她说她的病还会好起来时，那双无神的眼睛里就充满了惶恐的神情，梦见她绝望地想离开这个世界。这种梦使他感到胸口发闷。帕斯夸尔宁愿她得的病有各种症状，能有一

个确定的病源。他不能克服这种想法：那就是她之所以死去是因为她只是想死，她活腻了，她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他对母亲这种没有必要的一死了之，他没能做到母亲至少要为他活着而感到内疚。但是他也并不感到惭愧。他更注重孝心，他的这种孝心自然而然地透过他那不想讲话的嘴巴和那双一点都不显得悲哀的眼睛表露了出来。

母亲死后，马蒂亚斯和苏珊娜把一切都管了起来，因为他已经精神错乱，几乎到了精神完全崩溃的地步。对母亲的死他感到来得太突然，他一想到自己就觉得可怜。有许多天来他害怕人家向他谈起那些个数字，那些利息还有那些地契。他只焦急地等待着人家问他一句话。如果马蒂亚斯提出把那些珠宝给他，他就接受了。他愿意用他所有的东西来交换。想自己保存那巴掌大的一把首饰成了他的一块无望心病。他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但他觉得这样他就与母亲贴得更近了。他觉得这是比他的母亲最后几个月的可怜的躯体更能留得住的东西。那条项链、那枚戒指和那对耳环仍然是正在微笑着的母亲，她还在去参加聚会，挎着父亲的胳膊，邀请他在距今久远的黄昏时分在婆婆的树影下同在花园里散步呢。

可是马蒂亚斯不提起这个话头儿。他谈起了那些股票，那些土地，还有那些存款。就是不谈那些首饰。帕斯夸尔没意见。“好吧。随你便吧。反正是一回事。”他不想用自己的无依无靠来敲他一笔，他抹不开这个脸面。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可怜巴巴的孤儿，就像个七岁的孩子那样的孤苦伶仃。可他又觉得自己令人奇怪地成熟起来了，觉得今后若再哭哭啼啼只会被人认做是祈求别人怜悯。

有一天，说好了一块儿谈谈，哥哥却没有赴约。“他不愿意谈。那更好。一切全都是明摆着的事。”在帕斯夸尔的意识中，马蒂亚斯搞的诡计终于被证实了。两个月后，他同他在梅塞德斯和别达德街口迎面相遇，帕斯夸尔故意地装着看不见他走路时的小碎步，他那无可挑剔的礼帽，还有他那正宗哈瓦那雪茄烟。对这些细小地方他就像他对自己的习惯动作、对自己的那些不起眼的毛病那样熟悉。

然而，必须承认一点。由于他顽固地抱有这种明显的仇恨（实际上可能生出许多事端），他战胜了顾影自怜心理给他造成的沉沦状态。对马蒂亚斯的仇恨使他苏醒过来，助长了他每日冥思苦想，使他恢复了他所盼望的那种过去不常发火，过平平静静的生活环境。那些珠宝和对占有它们的渴望终于后退一步，变成了过眼云烟。想到那些珠宝，他发一通火、表示一下厌恶和蔑视也就算了。

那项链、戒指和耳环原本是对母亲的最后的眷恋，不管怎么说，它们仿佛加强了对母亲的思念，现在则成了支撑一种模糊的传统的高贵的形式了。仅此而已。

帕斯夸尔忍受着满腹怨恨。他承认这只是他和他哥哥之间一笔未了结的帐目，没有别的东西。他没有理由同马蒂亚斯的律师辛拉讲这事，也没有理由同他越来越少的朋友讲这些，更没有理由同苏珊娜讲。她每个月到他的单身寓所来喝一两次茶（他容许她不请自到）。她总是好像不经意顺口提出个问题来，打探究竟是什么事造成了兄弟二人之间的决裂。多年来他们之间很熟识，这使得帕斯夸尔用一句“与你何相干”就压住了表妹那纠缠不休的好奇心。然而这不但没有使她感到不快，看得出来也并没有满足她的好奇心，因

为在下一次喝茶时，她又劲头十足地卷土重来，旧事重提。

那时候苏珊娜变成了一个穿着华贵的五十多岁的老太婆，然而她孀居后生活上的优裕并没有能够使她身上的肥油减少，更没有能够推迟她那令人难堪的男式谢顶。毫无疑问，不论带上什么假发，头顶无毛对她说来总是个无法摆脱的折磨，都令她在优裕的生活中感到一丝遗憾。有时候帕斯夸尔这个清心寡欲的男人注意地打量着她。仿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样，帕斯夸尔自然而然地会将现在的她与昔日的那个招人喜爱的风流女人——那个在舞会上和散步时、在充满彩车和鲜花的狂欢节上令马蒂亚斯和他对其美妙动人的胴体垂涎万分的尤物对比一番。

可是，说实在的，为什么一定要与她谈呢？苏珊娜也常常去探望马蒂亚斯和他的妻子。星期天时一般她总是和他们一起吃午饭。然后他们一起到罗多公园去，沿着湖边漫步，无言地任凭孩子们在敞篷马车上打打闹闹。七点多钟，他们高高兴兴地乘上去时坐的那辆有轨电车，在车身的左摇右摆中归来。

苏珊娜找不到恰当的话来向帕斯夸尔夸赞马蒂亚斯妻子伊索尔迪塔^① 做的一手好菜。马蒂亚斯的妻子一直到 53 岁了，还是一听见人家用指小词这样来称呼她，就一准发起怒来。可是后来她对护卫自己也觉得厌倦了，带上了假牙又有风湿病，只好就自认是伊索尔迪塔算了。

帕斯夸尔不太了解自己。然而凭经验他了解表妹的那令人想象不到的嘴快劲儿。只要一同她谈过那些首饰，肯定马

① 伊索尔达的小称。

上就会传给马蒂亚斯，从而引起一场指桑骂槐的争吵，直到闹得一塌糊涂为止。总而言之，帕斯夸尔中断了和他哥哥的对话，他也没有恢复同他对话的想法。

他真没有这种想法吗？不是。好多次他在梦中都梦到过他现在正做的这件事：按下米利安家古老宅院门铃的电钮。醒来后他总是怨恨不已。可现在……现在他是完完全全地醒着的。现在他只是在潜意识中不让步，现在他是在实际上，用他自己的手，在做着使自己必须丢面子的事呢。

他仍然不能相信这是真的。那天下午参加完苏珊娜的葬礼后回来，他发现了西埃拉留下的条子。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个星期之后，就在他当时决定请律师时，律师对他说马蒂亚斯要跟他谈谈，说是非谈不可（这是马蒂亚斯的原话），要他马上到米利安家宅去，因为他病了出不了门时，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在西埃拉硬要他答应去了之后他仍然不相信这是真的。可是现在，他站在这里了，茫然失措，仍旧犹豫不决。可实际上，再怎么犹豫也无济于事了。他让步了。铃声在里面响了起来，他的心老了。苏珊娜——那可怜的令人讨厌的苏珊娜带着她的假发和一切已经命赴黄泉。帕斯夸尔好像感到，在整个一生中，如同每天的生活一样，也会有迟暮的到来，而他现在正在经历着这个时刻。苏珊娜已经成了不可测知的往事。他不爱她，也从来没能爱过她，可是她身后留下了一丝淡淡的空虚。

他推了一下大铁门，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他发现门是开着的。他轻轻地推开了门，不让门发出响声接着走了进去。在 25 年后的今天，他走进了原来的花园里。花园的右边是白色天竺葵花坛和那尊三个小天使组成的雕像。三个小

天使仍旧在那里撒尿。然后是夏日早晨时他曾经在那里玩过永远玩不完的单人纸牌的长石条。再后面就是那棵高加索云杉。那是装在来自欧洲的木箱里运来的——虽然不一定准是高加索云杉。大家都说这棵树快要枯死了。后面，被房子半遮半掩的是那个凉亭。有一条长凳已经坏了，那些树叶（天知道！）似乎更柔弱，更灰暗了。

这时，门打开了。帕斯夸尔看到一个有点像伊索尔达她妈，或许是她姨，也许是她的一个老亲戚模样的妇人。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只有她那莞尔一笑令人觉得她依然是当年的伊索尔迪塔。“你好啊？伊索尔迪塔？”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她把手伸了过来，他于是感到必须得进去不可了。他非常想进到大厅内，面对那帧母亲的大幅油画肖像。这是那位巴斯克画家画的，由于画得很年轻并且没有画上脸上的那些皱纹而收了 300 比索。他没有停在那儿。他跟在伊索尔迪塔的后面很快地走了过去。然而只看那么一眼，他就发现他对那张面孔的记忆是多么的淡薄。嫂子带着孝，当然是为了苏珊娜。整栋房子黑洞洞的，百叶窗关着，窗子的遮阳篷都已经变了形。

“马蒂亚斯在楼上呢”，她说道，像是表示歉意。帕斯夸尔感到稍微有些头晕。实际上，刚才在上楼梯时，由于用劲过大突然觉得一阵恶心，关节也感到一阵剧痛。而在早先这楼梯他是三蹦两蹦就能爬上去的。

伊索尔迪塔打开屋门，眉毛一抬示意他进去。这是母亲原来的卧室，可现在他在这里。难道“这”就是马蒂亚斯吗？他躺在床的左侧，围着一条灰不溜秋的围巾，两眼肿胀，头发散成一绺一绺的。帕斯夸尔走上前去（每走一步都

像是要他的命似的)。马蒂亚斯看起来没有费什么力气，说道：“请坐下吧。”他坐下了。还没有张嘴，那一位又接着说道：“唉，我早就该跟你谈谈。你知道么，发生了点误会。”帕斯夸尔突然感到太阳穴发热，他张嘴说道：“你觉得是误会吗？”马蒂亚斯很激动，两手揉搓着床罩，不知怎样才好。

突然，他开始讲起来，几乎是一口气说出来的。后来帕斯夸尔模模糊糊地记得他曾经想打断他的解释，可一点用也没有。马蒂亚斯很激动，一边咳嗽一边讲，有时候还嚷起来，不时地用手扶一下脑后不断滑下来的枕头。他看来急于要一下子全讲出来，急于确信对方已经听懂了：“我对你说实在话。当然也许现在不是说实在话的时候。你会这样想的。你是对的，你完完全全是对的。事实是，母亲去世时——15日那天正满25年——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我再也看不到你，再也不和你讲话……我向你发誓，你那时对我来说算是完了……是的，我知道，你不来看望我，你不理我，这是最糟糕的，因为我认为你不想跟我谈起那些珠宝……当然，当然，……我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可是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你不想同我讲话是因为你把项链、戒指、耳环都拿走了……对我来说，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那些珠宝不见了，而你又避而不谈这个话题。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你来说代表着什么。对我来说，它们至少表明母亲还活着呢。因此我不能原谅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能原谅你不愿意跟我谈这件事情，同时（这也是我愚蠢的地方），我也不想跟你谈。你要知道，兄弟，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脸面。你知道，我不能要求你什么。我等待着你来，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焦急地盼望你来啊。可我又多么恨你呀！25年来，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说实在的，你不觉得可怕吗？要不是苏珊娜死去，谁知道这种情况还会拖到什么时候？谁知道这种仇恨还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前几天，她把我们叫了去，你知道吗？她几乎说不出话了，她还是把那些首饰交给了我们。是她，这个混蛋。母亲去世的时候她把那些首饰拿走了。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伊索尔迪塔呆呆地看着她，简直不敢相信。25年了……你明白吗？我没跟你说话……没见到你……”

只有在这时，他才仿佛松了一口气，肌肉和神经才松弛了一些。可马上他又想起了什么，把身子靠在了床头柜上。他的两手有些发抖，很响地拉开一个抽屉，取出一个长长的绿布包。“拿着”，他说着把它递给了帕斯夸尔。“我跟你说话，拿着。我要惩罚我的愚蠢、我的不信任。现在终于拿到了这些首饰，我要你把它们拿走，你明白吗？”

帕斯夸尔没有说话。他的膝盖上放着这个绿色小包。他感到非常尴尬。他想：“那么是苏珊娜她……”，这时马蒂亚斯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要找回失去的岁月。我要再一次有个兄弟。我希望你来和我们一起住，住在你自己家这里。伊索尔迪塔也希望你和我们一起住。”

帕斯夸尔搭讪着说他会考虑的，会有时间冷静地讨论这件事的。他支持不住了，这是最要命的事。他想从这意想不到的事情中转过弯来，清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可是对方的声音在逼他，非要他给予什么该死的原谅，作为交出那些首饰的最合适的收据。

马蒂亚斯现在又是一阵咳嗽，这次比前几次要厉害得多了。帕斯夸尔利用这个间歇站起来，找了个借口要走，又答

应以后还会来。他握了握那只与他的一模一样的汗淋淋的手。嫂子默默地目睹了整个懊悔的场面，又一次送他到门口。“再见，伊索尔达”他说。她很感谢他来看他们，她没有非要他再来。

他毫不留恋地看了看那条长石和那几个小天使，关上了大铁门，铁门随之发出一阵嘎吱声。他又来到大街上。说实在的，他没有让步。他左手仍旧握着那个小布包。他突然抑制不住地想抽支烟。于是他停在了街角，燃上一支香烟。就在他感到飘飘欲仙时，他突然把一切都看明白了。现在那些首饰已经无关紧要。他对马蒂亚斯依然怀恨在心。让表妹苏珊娜安息吧。

李胜华 译

报 应

彼得罗·路易斯比胡安·托马斯大一岁，但是两人长得一模一样，人们就都把他们当成了双胞胎。此外，由于彼德罗·路易斯上小学时得了一场猩红热并发症留了一级，所以从那时起两人就一起读完了小学、中学和两年大学预科（学的是建筑学）。因此，人们经常看见他们俩形影不离。无论同学，还是老师，每逢要跟兄弟俩中的一个讲话时，总要先弄清是哪一个。上大学预科时，他们的恶作剧在学生中流传开来，准备考试时，两人把课程分开，这样每人只需学一半，考试时同一门课一人做两份即可（一份是作为胡安·托马斯的，另一份是作为彼得罗·路易斯的）。就这样，他们按照付出最小代价的原则，两人就可以同时升级。他们亲密无间的团结与合作竟过分到两人不止一次地代替对方来应酬未婚妻的地步。

只是在进入大学时，他们才分道扬镳，而且是由于政治原因。彼得罗·路易斯倒向左翼，胡安·托马斯倒向右翼。两人都不仅仅限于各抒己见，而是完全投身到本派的行动中去了。起

初胡安·托马斯同某些反共宣传组织建立了联系；彼得罗·路易斯则同一个极左的地下运动挂上了勾。他们只进行过一次深入的讨论，那还是在分裂的初期，但相互间未达成谅解，所以讨论也就自消自灭了。两人仍然住在父母家里，出于对不完全了解他们分裂的二位老人的尊重，兄弟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不把争论的话题带到家庭谈话中来。然而，胡安·托马斯通过他的好友们了解彼得罗·路易斯的非法行为；后者也从他的朋友那里知道他弟弟帮警察干的那些事。

在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胡安·托马斯退了学并正式加入了警察大队。彼得罗·路易斯经常听到有关他弟弟负责或亲自行刑的消息。老大则不同，他还在继续上学，不过不那么按部就班了，因为本派的活动占去他很多时间。在这期间，他们互不信任，所走的路又如此不同，所以谁也不会再把他们搞混了。彼得罗·路易斯的朋友们虽然明知胡安·托马斯在干着可耻的勾当，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胡安·托马斯的朋友及同事们虽然了解彼得罗·路易斯的所作所为（如果说至今尚未抓到他，也许另有原故），但却不曾注意到他们俩的相貌那样相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再说，他们在穿戴上也截然不同：胡安·托马斯几乎总是身着衬衫，红领带，黑外套，手持公文包，而彼得罗·路易斯则完全是一副不拘形式的学生打扮，穿着肥大的裤子，背上还背着个旧旅行包。

一个星期六下午，事情发展到了顶点。彼得罗·路易斯前一天晚上学习到很晚，所以和家人吃完午饭（吃的是扁豆、土豆汤、馅饼、啤酒）他决定睡一觉。因为不是特别困，他想，睡个把小时也就够了：睡到3点，然后再去找同志们开会。然而，醒来时已经6点了，而且头还沉得要命。不能到会了，真

他妈的。于是他去洗了澡，刮了脸。当他打开衣柜时，发现裤子、旅行包统统不见了。就在这一刹那（“哪个婊子养的往啤酒里给我放安眠药”）他想到了他那些伙伴，他们早已去找胡安·托马斯并把托马斯要的所有重要情报都掏给他了。晚了，谁都来不及通知。事情很简单：该倒霉。

彼得罗·路易斯一阵风似地闯进胡安·托马斯的房间。他打开衣柜，不出他所料，他见衬衫、红领带、黑外套、公文包全都在那。只用了5分钟他就把弟弟那套衣服穿在身上，他打开公文包，检查一下里边的东西，连父母他都没有辞别就冲了出去。他坐上一辆出租汽车，车子把他带到胡安·托马斯的“办公室”的对面。他进去时，警察们亲切地向他打招呼，而他却只向他们挤挤眼。在第三条走廊里，一个壮小伙子迎面而来，问他“那事”进行的如何他回答说好极了。

当第二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和他一样也穿着黑外套，向他指指一扇关着的门：“队长等着你呢”的时候，他这才明白过来。他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里面有人请他进去。队长穿着短袖衬衫，汗流浹背，神态紧张，正在和另外两个人谈话。当他看清是谁的时候，暂时中断了谈话：“你好！”“当然，一向如此，”彼得罗·路易斯说。“我这就完。希望你给我讲讲。”彼得罗·路易斯站到一边，背朝着窗户。

队长开始向那两个人匆匆地下达指示。显然，他是想独自听听这些好消息。这样彼得罗·路易斯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把公文包打开，里面装着胡安·托马斯乌黑发亮的、致命的、自动的——38型手枪。

王平媛 译

收 藏

“别动，别动！”“瘦子”叫道。

阿尔贝托的眼睛不敢离开对着他的武器，也不敢说话。他确实给吓坏了。他开门时闯进来的另外三个人（“黄头发”、“雀斑脸”和“黑姑娘”）迅速地分散到套间里去。

“你要是不动，不会有事的。”

“瘦子”微微一笑，但阿尔贝托不敢笑。

“家里有什么人？”

阿尔贝托轻轻出了一口气。

“就我们这些孩子。”他终于敢说话了。

“一共几个？”

“我和我兄弟豪阿金。”

“怎么？你没有姐妹吗？”

“有，她叫米利亚姆。”

“她也在家吗？”

“是的。”

“你为什么不提她？”

阿尔贝托咬了咬下嘴唇。

“因为她是个瘫子。”

“瘦子”只好把武器收起来。

“你多大了？”

“十二岁。”

“你兄弟呢？”

“豪阿金吗？星期五刚满九岁。”

“你瘫痪的姐妹呢？”

“我想，她大概十七岁了。”

“你父母何时回来？”

“明天下午。”

“经常把你们留在家里吗？”

“不经常。有时女佣人留下来。”

“他们为什么不带你们去埃斯特角？”

“可能是他们想过得安静点。”

“你很调皮吧？”

“有点。”

“你喜欢足球吗？”

“当然。我是中场得分手。我想参加国家队。”

“你考虑吧。”

“你呢？”

“我怎么啦？”

“你是国家队的吧？”

“看来你不害怕了。”

“不，还有点怕。”

“我是国家队的。更确切地说，我曾经是。”

“现在是佩尼亚罗尔队的吗？”

“不，现在我已不那么狂热了。”

“那时候真蠢，对吗？”

“瘦子”抓了抓耳朵。男孩把双手伸进了口袋里。

“别把手伸进口袋。”

“不行吗？”

男孩的脸上又显出恐惧的神色。

“好吧，你要是愿意就伸吧。不过，你要老实点。”

另外那几个人带着豪阿金和米利亚姆回来了。“黑姑娘”推着轮椅。

“他们说不知道父亲把收藏的武器藏在哪里了。”

“哼，他们不知道。”

“他们说父亲收藏着武器，但是他们认为没有放在这儿。”

“瘦子”望了望米利亚姆。

“你也不知道吗？”

“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你肯定知道一点。”

“不。”

米利亚姆显得很平静。只是有时动一动放在毛毯上的手。毛毯盖着她那没有知觉的双腿。

“当然，你这个样子，你会认为我们会同情你。”

“你们不同情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情。这样过日子真见鬼。不过，你起码还住在一套很舒适的房子里。有些人能走路，可是日子

过得糟得多。”

“如果你们不同情我，会更好。愈是同情，我愈是痛苦。你知道吗？”

“我想象得到。我也想象得到，你知道武器在哪里。”

“你想错了。”

最初，豪阿金轻轻地啜泣，但现在似乎对来访者着迷了。米利亚姆的表情很镇定。

“孩子们可以去睡觉吗？”

“如果他们想睡的话。不过，我看他们还不困。”

他望了望豪阿金。

“你困吗？”

“不。”

“那就让他们留在这儿吧。也许他们最后能想起父亲藏武器的地方。”

“我从来也没见过。”

“不过，你知道他收藏着武器。”

“是的。”

“你知道收藏的武器有多少吗？”

“一堆。”豪阿金说。

“既然你没有见过，你怎么知道有一堆？”

“因为母亲经常提醒父亲说，现在收藏着那么一堆武器很危险。”

“在你看来，一堆是多少？”

“我可说不清。大概一千吧。”

“你喜欢武器吗？”

“我喜欢电视上的。”

“瘦子”开始检查宽敞的藏书室。他把一二十本摞在一起的书一摞一摞地搬开，看看里头有没有暗洞、活门儿和什么迹象。米利亚姆默默地瞧着他乱翻。“瘦子”觉得有人在监视他。

“这些书，你老爸都读过吗？”

“我想没有。”

“他藏这些书干什么？当摆设吗？”

“可能。”

“瘦子”对“黄头发”和“雀斑脸”打了个手势，好像让他们再去彻底查一下整个房间。

“我和‘黑姑娘’负责看着这三个人。”

米利亚姆看了看双手，对阿尔贝托微微笑了笑。他现在似乎很平静，不过一双眼睛不住地闪动。

“你冷吗？”

“有点。”

姑娘用一个几乎觉察不到的动作引起“瘦子”的注意。

“你允许我弟弟去找一件套头衫吗？”

“瘦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望了望“黑姑娘”。

“你跟他去，行吗？”

她把一只手搭在男孩的肩上，这样走去。

“我可以坐下吗？”豪阿金问。

“喔，当然，可以。”

男孩坐在一把椅子上。“瘦子”重新面对着米利亚姆。

“你想起来了吗？”

“没有。”

“这样吧，你如果想起来，一定要把你父亲藏武器的地

方告诉我。”

“我觉得我可能想不起来了。”

“瘦子”燃上一支烟，然后递给米利亚姆一支。

“谢谢，我不能吸烟。不但我的腿没用，我的肺也不好。”

现在“瘦子”开始检查墙壁。他用指骨节敲着，好像找个什么嗡嗡作响的地方。

“你和你老爸一致吗？”

“在哪方面？”

“比如在政治上。”

“通常不一致。”

“为什么？”

“关于我和父亲的分歧，我不能细说。”

“你知道人们对你父亲的仇恨很强烈吗？”

“我想象得到。”

“你也有点恨他吧？”

“不。”

“那么你是爱他了？”

“我说过了，我不想细说。”

“可是，和一个人聊聊有时是令人愉快的。你如果愿意，我们可以聊上一夜。”

“请告诉我，你是什么人？是游击队员还是心理分析家？”

“不可以二者兼顾吗？”

“哼，真不得了。”

“放心吧。我几乎不是游击队员，更不是心理分析家。”

“你为什么几乎不是游击队员？”

“因为我没有那种本领。”

“那你为什么要干呢？”

“这么说吧，我认为那是一种责任。”

“就为这个吗？”

“唔，还有别的原因。不过，我也不能细说。”

“好吧。”

“你至少告诉我一件事：你父亲要这些武器干什么？”

“跟那些书一样。”

“当摆设吗？”

“差不多。”

两个人的低声谈话终于使豪阿金昏昏欲睡。米利亚姆举手抹了抹额头。

“你累了？”

“有点。不过，我抗得住，你放心。”

“你真的不会告诉我收藏的武器在哪里吗？”

“你找去吧。我总以为你们决定采取这类行动时一定掌握了全部情报。”

“事先想得好。但不总是符合实际。我们必须解决武器问题，明白吗？”

“当然明白。你要打我吗？”

“你真的认为我会打你？”

“为什么不？你们要是被抓住，也会挨揍，不是吗？”

“这不是一回事。”

“我知道不是一回事。”

“瘦子”好像准备继续进行这种舌战，但是“黑姑娘”

带着阿尔贝托回来了。

“‘瘦子’，这孩子支持不住了。他可以去睡觉吗？”

“即使我不准许，他也会睡着的，对吗？”

“我是说，他可不可以到他的床上去睡。”

“最好让他睡在这儿，在沙发上。已经有一个这样睡了。不管怎样，把毯子给他们拿来。”

这时，“黄头发”和“雀斑脸”回来了。

“怎么样？”

“没有查到。”

“认真检查了吗？查遍了吗？”

“一分一毫都查了。”

“但是，武器肯定藏在这儿。”

“天晓得。你不认为我们该走了吗？”

“不，我认为还不该走。我们有时间，肯定能找到。”

“我说这儿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收藏的武器，连一支发火药左轮手枪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我说有，我敢肯定。”

米利亚姆转动她的轮椅，最后停在“黑姑娘”面前。

“我要去厕所，你带我去好吗？”

“我带她去吗，‘瘦子’？”

“可以，当然。”

“黑姑娘”推着轮椅，顺着一条窄走廊走去。她推开门，让米利亚姆进去。她在外面把门关上时，米利亚姆打了个手势叫住她；她也打了手势让她从里头关上门。

“怎么了？你觉得不舒服？”

“不。”

“那你就自己呆在这儿吧。需要帮助吗？”

“不，我不需要帮助。不过，你别走。”

“那你有什么事呀？”

米利亚姆在轮椅上显得不安。还没有回答脸先红了。

“告诉‘瘦子’，让他去厨房。在窗子右边，第三块花瓷砖。”

朱景冬 译

看 马 戏

他对马戏团的热情由来已久。也许有两个月了。但是如果七岁就是整个一生，依然透过磨砂玻璃把成年人的世界视为一大群人，那么两个月就意味着一个漫长的、神秘莫测的过程。他的哥哥们已去过两三次，并且认真地模仿小丑们的可笑的失着表演和大力士们的怪相与平衡动作。同学们也看过马戏团的表演，一提起这种棒击或那种跳跃，他们便格格地大笑一阵。只有卡洛斯不知道那是夸张，是专门做给人们看的。他没有看过马戏团表演，因为他父亲明白，他容易受感染，看到吊杆演员的危险动作他会过分激动。但是一想到那些小丑，卡洛斯就感到胸中产生一种类似痛苦的东西。对他来说，克制对马戏团的好奇心越来越困难了。

于是他想好了要说的话，在适当的时刻他对父亲说：

“没有办法让我去看马戏了吗？”

在七岁的年纪，说出这么长的一句话来，听者是不能无动于衷的。父亲禁不住微微一笑，接着解释说：

“我不希望你看吊杆演员表演。”

听他这么说，卡洛斯觉得事情好办了，因为他对吊杆演员不感兴趣。

“如果那个节目一开始我就离开呢？”

“好吧。”父亲回答。“这样的话，你就去吧。”

母亲买了两张票，星期六晚上带他去看马戏。一位穿泳衣的女演员出场，她在一匹白马上做平衡表演。他等着小丑出场。观众热烈鼓掌。随后出来几只猴子，它们表演骑自行车。但是他希望小丑们出场。观众再次鼓掌。出来一位杂耍演员。卡洛斯睁圆了眼睛望着，但是他突然打起呵欠来。观众的掌声又响起来。这时，小丑终于出场了。

他的兴致达到了激动的顶点。一共四个小丑，其中两个是侏儒。一个高个子小丑来了个腾跳，就是他大哥模仿的那一种。一个侏儒钻进他的腿间，高个子小丑响亮地拍了一下他的屁股。几乎全场的观众都笑起来。小丑还没有做他的动作，一些男孩就大声赞扬他的滑稽的表情。那两个侏儒以千百种方式，滑稽可笑地扭打起来。与此同时，其余两个小丑中那个不怎么可笑的小丑为他们加油。这时那另一位，无疑是最滑稽的高个子小丑走到场地的栏杆边，卡洛斯看见他就在面前，那么近，他清楚地看到了那个人带着描画的固定笑容的疲惫的嘴。有一会儿，那个好人看到了卡洛斯那张惊讶的小脸儿，用他的真嘴唇不易察觉地对他笑了笑。但是其他三位小丑已经表演完毕，这位最滑稽的小丑只得回到他们那里去，参加最后的棒击和跳跃，全场观众热烈鼓掌，卡洛斯的母亲也鼓起掌来。

后来出场的是吊杆演员，按照事前的约定，母亲抓着他

的胳膊，一起离开了马戏团。这一回他终于和他的哥哥们及同学们一样看到马戏团的表演了。

他感到胸中空荡荡的。明天该对人说什么，他觉得无关紧要。已经深夜十一点了，但是母亲似乎有什么怀疑，便把他领到一处明亮的玻璃橱窗前。她先是不相信似地用一只手慢慢地摸了摸他的眼睛，然后问他是不是哭了。他没有说什么。

“是因为吊杆演员吗？你想看他们表演？”

足够了。他对吊杆演员不感兴趣。只是为了消除误会，他才解释说：他哭，是因为小丑们的表演没有引他发笑。

朱景冬 译

天真无邪

爬到飞檐上，看到下面的街道，我却没有头晕，已经足够了。远处有一个人在路灯下吸烟，时不时摘下帽子搔后脑勺。有时还从香烟旁吐一口痰。他从那里可以看见我们：我和豪尔丹。如果那个该死的女人突然到来的话。我们还没有到达窗口、穿过走廊、到平台上、找到盖子。在我们考砸了物理、在布里托家里一直喝到一点的那个晚上，维尔德斯嘴角颤抖着醉意和渴望，严肃而秘密地把这事告诉了我们。实际上，是阿特亚加把这事告诉维尔德斯的，而阿特亚加又是从掉牙的索莱尔嘴里知道这事的，只有索莱尔确实钻过通道。但是他是在二月间死去的，不可能忘记他的忠告：“小心盖子；从里头打不开。”只有我们五个人知道俱乐部里存在那条地下通道：它宽 70 厘米，长 15 米，姑娘们使用的浴室的栅窗对着它。但是谁也没有勇气。只有我和豪尔丹有。

现在那个吸烟的人说起粗话来，因为那个女人来晚了。后来他住了口，好像是为了酝酿适合于打破寂静的打耳光的

气氛。但和预料的相反，他没有紧接着说一句话。这时，她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拉到街角上，脚下踏的是石头铺的路。我们张着嘴，小心翼翼地，终于在飞檐上前进了两米，仍没有头晕。维尔德斯说，窗口在拐角那边。豪尔丹果然够着了窗框。在下面的被隔断的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我们猛地一跳。“好了。”豪尔丹说，“危险过去了。”我想我穿着白衬衫。

“我们会把衣服弄脏的。”我说。

“你别这么女人气。”豪尔丹说，“我们是去寻开心么。”

我想，他说的对，我们是去寻开心。不过，我的衬衫也会被弄坏的。

“你这么说如果是为了衣服，那你不用担心。”豪尔丹说。“我们不能穿着衣服进去。”

“那我们把这个放到哪儿？”

“这儿。”

他说“这儿”，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脚下就是盖子。它有两个铁环，是正方形的，很重。我还不知道我们能否移动它。我们脱了衣服，这时我们才感到夜很凉。如果在别的时候，看到豪尔丹穿着短裤站在屋顶平台上，我会觉得可笑的。但是，不幸的是，现在我却觉得不可笑。我感到又冷又尴尬，我担心下雨，衣服会被淋湿。是的，我们把盖子掀起来了。豪尔丹第一个钻进洞口，开始往通道里爬。在月光下，我看见他的脖子、双肩、腰部过去了，看见他的屁股、膝部和脚过去了。于是，我下了决心。通道壁十分粗糙，从通道里飘来一股令人感到不快的热气。我们越往前爬，热气就越热，越让人恶心，越难以忍受。我不能爬得太快，因为

我会撞着豪尔丹的脚。我觉得短裤被撕破了，好像什么东西划我的肩膀，但是我依然爬着，向前爬着，因为我们是去寻开心，因为我们要去看看她们裸体的样子。爬了七八米后，那股无形的热气变成了亮闪闪的雾。前面就是栅窗。豪尔丹说：“就是那里。”我重复说：“就是那里。”我们就像在地底下，在地狱里说话。豪尔丹停下了，因为我又一次撞着他的脚。我用头发蹭他，让他别停下。他接着向前爬，丢下了第一扇栅窗。我们停下来；我停在第一扇栅窗前，他停在第二扇栅窗前。但是里头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冒着那么大的危险，走过街道上头的飞檐，现在里头却什么也没有。我们浑身湿漉漉的，我想起了衣服。豪尔丹说：“你瞧。”我往里瞧，发现乒乓球亚军卡洛塔裹着浴巾站在那里。她打开喷头看水热不热。接着丢下浴巾，我们看到了她的样子。豪尔丹说：“那？”我没有说什么。现在我感到羞愧。我本希望看到她们一丝不挂，但并非如此。与其现在真正看见她裸体、连短裤也不穿，不如想象她穿着长裤打乒乓球的样子。这时有人叫喊或唱歌，我不清楚。卡洛塔用更刺耳的叫喊回答。另外两个女人，已脱光衣服，只披着浴巾，蹦蹦跳跳走进来。留金发的胖女人是阿亚拉夫人，留金发的瘦女人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她们坐在长凳上，等着另一个女人洗完澡。热气和我的汗水混和在一起，顺着我的松软的皮肤往下淌。卡洛塔的腿最漂亮。“喂，看她的乳房。”豪尔丹说。是的，我也看到了她的乳房。“喂，看她的屁股。”豪尔丹说。是的，我也看到了她的屁股。这时，留金发的瘦女人独自跳起舞来，留金发的胖女人怒冲冲望着她。后来，她走近她，二人一块跳起来。卡洛塔望着她们跳，突然说：“别跳了，现在阿米

来了，你们知道她怎么样。”“她非常狡猾。”阿亚拉夫人说，但是她停止了跳舞。

我不喜欢阿亚拉夫人，我喜欢安娜·克里斯蒂娜，但是她们两个一块跳舞是愚蠢的。当然，我更喜欢阿米，不过，我不愿意看见她。

“我们走吧。”我说。

“什么？”豪尔丹说，感到惊讶。“现在就走？”

“我想走，你留在这儿吧。”我说。

我开始向出口爬。现在我知道她们是怎样的了。对我来说，这足够了。此外，我感到羞愧，觉得太热和恶心。我用右手摸着通道顶部向前爬，但是什么也没摸到^①。我不相信，但是我摸着了通道壁，末端的通道壁。我重新向前爬，但是什么也没摸到。我往回爬，又往前爬，但是绝望的情绪使我不敢相信通道口的盖子盖上了。我爬回栅窗那里，叫道：“豪尔丹。”

“啊，你回来了。”他高兴地说。

“豪尔丹。”我重复道。

我不能再对他说什么。看到他那么自信地望着安娜·克里斯蒂娜在往后背上擦肥皂，我感到气愤。

“盖子。”我说。

他心不在焉地望着我，还不明白我的话。

“什么？”他说。

“盖上了，畜生！”

我们用嘶哑的小声对骂，第一次停顿时我们现出了恐

^① 指出口。

惧。现在豪尔丹的目光显得不安，嘴巴微微张着。他心慌了，我知道他心慌了。

“不过……是谁盖上的呢？”他结巴着说。

对我来说，谁盖上的并不重要。我向栅窗里看了看，阿亚拉夫人正在洗脖子。现在她的乳房下垂，那是两坨子又酥又软的肉。乳头像两颗黑洋李一样垂着。我想，为了这个，仅仅为了这个，我们才落到这步田地的。这是一件可怕的、令人讨厌的事情，但不必大惊小怪。

“让我过去。”豪尔丹说。恐惧改变了他的样子。他像一只骄纵的、发疯的猴子。“我要去看看。”

我不愿躲开，通道太窄了。于是我向后退，他跟着我。显然，盖子盖上了。豪尔丹没有吭声，返回到栅窗那里。我再次跟着他的腿爬进去。但是这一次我们不是去寻开心了。浴室里已空无一人。我觉得膝头发抖，但是豪尔丹的心情更坏。他绝望了，我知道他绝望了。瞧他那张猴脸儿，在抽泣。我不能流露同情心，但是流出了汗水，感到了恐惧。

“我们去呼救。”他说。

这时，我明白，我们不能去呼救，得想别的办法。

“不。”我说，没有再说什么。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脚步声。豪尔丹不再说话，我们静静地对望着。但我们越来越气愤，越坚决。是阿米的声音。但是我不想看见她。不愿意看见她这样。当然，她不知道，她打开水管，抚摸双腿。我知道豪尔丹不肯等待，我知道现在他要去呼救。我觉得不可能，但我已经爬到他嘴边。在这里搏斗，用我的恐惧的手指掐住他的柔软的脖子，是可怕的，是发疯的行为。是的，他绝望了。我知道这一点。这

时，他那张猴脸儿放松了，又成了豪尔丹，15岁的豪尔丹，死去的豪尔丹。但是我已一无所知，阿米还在浴室里，我不能叫喊。因为我不愿意承认她的存在，不愿意感觉到她不能自卫，孤单，纯洁得不堪忍受。然而，我是个白痴，我惩罚了自己。我的嘴老实地张开，喊了一声，可怕地、不可抗拒地吼了一声。因为我是一个白痴，我惩罚了自己。当我喊出豪尔丹的喊声的时候，粉红色的、湿漉漉的阿米神色惊讶，自知自卑，逃走了。

朱景冬 译

格洛丽亚的星期六

我在起床之前就听见下雨了。最初我想，大概六点一刻了，我该去上班，但是我把胶鞋放在母亲家里了，我只得把报纸垫在普通的鞋子里，因为一想到雨水把我的脚和脚踝泡得冰凉，我就感到恼火。后来我又想，今天是星期日，我可以盖着毯子再躺一会儿。这一点——确信是休息日——总使我的心情像孩子一样快活。我知道我可以随意支配时间，好像我可以不用跑两个街区（每六个早晨有四个早晨）就可以抢在我用来测定到达时间的表的前头。我知道我可以郑重其事地思考生命、死亡、体育运动和战争这类重要问题。一个星期中我没有时间。一到办公室，便有五六十件事情等着我，我必须把它们登入帐簿，并且盖上“即日入帐”的章，用绿墨水签上我的名字。到中午十二点，我差不多做完了一半，然后我跑四个街区去爬公共汽车。如果不跑那些街区，我可就倒霉了。从无轨电车近旁经过，我会感到恶心。其实，不是恶心，而是恐惧，巨大的恐惧。

这不是说我想到了死亡，而是一想到脑袋开花或肚子破裂，让二百个不安的围观者跷起脚看我，并且第二天一面品尝着家庭午餐的饭后点心一面讲述这一切，我就感到气愤。那种家庭午餐就像我用的午餐，我可以完全一个人在二十五分钟内吃完，因为格洛丽亚半个小时前就去商店了，她把四个饭菜都做好放在了文火的火油炉上。所以，我只要洗洗手就可以大口大口地喝汤、吃米兰菜、鸡蛋饼和糖水水果了。然后浏览一下报纸，再一次去赶汽车。两点钟到单位后，我要把二三十件有待处理的事情记下来。大约五点钟，我拿着我的记事本准时按副主任的门铃，他要口授五六封措辞严谨的信，七点钟以前我必须把它们译为英文或德文。

格洛丽亚每星期两次在门口等我，我们一块去玩，去看电影，她在影院里泪汪汪地哭泣，我用力攥着帽子或嚼节目单。其余的日子，她去看她母亲，我去检查两个面包房的帐簿，它们的老板——两个加利西亚人和一个马略卡岛人——用臭鸡蛋做饼干大赚其钱。不只于此，他们还控制南部地区的最集中的家具市场。这样，当我回到家，她已经睡了，或者——如果我们同时回家——我们一起吃晚饭，饭后很快就睡觉，因为我们累得像牲口一样。晚上我们很少有时间一块去购物。这样，我们一本书也不看，几乎也不评论我的同事们之间的争论或主任的粗暴态度——他自称是上帝的面包，女同事们称他是硬面包——有时连晚安也不说，便不关灯睡了，因为她想看描述凶杀的书，我想读报刊的体育栏。

评论要留到这样的一个星期六进行。（因为实际上今天是星期六，是星期六睡完午睡后）我三点半起来，做好奶茶，端到床前，这时她醒来，看一遍一星期的安排，告诉我该换的袜

子，五点差一刻起来听博莱罗舞曲。但是这个星期六没有进行评论，因为昨天夜里看完电影后我过分地赞扬了玛格丽特·萨拉文，她毫不犹豫地拧起我来，看到我不动声色，她就像商店的一位同事怀着同情心描述的那样用更为可怕和险恶的办法袭击我。当然，那是一个圈套，因为那个女演员是一种想象，那个男人纯粹是个骨肉铸成的蠢货。由于这种愚蠢的举动，我们没讲话就躺下了，熄灯后我们等了半小时，看对方能否迈出和解的第一步。跟过去那许多次一样，对我来说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但是在假装的怨恨结束之前睡意就来了，所以和解被推迟到今天，推迟到这个午睡的空隙里。

所以，当看到下雨时我想，这样更好，因为外表上的无情会自动加深我们的亲情，两个人中谁也不会变得那么傻，会厌倦地、默默地度过一个落雨的星期六下午；这个下午，我们是应该在两间一套的房间里共享的，那里实际上没有孤独，一切的一切就是面对面地生活。她哼哼叽叽地醒来，但我并没有想到她有什么不好。她醒来时总是呻吟。

但是当她完全醒来，我察看她的脸色时，我发现她果然不好，黑黑的眼圈清楚地显露出她遭受的痛苦。于是我忘记了我们一直不讲话，便问她哪里不好。她的肋部有个地方作疼，疼得很厉害，她怕极了。

我对她说，我去叫女大夫。她说，好的，立刻叫她来吧。她想微笑，但是眼窝很深。我犹豫不决，不知留在她身边，还是去打电话。随后我想，我要是不去，她会疼得更厉害，于是我下楼去给女大夫打电话。

接电话的人说大夫不在家。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说瞎话，我对他说，不对，我看见她进家门了。这时那人说，请

等一等。五分钟后他回到电话机前，编假话说，我很幸运，大夫刚巧回来。我对他说，喂，这太好了。我叫他记下了地址和急诊。

我回来后，格洛丽亚觉得恶心，肋部疼得更厉害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给她放了一个热水袋，后来又放了一个冰袋。这样做，也没有使她平静，我给她吃了一片阿司匹林。六点钟大夫还没有来，我非常着急，好像这样可以鼓励什么人似的。我给她讲了三四个笑话，想让她高兴高兴，但是当见她裂嘴微笑时，我却很恼火，因为我明白，她不愿意让我泄气。我只喝了一杯牛奶，什么也没有吃，因为我觉得肚子里像有一个球。六点半钟，女大夫终于来了。她像一头高大的乳牛，对我们的房间来说，她过于高大了。她鼓舞人地轻轻笑了两三声，然后动手按她的肚子。她用手指往下按，接着猛地松开。格洛丽亚咬着嘴唇，说：对，就是那儿疼，这里稍微更疼一些，那里还要痛一些。总的情况是疼得越来越厉害了。

那头乳牛仍然用手指按她的肚子，突然松开。当她直起腰来时，她的眼睛也现出恐惧的神情，她用酒精消了一下毒。在走廊里她对我说，她患的是腹膜炎，必须马上动手术。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家医院，她对我保证说，她一定去和外科医生谈谈。

我和她一起下了楼，我给出租汽车站和她母亲打了电话。我爬楼梯上了楼，因为电梯在六层楼开着。格洛丽亚缩成了一团，她的眼睛虽然很干，但我知道她在哭泣。我让她披上我的外套，系上我的围巾。这使我想起一个星期天，她穿上长裤和运动外套，我讥笑她那突出的屁股，她那有点男

性化的臀部。

但是现在她穿着我的衣服，不过是那个下午的戏弄性模仿，她必须立刻动身，不能多想了。当我们离开时，她母亲来了，她说，小可怜儿，上帝保佑你。这时她似乎明白，她必须坚强一些，忍受病痛的折磨。在出租汽车上，她开玩笑说，商店老板不得不批准她休假，还说到星期一我可没有袜子穿了。由于母亲实际上是一眼泉水，所以她对她说，人们是不是认为这是广播小说中的一章。我知道她的腹部痛得越来越厉害了。她知道我知道这一点，便紧紧地偎依着我。

到了疗养院下车时，她忍不住地呻吟起来。我们让她坐在一间诊室里，不一会儿外科医生就来了。他身材高大，目光快活，亲切。身上的大褂敞着，显得很脏。他叫我们出去，关上了门。母亲坐在一张矮凳上，哭得越来越厉害。我把目光转向大街：现在没有下雨。连吸烟的乐趣也没有了。在中学时代，在三十八个同学中，我是唯一没有吸过烟的人。我是上中学的时候认识格洛丽亚的，那时她留着黑辫子，宇宙结构学老是通不过。我有两种方式和她来往。或教她宇宙结构学，或两个人一块学。后一种方式最恰当。当然，两个人都没通过。

这时，医生出来了。他问我是她的哥哥还是丈夫。我说是她丈夫，他像患哮喘病的人那样咳了一阵儿。“她患的不是腹膜炎，”他说，“那个女大夫是头蠢驴。”

“啊！”

“她患的是别的病。明天我们会更清楚一些。”

明天。就是说……

“如果她熬过这一夜，明天我们会更清楚。如果给她开

刀，她就完了。她的病很重，但是如果她能熬过今天，她就有救了。”

我感谢他——不知感谢他什么。

他又说：“规章不允许你在这儿。不过，今天夜里你可以陪着她。”

先是一位女护士把我的外套和围巾拿走，随后格洛丽亚闭着眼、昏迷地躺在担架上被抬走。

八点钟我可以进格洛丽亚住的单人病房了。除了病床外，还有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骑在那把椅子上，双臂放在椅背上。我觉得眼皮跳动、作痛，仿佛眼睛睁着太大了。我不能不看她。被单仍然盖着她那苍白的脸，额头闪着光，呈蜡色。尽管这样，尽管她闭着眼，看到她呼吸还是令人愉快的。我不由得想到，她不跟我讲话，仅仅是因为我喜欢玛格丽特·萨拉文；我不跟她讲话，则是因为她的男友对她亲热。但是实际上，我知道真情，我觉得自己像飘在空中，仿佛这种强制的失眠是一种令人惋惜的梦幻，这种梦幻要求我保持这种暂时的、随时都会结束的紧张情绪。

每过一段时间远方就有一只钟作响。才过了一个钟头。有一次我站起来，到走廊里走了几步。有一个人向我走来，他嘴里叼着烟，脸上闪着光，做着怪相，问我：

“这么说，你也在等候吗？”

我对他说，是的，我也在等候。

“你是第一个。”他又说，“看来，这很耗费精力。”

这时，我觉得浑身无力，便再次走进病房骑在椅子上。我开始数铺地花砖，玩迷信游戏，自己欺骗自己。我用眼力估算一溜花砖的数量，然后对自己说，如果是奇数，她就能

得救。果然是奇数。如果我数到十之前钟表打点的话，她也能得救。结果，我数到五六时，钟表就打了点。突然我想起：“如果她能熬过今天……”我感到恐慌。必须确信未来，不顾一切地相信它。必须创造一种未来，把她从即将降临的死神手里夺过来。我开始想，在一年一度的假期里，我们要去弗洛雷斯塔，下个星期天——因为必须创造一个很近的未来——我们要和我哥哥嫂嫂一起进晚餐，我们要和他们一起打消我岳母的恐惧情绪，我要宣布同玛格丽特·萨拉文正式断绝关系，我要和格洛丽亚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孩子。每次我都将在走廊里焦急地等待着。

这时进来一个女护士，她要我出去，她要给格洛丽亚打一针。后来我回到病房，继续设想那种容易的、透明的未来。但是她摇了摇头只喃喃地说了句什么。这时，全部的现在就是她为活下来而斗争，只有她和我及死亡的威胁，只有我在注意她的鼻翼幸福地一起一落，只有这间小病房和打点的钟。

这时我掏出笔记本，开始写这件事，以便我们再次在家中的时候读给她听，以便我们再次在家中的时候读给我自己听。再次在家中的时候。钟声多悦耳啊！但是仿佛在远方，那么遥远，就像一个人十一岁时遇到的第一个女人，就像一个人二十岁时患的风湿病，就像仅仅发生在昨天的死亡。我突然心不在焉，想到今天的比赛，想到比赛会不会因下雨而中断，想到初次在球场上露面的英国裁判，想到今天早晨我所登的帐簿。但是当她——前额闪着光，呈蜡色，干燥的嘴由于发烧而嚼动着——重新进入我的眼帘时，我深深地感到这个原该属于我的星期六并不属于我。

十一点半了，我想起了上帝，想起了我过去曾怀有的“上帝也许存在”的希望。出于一丝不苟的诚实，我不愿意祈祷。人们对真正信仰的东西祈祷。我不能真正信仰上帝。我只希望他存在。后来我意识到，我祈祷不仅仅是为了知道我的诚实能不能感动他。于是我祈祷了。那是一种令人不知所措的、充满疑虑的、粗暴的祈祷，一种不让人怀疑我不愿意也不能奉承他的祈祷，一种坚决的祈祷。我听着我自己内心的喃喃自语，但是只听到格洛丽亚的困难的、吃力的呼吸声。又过了一段时间，响了十二点的钟声。如果她能熬过今天。今天已经过了。彻底过去了，她仍然在呼吸。我们仍在呼吸，我睡着了。没有梦见什么。

有人摇了摇我的胳膊，四点十分了。她不在病房里。这时大夫进来了，他问女护士是不是把事情告诉我了。我大声说，是的，她告诉我了——尽管不是事实——我说他是一头驴，一个比那个女医生更蠢的蠢人，因为他说过，如果她能熬过今天，可是……我对他叫喊，我想我甚至会用唾沫啐他，疯狂地啐他，他慈善地、既憎恨又宽厚地望着我，我知道他是对的，我是错的，因为我睡着了，因为我没有最后看她一眼，没有我为她设想的未来，没有我的伤害性的、惩罚性的祈祷，就失去了她。

于是我恳求他们告诉我哪里能看到她。我不肯放弃这种徒劳的好奇心：看见她死去，带走我所有的孩子，我所有的休息日和我对上帝的全部冷漠的感情。

朱景冬 译

午餐和疑问

一个男人停在玻璃橱窗前，但是他注意的不是窗内令人愉快的模特，而是映在玻璃窗上的他自己的面容。他整理了一下领带，把领带夹夹好。他突然看见一个女人站在他身旁。

“你好，玛蒂尔德。”他说，随即转过身来。

“想不到男人们会这么自负。”

他笑了笑，露出了牙齿。

“不过，这个时间你该工作呀。”

“该工作。不过，我是出来办事的。”

他用辨认的目光，面对面地盯了她片刻。

“再说，”他说，“我几乎敢肯定，你一定会来这儿。”

“你是偶然碰到我的。我不会再走这条路。这个时间，我经常顺孔本西翁大街下行。”

二人离开玻璃窗，并肩走去。走到街角后，等着绿灯亮。然后过了马路。

“你有点空儿吗？”

“有。”

“我请你吃午饭好吗？这次你也会拒绝吗？”

“那你请吧。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合适。”

他没有回答。他们走进科洛尼亚街，停在一家餐厅前。她从没有那么认真地察看着菜单。

“这儿的饭菜不错。”

他们进去了。深处有一张空桌子。他帮助她脱下大衣。

侍者打量了他们一番后向他们走来。

他们要了烤火腿，两盘儿烤肉和炸土豆。

“你说你不知道是不是合适，是什么意思？”

“是开玩笑。我是说结婚，天晓得……”

“啊。”

她把奶油抹在半个马赛小面包上。

她的右手上有一块墨迹。

“我们一直没有坦率地谈过话。”她说。

“没有。太困难了。可是同一件事我们谈过许多次了。”

“你不认为我们该谈点别的事吗？也可以谈同一件事，不过，我们要开诚布公，不说假话。”

一个女人向餐厅深处走去，跟他打了招呼。他咬着嘴唇。

“她是你妻子的朋友吗？”她问。

“是的。”

“你真希望她们骂你一顿。”

他挑了一块饼干，握着双手把它掰开。

“我想见见她。”她说。

“谁？刚才过去的那个？”

“不，是你女人。”

他微微一笑。他面部的肌肉第一次松弛下来。

“阿曼达很好。当然不如你漂亮。”

“别捡好听的说，我知道我长得怎样。”

“我也知道她长得怎样。”

侍者端来了火腿。他疑惑地看了看他们，又理了理餐巾。

“谢谢。”他说。

侍者走了。

“结婚后感觉如何？”她问。他勉强咳了一声，没有说什么。这时，她看了看双手。

“我本该洗洗的。你瞧，太脏了……”

他的手在桌布上移动，最后停在那块脏斑上。

“脏斑不见了。”

她注视着那盘菜。这时他把手撤回来。

“我一直认为和你在一起会很自在。”女人说。“我可以随便说什么，不会给你虚假的印象，就像某种修过的照片。”

“对别人你得给他们虚假的印象吗？”

“我想是的。”

“好的，这是我的长处，对吗？”

“我想是的。”

他举着叉子。然后咬了一口火腿。

“我喜欢不加修饰的照片。”

“为了什么？”

“你说‘为了什么’时好像只是用同样无辜的语调说‘为什么？’”。

她没有吭声。

“好吧，为了看到你。”他又说。“那样一修饰，就不是你了。”

“这很重要吗？”

“可能很重要。”

侍者来收盘子，动作不慌不忙。他要矿泉水。“加柠檬吗？”“好的，加柠檬。”

“你喜欢她，对吗？”她问。

“你指阿曼达？”

“是的。”

“当然喜欢。9年了。”

“别这么俗气。岁月有什么关系？”

“唉，好像你也相信岁月会把爱情变成习惯。”

“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不过这并不像你想的那样是一件坏事。”

她倒了杯矿泉水。然后，给他倒了一杯。

“对我想的事你知道什么？你们这些男人总是自认是心理学家，总在发现情结。”

他吃着奶油面包微微一笑。

“这不是一件坏事。”他说。“因为习惯也有它的力量。对一个男人来说，女人给他熨他喜欢的衬衫，或不给他的米饭放多了盐，或在半夜他需要她的时候她态度不粗暴，这都很重要。”

她用餐巾擦了擦并没有沾东西的口唇。

“但是你都喜欢在中午粗暴。”

他只是笑了笑。侍者送来烤肉，建议他们切一下肉，看

看肉是不是没烤透。他又评论了一番炸土豆，然后带着 15 年前曾是笑容的表情走开了。

“算了，别生气了。”他说。“我是想对你解释，习惯有本身的价值，但是它也会促进人的觉醒。”

“够了吗？”

“你听我说。如果一个人不是白痴，他就会明白，夫妻间的习惯会渐渐削弱彼此的好感。”

“啊！”

“他会明白一个人会无所顾忌地对待事情，新鲜感会消失，总之，爱情会愈来愈表现在日期、表情和时间表上。”

“这不好吗？”

“说实话，我不知道。”

“怎么？你那著名的觉醒呢？”

“啊，对。我正要谈到这一点。问题是你老盯着我，让我走神了。”

“好吧，我保证盯着这些炸土豆。”

“我的意思是说，实际上一个人听说过那种机械行为，那种自动化。一个人知道，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一个重新变得新鲜的女人，以某种不忠的方式说，她比一个人的妻子强。”

她不再吃饭，把餐具仔细地放在盘子上。

“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他说。“妻子是一种熟悉的，完完全全熟悉的东西。没有什么奇妙可言。你明白吗？另一种女人……”

“比如我。”

“另一种女人虽然以后难免会因循守旧，但现在她拥有

新鲜的优势。一个人会重新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一天的某个时刻，等待将打开的某一扇门，将到来的某一辆公共汽车，将在巴赫中心进的某顿午餐，一个人会重新觉得年轻了。这一切有时是必不可少的。”

“那觉醒呢？”

“觉醒说不定哪一天会出现，或在你打开街门的时候，或在你刮脸和心不在焉地照镜子的时候。不知道你是不是明白我的话。最初你会考虑幸福是怎么一回事，但是随后你会同意纠正这种想法。只有当你做过一切可能的纠正后，才会明白你在设置陷阱。”

“要饭后点心吗？”神秘地出现在女人头上的侍者问。

“要两个西班牙乳蛋糕。”她说。

他没有表示反对。他等着侍者走开，好继续说话。

“对这样的人来说，玩单人牌和欺骗自己没有区别。”

“这种比较，去年夏天你就在佛洛雷斯塔对我做过了。只是那一次你是指别的事情。”

她打开手提包，取出小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

“你愿意我谈谈你这番话使我产生的印象吗？”

“好的。”

“我觉得你这番话有点可笑。明白吗？”

“是可笑。这我相信。”

“哎，要是你讲给自己听，也许不可笑。不过你别忘记，你是讲给我听的。”

侍者把西班牙乳蛋糕放在桌上。

他打了个手势要侍者算帐。

“喂，玛蒂尔德，”他说。“我们别绕圈子了。你知道，

我很喜欢你。”

“这是什么？是表白吗？是休战吗？”

“从一开始你就知道。”

“好吗。不过，我知道什么？”

“你知道你有条件得到一切。”

“啊，对……一切指谁？你吗？”

他耸了耸双肩，动了动嘴唇，但没有说什么，然后，不是呼吸而是吁了一口气，用左手挥了挥钞票。

侍者拿着帐单走来，把找回的钱放在小碟里，一个动作也不失误，一个目光也不失慎。他收起小费，说了声“谢谢”，便转身走了。

“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做。”他说。“不过，倘若你现在对我说‘你来吧’，我知道我会跟你去的。你不会这么做，因为理所当然，你不愿意把我觉醒的重担加在自己身上。此外还因为，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就不是我心目中的你了。”

她移动着带墨迹的手，把它放在他的手上。眼睛注视着 他，仿佛要把他看穿似的。

“你别担心。”沉默了一会儿后她说，同时把手撤了回去。“看来，你全都知道。”

她站起身，他帮助她穿上大衣。他们离开时，侍者礼貌地点了一下头。他陪她走到街角。他们沉默着呆了一会儿。但是她在上公共汽车前闭着嘴微微一笑说：“谢谢你请我吃饭。”说完，爬上汽车走了。

主人的狂怒

尽管他的腿只是微微地晃动，卧在桌子底下的菲多仍然十分珍重对它的嘴巴周围的那种抚爱。这使它觉得几乎像直接在男主人的手上吃碎烤肉那么快活。早在两年前，菲多就违背自己的爱好和体格（又粗又结实的腿，健壮的后颈和细长的耳朵），变成了一条生活在套间里的狗，这种条件似乎更适合那些体质柔软、喜欢歇斯底里大叫、爱撒尿、使二层楼名声扫地的小狗。

菲多不属于某种确切的品种，但是它是一只安分守己、神志清醒的狗，一般来说它可以把大小便的时间推迟到中午，那时它会被带出套间，到路边的树林里去遛弯儿。此外，它还知道如何坚持两腿站立，直到听到休息的命令，知道每天早晨用嘴把报纸叼回来，知道门铃一响它就发出男中音般的叫声，还知道在主人下班回家后为他当鞋擦。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它都卧在餐室的某个角落里或卫生间的花砖地上度过，或者睡觉，或者仅仅注视着浴缸上的绿色镇静剂。

一般地说，它不惹人讨厌。诚然，它对女主人并不怀有特殊的感情，但是由于她负责给它喂食和换水，所以菲多每天都要装模作样地舔舔她的手，免得断绝了如此重要的服侍。它偏爱的自然是男主人；当男主人吃过午饭抚摸女主人的后颈、腹部或胸部时，它便躲在餐室最阴暗的角落里妒忌而怀疑地颤抖。

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无疑是：两次进食，在路边利尿的散步，特别是晚饭后男女主人心不在焉地交谈、他感觉到法兰绒长裤在它的嘴边的亲切的磨擦时的这种休息。

但是这个晚上菲多的不安的样子显得很怪。它甩打尾巴不同于往日的饭后，不是为了表示亲热和感谢，不是老狗惯常的动作。这个晚上，刚刚过去的事情压着它。一系列形象、新发生的事件聚集在它那一双要哭的、饱经风霜的小眼睛里。首先就是那另一个男人。是的，一天下午它独自留在家里，卧在浴缸对面睡午觉，这时女主人由另一个男人陪着回家来。菲多大胆地叫了几声，它的表现像一位预言家。那个男人假装亲热地唤了它几声，但是它既不喜欢他那条黑色的破裤子，也不喜欢他身上那股令人讨厌的气味。有两三次它忍耐着走过去嗅他，但最终还是回到餐室它那个角落里去。那个地方，水果的香味比不速之客的气味强烈得多。

那一次，女主人只跟那另一个男人进行了交谈，当然她从来没有那么开心地笑过。但是又有一天，她单独和菲多在家，那个人来了，他们竟然拉着手，最后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从那以后，那一张留着黑胡子、长着突眼睛的圆面孔来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他们从来不进卧室，但是他们在沙发上做的事情却使菲多强烈地怀念它干过荒唐事情的某个小庄园的那些小母狗。

一天下午——天晓得为什么——，他们又注意到它在场。

菲多一开始就明白，它不应该靠近他们，第一天那种预言般的吠叫不能再重复。为了它自己好，为了那种重要的服侍能够继续，也为了它渴望的路边的散步。它不舔任何人的手，但也不惹人讨厌。然而，他们还是注意到了它的在场。其实是女主人，这是自然的，因为它跟那个男人毫无共同之处。也许是她特别意识到狗的存在，狗的在场，狗是一个目击者，唯一的目击者。菲多一点儿也没有责备她，更确切地说，它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责备她，但是它躲在卫生间或餐室里望着。

在那种湿润的、眼屎多的目光注视下，女主人终于感到紧张不安了，并立刻被一股难以忍受的强烈仇恨所控制。

很自然，菲多对此毫无所知。但是有一种东西它却很明白，这就是她对它的憎恨，由于被迫接受它而产生的奇异怒火。

如今，它每天都受到亲热的对待，嘴边感觉到它所喜欢的磨擦，闻到了它所喜欢的气味，觉得受到了保护，是安全的。但是以后呢？它面临的问题是一件往事，最近的往事。一天、两天或三天前——狗不懂得为过去的时间加标签——，那个家伙不得不匆匆离去（为什么？），把香烟盒忘在了起居室的小桌上。那是一件镀金的、很漂亮的、坚硬的东西。

女主人也匆匆地（为什么？）把它藏在食品室的一道帘子下。菲多一独自在家，就走到那里去嗅。那件东西有那个男人的难闻的气味，但是它很硬，是金属的，闪闪发光，是一件便于嘴舔、推动和在地板上弄出声音的玩意儿。

男主人的腿不再颤动了。菲多明白，今天欢乐已经结束。它懒洋洋地伸了伸腿，站起来。它仍旧舔了舔长裤和破袜子之间露出的那部分脚踝。然后，它既不哼也不叫，迈着缓慢的患风湿病的步子回它那个平静的角落去了。

但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女主人走进卧室，又随即返回来。她和男主人讲话，开始比较冷静，后来大声叫喊。女主人突然住口，从衣架上取下外衣，三下两下穿上，哐啷一声把门一关，冲出家门（男主人没有做拦她的任何表示），把狗吓得汪汪直叫。

男主人留在家里，心神不安，陷入沉思。菲多心想，时候到了。决不是报复；其实，它并不知道什么叫报复。但是本能告诉它，时候到了。

男主人正凝神思索，没有立刻发觉狗在扯他的裤子。菲多不得不连叫三声。它的意思很清楚。男主人迟疑了一下，不情愿地跟它走去。没有多远，只走到食品室。狗把帘子扒开时，男主人只是适当地往后一退，弯腰捡起了香烟盒。

实际上，菲多并没有什么希求。对它来说，它的发现并没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所以当男主人猛烈地拳击墙壁，像二层楼的小狗那样又叫又哭的时候，它也不得不后退几步，因为它被它惹起的乱子吓坏了。它一声不响地贴着门框站着，望着男主人如何咬牙切齿地叫喊和呻吟。于是它决定走过去亲热地舔他，似乎这是它应该做的。

男主人抬起头，看到那条摇动的尾巴，那只走过来对他表示同情的狗，那个目击者。菲多还在伸着湿润的深色舌头愉快地喘气。随后，一切都结束了。它已衰老，它忠实，它值得信赖。当男主人一脚把它的嘴踢烂的时候，这三个可怜的理由竟使它一点儿也不觉得惊奇。

他们如此友好

“天气太热了。”侍者说。

看来，穿蓝衣服为顾客要松一松领带。但是最后他把手臂放回了肋边。然后，他用警惕的眼睛透过高大的窗玻璃察看着街道。

“不合情理。”侍者说。“才十月就像火烤一样了。”

“哎，没有这么热。”穿蓝衣服的人说，没有加重语气。

“没有？那一月份又怎样呢？”

“会更热^①。你不要抱怨了。”

街上，有一个戴帽子的瘦男人为了遮挡窗玻璃的反光把双手放在眼上，往里头瞧。一认出他，就推开门，微笑着走过来。

直到来人站在他面前，穿蓝衣服的人才看到他，才把手

^① 乌拉圭在南半球，一月是夏天。

伸给他。来人迅速地扫了一眼闲着的四把椅子，看哪一把椅子凹陷的程度适合他的屁股坐。然后他坐下了，但肌肉并没有放松。

“过得好吗？”他问，脸上仍然挂着笑容。

“还是那样。”穿蓝衣服的人说。

侍者气喘吁吁地走过来接待。

“来杯咖啡……清淡点。”

二人望着窗外，半天没有说话。这时，一个穿紧身女衫的女人走过。来人在椅子上显得不安。然后他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好像寻找一句评语。但是穿蓝衣服的人没有微笑。

“对有钱人来说，真是美好的一天。”

“为什么？”

“你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傍晚凉风吹来的时候，你重新开始生活。”

“那得看情况。”穿蓝衣服的人说。

“什么？”

“这样也可以生活。”

侍者走来，把咖啡放在桌上，迈着大步走了，免得让别人看出汗水把他的内裤变硬了。

“我的女老板病了，你知道吗？”

“啊，是吗？什么病？”

“不知道。只是发烧，肾疼。”

“让她去看看。”

“当然。”

穿蓝衣服的人对擦皮鞋的打了个手势。他把嘴里的半根牙签吐掉，吹着口哨走过来。

“这几天你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另一个说。

“是吗？”

“我知道事情跟我有关系。”

擦皮鞋的停止擦油。他闭着嘴，眯缝着眼，抬起头来看了看。

“问题是你立刻做出了反应。”

“真的吗？”

“你认为一个家伙不好，没有人阻止你，你知道我为什么做那种事？”

“你为什么做什么事？”

“看见吗？这样下去不行。如果我们坦率地谈谈，你看如何？”

“好的。你说吧。”

两个人望着开始发亮的左脚上的皮鞋。擦皮鞋的打了最后一下，把布条仔细叠了起来。“二十五比索”，他说。他接过钱，把找头交给顾客，吹着口哨向另一张桌走去，一面又嚼起留在牙槽间的那半根牙签。

“你以为我没有发觉吗？你觉得我跟老头谈话是为了伤害你。”

“那么？”

“不是为了这个，知道吗？我没有那么愚蠢……”

“不是？”

“我跟他谈话是为了为我自己辩护。人们都说，九点前我进了经理办公室。都说我看到了那份该死的文件。”

“是这样。”

“但是我知道，你比我进去得早。”

一个衣衫褴褛、臭味扑鼻的男孩走来，向他兜售薄荷糖。他们连对他说“不要”都没有。

“老头给我打电话，说事情很严重，说有人鹦鹉学舌，说人们都说九点前我见过那个文件。”

穿蓝衣服的人没有说什么。仔细地往上拉了拉裤子，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

“我没有对他说是你。”另一个人接着说，情绪很激动，仿佛就要起跑或就要哭似的。“我对他说，有人在我之前进了办公室，如此而已……你应该明白……”

“我明白。”

“我必须为自己辩护。如果我不为自己辩护，他就会辞掉我。你很清楚，他不玩弄女孩。”

“他做得对。”

“当然，你这样说，因为你是单身汉。你可以冒险。我有女人。”

“你很恼火。”

另一个人用巧克力杯敲了敲桌子，仿佛为了驱散烦恼。他看了看身体两侧，突然面色苍白。然后，他喘着粗气，不知所措地抬起头。

“你应该明白。你想想看，我非常清楚，如果你愿意，就可以把我除掉。你知道该怎么做。我恰恰要和你作对吗？你只要给乌加特拍个电报，我就会被炒掉。我这样对你说，是为了让你知道，我是明白的。我决不会跟你作对，你有伦戈做靠山……现在你明白了吗？”

“当然明白。”

另一个人猛地做了个胆怯的不满表情，无意中用臂肘推

翻了杯子，杯子里的水洒出来向前流去，浇湿了对方的蓝裤子。

“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没什么。一会儿就干了。”

服务员走来，捡起了大块的碎玻璃。现在他似乎觉得不那么热了。或者，他忘记了装热的样子。

“你不拍电报，这至少能让我感到安心。昨天夜里我都没能合眼……”

“喂……你是想叫我告诉你什么事吗？把这个话题放下吧。我觉得心里烦透了。”

“这样的话……你就别……”

“你不必担心。”

“我知道，你会明白。我感谢你。真的，哎。”

“你不必担心。”

“我一直说，你是个好人。不管怎样，你有权利打电报。因为我不好……我承认……我应该想到……”

“你真的不能保持沉默吗？”

“你说得对。最好我让你感到安心。”

他用很响的声音推了一下椅子，慢慢地站起来。他想把手伸给对方，但是对方的目光使他泄了气。

“好吧，再见。”他说。“你知道，我永远听你吩咐……无论什么事……”

穿蓝衣服的人几乎没有回头，似乎不想有什么具体的表示。当那另一个人走出店门后，他叫来服务员，付了咖啡钱，赔了打碎的杯子。

他慢慢地咬着手指甲，平静地坐了五分钟。然后他站起

来，用眉毛对擦鞋匠打了个招呼，开了门。

他不慌不忙地走着，一直走到街角。他看了看摆着领带的橱窗，吸了最后一口烟，把烟蒂扔在一辆汽车下。

然后他穿过马路，进了电报局。

朱景冬 译

艾莉莎的照片

她骑过塔赫斯总统的马；她曾和一个车夫及四个黑女佣住在一幢拥有十五个房间的宅子里；十二岁时她去过法国，至今保存着一位阿根廷上校于 1874 年 2 月送给她父亲的一本人皮封面书。

如今她却一文不名，靠女婿们的不义施舍生活，用着一块满是窟窿的黑毛三角巾，她那 32 比索的养老金由于付两笔可以偿还的借贷的利息而减少。但是过去仍存在，往事连着往事，那时生活是奢侈的，她对现在的困苦深恶痛绝。自从第二次守寡后，艾莉莎·蒙特斯就以她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憎恨那缓慢的、连续不断的现在。20 岁时，她和一位意大利工程师结婚，丈夫跟她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很年轻就去世了，既没有确认她的封号也没有给她留下养老金。她从没有深切爱过那第一个丈夫，现在他一动不动地呆在那些发黄的照片上：留着拿破仑三世式的好斗的髭，有一双爱激动的小眼睛，风度翩翩，却思考着弄得他喘不过气的

金钱问题。

在那些岁月，她絮絮不休地谈论她早年的那个车夫、她那四个黑女佣和她那十五个房间，目的是让她丈夫感到厌倦，让他觉得他在那个只有小花园而没有客厅的家中微不足道。意大利人寡言少语，常常工作到天亮，以便让全家人有吃有穿。他终于支持不住了，结果患黄热病死去。

在那个悲惨的时刻，艾莉莎不能求助她的亲戚，因为她跟她的三个哥哥和三个嫂子断绝了来往；跟后者，因为她们是裁缝和小职员，无足轻重；跟前者，因为他们给她起了名字。至于家庭财产，过世的父亲早就在赌场上和倒霉的投资中折腾光了。

艾莉莎·蒙特斯只好先求助老朋友，后又求助国家，好像两者有义务保护她似的。但是她发现所有的人（包括国家）都有自己的难处。在这方面，她得到的仅仅是一些零钱和接受它们的耻辱。

所以当堂古梅辛多（一字不识的庄园主，也是个丧偶的单身，但是比她大二十多岁）出现的时候，她就已无可奈何地为人做窄花边，摆到名气显赫的商店里出售。这事多亏一位红脸将军的夫人的介绍（那是在最后一次军事暴动后的牌桌上）。在那久远的、让人难以沉睡的秋天，艾莉莎曾和她一起打羽毛球、抖空竹。

做窄花边是下坡的开始，但是听从堂古梅辛多的下流暗示和令人讨厌的大笑却意味着彻底完蛋。艾莉莎对她的不多的女友的遭遇的看法也许就是如此，但是关于她自己的情况，她就不得不寻求安慰，并牢牢地抓住它。这安慰（成了她生活中的主要话题之一）就是孩子们。为了孩子，她开始

为人做窄花边；也是为了孩子，她任凭庄园主支配。

在短暂的恋爱中，堂古梅辛多·奥尔梅多用对他的乳牛的亲热态度讨好她；在那个夜晚，他使用他那种有力的言语向她列数他的财产清单，她终于做出了决定，接受了圆圆的戒指。但是她的儿子们已经长大：胡安·卡洛斯 18 岁了，学习了三年英语，两年意大利语，但是在星期日的市场上卖花卉；阿尼瓦尔·多明戈 16 岁，为一条邮船搬运图书。女儿们温顺，讲求实际，长得很像，到农村陪伴她们的母亲和继父去了。

就是这时，发生了第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堂古梅辛多耍小聪明，他讲了他的乳牛、牧场，甚至银行的往来帐，但是却绝对不讲他第一次结婚后生的三个身强力壮的儿子。从第一天起，他的三个儿子就恨不能把那两姐妹生吞下去。她们虽然身体发胖，讨人喜欢，但是还没有度过青春期。为了阻止他们那种急不可耐的好色举动，艾莉莎不得不两次出面干预。

把家搬到庄园后，堂古梅辛多变了，再不是在蒙得维的亚追求艾莉莎的那个不会伤害人的粗鲁汉了。姑娘们和母亲很快就明白了：当看见他又着双腿、靴子尖往外撇着从石铺院子里走过来时，那可不是开玩笑。在他的领地里，他是善于发号施令的。为了孩子才结婚的艾莉莎无可奈何，只能让女儿们和她一起挨饿，因为堂古梅辛多一个铜钱也不撒手并亲自去买轻易不买的东西。他着魔似的利用闲暇的时间，尽管对一个陌生人来说他那么吝啬可能很可笑，但是当继父让女儿们连续几个小时拔钉子时他们却不那么看。

于是，艾莉莎开始了她偏爱的唠叨。在性爱和支蚊帐的

夜晚，她毫无顾忌地对堂古梅辛多提起她的第一个丈夫的长处。老家伙听了只是冒汗。似乎一切都表明，他必须相当坚强才能受得了她的诅咒。但是在他们结婚六周年过去后的第五天，他的胃突然疼痛起来，他先是躺在床上，八个月后便躺在家族的墓地里。

在那八个月里，艾莉莎照料他，把他拉到蒙得维的亚，她恨不得他一下子死去。但是就在这时候堂古梅辛多让她落入了他最漂亮的陷阱。为他看病的三个大人接到通知，知道他的病可以使用放射疗法。放射疗法花费昂贵，经过八个月的放射治疗和疗养，还没死就把他的财产折腾光了。交了医药费，还了债，办了葬礼，处理了同前妻的子女的一些争端，留给艾莉莎的只有大约四百比索，对丧失家庭的奢侈尊严来说，这个代价是微乎其微的。

艾莉莎留在了蒙得维的亚，打算重新做窄花边。但是介绍她在大商店卖花边的那位夫人的丈夫现在憔悴不堪，在体面的流亡中在阿莱格雷港处理办公用品。她不能再下降了。

做窄花边毕竟比平民高一等，艾莉莎具有强烈的等级观念。所以，她要女儿们工作。何塞法和克拉里塔成了制军裤的女工。艾莉莎想，干这活儿起码离军队近些。她自己却开始固执地憎恶部长、办公厅主任、局长、公共设施管理人，甚至名人们的理发师。

在某个机构的接待室难以忍受地干了两年后，她得到了一笔难以置信的养老金，内中原因谁也不清楚。同一年，她顺利地把女儿们嫁了出去，从此便侍候她的女婿们。

何塞法的丈夫是个满不在乎、嘴馋的家伙，他从父亲名下继承了市区的一家五金店，没有做丝毫的改革，也不曾增

加一个项目，只是顺着惯常的规道经营生意。另一个女婿，即克拉里塔的丈夫，是一名血气方刚的炮兵上尉，他用《面向前方，前进！》的乐曲向人问好；在闲暇时刻，他撰写一部大战史的第二卷。

艾莉莎和未婚的儿子们住在一起，但是周末却和已婚的女儿们一起过。她的影响不限于星期六和星期日。上尉和克拉里塔爆发的一切争吵几乎都是由于艾莉莎在最近的礼拜天的冷餐食品和饺子之间说的一句无辜的话引起的；而何塞法开朗的、宽容的五金店主必须忍受的一切玩笑则是由于他的岳母在女婿去舒服地睡星期六的午觉时对女儿的软耳朵的窃窃私语。

对中尉，艾莉莎指责他的严肃呆板、他的政治思想、他的吃相、他对历史的着迷、他旅行的渴望、他的冷漠态度和他的矮小身材。相反的，她指责五金店主的软心肠、他的温顺、他那经得起任何考验的身体、他在政治上的平庸、他对海贝的嗜好、他那种宏亮的笑声和他戴的过多的戒指。

全家人坐在餐桌上的机会很少，但是六个月间只要有一次机会艾莉莎就足以让她的女婿们卷入关于马恩战役的争论，经过争论，他们便永远成为敌人。中尉（请原谅，现在是上尉了）也跟他的两个连襟不讲话，因为艾莉莎曾不厌其烦地对她这位女婿说胡安·卡洛斯和阿尼瓦尔·多明戈多么好逸恶劳，但是又对胡安·卡洛斯和阿尼瓦尔·多明戈说，上尉认为他们是一对懒汉。

另一方面，岁月为她带来了外孙，外孙为她带来了烦恼。五金店主的两个男孩，一个七岁，一个八岁，他们想把上尉的小女孩的手指插进电插座，但被艾莉莎瞧见，她阻止

了他们并打了小女孩。后来她说服克拉里塔相信，是两个男孩不对，并且拿出仅有的力气找来一根棍子打他们，不过不是他们的父亲，而是当兵的叔叔打了他们。结果，这样的惩戒也引起了连襟之间的大声对骂，同时爆发了何塞法和克拉里塔之间的不合时代潮流的妒忌之战；她们的妒忌很难像子女间的，并且奇怪地回顾往事。

每次去看女儿，艾莉莎总像一位忏悔牧师一样明白她们的心情。表现出一种持久的容忍态度，“只要他们在很神圣的事情上不侮辱你”。当然，还有比母亲更神圣的吗？在这种情况下确实该说几句实话，譬如提醒上尉说，他祖父当过教区神甫；提醒五金店主说，他叔叔因诈骗自杀。如果这样做能激怒他们，很好，好极了。一个心神不安的男人（“你可以从我跟你父亲和别人经受的痛苦中学习）总是更容易引导，更容易在冲突中抓住他，更容易让他说出不可挽回的蠢话。不幸的是，有时他们会暴跳如雷，动手打人，不过，不要泄气。挨一耳光总是一种不错的代价：至少意味着长长的半年的让步和后悔。

但是艾莉莎考虑到了性爱。的确，在她的两次婚姻中，她享受的快乐还不如木头。不过，女儿们条件好一些，她们不会浪费她们的良宵的。在不眠之夜，女婿们会由于艾莉莎教给女儿们说的道理而失败，但是在床上，他们会凭着上帝教给他们的道理取胜。这——的确——是一种不同一般的斗争。女儿们害羞地，但是毫不犹豫地恳求她不要再来了，因为她们认为这是拿她们最渴望的快乐当儿戏，她们宁肯不时地去看她。她最宠爱的何塞法从没有露面，但是克拉里塔有时给她写信，或者和她在市中心见面。

艾莉莎单独和阿尼瓦尔·多明戈在一起，他态度粗暴，不喜欢那些未婚妻。胡安·卡洛斯是旅行社老板，十天半月来一次呆几个小时。但是那几个小时总受到歧视和怀疑（“天晓得你跟什么放荡女人鬼混”），他终于留在了内地，每年到蒙得维的亚来两三次。

当痛苦产生的时候，艾莉莎·蒙特斯不想欺骗自己。显然，她患的病就是折磨过堂古梅辛多的那种病。她要求医生对她说实话，医生像过去每一次怀着同情心说心里话一样对她详述了病情。知道情况已不可挽回，她便没有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检查她的良心，了解她自己的想法。在吗啡减轻了她的痛苦后，她仍然怀着残留的快意在她周围的平淡生活中寻求。另一些时候，当可怕的刺痛加重时，她根本没有力量去掩饰，因为那种痛苦剧烈得的确难以忍受。

阿尼瓦尔·多明戈胆怯、呆滞、顺从、毫无热情地陪伴她，受到她的咒骂。只有这样一个虚弱而麻木的人才能忍受那种频死、孤独、被忘记的过程，直到最后。但是当一天早晨发现她死去时，他才感到一丝轻松。死神不可抗拒，毫不留情，仿佛连最后的平静也不肯给她。

他没有登讣告，但是他把姐姐们、胡安·卡洛斯、姐夫们叫了来；他懒得去找年迈的叔叔们。然而，他们都知道。连卡洛斯后来也对我说他没有及时收到电报。只有上尉和五金店主来了。

灵车后面是亲戚们的卑微的、几乎连花儿也没有的车子。三年来，三个男人彼此没有说过话，现在还是不说。上尉盯着街道，好像为某个女人看见可怜的灵葬队伍经过时划十字感到惊讶。

阿尼瓦尔·多明戈着迷地望着司机发红的后脑勺，但是有时也望一望后视镜，镜中总是反射着在同样的远处行驶的殡仪馆派来的、谁也不愿意使用的另一辆汽车。阿尼瓦尔·多明戈心想，都怪那个死人，他没有过未婚妻，还不习惯那种愉快的谈情说爱。

北方墓地的新区洒满欢乐的阳光：到处是为了耕作而翻动的土地。下车时，五金店主打了个趔趄，另外的两个男人抓住他的手臂扶着他。他说：“谢谢”，关系不那么紧张了。

一口光滑的、有四个把手的棺木被放在一侧的草地上。亲戚们走过来，但是司机不得不帮助他们，因为缺一个人。

他们缓缓地前进，仿佛带领一支庞大的送葬队伍。然后，他们离开大路，停在一个平常的深坑前。那个土坑和其他十五六个或十八九个摆在那里的土坑一模一样。“嘭”地响了一声后，棺木在坑底上不动了。司机擤了一下鼻子，把手帕像干净手帕似地叠好，慢慢回到大路上去。

这时，其他人怀着莫名其妙的同情心彼此望了望，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们一把把地扔土。由于往坑里扔土，这种死亡就和其他的死亡没有区别了。

朱景冬 译

佩 克 布

他有时觉得他自己的叫喊声是从别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只有这时他才能把无益的、难忍的疼痛置之度外。尽管他的躯体能伸能缩（他甚至想，它简直像旧货商店的一架手风琴），他却几乎觉得是一件别人的东西。和那些说“不知道”而不讲话的人不同，尤其和少数说“不知道”、但是讲话的人不同，他宁肯开创一个新类别：即说“是的，我知道”、却不讲话的人。现在，显然他的身体离开了机器，机器离开了他，但是他知道，鸡蛋上还缺一脚。这是一种仪式。这一脚来了。他还不能充分地摆脱他那可怜的躯体来感觉作为仪式的那一脚。这时他不觉得他的阳物是别人的东西，而觉得必不可免是他的东西。他只好屈服。“这么说，你是佩克布，对吗？”他笑了笑，那笑声也像打呵欠。原来，人们连这个也知道。佩克布，这个绰号是那个晚上在加利西亚人索莱尔的小酒馆里产生的，当时埃拉迪奥看见他拿着两本书，就问他在读什么。侍者已经把盛烤面片的托盘放在上

面，所以他只把托盘拿开，埃拉迪奥就看到作者了：黑塞和马查多。“这么说，佩克布，嗯？作为绰号，还不坏。”那个人又称赞说，可能还对他那些沉默的朋友们做了个鬼脸。他开始慢慢地伸腰杆，因为他知道现在疼痛又来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反正我累坏了。所以，我们得休息一会儿，然后重新开始。你说呢？”他等待着传来关门声，等那五个人的脚步声走远。这时他才在肮脏套间里伸懒腰。他自己的和别的血味同汗水和风帽里的呕吐物的臭味交织在一起。“小资产阶级的读物”，劳尔断言。他耸了耸肩。是的，但是他喜欢。埃拉迪奥把烟灰弹在杯子里，用小匙在喝乏的小茶叶袋上用力把它碾碎。然后冷淡地微笑了笑。“问题是你，劳尔，你还没有注意到，维森特不但读小资产阶级的读物，而且他本人也是小资产阶级。”“他是个佩克布^①”，劳尔说，众人笑起来。从那个晚上起，酒店的顾客都这么叫他。只有几个姑娘出于女性那种对省略语的癖好，管他叫佩克。别人在读法律预科，但是唯独他兼顾写作。但不像某一位爱好者那样写诗；而且也写短篇小说。他寡言少语，但是乐于听别人讲话。现在疼痛似乎减轻了一毫米，这使他想起听别人讲话是多大的享受。一面听人讲话一面还能对别人的讲话进行思考、描写、预言和诊断。他是那么胆怯，从来也不把写的东西给人看。人们几乎是把他的手稿硬抢过来的。于是有个人（通常是个姑娘）高声进行朗读。然后进行评论。“佩克布，你错了。你对美丽的东西太陶醉了”。他问他们那么说是不是暗射女人。姑娘们热烈鼓掌。“不，那样写很好，那

① 意为“小资产阶级”。

是最美丽的东西，而且必不可少。”伪君子。政客。“我只是指东西，指物品。在你的短篇小说里，当描写一幅场景时，一把椅子或一个柜子，尽管你不是用形容词宣传它们，一个人还是觉得它们是美丽的东西。”“你想干什么？我就是喜欢美丽的东西，你不喜欢？”活见鬼，这才叫痛苦。他还要忍受多久呢？不仅仅是不讲话，而且也不死不活。“问题不是这个：我喜欢不喜欢，这全是主观的东西。但是在世界上还有丑恶的东西，不是吗？”他问他是不是喜欢那些丑恶的东西。“我再说一遍，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那些东西存在，你却不知道。”谁告诉过你他不知道？它们也存在，只是未被注意。人们只注意美丽的东西。“佩克布，你头脑里有几个小湖几乎像海洋那么大。”他承认，这是可能的，但是顺便请他们注意：小湖一般都很平静，海洋却波浪翻滚，非常厉害。最多坚持两次刑讯，右侧仿佛不存在了。但是左侧，妈的，疼得要命。协会创立的时候，他想参加，但是没有机会。“我们喜欢你，老朋友，不过在这个时代，友爱不优先，你知道吗？”埃拉迪奥头一个提醒他说理由不充足。“我说，佩克布，我想直率地告诉你，斗争是残酷的，明白吗？”他不明白，因为这个？“可能我错了，我不是一贯正确。不过，你有许多毛病：你的嗜好，你的习惯，你的读物，直到你写的东西，都有表现。”他干吗写那些美丽的事物呢？“不只是因为这个。譬如你写的短篇小说里从来没有工人。”的确，没有。“这是不对的。倘若你知道工人阶级……”他知道，他知道。“既然如此？”他想让他明白，他的小说里没有工人，仅仅是因为他尊重他们。还有一点：“你知道，我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对吗？”“显而易见”。“我没有到工人中间

去过。好几次我想把石匠写进我的小说，但没有成功。我读了写的片断，听起来虚假。我还没有找到让他们说话的关键，你明白吗？我不把工人写入小说，是为了避免空洞。因为我知道，石匠说话时一点儿也不空洞，做事时更不空洞。”这里有人把罗西的小说当作榜样，罗西已出版两本书。“他也是出身中产阶级，但是他写工人生活。”那人真的喜欢罗西的小说吗？“这是另一个问题。你看什么都带个人色彩：你喜欢他的小说？不喜欢？这个问题也是小资产阶级的。”他是对的：至少他有个人看法，你说服不了他。不过，他喜欢还是不喜欢呢？“别追问了。我不懂文学。”他当然不懂，不过，他喜欢吗？他终于坦白地说：“我有点厌恶它，不是因为我不懂，而是因为他的小说听来有点空洞；因为那些人物不是石匠，而是图解。更确切地说是简单图解。相反的，疼痛不是图解，而是溜不掉的事实。忍受这种该死的疼痛也是小资产阶级态度吗？”这确实应该进行一次自我批评：他说过知道。为了什么呢？总之，连他自己也不完全明白他现在隐瞒的事情，他坚决不肯说的事情很重要还是很多。他说过“知道”仅仅是为了向他自己证明和为了肯定他能忍受到底而不暴露任何人吗？他没有被接受入会。显然是因为他的小说。再说，协会也不同意小资产阶级加入。他照样参加咖啡桌上的聚会。人们对他略有嘲弄，也略有尊敬。尤其尊敬他不爱发火的素养。甚至有一次他俩来得很早，单独坐在桌上。玛蒂塔是小酒馆里最漂亮的女孩之一，她带着内疚的表情问他：他经常读的那些书写的是什么。他对她读了马查多的几句诗：“春天到了/谁也不知它曾如何。”还读了：“我相信我那熄灭的炉火/我翻动过灰烬……/我烧伤了手。”当

玛蒂塔迟疑地问：“马查多跟你一样也是小资产阶级吗？”时，他不得不说明他跟马查多一样是小资产阶级。优势总是属于老师。这时玛蒂塔的面孔通红，垂下那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说：“你别把这事告诉埃拉迪奥和劳尔：我喜欢这些诗，维森特。”她不叫他佩克布，也不叫他佩克，而简单地叫他维森特。他像傻子一样微微一笑，但是实际上他相当激动。这是因为他本人，也因为马查多。不因为别的。劳尔来了，几乎是跑来的。炉灶不是用来烤小面包的。镇压变得残酷了。警察带走了埃拉迪奥：让他站在教室门口。这样，口号就消失了，已经消失了。他再也没看见玛蒂塔。一周后，有人散布说，埃拉迪奥屈服了。但是他不相信，现在也不相信。官方的通告总是暗示所有的人都屈服了。但是一百个人里头只有一个。尽管他像个被判刑的人那样忍受痛苦（难道他不像个被判刑的人吗？他从来不认为格言能变成事实），实际上却觉得平静，因为到这个地步，他仍然相信两件事：他不会是一百个人中那唯一的一个，但是他也会被处死。“你的世界和你一道死去？/还有你那新旧秩序的生活？/你心中的铁砧和熔炉/为尘土和风工作吗？”没有机会，不能背弃马查多。他病倒了，他不能相信。他没有参加。实际上，是他们不让他参加。大约是二十天前，也许是两个月或四天前倒下的。戴着风帽很难估计时间。他没有和任何人讲话，没有和天天让他看到星斗的人讲话。这是变成真理的另一种陈词滥调。当机器开始运转、他闭上眼睛时，总是看见星斗。严格地说，讲话的、提问的和骂人的人，是另一个人。起初他说不知道，后来他只摇头否认。现在只用沉默回答。他知道，这会进一步激怒对方，但是没关系。最初，他不好

意思哭，但是现在不害羞了。竭力克制眼泪是愚蠢的。此外，他既不咒骂，也不诅咒。他知道，这样也会使对方发怒，不过这也没关系。至少已经建造了一个小小的场地，由他制定那里的游戏规则。其中一项规则（没有包括在对方的计划中）是死亡。他相信他一定制定他的游戏规则。他要叫他们不得安生，哪怕自己死去。他已经没有肌肉，没有神经，没有肌腱，没有血脉，没有皮肤了。只有波及全身的巨大疼痛，简直像非常厉害的恶心。他知道，除了对方要求他说的人名、住址和电话，他什么东西都可能吐出来（从肮脏的食物到可怜的肺脏）。他们可以成为刺棍、脚踢、潜水艇（潮湿和干燥）、刑罚、残暴行为的使用者，但是他是否认和沉默的使用者。走廊里的脚步声怎么听得这么清楚？先生们，一天中的第三次刑讯要开始了。是这次刑讯的声音吗？最迟是在明天的刑讯中。最近那两次他失去了知觉，从他缓缓苏醒后听到的情况看，为了使他重新活过来。他们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所以，从根本上说，他知道自己强大的。他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赢得这最后一次斗争的胜利。有时从风帽下像闪光一样他看见了父母的面孔、他经常去那里学习的顶楼、他的街上的树木和咖啡馆的窗口。但是他已没有地方忍受痛苦。只有某种东西为他带来一丝苦楚，这也许是最后的。这就是他确信，孩子们永远不会知道，佩克布（玛蒂塔说的维森特）就要死了，死时没有呼唤他们名字。没有呼唤他们，也没有呼唤马查多。

惜 别

“不要告诉任何人，”红脸儿说，“不要告诉任何人，连你老婆也别告诉。明白吗？”

“明白。”他回答。

“一丝一毫也别透露，嗯？我们为这些和那些自由主义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明天的行动特别危险。尽管安全措施十分周密，你和阿尔弗雷多还是会冒很大的危险。这你知道，对吗？”

“对，对。”他说。

在涉及具体行动之前，红脸儿喘着粗气对他说：“好了，七点钟阿尔弗雷多在杜拉斯诺和孔本西翁街口接你。”

现在，玛尔塔给他端来她称为“里奥哈风味的猪排骨”，这是根据意思说的。为了开玩笑，她总是在菜盘上给他放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当天的菜肴：罗马式的通心粉面团，维也纳式的软炸肉，帕尔玛干酪，如此等等。关于“里奥哈风味”，是他们一次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旅行时她学到的，他喜

欢那种食物。那是在他们还能够每三个月去买一次东西、顺便看电影、戏剧演出和展览会的时期。在蒙得维的亚，他们生活在父母、岳父母、公公和公婆、叔父叔母、侄儿侄女中间。那些外出机会对他们来说起着表露他们最亲密的关系的作用。他们挽着手臂在科连特斯街上散步，觉得比在家里更亲近，更加像一对儿。在家里，各个角落、所有的照片上都有眼睛。但是那种“蜜月”早就过去了。现在必须用钱来创造奇迹。

“你母亲给你打电话了？”玛尔塔问。

“是的，20分钟，一口气。”

“她打电话干什么？”

“跟往常一样：表示同情。可怜的老娘。她多么目光短浅，老天可以塌下来，可是对她来说，没有比给她带来更多的收入、更少的烦恼的仓库保管员更重要的了。”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活到70岁，一个人生活，除了为自己操心不为别的，多好。再说，在这样的年纪，你还想改变她吗？”

“我根本就没这么想。只不过有一次我对她说：‘老娘啊，你为什么不看报呢？这样，也许你会知道巴西东北部饿死的人、越南每天被凝固汽油弹烧死的儿童、以及在你的国家从没有尝过牛奶的孩子的情况。你应该知道这一切，你会明白明天你将怎样去吻仓库管理员，他低声下气，将给你挣30比索。’”

这最后一句话说了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注意到这天晚上玛尔塔很美。谁也没有来，然而她穿了一身蓝衣服。这也许是为了他，仅仅为了他。与此同时，为了证明她穿这身衣服

有多合适，他竟然产生了把衣服给她脱下来的可怕想法。不过，他克制住了。

“今天你太美了。”

“只是今天吗？”

这种嬉戏似的谈话在他们之间几乎成了一个传统。这类下意识的对话，他们有好几套。有时进行得巧妙，会引出新的对话，这些新的对话确实是即兴的。有时情况相反，对话是老一套。这取决于多种因素：一个人或两个人的情绪如何；消化的情况好还是坏；无线电里听到的令人沮丧的新闻；甚至雾、雨或者可能出现在起居室窗口的太阳。

“相反，你很丑。”

“男人都像熊，不是吗？”

“是的，越丑越可怕。”

其实，发生变化的是他。但是当他分派她搞家庭民间艺术时她都大笑起来。

“提个要求好吗？今天晚上你别打扫厨房了。推到明天吧。”

“明天你帮我干？”

他犹豫不决。她看出来。

“啊，你不帮我。”

“哎，明天我不帮你是因为我得早点出门。不过，我还是要求你今晚别打扫厨房。”

“哼，理由不十分令人信服。”

“那目光呢？”

“目光倒令人信服。”

“那你不打扫了？”

“不打扫了。”

一切都不言而喻。结婚8年了，8年的美好岁月，当然养成了老习惯，但是也创造了写在行间的字、秘码和暗语。“我们不能让习惯压倒。”他常这么说。“必须经常有所创造，有所发明。”“难道是我竭力把你推向老习惯一边的吗？”玛尔塔问。“不，绝对不是。只是因为我没能创造夫妻间的任何新内容，没能使任何方面更新。一些夜晚你用某种新的抚爱方式、没用过的抚爱方式对我。你瞧，多奇怪啊，那种新的抚爱方式也起到了复活过去的抚爱方式的作用，好像为它们带来了新鲜感。”

“过来。我想把你的衣服脱掉。”

“怎么啦，亲爱的。”

“没什么。我就是想把你的衣服脱掉。因为衣服太漂亮了。”

玛尔塔快活而惊异地站到他面前，好像准备参加某种游戏却又不完全明白游戏的内容。

“那你脱吧。”

他慢慢地拉开拉链，解开应该解开的扣子，然后把衣服往下脱，蓝色的衣服落在玛尔塔的脚上。她想把衣服提起来。但是他说：“呆一会儿。”“会起皱的。”“没关系。”他让她转过来，面对他。他把乳罩解下来。

“你果然比我们结婚时美丽得多。”

“可是，你这是怎么啦，亲爱的？”

“这就是我想验证的。已经证明了。现在，你过来。”

“你不想脱自己的衣服吗，亲爱的？”

“你认为需要吗？”

“绝对。”

红脸儿说过，“不要告诉任何人，连你妻子也别告诉。”也许因此他才暗自感到在这种爱的举动中包含着某种欺骗。但是他决定瞒着她。他决定了，哪怕是在悄悄开始抚摸玛尔塔的肉体的时刻。今天晚上他的双手仿佛是新的。他的触摸今天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什么都感觉得到，什么都挺刺激，什么都很可爱。他甚至觉得他的双手突然变得富有记忆力，因为在抚爱一个乳房，或一部分腰部，或一条大腿时，他惊奇地恢复了很久以前的感觉，就是说，他重新感觉到（和新的触觉一起）一种得到恢复的旧触觉。

玛尔塔注意到，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夜晚。她不知道原因何在。但是以后她要弄清楚。对她来说，这不是一个被动的夜晚，任凭他爱就得了。这个夜晚她也要主动地爱，以及其他，因为她心中充满一种奇特而温柔的渴望。他悄声对她说：“你美丽、温柔、善良。”她觉得自己的确如此，至少在这个时刻是这样。至于她，她什么也没有说。她愿意听他对她说什么事情，但是她不出声。只有她的眼睛和她的手说话。这就够了。当她的眼睛和手说话的时候，对他来说听不见话语不重要。话语可以由他赋予它们。总是有某种新的话语。新话语就如同新的抚爱，并且也是对平日的话语的丰富。

只有那么一刻，当他感到激动甚至要哭的时候，她才睁大眼睛，停止了一切节奏，对他耳语说：“怎么啦？”他结巴着许愿，请她原谅，他发誓爱她。但是说这一切时用的是一种她听不懂的密码语言。这时，欲望要求它的权利，这个疑问也只好留待以后解决了。

二人疲惫、快活地挨在一起。他用一只手臂搂着她的脖子。双双一声不响，吸着烟。

“很久……”他打破沉默说。

“真的吗？为什么会这样？不管怎样，我们今天和上礼拜没有什么不同。”

“天晓得。”

“我很高兴，知道吗？”

“因为什么？因为国家的情况糟透了吗？”

“不。我高兴，是因为我们的情况不错。当然，国家的现状令人不安。不过，我坦白地告诉你，我还没有那么慷慨，以至把国家命运放在我们的命运之上。”

“你不认为国家的命运包括我们吗？”

“是的，当然。”

“那又为什么呢？”

“我说过，我还没有那么慷慨。”

“这不是事实。”

“喔，有时我慷慨几乎是出于自私，譬如对你。对你，怎么能不慷慨呢？不过，这也是自私。”

“像纪廉说的那样，全都混杂在一起了。”

“不过，我很高兴。你呢？”

“我也很高兴。”

“我高兴是因为我们的一切会越来越好的。时间不会很久。”

“但愿上帝的耳朵不那么聋。”

“什么意思？”

“我是说愿上帝听见你的话。”

她在烟雾中微微一笑。

“告诉我：你想继续服役吗？”

“是的。”

“你真的认为有必要吗？”

“是，玛尔塔。我相信。尤其对我、对我们来说。”

“有时我怕。一切都那么复杂，我不知道牺牲是不是值得。”

“永远值得。”

“那种恐惧心情是遮着眼睛的唯一的云团。那么多人倒下去了。能向你提个要求吗？”

“当然。”

“别冒太大的危险。”

“危险没有大小。都是危险。总之，我不想躲避它们。”

“你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你万一出什么事，我受不了。”

“我不会出什么事的。”

“我知道，我知道。只是……”

“你要是得知我逃避危险、胆小怕死、怯懦软弱，你会爱我吗？”

“不知道。你别认为事情那么简单。也许我的头脑在责备你，可是我相信我的肚子仍然是爱你的。有一件事你知道吗？我的头脑能够坚持原则，甚至能够承担责任。但是对我的肚子来说，你是我唯一应负的责任。因为我的肚子是忠实的。你不信吗？”

他仍在默默地吸烟，显得很激动。她等待着回答。然后又说：

“怎么？你不相信？”

“是的，我相信。”

他又拥抱她。这一次没有别的意图，他只想知道她在身边，同时感觉她的肚子的忠实。

二人睡了一会儿，醒来或半睡半醒仅仅为了感觉挨着对方的肌肤有多舒服，仿佛简单的接触能够使他们避免一切不幸似的。

闹钟差十分打点前他完全醒了。夜间，玛尔塔躲开了，现在趴着睡，没盖被单：美丽极了。他没有碰她，静静地起来，去了卫生间，匆匆穿上了衣服。他又望了望她。然后在一张纸上草草写道：“谢谢，忠实的肚子。”把纸放在很乱的床上。

他来到街上，看了看表：还来得及去孔本西翁和杜拉斯诺路口同阿尔弗雷多会面。

朱景冬 译

布洛梅街上的小客栈

也许是由于不愿意公开相认的老习惯作怪。在地铁里他们确实没有说话。有时他看看她，她只是微微地苦笑一下。正值商店关门的紧张时刻。车上挤满乘客，有一股又酸又甜的气味，混杂着腋臭和香水味。就像 1965 年一样。

最后到达沃吉拉尔车站才感到轻松。他拎起两个小时前她出现在里昂车站时带的手提箱。这时下着雪，好大啊！

“我们买面包、干酪和酒吗？”

“是的，当然，跟往常一样。”

“这样就不用出去吃晚饭了。”

“这样更好。街上太脏了。”

“阁楼里至少还有暖气。”

“太好了。”

他们买了那些吃的。还为他买了香烟和火柴；为她买了巧克力糖。她拿着一个新包裹，他又拎起了箱子。双双沿坎布龙街上行，挽着胳膊，紧紧地挨着，抗着雪。但走得很

慢，免得滑倒。

在布洛梅街的小客栈里，贝诺瓦夫人带着惯常的刻薄笑意远远地跟他们打招呼，并把手伸给她，说了这句套话：曼德斯夫人驾到，她很高兴。她微微一笑，也说了一句俗气的客气话作为回答。他取了钥匙，二人上楼了。

那是一间阁楼，只有一扇窗户，窗台上堆着雪。窗前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双人床上铺着蓝床罩。墙上挂着一幅雷诺阿的画的复制品。房间相当朴素，温馨。

“我没能订到原来那个房间。42号有人了。”

“没关系。这儿很不错，而且有暖气。”

但是，她没有脱大衣。她给冻坏了。她打开手提箱，开始拿衣物。

他打开一个几乎很矮的柜子。

“我把右边仓留给你用。”

她没有回答，但开始在他留给她的隔板和衣架上搁她的衣服。他走进卫生间，拧开水笼头，等着热水流出来。他洗了手，然后动手把一个个小包解开，把吃的东西放在桌上。他取下瓶盖，把每个面包掰成两块，再一一夹上干酪。

他走到她背后，把一只手搭在她肩上时，她还在往柜子里放她的东西。她把头歪向那边，感觉到他的手的抚摸。于是，他想拥抱她。

“别闹。我饿了。”

“我也饿了。”

她洗了脸。然后走到桌边。他们默默地嚼了半天。

“真香。”

“坦白地说，这几乎是我每天吃的晚饭。”

“好吃极了。我饿坏了。在火车上我吃得很少，都觉得有点晕了。”

“现在呢？”

“现在好了。酒和干酪又让我活过来了。”

“让你的面颊也红了。那时你面色苍白。”

“是饿的。”

“以前你的胃口从没有这么好。”

“以前在这儿还是在乌拉圭？”

“无论在这儿还是在那儿，你的胃口一直不好。”

“不过，你瞧，现在不一样了。这应该是一次补偿。说实话，1972年我不得不消声匿迹的时候，我挨过饿。那是真正的挨饿。”

“我知道。在兵营里吃的饭很脏，像狗食，一点儿也不好吃。但不管怎样，那还是饭。此外，我的肚子也小了。”

“是的，看上去你瘦多了。”

“你很漂亮。”

“得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漂亮。你还有另一种表现。好像现在你更有女人味了。”

“见鬼。”

她开始收拾盛干酪的外壳，装在一个纸袋里。

“那你，觉得自己更像男人了吗？”

“不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对自己很满意，因为我忍耐着，不讲话，不告发任何人。在那些狗屎般的日子，讲话成了一种烦恼。不能讲话，特别是不能讲话。”

“你觉得还不够吗？别的不说，我所以来这儿，就是因

为你不讲话。”

“只是因为这个吗？”

“不。我是说，你倘若讲话，我即使消失了，他们也会有材料找到我，或者阻止我外出。”

“你到这儿来只是为了这个吗？”

“你别装傻了。你很清楚，我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想见你。”

“我也想见你。我愿意你想来看我。”

“喔咿，说话这么费劲。”

“我不知道怎么说才更简单。”

她叹了口气。

“好了，我们总算见面了。”

“在布洛梅街的小客栈里。1965 年谁能说我们会遇到我们遇到的事情呢？”

“没有人。”

“你愿意我告诉你一件事吗？我想，连士兵们也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什么事？”

“譬如说：他们可能变得非常残忍。”

“也许。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真是抽象的大杂烩，你不觉得吗？”

他抓住她的手。

“我觉得。不过，现在你是某种很具体的东西，我喜欢你。抽象的东西没有了。”

她又微微地苦笑了一下。

“劳拉也是很具体的东西。你也喜欢她。你知道，这不

是责备。奥斯卡尔也是具体的东西。我喜欢他。这是客观情况，对吗？”

“是的，当然。”

“劳拉知道我们去巴黎见面吗？”

“我没敢告诉她。我对你起誓，这不是因为缺乏诚实。不过，她不久就会康复的。对她来说，智利发生的事是第二次不幸。”

“对谁不是呢？”

“奥斯卡尔知道吗？”

“奥斯卡尔知道。”

“他怎么看？”

“很好。就是说，这样的事情都会认为无可挑剔。他知道，在我重新见你之前，他觉得对我跟他的关系没信心。”

“你呢？”

“也许我也有那种感觉。”

“我们都没有信心，对吗？我也是。我跟劳拉的关系很好。不过，我跟你的关系也很好。我不知道。倘若你我由于某种个人矛盾，由于打一次架，关系吹了，情况就不同了。但是你我是天生的一对，不是吗？”

“我们一直是。”

“来吧。”

二人走到床边，谁也没碰谁。各自脱掉自己的衣服，背对着背。

“好了吗？”

“好了。来吧。”

他们慢慢地转过身，像对称舞蹈里的奴仆一样。也像再

现某种古老的仪式。二人赤身裸体面对面站着。他把她拉过来。于是她不可避免地顺从了。她抱住他，啜泣起来，克制不住，也不想克制。他觉得她的泪水浸湿了他的脖子和胸前的汗毛，一颗比其他泪珠大的泪珠滑到他的肚脐眼，停在了那里。

他抚摸着她的头发。有时把她往后推一下，吻她的耳朵。她仍在哭，不知是由于幸福，还是伤心。他把双手往下滑，用力地抚爱。双双几乎不知不觉地倒在了床上。突然他觉得顺着他的脸滑动的泪水可能是他自己的。他很激动，怀着某种希望。她的双手重新获得了那个肉体，那是她老早熟悉的，那是她的补充。过了一会儿，她的啜泣变成了另一种东西。

两个人仍然躺着。他吸烟，她吃巧克力。他把那只闲着的手放在她的肚子上。

“他们真可恶。”

“是的。”

“他们拆散了我们。”

“是的。”

“他们把我们分成了两半。”

“是的。”

“你决定了吗？”

“决定了。”

“我不知道，不知道。”

“为什么？”

“我不想伤害劳拉。不过，我也不愿意让自己烦恼。”

“你烦恼，我烦恼。我们必须彻底弄明白。奥斯卡尔和

劳拉也烦恼。他们永远不会完全赞成我们。但是倘若我们重新在一起，他们会活不下去，因为他们比你我软弱得多。这样的话，我们会过得不快活。是这样还是我不了解你？”

“你很了解我。”

他的手向下滑了滑，热乎乎地停下了。

“很难办，是吗？”

“特别是从今天起。”

她的手盖住了他的手。

“他们把我们分成了两半。”

“不只于此，”她说，“他们把我们打碎了。”

朱景冬 译

死

“你应该做最坏的准备。”

不仅是医生而且尤其是中学的老校友奥克塔维奥用担心和友好的语气讲的这句平常的话几乎没有在马利亚诺的耳中停留就在他的肚子里回荡起来。四个星期以来，他的肚子一直疼痛不止。在那一刻，他克制着，痛苦地微笑了笑，甚至这样说：“你不必担心，我早就做好了准备”。说谎，他没有什么准备，从来也没有什么准备。当他再三恳求奥克塔维奥看在过去的友谊的份上（“我对你起誓，我一定和你配合”）把真实的诊断结果告诉他时，他心中暗暗希望他的老同学会对他说实话，是的，那实话可以挽救他，而不会是一种判决。但是奥克塔维奥不折不扣地对待把二人连接在一起的老交情，在百忙之中花了一个半小时反复给他做了检查，然后带着厚玻璃镜片后面那双难免湿润的眼睛，对他说，故意把坏消息说得缓和一些：“你得的是什么病，不可能马上告诉你。必须进行分析，透视，了解全部病史。这要耽搁一点时

间。我唯一能够告诉你的是，经过这首次检查，留给我的印象不好。你太粗心大意了。刚刚感到不适的时候你就应该来找我。”然后是对他将遭受的第一个直接打击的预言：“既然你以我们的友谊的名义要求我务必对你讲实话，那我就告诉你，由于怀疑……”他打住了，摘下眼镜，用大褂的边缘擦了擦。在令人心碎的等待中，马利亚诺还能够想到，那是一种很不卫生的举动。“由于怀疑，怎么样？”马利亚诺问，竭力使语调显得平常，几乎是冷淡的。这时，天塌了下来：“你应该做最坏的准备。”

这是九天前的情景。后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化验、拍 X 光照片，等。他以一种连自己都不相信会有的紧张意志忍受了注射和裸体治疗。只有一次他回到家、发现家里就剩他一个人时（阿格达带着孩子们出门了，他父亲在内地），他失去了对自身的控制，站在他那充满秋天的灿烂阳光的书房里敞开的窗前，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任凭泪水流淌而不去擦。“希望，希望，有希望，有希望，”有时用这个词儿的单数，有时用这个词儿的复数；奥克塔维奥曾以多种不同的方式：面带微笑、开玩笑地、同情地、友好地拍着他的肩膀、半拥抱地、回忆同窗往事、问候阿格达、怀疑地皱着眉头、眯着眼睛、紧张地抽动、询问孩子们的情况，对他重复这句话。很可能对自己讲话那么直率感到后悔了，所以他总想以某种方式减轻疾病的打击对患者带来的影响。很可能是这样。不过，真的有希望吗？或许只有一种希望，一种简单的希望，一种用微小的单数表示的小小的希望。如果化验、X 光片和其他讨厌的检查最后用它们那种秘密的语言和密码预言说他只能再活几年呢？他不多要求：只要五年，最好是十

年。现在他穿过独立广场，去见奥克塔维奥，打听他的结论（或判决，或缓期，或赦免），他觉得，尽管他身上发生什么问题，那些单数和复数的希望还是有的。也许这是因为疼痛大大地减轻了，尽管他并不对他隐瞒奥克塔维奥开的、他按时服的药片可能跟疼痛的减轻有关系。但是当接近目的地的時候，他的心情几乎迫不可待了。在某个时刻，他的腿酸软无力。他心想，这个样子的走不到诊所的，于是他决定坐在广场的长凳上休息。擦皮鞋的要给他擦鞋，他摇头拒绝了（他觉得没有力气进行关于天气和通货膨胀的惯常交谈），他一心等待着情绪平静下来。阿格达和苏莎娜。苏莎娜和阿格达。他喜欢的顺序是什么呢？此刻他连这个也不能够决定了吗？阿格达是分层次的理解和不理解，是没有争议的边界，是重复的现在（但在重复时也有—种不可替代的热情）；年复—年，双双彼此预言，记在心间；两个儿子，他们有两个儿子。苏莎娜是秘密，是意外（但是意外也会向习惯变化），是阴暗中的不能分享的陌生生活地区，是感动人的争吵和和解，是保守的妒忌和革命的妒忌，是不确定的边界，是新的抚爱（很难察觉，像重复的动作），是猜测，不是预言，是直觉的了解，而不是靠记忆。阿格达和苏莎娜。苏莎娜和阿格达。他不能够决定，他不能够（恰恰在他应该举手向他的一位老同事打招呼时，他才发觉这一点），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想她们时觉得她们是他的东西，是他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的生命，不是依靠自己、凭自己的勇气生活的人。此时此刻，阿格达和苏莎娜，苏莎娜和阿格达，是他的机体的组成部分，就像威胁着他的生命的卑微而疲劳的内脏—样属于他。此外，当然还有科科，特别是西尔维塔。不过，他不愿

意，不，不愿意，不，现在他不愿意去想孩子们，尽管他明白到一定的时候他必须面对这一点，现在他不愿意想他们，因为那样的话，他真的要垮台了，根本没有力气走到诊所去。然而，做人应该诚实，应该事先承认，到那个时候，他不会那么自私，而是更为高尚，高尚得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如果他在健康恶化的情况下（他的健康很可能恶化）那么想的话，他想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孩子们，或者至少他想孩子们胜于想自己，想等着他们的新的痛苦胜于他自己那种由来已久的没有他们在身边的想法。他身边没有他们，唉，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东西。没有儿子们，没有妻子，没有情妇。但是也没有太阳，这个太阳；没有和这个国家的情况相称的那些又干又瘦的云朵；没有那些羞愧的穷人，没有帕西瓦的合法剩余物；没有3号信贷所的常规（幸运、可爱、温和、刺激性欲的、不受风寒侵袭的、完美的常规）和它的核帐、它的长期寻找但总能找到的差异；没有他在咖啡馆安第斯大窗前的仔细读报；没有他同一个侍者开的玩笑；没有他观海特别是观天时突然产生的软绵绵的晕眩；没有这些匆忙的、幸福的人（因为他们对自己一无所知，喜欢说谎，把他们的椅子固定在永恒上，或评论别人的美好的英雄主义；没有令人感到安慰的休息；没有令人陶醉的书籍；没有给人弹簧般感觉的烈酒；没有不眠般的生活；总之，没有生活。

这时，他的绝望情绪达到了顶点。奇怪的是，正是这一点使他振作起了精神。他站起来，证明他的腿有了力气，他终于穿过了广场。他走进咖啡店，要了一杯牛奶咖啡，慢慢地喝着，体表和内心都很平静，脑海里几乎一片空白。他看到阳光如何渐渐变弱，它最后的光芒如何慢慢地消失。在灯

盏点亮之前，他付了喝咖啡的钱，像往常那样留下小费，然后走了四个街区，从黑河街向右拐，走了一半街区停下来，接着爬到五层楼，按了一下铜牌子旁边的门铃。牌子上写着：“医生奥克塔维奥·马萨博士”。

“这是我所担心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句话是病情恶化的同义语。奥克塔维奥平静地讲了很久，无疑，在安慰人和鼓励人方面他使用了他掌握的最有力的词汇。马里亚诺默默地听着，甚至一直面带微笑。他那么微笑，并无意使他的朋友不知所措。但是他肯定使他感到不知所措了。“不过，我很好。”当奥克塔维奥担心地询问他时，他只是这样说。“此外，”医生说，语调像从衣袖里拿出一张偷藏的牌的人讲话的语调。“此外，我们要做一切必要的努力，你要明白，我相信，手术会成功的。另一方面，我们不必过分着急。我们至少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平静地、耐心地、平稳地使你恢复健康。我不用劝你应该心情快乐，不要担心，但也不要从坏的方面去想。今天，我们同疾病作斗争的条件好多了……”他就这样接连不断地讲着。马里亚诺突然觉得他必须刻不容缓地离开诊所，但决不是因为他再次陷入绝望。难以置信的是，诊断的结果竟使他产生了一种轻松感，但同样也使他产生了需要独自呆着的想法，这大致像一种享受新的把握的强烈好奇心。所以，当奥克塔维奥接着说：“……此外，凑巧的是，我是你那个银行的大夫的十分要好的朋友，这样，你支配一切必要的时间就不会有问题了……”时，马里亚诺总是微笑着。他的微笑不是苦笑，不是难过的笑，而是（许多天来第一次）在一定程

度上说是愉快的笑，满意的笑。

从他走出电梯、重新看见大街后，他的心情就仿佛受到了某种启示。当然，时值夜晚，可是，为什么灯光显得那么远？为什么他不明白、也不愿意明白他面前的灯光字牌上的活动说明？街道是一条大运河，是的，不过，为什么离他的手只有半米远的行人像电影让人感觉到的那样是飘离的形象呢？那种电影虽有色彩，但是靠一种不准确的声带受益（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进步），在他听来，声带的每种声音都像经过无数次中转，最后传进他耳中的只是另一些减弱的回声的一种减弱的回声。大街像一条越来越宽的运河，是的，可是为什么对面的房舍变得那么小，甚至离开他，使他感到那么惊讶？一条运河，不过是一条运河，可是为什么迅速驶来的汽车的灯光越来越弱，最后竟像是手电筒呢？他觉得脚下的花砖突然变成了一个岛，变成了患麻疯病的花砖，在卫生学上受到健康的花砖的歧视。他还觉得眼前的东西在走动，在疯狂地躲开他，但是他不许它们离开。一种虚假的逃跑，如此而已。他怎么没有早些意识到呢？不管怎样，东西、人、地和天的那种令人晕眩的逃遁，毕竟给了他一种力量。这可能是死亡、仅仅是死亡吗？他怀着突如其来的贪婪心情想。然而他还活着。只是没有阿格达，没有苏莎娜，没有科科，没有塞尔维塔，没有奥克塔维奥，没有在内地的父亲，没有3号信贷所。只有那盏路灯的路灯；就是说，一开始它很大，天晓得它从哪里来的，后来不那么大了，应该离开花砖岛，后来它更小了，应该面对街上的一切，小了，更小，是的，微不足道了，就在这里，其他人逃走没关系，只要那盏灯，小灯，离去又归来，在这里，在这里，手电

筒，萤火虫，越来越远，越来越近，距离他那双眼睛十公里，也是十厘米，但是他的眼睛永远也不会闪光了。

朱景冬 译

顶 楼

它就在那上面。我从这儿看得见。我一直想有一间顶楼，我九岁的时候，我十二岁的时候。我从这儿看得见。知道它存在是令人愉快的。它有一盏燃着的灯。那是一盏相当于一百支蜡烛的电灯泡，但是从院子里看去，它只不过像一点亮光。我一直希望有一间顶楼，好有个地方逃避。逃避谁呢？我始终不知。老实说，我很想知道是不是人们都确信自己在逃避什么人。谁也不清楚。可能老鼠知道。不过我相信老鼠决不是博士讲的那种典型的逃跑者。我却是。我希望有一间顶楼，比如像伊格纳西奥的顶楼。伊格纳西奥在顶楼上存放他的图书、历书、地图、明信片和相册。伊格纳西奥直接从顶楼走到屋顶平台上，从平台上能够看到所有的邻居家的平台。那些平台有的有天窗，有的没有，有的有洗衣池，有的在墙头上摆着花盆。这个时候，他的神情不是要逃跑，而是想观看。观看平台差不多像察看别人的秘密一样。人们在那里晾内衣，堆放旧家具，毫不炫耀地晒太阳，为自己而

不是像在沙滩那样为姑娘们做体操。平台就像店后的房间。当然，有的平台上有狗，这是不适宜的，因为总是有办法向它们扔石头或者简单地把它们哄走。但不管怎样，我和伊格纳西奥都不喜欢被一只狗盯着。有狗的平台失掉了它的孤寂，这样一来它就没用处了，尤其是当狗有一双人的眼睛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长着狗眼睛的狗。对我来说，猫不那么重要。它们不过像一种装饰品。和天空、一架飞机、一只风筝和一只猫在一起，我会感到非常孤独。甚至和伊格纳西奥在一起我也几乎觉得是孤独的。也许是因为他寡言少语。他拿起演戏用的望远镜，仔细观察米索家的屋顶平台，有一次他看到梅恰和索尼娅都还没有上来，他便把望远镜给我，我仔细地察看安图尼亚家的平台，直到确信路易莎和玛尔塔也没有上来。我一直希望有一间顶楼。伊格纳西奥的顶楼很漂亮，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它不是我的。我知道，伊格纳西奥从来也不让我觉得我是外国人、闯入者、敌人、讨厌的人和陌生人；但是，对这一切，我是靠自己来感觉的，无需任何人来提醒。为了避开，为了逃脱某种你并不很清楚的东西，必须一个人去做。当我逃避，比如在我打碎我姑妈的眼镜，把它扔进厕所，她失去理智，大发雷霆，喊我“臭狗屎，你父亲那个醉鬼生的好儿子”，尽管据博士说我的弱智并不一定和我老爸（愿他安宁）的酒醉有关系，当我躲到伊格纳西奥的顶楼想独自呆着时，我不能够一个人呆在那里，因为，当然，伊格纳西奥在那里。邻居家的狗有时也在那里，那是一只用人的眼睛观看的狗。这一切，发生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和九岁的时候。我十三岁的时候顶楼的事就结束了，因为我开始上边界的小学了。对我在小学里做的事情，

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应该知道，我只上了三天；后来我染上了重病，长期卧床，不能睁开现在睁着的这只眼，此外我还必须克制着呼吸。当然，一切都是因为肋骨断了，但是我毕竟还得呼吸，因为我的脸憋得通红，通红的，最初像西红柿，后来像红萝卜。当时我呼吸，疼得要命。我叔叔说，我不能上学了。我姑妈说，不管怎样，我算是正常人。我弯着腰，突然眼睛感觉到冰凉的钥匙，我离开锁孔，穿上睡衣。我姑妈说，从明天起她将来给我上课。说完，她给我盖上被子，亲了我的额头。我还没有我的顶楼，也不能去伊格纳西奥的顶楼，因为他爸爸和我叔叔打了一架：没有动拳头，只是说脏话骂人。她每天早晨都来给我上课。不仅给我上课，还把两条毛茸茸的腿露出来，我不能不瞧它们。我告诉她，我几乎是个正常的人，她微微一笑。她问我，我是不是特别喜欢什么东西，我说是顶楼。我立刻后悔了，因为这就像出卖了伊格纳西奥。但是无论如何，她总会知道的，因为她的目光是从睁得很大的眼睛里射出来的。我相信她从来也不闭眼睛，也许我眨眼的时候她才眨眼睛。有时我故意拖着不眨眼，她察觉到我的意图，也拖着不眨眼。然后也许她和我一块眨眼，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她闭眼。确切地说，我只见她眨过一次眼，但是那一次不能算，因为那是她死了。她教过的学生送给她一束花。我也是她教过的学生，但是我不怎么喜欢她。我喜欢她的腿，这倒是，因为她的腿上长着许多绒毛。但是她身上还有其他部位。这样，事情就仅持续了一个半月。这是一件憾事，因为我好多了，我姑妈说。我已经会背8的乘法表了，我姑夫说。我也会9的乘法表。当然，我从来也不说，因为总应该有个秘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

没有秘密也能生活。伊格纳西奥说他的秘密中最秘密的秘密是……但是我不能讲，因为我对他起过誓，不能告诉任何人。那是我对死狗起的誓。我记不准是在何时了。我老是把日期弄混了。我终于能做点事情了。可是我觉得它太久远了。相反的，有时一件老早的事情，我却觉得是在五分钟以前做的。有时候我能够知道事情发生在何时，特别是现在，叔叔给了我一块表，那是妈妈的，愿她安息。小可怜儿，这样你就可以玩耍了，姑妈说。但是我不愿意玩耍，就是说，我早就不愿意玩耍了，因为那是十二岁的时候的事，现在我二十三岁了，我叫阿尔贝蒂托·鲁伊斯，住在索拉诺·安图尼亚街 569 号，我叔叔是奥罗斯曼·里瓦斯先生，我姑妈是阿梅利亚·T·德·里瓦斯。T 代表塔达吉拉。我终于得到了顶楼。它属于我一个人。是昨天，前天，或五年前得到的。什么时候对我不重要。我的顶楼就在那里。我从这儿看得见它。我一直希望有一间顶楼。博士说，严格说来他不是边界上的人，我姑妈叹了一口气，我从锁孔里清楚地看见她在叹气，就是说，她怎样鼓起胸脯，接着落下来，怎样托起带小十字架的项链，怎样落下来。后来，我从顶楼上下来，我叔叔在喝茶，问顶楼怎么样。我说，很漂亮。我的顶楼上有一盏可以移动的电灯，灯泡是七十五度的。我要了个花招，换上了一只一百度的，但是我姑妈以为是七十五度的。有时那么强的光线照得我眼睛难受。我叔叔发现，尽管灯泡上写着 75 度，但实际上是一百度。但是我知道，当着我姑妈的面，他不会揭发我，因为在他的床头桌上也有一盏七十五度的，而姑妈只准他点四十度的。倘若刚才伊格纳西奥不来的话，现在我就在顶楼上了。但是他来了，而且我多年没见他了。

他说有十一年了。我知道，他搬了家，他再也没有顶楼了。你好，他说。伊格纳西奥从来就话少，即使在他有顶楼、那么骄傲的时代也是这样。现在我有自己的顶楼了。傍晚时分，我喜欢到屋顶平台上去，幸运的是这里没有长着人眼的狗。滕雷罗家的平台上有一只小狗，那只小狗叫戈利亚特，不过它长的是狗眼，所以我不害怕。你好，我也说。但是我明白他的来意。我立刻就意识到了。他说，我们十一年没见了，他在读大学三年级。我觉得他长了胡子。我不长胡子。你叔叔允许我来看你，他低声说。你叔叔说，你好多了，他又低声说。我叔叔说了那么多蠢话。他走到窗前，望着天空，天空也望着他。喂，怎么样，我下楼时叔叔问我说。很好，我说。我让电灯亮着，从这里我能看到灯光。谁也不能把顶楼给我夺走。永远不能。谁也不能。永远不能。我没有出卖他，现在他来了，这个十分虚伪的人默默地望着天空。大家都知道，他失去了他的顶楼，但是我没有过错。怎么样，我叔叔问。好极了，我说。灯光亮着，那是一百度的灯泡。但是我确信，伊格纳西奥不会感到不快，因为在下楼之前我说了对不起，并让他闭上眼睛。

朱景冬 译

戏弄的愿望

一开始他不愿意相信。后来他说服了自己，但是他不能不把它当作笑话。对耳朵灵的人来说，微弱的声响（有时是掉在地上的卡片声；有时是低沉的嗡嗡声）是不会听错的。阿曼多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事实是，他的电话被窃听了。他不觉得自己正直，也不认为受到了迫害。他只是认为那是一种愚蠢行为。他从来也不能把特务活动这个词的重要、神秘和可怕的意义同一个小国像他的国家这么简朴的小国联系在一起。他的国家不产石油，不产铅，不产铜，至多有水果（由于种种原因，遥远的北方并不喜欢）或羊毛和肉（属于专家们认为的有影响的红色产品）。

1965年在这个中产阶级和官僚的乌拉圭存在着特务活动？得了吧！可是他的电话受到了窃听。多像开玩笑。不管怎样，他打电话的内容并不比他的文章更秘密。当然，打电话时，他讲话的方式不会那么文雅，甚至有时会更差，间或说几句下流话。“一点儿也不差”，热情的巴雷罗坚持着，

“不要忘记，有些下流话是高尚的。”

由于阿曼多觉得至少在这个地方特务机关是荒唐可笑的，所以他干起了一种有失谨慎的愉快的练习。当巴雷罗（唯一知道这一秘密的人）给他打电话时，他故意讲了一些针对美国或约翰逊或美国情报局的攻击性的笑话。

“等一等，”巴雷罗说。“不要讲得这么快，速记员记不下来。你想怎样？你希望可怜的速记员被辞退吗？”

“什么？”阿曼多问。“是速记员还是录音机？”

“本来是录音机，但是好像机器太热了，烧毁了，所以现在换成了速记员。就是说，这是一台具有不怕热优越性的机器。”

“我们可以告诉他一件重大的秘密，让他立功。你看如何？”

“譬如关于叛乱的事？”

“不。喂，讲这事太早了。”

反正是诸如此类的事。后来他们在咖啡馆里相遇，玩得很开心，并开始策划第二天的节目。

“如果我们开始讲人名呢？”

“假名字吗？”

“当然。确切地说是点人的名字。例如，佩德罗就是罗德里格斯·拉雷塔；阿尼巴尔就是阿格隆多；安德雷斯就是特赫拉；胡安·卡洛斯就是贝尔特兰。”

然而，在新计划实施几天后，在一次毫不危险的电话中，出现了一个新因素。是玛鲁哈打来的电话，她谈的是一位感到自己被遗忘、被冷落的未婚妻通常接触的话题。“你越来越对我冷淡了，”“你多久没带我去看电影了，”“你哥哥

肯定对塞利娅好多了。”如此等等。他暂时忘记了电话的特务活动。

“今天还是不行。我有一个会要参加，你知道吗？”

“关于政治的吗？”她问。

这时，电话里传来一声干咳，接着又传来两声。第一声和第三声长，中间一声短。

“是你干咳吗？”玛鲁哈问。

阿曼多的头脑做出了迅速反应。

“是的。”他回答。

实际上，那三声干咳是从他的电话受到窃听后最让他激动的事情。

“好吧。”她强调说，“总之，你没有回答我：到底是不是政治会议？”

“不是。是告别单身汉的聚会。”

“我想象得到你们会说这种无礼的话。”她抱怨说，挂上了电话。

玛鲁哈是对的。塞利娅受到他哥哥的很好的对待。但是蒂托是另一类人。阿曼多一直很钦佩他，因为他做事有条理，因为他处事稳重，因为他的工作方法，因为他不守旧。但塞利娅不然，她经常嘲弄这类优雅举止，有时还开玩笑地索要蒂托孩提时的照片。“我想证明，”她说，“你六岁的时候就系领带了。”

蒂托对政治不感兴趣。“一切都太肮脏了，”这是他的口头语。对阿曼多来说，承认“一切太肮脏了”并不困难，但是即使如此，他仍然对政治感兴趣。蒂托以其耀眼的头衔、良好的收入、远近闻名的学识和过人的才能、神圣的周末、

星期天的弥撒、对母亲的爱戴，成为家庭的光辉榜样，从两兄弟一块上学的时候起整个家族为阿曼多树立的纪念碑。

阿曼多拿窃听电话的问题跟巴雷罗开玩笑，但是他从来也不和他哥哥谈这件事。很久以前二人曾关于一个政治话题进行过最后一次对话，蒂托用几句尖刻的评论结束了他的谈话：“我不明白你怎么能让那种人弄脏自己。你要相信，他们是无所顾忌的人。都是。无论右翼、左翼还是中间派。”正是这样。蒂托毫无区别地蔑视一切政界的人。阿曼多也钦佩他，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够像他那样保持独立性。他想，要做到不气愤，必须具备十分坚强的性格。也许正是凭着这一点，蒂托才不气愤。

那三声干咳（一声长，一声短，一声长）又听见了三四次。也许是一种警告？出于疑虑，阿曼多决定不和任何人谈这件事。不仅不和蒂托或他的父亲（不管怎样，老爹是可以信赖的）谈，也不和巴雷罗谈（无疑，他是他最好的朋友）。

“最好我们停止关于电话的玩笑。”

“怎么？”

“很简单，我玩腻了。”

巴雷罗仍然觉得开那种玩笑很开心，但是他没有再坚持。

在阿曼多被捕的那个夜晚，无论学生还是工会，都没有闹事。连佩尼亚罗尔队也没赢球。城市一片平静，那是很少见的一天：不冷不热，无风，这样的天气只有在蒙得维的亚的某个四月才有。阿曼多在要塞路上走，走到广场时，两个调查局的人向他走来，向他要证件。阿曼多身上带着身份证。其中一个家伙说，身份证已经无效。的确，至少一个季

度前就该更换了。被带走时，阿曼多心想，这事真叫人恼火，他好几次骂自己粗心大意，没再说什么。一切都会解决的，他暗暗告诉自己，在半路上，他既乐观又气恼。

但是事情未能解决。当天夜里，那两个家伙审问了他，每人有每个人的特点：一个采用亲切、热情、随便的方式；另一个表情凶恶，举止下流。

“你为什么在电话里讲那么多不合适的话？”态度和蔼的人问，他用调皮的孩子们才有的目光望着他。

但是另一个家伙直截了当地问：

“贝尔特兰是谁？”

“是委员会主席。”

“最好你还是别装傻。我要知道你和那个人所说的贝尔特兰究竟是谁。”

阿曼多没有吭声。现在他们会用钢针扎他的手指尖，或者用燃烧的烟头烧他，或者用电刺棍刺他的睾丸。这一次事情很严重。阿曼多虽然忧心忡忡，但是他有足够的理智对自己说，这个小国由于有了刑法等等东西而变成了一个重要民族。当然，关于他自己的抗拒能力，他是怀疑的。

“不过是开玩笑。”

“啊，是吗？”凶狠的人说。“喂，这是恶作剧。”

他冲着阿曼多的鼻子猛击一拳。这使他觉得什么破裂了，他的双眼不由得充满泪水。当第二拳打在他的耳朵上时，他的头歪向了右边。

“他什么人也不是。”阿曼多结巴着说。“我们确实提到了人名，那是为了戏弄你们。”

鲜血顺着他的衬衫流下来。拳头从他的鼻子上抡过，鼻

子疼痛难忍。

“这么说你是想戏弄我们？”

这一次，那个家伙给了他一巴掌，不过力量更大些。下嘴唇立刻肿了。

“真漂亮。”

然后那个家伙用膝部猛地顶了一下他的后腰。

“你知道电刺棍是什么吗？”

每次听到他提电刺棍，他就觉得睾丸发抖。

“我必须刺激他，让他继续打我。”他想，“这样，他也许会忘记电刺棍。”

他不能够连续讲许多话，于是他使出全身的力气说：“你这堆臭狗屎。”

那个家伙听到这句骂他的话，觉得好像脸上被吐了一口唾沫，但是他还是微微一笑。

“你别以为这样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你还嫩点儿。同样，我也不会忘记你希望我忘记的东西。”

“算了，”这时，态度和蔼的人说。“算了，他的话也许是对的。”

他的声音听来像下结论，像做出了决定。阿曼多终于喘了口气。但是他随即软弱无力地晕倒了。

在一定程度上说，玛鲁哈是刑讯的间接受益者。现在她整天和阿曼多在一起，为他治伤，溺爱他，吻他，不厌其烦地对他谈计划。阿曼多的抱怨是过分的，因为实际上，他并不讨厌年轻人间的这种接触，他甚至想马上结婚，只是他对自己的想法非常谨慎。“挨了这么多拳头，我的脑袋准留下

了毛病。”

她那只温暖的手的抚爱突然停止了。阿曼多睁开眼睛，看见大家都在面前：父亲、母亲、巴雷罗、蒂托和塞利娅。

“为了守口如瓶，你是怎么做的？”巴雷罗问，他和往常一样解释说，他们只不过打了他几下，当然，非常狠。最重的是用膝盖猛顶他的后腰。

“他们要是对我使用电刺棒，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母亲哭了；三天来，她一直不住地哭。

“我听说，”父亲说，“协会在报上发表了一份抗议声明。”

“许多声音，许多抗议。”巴雷罗气愤，“但是谁也不能避免他挨拳头。”

塞利娅把一只戴手套的手搭在他的前臂上，玛鲁哈在他额头上的绷带空白处吻了一下。阿曼多感到疼痛，但是心里几乎是愉快的。

站在巴雷罗身后的蒂托比平时还沉默。玛鲁哈突然注意到他。

“那你现在想说什么？仍然像往常那样沉静吗？”

蒂托微微一笑，然后平静地回答：

“我一直对阿曼多说，政治是肮脏的。”

然后他干咳了一阵。连续干咳了三声。一声长，一声短，一声长。

消防队员

奥莱加里奥不仅是一位预感的能手，而且常常为他的本领感到无比骄傲。有时他凝神思索片刻，说：“明天有雨。”第二天果然下了雨。有时他搔搔后脑勺，预言说：“星期二 57 号会中头奖。”星期二 57 号果然中了头奖。在朋友们中间，他受到无比的崇拜。

在他的朋友中，有人想起了他最有名的预感。他和朋友们经过大学门前时，早晨的天空突然被疾驶的消防车的声音划破。奥莱加里奥几乎让人察觉不到地微笑了笑，说：“可能是我家失火了。”

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紧紧地跟随消防车。消防车开进了里维拉街，奥莱加里奥说：“几乎可以肯定，我家真的着火了。”朋友们尊敬而和蔼地保持着沉默；都非常佩服他。

消防队员们顺着佩雷拉街前进，大家的精神紧张到了极点。当消防车拐进奥莱加里奥居住的那条街时，朋友们都惊

呆了。消防队的车子终于停在火光冲天的奥莱加里奥的住宅前，队员们迅速而冷静地开始了严格的准备工作。楼房高层的窗口里不时飞出一块木片。

奥莱加里奥不慌不忙地下了出租车，整理了一下领带结儿，然后带着歉恭的胜利者的风度准备接受他的好朋友们的祝贺和拥抱。

朱景冬 译

表 情

米尔顿·埃斯东瓦曾是个神童。七岁就能弹奏勃拉姆斯^①的五号作品第三奏鸣曲；十一岁时，他在欧美国家的大都会举办的一系列音乐会受到批评界和观众的一致欢迎。

然而，当他年满二十岁时，人们却在这位年轻的钢琴家身上看到一种明显变化。他开始过分地注重虚夸的动作、面部的做态、皱眉头、陶醉的眼睛和其他种种类似的效果。他把这一切叫做“他的表情”。

渐渐地，埃斯东瓦练就了一套独到的“表情。”演奏《忧伤》用一种表情，演奏《花园里的小女孩》用另一种表情，演奏《波洛涅兹舞曲》用第三种表情。在每场音乐会之前，他都要对着镜子练习，但是疯狂地崇拜他的听众却认为他的表情非常自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喝采和跺脚声。

① 勃拉姆斯（1833年～1897年），德国作曲家。

第一个令人不安的征兆是在星期六的一次朗诵会上出现的。观众注意到某种奇怪的东西。在他们的掌声中包含着些许惊愕。实际上，埃斯东瓦是用《土尔其进行曲》的表情演奏《沉没的大教堂》的。

但是六个月以后灾难降临了，医生们称之为空白遗忘症。空白的内容是指乐谱。在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米尔顿·埃斯东瓦永远忘记了他的长长的节目单上的一切小夜曲、序曲和奏鸣曲。

令人惊讶的，真正令人惊讶的是，他一点儿也没有忘记他每次演奏时所采用的虚夸而做作的表情。他永远不能再举办一场钢琴音乐会，但是有一点能够使他感到安慰。即使今天，在礼拜六的夜晚，最忠实的朋友们仍然聚在他家里欣赏他的“表情”的无声的独奏音乐会。大家一致认为，他的杰作是《热情》。

朱景冬 译

丑陋人的黑夜

一

我们两个相貌丑陋。甚至都不是一般的丑陋。她的颧骨有一侧凹陷。自八年前动手术后一直如此。我嘴边的令人厌恶的伤疤是在我进入少年时遭受的一次严重的烧伤留下的。

我们的眼睛也不能说温柔，不是那种吸引人的眼睛，可怕的人有时凭那种眼睛接近美丽事物。不绝对不是。无论她的眼睛还是我的眼睛，都充满了怨恨，它们只能反映少许或一点儿也不能反映我们的不幸带来的无可奈何的心境。也许是这一点把我们连接在了一起。可能“连接”一词用得并不恰当。我指的是我们各自对自己的面容产生的刻骨仇恨。

我跟她是在电影院门口认识的。当时我们在排队买票，想看看银幕上出现的两个漂亮人儿。就是在那里，我们第一次打量了对方，虽然无好感，却也暗暗相怜；也是在那里，

我们从第一眼起就注意到了各自的孤独处境。排队时，人们都是成双成对，而且是真正的伴侣：夫妇、未婚夫妻、恋人、爷爷奶奶，等等。所有的人——拉着手或挽着臂——都有人相伴。只有我和她的手没有拉着，微微地哆嗦。

我们仔细、大胆地察看着对方的丑陋面孔，但并非出于好奇。我怀着我的皱缩的面颊赋予我的无所顾忌的勇气察看她那凹陷的颧骨。她的脸没有红。我喜欢她的冷淡，喜欢她这样回报我的察看：仔细地看一看我那块早年烧伤留下来的没有胡子的发亮的光滑皮肤。

我们终于走进影院。我们的座位不在同一排，但是挨得很近。她看不见我。但是，尽管光线暗淡，我仍能看清她那长着金发的后脑，她那长着完美的红润的耳朵。那是她正常的面颊一侧的耳朵。

在一小时四十分钟的时间里，我们欣赏了粗鲁的男主角和温柔的女主角的英姿。起码我是向来能够欣赏美丽的东西的。我的不满主要是对我的面孔，有时是对上帝，此外也是对其他丑陋人、其他面目可憎的人的面孔。也许我应该产生同情心，但是我办不到。事实上，那些面孔就像一面面镜子。有时我问自己，倘若那维纳斯有一侧的颧骨凹陷，或被硫酸烧毁了面颊，或少了半个鼻子，或额头上有一道接缝，那么神话的命运该怎样呢？

散场后我在门口等她出来。我和她一起走了几米路，然后对她说话。当她停下来看我时，我觉得她犹豫不决。我请她去咖啡馆或一家兼售糖果、烟酒的咖啡店谈一谈。她马上同意了。

咖啡店一向顾客盈门，但是此刻有一张空桌。我们从人

群间走过时，背后有人惊奇地指指划划，表情异样。我的天线受过特殊训练，善于接收有着平常的、奇迹般对称的面孔的人那种病态的好奇心和那种下意识的虐待狂。但是这一次根本不需要我的训练有素的直觉，因为我的耳朵听得清低语声、低咳声和干咳声。一张可怕的面孔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两个丑陋的人在一起，本身就构成了一副不平常的、近乎协调的场景；这是应该和那些长得好看的、值得与之分享世界的人中的某个男人（或女人）一起观看的事情。

我们坐下来，要了两杯冷饮，她勇敢地（我也喜欢她这样）从手提包里取出一面小镜子，整理她的头发，她的漂亮头发。

“你在想什么？”我问。

她把镜子收起来，微微一笑。她脸上那个坑改变了形状。

“一句老话，”她说。“彼此彼此。”

我们谈了很久。一个半小时后，我们不得不要来两杯咖啡，好表明我们久久地坐在那里并非没有理由。突然我意识到，她和我一样，我们都在以一种如此刺人的直率口吻在讲话，令人感到那种口吻超出了真诚，而几乎变成了虚伪。我决定一针见血。

“你觉得自己被排斥在世界之外吗？”

“对，”她说，依然望着我。

“你羡慕长得美的人，正常的人。你希望有一张像坐在你右边那个小姑娘那么匀称的面孔。但是你很聪明，她却愚蠢得无可救药，你看她那副笑的样子。”

“对。”

她第一次不能忍受我的目光。

“我也希望那样。你知道吗？有一点我和你是有可能做到的。”

“你指的是什么？”

“我们相爱，咳。或者简单地说，我们彼此合得来。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是可能的。”

她皱起了眉头。她不愿意抱什么希望。

“你对我起誓，决不认为我是开玩笑。”

“我起誓。”

“可能性就是我们生活在黑暗中，生活在漆黑的夜里，完全的黑暗中。你明白吗？”

“不明白。”

“你必须明白！完全的黑暗，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你的身体很美，知道吗？”

她的脸红了。凹陷的面颊突然红似胭脂。

“我独自住一个套间，离这很近。”

她抬起头，现在才敢正眼看我，用目光询问我，了解我，竭力地想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走。”她说。

二

我不仅熄了灯，而且拉上了双层窗帘。她躺在我身边呼吸。她的呼吸并不吃力。她不要我帮助她脱衣服。

我看不清，什么也不清。但是我仍然知道现在她正一动不动地等待着。我谨慎地伸出一只手，直到碰到她的胸部。

这样的触摸给了我一种强烈的刺激。我就这样摸到了她的腹部，她的下身。她的双手也摸到了我。

此刻我感到，我应该自己（也让她）戳穿我自己制造的或试图制造的那种谎言。那仿佛是一道闪电。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不是那么回事。

我不得不求助我所有的全部勇气去做。我的手慢慢地向她的脸上移动，摸到了那个可怕的凹处，接着开始轻轻的、信服地、确信无疑地抚摸它。事实上，我的手指（起初有点发抖，后来渐渐地平静了）不只一次地摸到了她的泪水。

这时，我没有料到，她的手也伸到了我的脸上，一次又一次地抚摸那块伤疤和那块光滑的皮肤，那个没有胡子的荒岛，我那块倒霉的烧痕。

我们一直哭到天亮。不幸的人，幸福的人。我起身，拉开了双层窗帘。

朱景冬 译

另一个我

这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长裤的膝部打着补丁，他喜欢读连环画，吃饭时呱嗒嘴，喜欢用手指挖鼻孔，午睡时打鼾，他叫阿曼多。一切都很平常。只有一件事例外：他有“另一个我”。

“另一个我”目光里流露着某种诗意，他暗恋着女演员，谨慎地说谎骗人，黄昏降临时心情激动。“另一个我”使年轻人阿曼多很伤脑筋，使他在朋友们面前感到尴尬。另一方面，“另一个我”还很忧伤，因此，阿曼多不能像他希望的那样做个普通人了。

一天下午，阿曼多疲惫不堪地下班回来，脱了鞋，慢慢地活动着脚趾，并打开收音机。收音机正播送莫扎特的乐曲，但是年轻人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发现“另一个我”在伤心地大哭。一开始，年轻人急得不知道怎么办，但后来他镇静下来，严肃地训斥了“另一个我”一顿。“另一个我”没有吭声，但是第二天早晨寻了短见。

最初，“另一个我”的死对不幸的阿曼多是个严重的打击，但是随后他想，现在他可以做个完完全全普通的人了。这个想法使他振作起来。

他只戴了五天孝就出门去显示他那新获得的完全的普通人格。他老远就看见他的朋友们走来。这使他心花怒放，立刻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然而，他的朋友们从他身边走过时，却没有注意他的存在。更不幸的是，年轻人听见他们议论说：“可怜阿曼多。想不到他看上去这么结实，这么健康。”

没有办法，年轻人只好停止大笑，与此同时，他觉得胸口堵得慌，非常像心头涌起的一股思念情绪。但是他不能感到真正的忧伤了，因为他的全部忧伤早就被“另一个我”带走了。

朱景冬 译

我要把毛里西奥叫来

“阿利——里奥”。“阿利——里奥·本戈亚”。那个人声嘶力竭地叫喊，为的是在早晨七点半让人听见。但是那个人就在那里，他挥动着双臂，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喊着“阿利——里奥”，与此同时，公共汽车和大卡车一辆一辆从他和我之间驶过。而我，就是阿利里奥·本戈亚，只是不知道喊我的是何人。

当红绿灯变红了时，那人从停下来的一辆小汽车和一辆大卡车之间跑步穿过了马路。不等我做丝毫的躲闪和分辩，他就牢牢地抓住我的一条胳膊，既不容我怀疑也不让我喘一口气。

只是到这时我才认出他来，但不是根据他的声音或他那种表达热情的方式，而是根据他冲着我的耳朵呼出的那股灼热的气息。他是毛里西奥，不错。他是毛里西奥·莱莫斯。我们起码有 15 年没见面了。从他现在的样子看，他就像过去在银行工作的那个干瘦的毛里西奥的一个胖大叔。

他要我们去喝咖啡，加奶咖啡，啤酒，只要我不溜走，喝什么都行。“15年没见了，老朋友，你依然如故，只是多了几根白发，你是如何保养的，因为看上去你不过40岁出头，对吧？47岁。我早就说过，我早就说过。谁也不会再给你46岁。”他格格地大笑一阵，因为他像往常一样确信，他讲的笑话无与伦比。

我微微一笑，不知道是赞成还是发傻。当然，我们去了咖啡馆。我绞尽脑汁回忆他妻子的名字。她叫玛鲁哈？不记得了，唉，不记得了。随后又想到了卡洛塔，她怎么样？不记得了，唉，不记得了；最后又想到了桑德拉。也不记得了吗？“你疯了，桑德拉是一件珠宝，不是废旧金银器，不同其他。桑德拉是实心的金子。”我无缘无故地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表情，从屁股兜里掏出手帕，仔细地擦眼镜，眼镜当然不脏。其实，我是面对这个什么都记得的毛里西奥不知道该做什么，说什么，期待什么。他一面大笑，做怪相，一面列举我的成功，我的失败，我的爱情，我的仇恨，他无所不知，包括我不记得的事情。

“因此你流亡了，流亡到何处？你别对我说你丢了那份重要材料。对了，我知道你去过墨西哥、法国、西班牙。对了，你没有去荷兰。”“你说得对，我没有去荷兰。我想知道你的健康状况，必须谈点什么。我不仅没有去荷兰，而且我还失去了半个胃。”他开心地笑着。“我长了一个瘤子，一种丑东西，不过你看到了，我活下来了，我就在这儿，只是不知道待多久。”

突然，他的笑容不见了。他那红润的面颊变成了灰色。“我很讨厌，阿利里奥，我的时间不多了。”他的啜泣不刺

耳。此刻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最后的期待是知道这个结实的家伙，这个引人发笑的人，这个满面春风的人，被判刑。他用一种自然而朴实的语调讲话，请求我原谅。“我不会把事情告诉任何人，我从来不喜欢受害者的角色，不过你总是让我觉得你可以信赖，我如果不把事情告诉任何人（因为连桑德拉都不知道），我会憋死的。你知道，要想一个人受用，消息是很多的。”

我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胳膊上，一时想不出别的事情，找不到什么话对他说。在交流方面，我是个失败者。突然，他站起来，留给我一张名片，说“再见，阿利里奥，遇见你很好。”他像来的时候那样，从汽车和卡车中间跑过去，走了。

总而言之，远离 12 个月后，我于两个月前归来了。城市是原来的城市，也不是原来的城市。人行道上的花砖还是那么松动，从香蕉叶子间透下来的还是那样的太阳光，早起的姑娘们还是那么简朴、美丽，光线昏暗的柱廊还是老样子。但是也有一种暗淡无光、破败不堪的景象，是新出现的。人们的目光里有一片阴影，步调上透着疲倦，人与人之间相距遥远，这一切和 15 年前开始显现的情况截然不同。

在每个街角，每个报亭，都明显地展示着日报、周刊、杂志。人们停下来看大标题，但是购买的人不多。显然，要了解消息，得靠广播，听广播是免费的。再说，一张报纸比一公升牛奶还贵。

“你好，堂阿利里奥”，一个报贩招呼我，几乎 10 年前，我是他的顾客。“几时回来的？”我向他背诵了我为了回答惯常的问题而记住的日期。“你了解情况，你旅行回来，请告诉我，按这样的价钱出售，东西也像这儿那么令人厌恶吗？”

对了，这是另一种令人厌恶的方式，消费水平低么。多不幸，不是吗？堂阿利里奥，知道的人对我说，消费水平低是一件极好的事。不是好事，是什么呢？但是解释不清。我买你一张报，好像找个借口跟你说再见似的。”

我仍然一个人走路，在陆续到来的但是姗姗来迟的人群中间游荡。公文包、手提包、打补丁的长裤、未穿袜子的鞋子、去年的裙子，从我身边掠过。激怒的眼睛、画得很糟的口唇、早谢的秃顶、像自言自语一样伸开又合上的手，从我身边掠过。

昨天，我打听过六十年代的三位朋友。两个已经死去：一个死于意外事故；另一个在身上洒上汽油，自焚了。幸存的那一个用另一种方式被火化。他曾跟士兵合作，干过大买卖。今天在布莱瓦尔有一套楼房，在巴拉·德·马尔多纳多有一幢豪华的乡间别墅，此外他还和一位最富有的客栈房主的二女儿结了婚。当政府宣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达到三千多美元时，他默默地用自己的人均产值证明了。

那么，我是此地人了。请注意，我并没有肯定，更确切地说，我是问自己。我是此地人吗？在尝过关于个人身份的苦酒之后，请来一杯波尔多茶吧。12年间，我忘记了细节、街角、姓氏、地址、电话、轶事。同时恢复了联系、景致、形象、声音、拥抱、忠诚。我怀念引起我怀念的地方。然而我相信，我几乎确信，我是此地人。

我如果勉强活着，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我的过错。每一口井都是我的井。梅塞德斯和佛罗里达的那种不寻常的垃圾，也是我的垃圾，我的碎石，我的瓦砾。在不和睦、大小仇恨、坍塌的桥梁、心灵的迟钝、孤独的窃窃私语和显而易

见的小气方面，我都有一份。

其实，我的古怪，我的落落寡合，并不是重要消息（不像毛里西奥那么可怕的消息），而是不重要的、极小的消息，不过不管怎样，我不打算独自受用它。明天我一定要把毛里西奥叫来。

朱景冬 译

诗 歌

(朱景冬 译)

每个城市都可能成为另一个

当爱心改变城市的模样
每个城市都可能成为另一个
当怀着爱心的人把城市走遍
每个城市都可能变成许多个

爱心经过一个个公园
在鸟儿们的节日
和松柏的布道中间
几乎未注意它们
但是把它们爱怜

当爱心把墙壁描绘
每个城市都可能变成另一个
在临近黄昏的面孔中
有一张是爱心的面孔

爱心到来，离去，归来
城市是爱的怀抱和黄昏
爱心的平静和阵雨的见证

如果爱心一去不复返
城市会厌恶它的秋天
因为留给它的只是痛苦
和爱心的雕塑

你 有

——献给尼古拉斯·纪廉

超越善与恶，
你最好的日常冒险
是对付你得到的、
你提炼和维持的朴素生活。

夜晚没有了人质，
阳光从你的诗和窗口进入，
你用古巴的语调说，我有，
你说你有，当然你就有。

人民在那么多天空下倾听着你，
因为你很容易找到
只有大多数人歌唱的方式。

凭着你的八十位、你的二位祖父母
和那颗孩子的心，
你就有了一切，
胡安和一切，尼古拉斯。

罗多尔弗把现实变成……

罗多尔弗把现实变成他的杰作
他用艰难的问题包围答案
他对真理有一种令人恼火的热爱态度
如果知道他善于用他那失眠的面孔
他那做见证的苍白的眼睛
他那冷若铁石的见解
他那假日中警察般严肃的态度来伤人
敌人怎么能不憎恨他

罗多尔弗把现实变成他的杰作
他进行调查，甚至达到痛苦的严格极端
他像去掉薄果皮一样抛弃借口
他以他最好的朴实态度进行冒险
他愤怒地向希望发动进攻
一直斗争到他的新闻被劫持

但是他还有其他的情节都不轻的过失
既然他的女儿被敌人杀死
敌人怎么能不憎恨他

罗多尔弗把现实变成他的杰作
一个人可以在任何争论中把它打开
无辜和热情、和平和战争从书中飞出
惊异的居民善于以正确的尺度
理解他那种极其朴素的内心的公正
如果他是正确的
且不为知此而感到羞愧
敌人怎么能不憎恨他

诗 人 们

诗人们在代表大会上
在晚会上监狱里选集中相会
有的在著名教科书里收获颂歌
有的受到纯粹的指责的包围

诗人们在机场上拥抱
他们的比喻拉响了海关的警报
他们常常在别人的朗诵会上打呵欠
使得朋友们也在自己的朗诵会上打呵欠

诗人们在每年的博览会上安家
臂肘挨着臂肘签署他们潦草的名字
活动结束后青年们胆怯地走来
他们由衷地感到愉快

诗人们在专题讨论会上相遇
为了得到和平却总是得不来
有的得到奖赏
有的受到不当的惩罚
他们是偶然的来自多方面的少数派

他们的最好酬金是受到充分讨论
严格的探讨展示了他们上的台阶
分析家寻求差异
诗人们却
常常抛开某种不同使讨论更有生气

诗人们常去小酒馆和博物馆
他们回答得少提问都不断
问题狂妄或简单
而有时
他们以自己的交际方式爱上不可思议的缪斯

他们饮酒争论沉默推断评价
但是当一天结束他们准备回家
却知道他们只要和自己的灵与肉相伴
诗就会到来
如果它想到来的话

不吓鸟的稻草人

小菜园对稻草人并不重要
对他那种无偿的义务却感到厌倦
不仅如此，戴着破帽子
穿着破衣烂衫，他感到寒酸

鸟儿对稻草人并不重要
但是他发觉一只普通的苍蝇
在他的木头手臂上爬行

鸟儿确实飞走了
但不是他吓跑的
而是因为暴风雨来了
暴风雨可不是假的

打在窗上的小石块

——献给罗伯托和阿德莱达

快乐不时地把小石块
打在我的窗上
它想告诉我它在那里等待
但是今天我觉得平静
我几乎平静地说
我要把痛苦掩藏起来
然后面朝屋顶躺下
这是一种洒脱而舒适的姿势
便于过滤和相信消息

谁知道我所留下的足迹在哪里
我的历史何时才能得到计算
谁知道我还会杜撰什么建议

为了不听从它我会想出什么好主意

好吧，我不再玩绝望的游戏
不再用忘却给回忆文身
有许多东西需要讲和保持沉默
也有许多葡萄用来填进嘴里

好吧，我被说服了
快乐不再扔小石块
我将把窗子打开
我将把窗子打开

缓慢但是到来

未来缓慢地到来
缓慢

但是到来
现在它在
厚厚的云层那边
它在几座
还看不清的山峰那边
它在雷鸣
和蜘蛛那边

它来时显得
像一朵顽强的
守护太阳的花

也许因为这个

日常生活
才准备欢迎它
才偿清高利贷
敞开原始的记忆

但是它
不慌不忙
缓缓地
 到来
带着它的答案
它充饥的面包
它的受伤的天使
它的忠实的燕子
缓慢
但是不懒惰

不傲慢
也不令人扫兴
只是
带着它的细长叶子
和它的天平
走来
它首先
寻问梦幻
然后寻问祖国
躺着的

和新产生的记忆

未来

缓缓地走来

带着它的星期一和三月

带着它的拳头、黑眼圈和建议

缓慢但是急切

像一颗

还没有名称的可怜星体

正在康复

缓慢

良心不安

清高

十分庄重

我们和偶然性

创造的那种

有经验的未来

我们越来越多

偶然性越来越少

天 堂

刽子手通常是天主教徒
他们相信神圣的三位一体
他们把折磨人
作为反对基督教死敌的方式
但他们死后不能进天堂
因为天堂不接受杀人的罪犯

但是被他们杀死的人是殉教者
甚至可能是天使或圣人
他们宁肯粉身碎骨也不背叛
但是他们也不得进天堂
因为他们不相信天堂存在

维 护 快 乐

——献给特林尼

维护快乐像守卫一条战壕
维护它免受丑闻和陈规
不幸和不幸的人
暂时的和最后的
侵扰

维护快乐像维护一条原则
维护它免受令人惊讶的事和噩梦
中立和中子
甜蜜的丑事和严格的诊断
破坏

维护快乐像守卫一面旗帜
维护它免受雷电和忧伤

天真的人和无赖
浮夸和心脏停顿
地方病和研究院
侵袭

维护快乐像卫护一种命运
维护它免受大火和消防队员
自杀者和杀人者
假期和苦恼
享受快乐的义务
损害

维护快乐像维护一种准确性
维护它免受氧化物和恶习
时间的著名铜绿
夜露和机会主义
带着笑容的淫媒
侵害

维护快乐像卫护一种权利
维护它免受上帝和冬天
大写字母和死亡
姓名和遗憾
偶然性

 还有快乐
侵犯

天真的国家

我要找一个天真的国家

——朱塞佩·翁加雷蒂^①

有的像侵略者
有的像被侵略者
哪个国家
不丧失天真

不过还有
一个天真的国家有何用？
怯懦的边境
天真的省份

^① 意大利作家（1888年～1970年）。

有何重要性？

只有那些
失去天真的国家
才能辨认敌人

所以我不呼唤
天真的国家
不管怎样我要寻找
一个陌生的国家
它能够宣布
自己是
天真的罪人

综 合 症

我几乎还有全部的牙齿
几乎有全部的头发和极少的白发
我能够创造爱和破坏爱
能够两级两级地爬楼梯
能够跟着公共汽车跑四十米
就是说我不应觉得自己老
但是严重的问题是
以前我没有注意这些具体问题

四 面

北面是
愤怒的山丘
南面是
希望的火山
东面是
忧伤的高原
西面是
平静的海湾

此外还要说
要成为
 罗盘
这一切
还缺少许多

宣传者何塞·马蒂

你的名字像熔炉
里头熔化着英雄业绩
你的名字像甘蔗
凭借雨露和阳光变甜蜜

只有你的人民
才是自己的新命运的主人
人民出现在你的梦中
你的人民终于获得自由

宣传者何塞·马蒂
你没有在宣传中死去
你的诗永存
它是全体人民的宣传品

你的岛出口夏季
 那里有凤凰木和正义
 肥沃的好土地
 为古巴人结出果实

你的名字像熔炉
 里头熔化着英雄业绩
 你的名字像甘蔗
 凭借雨露和阳光变甜蜜

你那么质朴那么洋溢
 那么善良那么自豪
 那么坚强那么高尚
 那么矮小那么高大

你是一个十分深刻的岛上人
 一个十分清晰的古巴人
 在你的土地和你的梦中
 你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拉美人

你总是让我们保持清醒：
 通过你那永恒的目光
 通过你那清醒的方式
 和你那双睁大的眼睛的信仰

你的名字像熔炉

里头熔化着英雄业绩
你的名字像甘蔗
凭借雨露和阳光变甜蜜

海上的瓶子

大海，一种偶然
——维·维多夫罗

我把这六行诗装进我的瓶里，
怀着这个秘密想法把它抛进大海：
有一天它漂到一处几乎荒凉的海滩，
一个男孩捡到它后把它打开，
他取出的不是诗行，
而是急救物品、警报、海螺和小石块。

英 雄

我住在一个地区
那里的英雄死于大火和勇气
但是不管怎样
他们在发光闪烁
仍然光彩熠熠
他们活在孩子们的眼睛里
他们在高大的障碍物上出现
他们改变
赞成
陪伴

但是在我的遥远国家
那里也有英雄
他们却不能
高声被人提起

不能被一面旗帜拥抱
甚至不能被哭声暗示
很简单，他们不准
作为尸体存在
更不能
作为闪光的尸体存在

唉，可是谁能避免
那些非法的死者
在他们那坚不可摧的地下
密谋呢？

陈词滥调

我用双眼
望着
两种景物

这里是犁地的声响
一沟连着一沟
那里是居留地的
放牧

这里是金光闪闪的
芒果
那里是毛绒绒的
桃树

这里是令人信服的

凤凰木
那里是雾气笼罩的
松树

这里的下午在下雨
像一种仪式
那里的草原人
在指挥

这是分别
描述景物的
陈词滥调

但是如果它们
在我的双眼中相邻
陈词滥调
就会异乎寻常

那 场 战 斗

怎么能
将死亡的
毁灭性
同这种生活的
不可抑制的热望相比？

怎么能
将莫名其妙的恐惧
同一时的和真正的爱情
引起的强烈快乐
联系？

怎么能
将石碑同耕地并论？
将钐刀

同石竹相提？

难道这就是人？
就是那场战斗？

可 能 性

每当一位地主

宣布

他要夺走我这块土地

他们必须

从我的尸首上走过去

他应该考虑到

他们有时

会那样走过去

新的洋际运河

我建议你修建
一条新运河
不用船闸
也无需借口
让它最终
将你大西洋的
目光
同我太平洋的
天性
连接在一起

回 击

如果有人
盲目地
惩罚你
唯一
有效的回敬
是睁着眼
予以
回击

让我们破除关于银河的神话

同样不应制造关于银河的神话
拉卢斯词典说那是一条发白的带子
是由无数颗星球构成的

不管怎样，那是一座屋顶
整个是那么光辉灿烂
尽管归根结底有点令人厌倦

有人称之为圣地亚哥之路
着迷地注视沥青的人
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

有时它仿佛是
对地区的天象仪的粗糙模仿
它也许是南半球的一份礼物

但是现在我们不鼓励馈赠

此外，如果你仔细观察它
就会感到目眩头晕或颈痛
或莫名其妙地想飞行

不应该制造关于银河的神话

那么
既然我彻底戳穿了银河的神话
我还会重新怀念它吗？

当 场

当你永恒地旋转时
世界
我捕捉到你

我们这些胆大妄为的人
将阴影变得完美
耗费我们的痛苦
把天空缚住

你将
永恒地旋转

我们这些骄横无礼的人
织补一个个伤痕
逐步把郊区
建成市中心

你将
永恒地旋转

无论相同还是不同
我们都交付赎金
无论弱者还是专横的人
我们都不能乱爱

你将
永恒地旋转

当我们费心操劳
或者活生生地做梦时
我捕捉到你

世界
我破除你的神话
祖父

当你
永恒地旋转时
你像漫不经心
丢弃着一个个碎片
死亡的小碎片

另一个天空

一个不属于你的陌生天空

——切塞雷·帕韦泽^①

没有海绵能够擦洗天空
尽管你能给它打肥皂
然后用一桶桶海水冲洗
把它挂在阳光下晾晒
但你总是缺少一只沉默的鸟儿

没有办法能够触摸天空
尽管你伸得像棕榈那么高
在神志不清中触到了它

^① 切塞雷·帕韦泽（1908年～1950年），意大利诗人、小说家。

终于知道摸到它的感觉
但是你总是缺少棉絮似的云朵

没有桥能够跨过天空
尽管凭着记忆和预测
你能够到达对岸
证明事情并不困难
但你总是缺少黄昏的松树

这是因为那个天空不属于你
尽管它无所顾忌，不知羞耻
相反的，当你到达属于你的天空
你并不想洗它，摸它，碰它
但是那里有鸟儿、云朵和松树

异 常 状 态

一个只在明信片上见到的海湾
一个记忆中的复杂地区
一种罕见而美味的水果
一个已无人光顾的郊区
一只在栏杆上出神的鸽子
一首为知了和钢琴准备的乐曲
一个没有直升飞机的黄昏
一团飘浮在远方田野上的烟雾
暴雨过后的万里晴空
平静的雕塑和轮廓
可能已变得陈旧
那种透明的异常状态
我们愈来愈感到不适应

手 风 琴

我讨厌供认它
但生活也是一架手风琴
有人说是上帝弹它
我却相信是手风琴手
因为上帝几乎不弹风琴
并且弹得很蠢

无论是谁弹琴，
反正他用一个单纯的动作
就把我们拉长
然后把我们压缩得几乎等于零
当然他要我们供认
呻吟变成叫喊
希望变成快乐的椎骨
就像回头的浪子

尤其像迭句

我讨厌供认它
 因为在今天
 的确没有多少人
 喜欢成为探戈
 自然的倾向
 是成为伦巴或曼博或恰恰恰
 或梅伦盖或博莱罗或也许娱乐场
 不得已时成为小华尔兹或米隆加
 绝对不成为进行曲
 但是当上帝或皮丘克^① 或无论谁
 把手风琴的生命掌握在手里
 并暗示它哭泣或快乐
 你总会感受到成为探戈的可怕廉耻
 并放声歌唱
 根本不记得
 匣子还在那里等待

① 皮丘克，手风琴的别称。

郊 外

在我生命的中心
在我生命的首要核心
有一个光辉的源泉 一个喷泉
它举起五彩缤纷的信念
观赏它 注视它 十分美丽

在我生命的中心
在我生命的首要核心
有一种痛苦 它一寸寸
赢得它的时间
学习它的坚定的足迹无害有利

在我生命的中心
在我生命的首要核心
死亡远在天边

平静散发着雨水味
雨水散发着土地味

这是别人对我讲述的
因为我从没有到过
我生命的中心

做什么？

在死亡的时刻该做什么？

——罗莎里奥·卡斯特利亚诺^①

过了下一个弯道
也许应考虑它了

我知道一个年迈的同胞
他是地主
他躺在临终的垫子上
一个一个地看了看
他的泪汪汪的继承人
对他们说

哼，虚情假意的东西

^① 罗莎里奥·卡斯特利亚诺（1925年~），墨西哥女作家。

紧接着

他像个幸福的人那样振奋

当然，这样的表情
地主们是必不可少的

我要说，还不如即兴

因为你要是准备讲什么有力的话
然后像个遭打的狗那样啜泣

或者，你要是想体面地大哭
然后像疯子一样哼唱小曲

或者，你要是伸开手掌
然后握成拳头，不知是
因为党派还是因为小气

就会被指责为
言行不一或轻浮

这不是好石碑
能是什么呢

语义学实践

我们知道灵魂像生活原则一样
是一个衰老的宗教和唯心论概念
但是相反的，它的第二个概念
即火器的枪膛
却很时兴

然而必须承认
人民的语言并不严格适应最新潮流
当一位学生在康斯坦丁诺夫的书读到
灵魂的概念是幻想的和纯真的时
他吻了女伴的纯真的和幻想的口唇
他的女伴不了解那第二个概念
尽管这样，他还是用整个灵魂对她说
我爱你
显然，他并不是暗示
他用整个枪膛爱她

两种语言的时间疗法

如果一个男孩读我的诗篇
我会觉得自己一时变得年轻

相反的
当一个女孩读我的诗篇
我却希望钟表的嘀嗒声
变成嗒嘀声^①
或更确切地说
变成嗒嘀声^②

① 西班牙文为“tacfic”。

② 原文为法文“un tacf: que”。

没有时间的时间

我需要时间 需要那种
被别人抛弃的时间
他们把它抛弃 因为
它多余 或者他们不知道
该怎样把它处理

时间
白的
红的
绿的
甚至深褐色的
我不在乎它的颜色
纯洁的时间
它就像一扇门
我可以打开
也可以关闭

我需要时间
 用来看一棵树一盏路灯
 用来沿着休息的刀刃向前走
 用来思考今天不是冬天有多好
 用来死去片刻
 随后诞生
 用来明白事情
 用来鼓励自己
 我需要时间 必要的时间
 用来湿润生活中的若干钟点
 用来了解我为什么感到痛苦
 用来习惯于我的古老骨架
 我需要时间
 用来躲藏在雄鸡的歌声里
 用来消失在马的嘶声里
 用来度过白天
 用来度过夜晚
 没有顾忌和没有种表的时间

应该说我须要
 即我需要
 比如说我需要
 没有时间的时间

踪 迹

一个遥远的国家可以在附近
可以近在咫尺
但是它也可以慢慢地离去
直到它的踪迹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
用猎犬或雷达跟踪它

惟一可行的办法
是在自己身上挖掘
直到找到地图

遥 远

想起在一个遥远的雾蒙蒙的从前
你每日每时都是少年
你在手指肚上发现
多种多样的生命表层
现在有时你能在指甲上感觉到生命

在那篇痛苦的短短的序言里
你却提到你像一名
从没有上过轮船的遇难者
也像一只
谁也不去破坏的沙漏

但是你还提到你像一种预兆
今天你和它具有深刻的不同

日常生活（一）

日常生活是另一个瞬间的瞬间
那另一个瞬间是人的全部生命
但是那个更大的瞬间的瞬间
多少瞬间不能够有

每片绿叶都在阳光中摇动
仿佛在延续它们那不可言喻的命运
每只麻雀都在盲目地跳动
似乎在嘲弄时间和空间
每个男人都在拥抱一个女人
仿佛这样就抓住了永恒

其实所有这些固执行为
都是驱除死神的朴素举动
都是以胜利的节奏遭到失败的战斗

都是拒绝了解
其不公正刑罚的固执犯人
和变得心不在焉的人的作为

日常生活也是许多瞬间的总和
大体像那些
不断落入深渊的尘土微粒
但是每个瞬间
即每个尘土微粒
也是一个有着
黄昏和大教堂
庄稼地和人群
交欢和下船
醉鬼和殉难者
及小山的丰富宇宙

为了在转瞬之间
用一种不为其大胆的
短暂的
不可取代的
 光线
感到害羞的目光
一览宇宙这个瞬间
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日常生活（二）

当一个人
被从梦境中踢出
黎明总是昏昏沉沉

它从死亡的排练中出现
仍然打着前夕的印记
如果由于仇恨
就带着仇恨的残余
如果出于爱情
就带着爱情的果实

但是白天开始召唤我们
它和其他白天不同
它有另一种雨另一个太阳另一种微风
也有另一些可怕的秘密

这样就开始了同工作日的对话
 开始了争论并交换怨气
 突然开始拥抱
 因为有些日子充满傲气
 有些日子带来死敌
 另一些日子是永久的伙伴
 是为我们记录生活的兄弟日子

这样就产生了味道
 无味
 手是链子
 女人是口唇
 眼睛是景致
 当一个人
 终于被从不眠中逐出
 便闭着眼睛
 从生命的演习中走出
 并缓慢地
 像寻找梦幻或南方的十字架一般
 摸索着进入无名的夜晚

我 在 彼 岸

我在大洋彼岸
在帕尔玛·马约卡
确切地说在戈米拉广场
总是那么醉醺醺的美国海员
瑞典法国英国荷兰的游客
直到马约卡人都曾寻找它

一部分街道进入我的阳台
连同它的肥胖妓女
和它的骨瘦如柴的男人
还按照不同的时间
带来霓虹灯和平静的故事
甚至一位忧伤的蹩脚女舞蹈演员
她热切地表演她的热病的痛苦
却没有一个同情者鼓掌或观看

当时我已开始
在西班牙的艰苦学习
觉得漂泊或被抛在那里
除了在海外的焦虑
我没有别的设想和掩体
除了不幸的命运
我没有别的未来
除了我的呼吸
我没有别的保证

我在大洋彼岸
没有布宜诺斯艾利斯
也没有蒙得维的亚
没有哈瓦那
也没有墨西哥城
没有基多
也没有马那瓜
只是在戈米拉广场上
面对我另一次流亡的处境
我喜欢广场尽头的贝尔维城堡
作为娱乐那里有飞碟

傍晚它给我们留下痕迹
合谋的眼色和疑问
但是我真正喜欢的是布景

它虽不热情
但是我喜欢
尽管我不能和耳聋的主人公
也不能和一般角色沟通
但是在漫长的一天
我用肝和支气管
用手指和胃
还有修补过的白内障观看

天空布满极细的蓝脉
房舍是那么洁白
那里有爬藤植物和天竺葵
房子像在昨天或二百年前盖成

相反的，在夜晚
我用我的肩和我的口唇
我的肾和我的鼓膜与胰腺观看
总是用我的忠诚的白内障观看
尽管现在它不那么眼花缭乱

我在大洋彼岸
电话传来三声呼救
一个极其遥远的结巴的声音
说海德于昨天逝世
并且又说了一遍
也许既不是为了劝慰我

也不是为了真地劝慰自己。

海德于昨天逝世
 五年前那个声音
 在我失灵的耳边说
 在那个广场上
 听到这个消息
 很难也不可能
 把那种残忍的死亡
 同十四五年的相处联系起来
 在我不安定的命运和生活中
 海德徒劳地开辟着道路
 海德是我的没有哮喘的哮喘侣伴
 海德没有那个家没有她的美洲
 海德没有人保护也没有光线

我回到阳台
 那是在晚上
 不知为什么天色突然变暗
 没有光线没有轰响
 没有酒吧没有夜总会
 没有迪斯科舞厅
 没有胖女人
 也没有瘦男人
 都已不见踪影
 也许这就是寂静和黑暗

瑞典人和法国人
英国荷兰和德国人
都已不见踪影
海员比任何人消失得都早
贝尔维城堡已不在那里
洁白的房舍和天竺葵
以及二百年来或从前一日起
挂在墙上的爬藤植物也消失不见

但是却有一道堤坝
对付席卷一切的
不属于地中海的巨浪
还有一座
供白种黑种和混血大学生
健身的体育场

稍远处是绘着
委内瑞拉墨西哥
巴西智利乌拉圭
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
图画的墙壁
和一幅绘着紫色葡萄架的油画
还有两三张切^①的阿根廷画像
到处是默默哭泣的面孔

① 即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

那幢不幸的房子
已经没有了海德

我在大洋彼岸
但是那个晚上
我望见了一个死亡的新省份
甚至看见一种陌生的爱的形式

只有在我们那些火热的国度
我们才能允许
以令人激动的排场
对待一个在历史上
未受损害的
唯一燃烧着思想
无辜、宽容和英雄主义的人物

她放掉蝴蝶
松开伸给同类和不同类的手
安慰和深渊
污点和神志错乱
气愤和痛苦
梦幻和宽厚

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这样在我们痛苦的
和被遗忘的人民中间发生

我们常常以可怕排场
对待古历史上受伤的
一个火热的不驯服的纯洁人物
根本做不到
也许不值得
让他燃烧下去

海德死去了
这是真的
有人把此事
永远置入我不相信的脑海里
我望了望天空
一无所见
但是我知道
当后来白天归来时
天空的极细的蓝脉
将洒下
无可抚慰的
倾盆大雨

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

一位精明的批评家终于指出
(我早就知道会被发现)
在我的短篇小说里我不公平
并亲切地规劝我
应像任何一个可敬的知识分子那样
采取中立态度

我相信他是
我对的
不公平
对此我毫不怀疑
但是我还要说
我是个不可救药的偏袒者
总之是个不可救药的人
因为无论我怎么努力
我总是难以保持中立

为了改变我的偏袒态度
本大陆好几个国家的
杰出的专家学者
进行过一切努力
譬如在我国的国家图书馆里
人们对我有倾向的图书
进行了不公平的清理
在阿根廷官方限我在 48 小时内
带着我的派别性离开
(不然就把我杀死)
最后在秘鲁
人们把我的派别性隔绝起来
把我放逐他乡

如果我保持中立
我就不需要那些疗法
但是我怎么办呢
我是个偏袒者
不可救药的有倾向的人
尽管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我是个完完全全的偏袒者
我很清楚
这意味着我不能希求
那众多的荣誉和名誉
声望和高位

那都是世人
为可敬的知识分子
即为那些中立者留的
但是中立者愈来愈少
所以荣誉便在
一小撮人中间分配

不管怎么说
从我供认的局限性出发
我应该承认
对那少数中立者
我还是怀着一定的敬意
或更确切地说
我怀着几分赞叹
因为事实上
面对基隆滩
特雷莱乌

三文化广场

潘多

这些事件和金钱
要保持中立
的确需要一种钢铁般的意志

当然在私生活中
一个人可以偏袒一方
在文学上可以保持中立

比如说失眠时
对皮诺切特满怀气愤
关于阿特兰蒂达
写一些白天的故事
也许这是批评家想对我说的
这个主意不坏
显然它有优越处
一方面你心中有矛盾
这一向被认为
是艺术的一种美好养分
另一方面留出肋部
让资产阶级的
或中立的报刊抽打

这个主意不坏
但是
在被淹没的大陆上
我发现或想象到了
被压迫者和压迫者
偏袒者和中立者
受拷打的人和刽子手的存在
就是说来自未被淹没的大陆的
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
那种斗争

所以

对优越的中立来说
似乎我已一筹莫展
我是彻底完了
可能的选择只能是
继续写不中立的短篇小说
不中立的诗歌和随笔
歌曲和长篇小说
但是我明白
即使不表现酷刑和监狱
和其他看来让中立者受不了的主题
我的态度将始终如一

即使表现蝴蝶和云彩
鬼怪和小鱼
我的态度将始终如一

明 天

祝福你 明天的河流
你所坠入的未来
无限的时间碎片伴随你到来
尽管它们一天短似一天

还有不可动摇的魅力
建造幸存的怀念
鸟儿的飞翔
它们知道乌托邦歇息的宁静

如果我凝神沉思
即看不见你也不知道你预言什么
如果我蜇居在我的瓦砾中
谁也不能把我从这么多废墟中救出

但是如果我对你的岸畔的绿色
完全敞开我的冬天
也许我能够学会
用距离把你的树丛同我的分开

祝福你 明天的犁沟
连同你那疲倦的重复
种子的运气将从一只
播种的大手上降临于你

鲁 文 祖 父

肯定你从没有写过：

“一个世纪是一瞬间”。

更没有写过：“一百年，多么疯癫”。

你的确击打过悦耳的古钢琴，
直到让它发出你寻找的音调，
或者曾把句子的脆弱横穿磨光，
就像某人为一定可能的夜莺
迅速准备一个不可能的笼子那样，
也许你曾用阿特兰蒂达、农牧神、
侍童、摩西，甚至安哥拉女王，
来说明某种像你的突然的年龄那么
简单的东西
或者你那昔日黎明的闷热情况。
我竭力想象

在你百年中的这个严峻的一月
和我们的三分钟里，
你怎样得以称量

你那走私的教育学的佳馐美酿。
于是我相信发现了另一些有益于健康
的悼亡经，
大致像提心吊胆的结算一样。
归根结底，我们已知道，
公主们为什么那么忧伤。
不仅仅公主们。警察、总理、
肥皂泡的制造者和国务卿，
在他们的金椅子上同样面无灰浆。

归根结底，我们已知道，
宦官为什么怒火满腔。
不仅仅宦官。生锈的清教徒、
矫形术的审查官、贫穷的详细恢复者，
最后还有亚洲胡狼，
都为你那可怜而可笑的猩红热遗产打仗。

据说，那是在另一个时代，
在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
你那些侯爵夫人和一色的天鹅不适宜，
饥饿的纯朴男人不在乎
你提议为单峰驼规定的
蜂蜜和玫瑰的有节制的饮食。

不过，这都是简单的说法。
确实、生动、奇特的是，
你放飞了一个关于传说中的
不那么真实的仙女的故事。

让我们谦虚地当一次学者，
尤其要当一个公正的人士。

我们要依靠正义和我们的面包
维护你梦想言语、
征用字典和神话、
控制一切空闲的美丽事物的权利，
就像袭击敌人的火药库，
在自己的胜利中让它飞天坠地。

你没有写过这句话。
但是多亏你，
我们无愧于以你的名义说：
“一个世纪是一瞬间”，
更无愧于以我们的名义想：
“一百年，多么疯癫”。

我和小蜥蜴一起

我和飞快的小蜥蜴

一起

跑遍一个个牢房

利维尔

劳尔

埃克托尔

何塞·路易斯

海梅

埃斯特尔

赫拉多

扁鼻子

丽塔

毛里西奥

弗拉维娅

老头儿

在为大家服刑
受罪

我和受欢迎的
飞快的
小蜥蜴一起
把他们留在这里那里
带着伤疤留在铁窗里
或将可敬的面包渣
可信赖的寂静
放在小匙上
并为他们的存在表示谢意

恒久的蟋蟀

在这没有烦恼的夜晚
我想起我的废墟
于是我下到我的地狱
蟋蟀在它那恬静的匿名中
一动不动地唱着新的无疑

当我摇动我的枷锁
逼近的死亡搅扰着我
在某个神奇的阴暗角落里
蟋蟀在持久而秘密地唱歌

当我在梦中分辨爱和恨
并醒着宣布
无情而无条件地分手
蟋蟀在以蟋蟀的名义唱歌

知道或不知的焦虑
在半明不暗中燃烧
与我有关但并不重要
小小的蟋蟀像工人一样顽强地唱歌

现在一切都清楚

当卡特总统
那么
关心
 人权

似乎很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
权利
不意味着能力
或属性
或自由意志
而意味着右
或左的对立面
或心脏的另一边
总之是右边

那么
还不是
我们开始
一场支持左派的
广泛的国际运动
的时候吗？

儿 子

倘若我有一个儿子
我不叫他
马里奥、奥兰多、昂伯特
也不叫他布伦诺、哈尔迪
就像我的人名大全里说的

我宁肯用一个单音节词
比如路易斯、布拉斯或胡安
如果是女孩，
就叫她帕斯或露丝
这样，只要出口气儿
你就可以呼唤他（她）的名字

倘若我有一个儿子
我会教他阅读

在书上、墙上
和真诚的眼睛里
我还要教他写字
但是只在岩石上
用一把灼热的刀子

这样可以让雨水
冲刷他的字迹
好让它们避免
嫉妒和小气的侵袭
即使永远没有人
走来读这些字

倘若我有一个儿子
在他离去时
除了用我这双被生活弄伤的眼睛
对他说再见
还应该做什么，也许我不知

唉 叹

我知道
夏天最茂盛的爬藤
也不足以覆盖
我唉叹的墙壁

奇怪的是
这些唉叹是快乐的
比如，唉，多愉快
唉，真是走运
唉，多好的天气

与此相反
当我的唉叹
真正不得安慰时
我却不再叹息
也没有了墙壁

挖掘记忆

孤独是一片荒漠
不过并不平静
它没有阴影
是一块纯粹的骨头

孤独是一座世外桃源
没有任何标志
夜晚它沉闷难挨
它什么也不知

孤独什么也不忘记
它挖掘着记忆
它闭门不出
它赤露无遗

沙

手指间的沙
我沉重的脚下
飞沙
好沙
我的城堡
躲藏在
你的记忆底下

请把城堡保存到
一个孩子
又一个孩子走来
用我的通行证
来拯救它

地 震

只剩下生命的空壳
立柱的彼此支撑
瓦砾的休止
令人恐惧的灰色天空

绝望的大地
呼唤着抚慰
不要忘记它
永远不要忘记它
它担心被遗弃
所以瑟瑟战栗

只要人们爱它
只要我们爱它
它就会重新给我们

无声的原谅
心平气和的爱心

谜

我们都有一个谜
当然不知道它的密码它的秘密
我们在周围触触摸摸
收集各种剩余的东西
我们在回声中迷了路
把它丢失在梦境里
恰恰就在即将把它解开时

同样你也有你自己的谜
一个如此简单的谜
小门儿藏不住它
征兆也不能把它排斥
它在你的眼里 你闭上了眼睛
它在你的手中 你把手撤离
它在你的胸前 你把胸遮蔽
它在我的谜里 你把它抛弃

岩 石

岩石的无动于衷
让我感动
引我前去

面对那种
恒心和纯洁的
范例
我怎样在
一小时又一小时
眼睛眨了又眨
一层又一层地脱着皮

尽管如此我敢打赌
岩石的无动于衷
是想引起我们
一阵无限的惊惧

仇 恨

仇恨来了去了又返回
我眼花缭乱地把它关注
它来去像一声如烟的告别
像一个影子
像一阵疼痛

它苍惶失措地来与往
它绝望而不自由
被关在遗忘的天窗后
像一种灾害
像一阵回声

它来它往它攻击
它是一把无声的刀子
它慢慢地撕扯着我

像一阵阵啜泣
像一个瞎子

然而然而它有时
可以成为一种奖励
不对仇恨报以报恨
得到它
痛苦会得到安慰

随笔 文论

(朱景冬 译)

纪念卡彭铁尔^①

几天前，当友人奥菲拉要我在纪念阿莱霍·卡彭铁尔的大会上讲话时，我想：时间太短促，肯定来不及重读他那些我多次读过的作品了。最初我觉得这种情况限制了我，几乎使得我没法在纪念大会上发言。但是后来我又想，不管怎样，我总可以讲一讲作为作家、作为他这个人、作为革命者和朋友的阿莱霍·卡彭铁尔给我留下了什么。

就这样，我没有重温他的任何作品，也没有翻阅他那丰富的书目，便同阿莱霍的形象会面了。所以，现在我才能够对诸位讲几句我从来也不敢对他说过的话。我确信，倘若他

① 作者 1980 年 5 月 9 日在纪念卡彭铁尔的大会上的讲话。

听见我说的这些话，他定会发出一阵既谦虚又难堪的坦率笑声，仿佛我对他开了个过分的玩笑。

然而，有一点我是一清二楚的：阿莱霍是我多亏文学但并非仅仅通过文学认识的最可敬的人物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阿莱霍是在 1962 年，即在智利的孔塞普西翁市召开拉丁美洲作家会议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我随同巴勃罗·聂鲁达、罗亚·巴斯托斯、阿莱霍·卡彭铁尔、卡洛斯·富恩特斯、曼努埃尔·罗哈斯去该市郊区进午餐。

和这些可敬的人物同桌进餐，我有点心慌，吃饭时几乎没说一句话。不过，除了阿莱霍·卡彭铁尔，其他人也很少开口。阿莱霍确实不同凡响，他用他那些极为动人的故事使我们得到极大的愉悦。连聂鲁达（他是非常健谈的）也高兴地保持沉默，和其他在座的人一样开心地听阿莱霍讲故事。当时我只知道阿莱霍的小说《追踪》，见到快活、有趣、活泼、机敏的阿莱霍后，我进一步了解了。他。

五年以后，我又在哈瓦那遇见了他，我们两个和曼努埃尔·罗哈斯、胡安·加西亚·庞塞都是“美洲之家”长篇小说奖评委会成员。我记得那一年参加评奖的有古巴佛朗西斯科·乔弗雷的作品《奥迪莱亚》，这个书名就好像是印错了的《奥德赛》。小说用一个古巴乡下人的语言叙述。在读这本小说时我感到很开心。但是坦白地说，要是承认对一篇远不具荷马风格的荷马式的故事感兴趣，我是有点胆怯的。然而，在评委们第一次开会时，我还是讲了我感兴趣的理由。第一个支持我的就是阿莱霍。他说，在前一天夜里单独在房间里读那个付不出帐的故事时，他不禁哈哈大笑。这部小说最后获得了那年的提名表扬第一名。我还记得我曾注意到，阿莱霍当时虽然已有

很大的名气（他出版了《启蒙时代》），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备受尊敬，但仍然非常热情、毫无偏见地对待一位新人的诙谐作品。

有一点在当时我已略知一二，后来又通过了解他的作品和人格得到了证明。这就是阿莱霍特别善于享受生活，当然不是表现在消费社会那种轻浮的享乐主义方面。阿莱霍总是过着真正典型的俭朴生活。他的奢侈品是音乐，是他喜欢的画家们的作品。他特别善于读书，尤其喜欢结交朋友。他最大的享受是人，是有着种种奇特性格的人。但是我从没有在阿莱霍身上看到某些作家那种热衷于表现周围现实中的新题材、新人物的倾向。多年来，我倾听着阿莱霍讲述的趣闻轶事和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可以成为另一些故事和长篇小说的基础。但是我确实知道，这些材料的大多数他都没有写。就是说，他有那么多、那么好的材料可以选择。因为他是一个特别关注的人，不但关注他身边发生的一切，而且关注世界上发生的一切。

在许多会议上他都保持沉默，只是听别人讲话。但是如果朋友们——他很高兴和他们在一起——包围着他，他就会打开话匣子，给大家讲故事。他的讲述方式格外机敏、幽默，讲述才能不同一般。但是他不是“明星”，更不用说在朋友圈里了。他从来也不凭借他的非凡学识吓唬人。当我们中间有人讲述一个有趣的笑话或一个美丽的故事时，他就毫不保留地为他喝采。我很少看见谁会像他那么开心地大笑。

我知道有些异常敏感的人承认阿莱霍·卡彭铁尔是个大作家，但是他们不同情古巴革命，对一位如此杰出、如此学识渊博、如此主持正义的艺术家竟会一向那么清楚地表示对古巴革命的拥护态度感到惊讶。充其量他们只承认阿莱霍的才智，尽管他具有革命的斗争精神。但是只有那些十分轻浮

的人有一天才会认为这位伟大的享受者阿莱霍将由于革命而丧失人的伟大享受，才会歪曲他完全卷入一场能够深刻改变他的人民、使人民可以完成马蒂的未竟事业的事件的行动。那些学识过人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本世纪最敏感、最博学、最高尚的人物之一阿莱霍为什么毫不迟疑地保卫一场基本上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阿莱霍把他的作品献给了无可否认是他的人民，甚至把他的奖赏也献给了人民。但是他同样也由衷地感谢人民。在承认从人民那里接受的东西即态度、理解、建议和题材时，像他这么直率的作家是不多的。

在新近写的一篇关于阿莱霍·卡彭铁尔的文章中，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回忆说，在1949年出版的《这个世界的王国》的前言里，阿莱霍对超现实主义的某些方面下了定义，如“神奇的官僚”^①。何塞·埃米利奥提醒我们注意这个问题十分必要，因为“神奇的现实”的产生也许就在于此，当然是作为一种订正。谈到这个概念时，任何一位批评家都不会不提卡彭铁尔的名字。也许就是从对超现实主义，更正确地说是对超现实主义的某些曲解和咬文嚼字的否定态度出发，阿莱霍用现实的神奇取代了神奇的官僚。一旦发现那条银河就在脚下，一旦承认那种自然状态的奇迹，他就能开始安东尼奥·马查多肯定称之为真理的创造了。于是他创造了那么多，从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的遗忘中拯救了那么多，今天这样说是不会有损于他的从未有过的谦虚的：在他关于现实世界的使人眼花缭乱的知识大教堂面前，只存在另一个能够同它媲美的宏伟建筑，这就是他创造的世界：那架来自他的光辉

① 卡彭铁尔对迷恋幻想中的神奇的作家的称呼。

的想象力的坚固、有趣、难以预料的天象仪。

人们多次写道，拉丁美洲小说家喜欢建造他们的约克纳帕塔法^①：鲁尔福笔下的科马拉，奥内蒂笔下的圣玛丽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但是我有这样的印象：阿莱霍的做法跟他们完全相反：从他的祖国古巴出发，延长他的现实坐标，直到把它变成加勒比的坐标。所以，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不是哈瓦那的一个城区或者辛富埃戈斯或卡马圭的一个综合城镇。他的约克纳帕塔法是加勒比。读过卡彭铁尔的作品后，如果读者进一步了解了古巴，是因为他更深刻地了解了安的列斯群岛的背景。不言而喻，写作《这个世界的王国》、《消失的足迹》、《启蒙世纪》和《春天的献祭》的小说家在寻找和深刻了解加勒比地区的特点时找到了古巴的特点。

伴随阿莱霍的尸体到达位于哈瓦那的墓地的成千上万的古巴人也许愿意为此向他致谢：早在人们谈论建设一个统一的加勒比以前，他的作品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并帮助找到了它、发展了它。这一点再一次变得显而易见：当生活好像模仿艺术时，那是因为艺术成功地预见了生活。所以，尽管阿莱霍——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只带着荣耀走了——的作品可以作为对过去的一种明显恢复来理解，但是事实上他的作品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生活的预言。

① 约克纳帕塔法，福克纳小说中的县名。

纯真的加夫列尔^①的 可信可乐的故事

我不知道诺贝尔奖是不是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增加了某种威望；但是肯定地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确实使诺贝尔奖恢复了些许信誉。从根本上说，这位哥伦比亚作家通过他的《百年孤独》，但也通过后来出版的作品，创造了成为一位取得特殊的成就和非凡的文学水平的作家的奇迹，而这两个方面不总是能同时达到的。

诺贝尔奖也是授予马孔多的。这个典型的镇子具有真实的自然景色和深刻的、几乎深不可测的现实，这也许是为了赋予外表常常让人感到的最初的虚假印象以决定性的意义。在马孔多，事物不是纯粹的介绍，也不是指挥复杂的人物通行的单纯的红绿灯；更确切地说，它们是生活的要求，是有意识的材料，

①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简称。

是责备或有力的拯救，几乎总是毫不留情的见证。在这种背景下，人物的稳重进而具有了一种迷人的价值，一种令人着迷的光辉，一种就像慢镜头放映的激动场景似的东西。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事中，放纵的暴力场面是不多的。但是，无论作为过去的伤疤，还是作为未来的威胁，暴力总是潜伏在马孔多武装的和平下。这一点决非偶然：在充满暴力的国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故事和长篇小说总发生在不多的间歇中，仿佛小说家不得不在这样的地区做个头脑清醒的人，在那里，人们的激情和不满情绪达到一种奇特的报复水平。

尽管有那种著名的为国家的主权而斗争的精神，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不是一个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的作家，他的介入是很灵活的。也许因此他才选择了间歇期：因为这些时期可能是这位哥伦比亚作家的目光有机会停留下来观察简单的事件和已干燥的血迹的唯一时期。只有在间歇期才能对不幸结局进行总结。作家并不试图总结暴力造成的历史、政治和社会后果；他只想展示马孔多的那些虚构的、但是可信的哥伦比亚人在一次和另一次爆炸声之间、在一次和另一次致命的兜捕之间的反应如何。

我认为并不只一次强调，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杰出作品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但这并不妨碍承认《百年孤独》是想象力和娱乐的惊人之作。然而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叙述的节制性达到了极点。为了讲述主人公的不停的往返（从高利贷者家到裁缝铺，从医生的诊所到神甫的住所，从邮局到律师事务所，最后总是回到他妻子和他的公鸡所在的地方），为了描述那种疲倦的、却是坚持不懈的奔波，除了运用这种实质性的、无枝无蔓的、准确的、没有一个多余的形容词也不缺

少任何真实性的散文外，其他散文是不可想象的。先是在《枯枝败叶》中，后来在《恶时辰》中，暴力总是一种潜伏的存在。特别是《恶时辰》中的人物，他们组成了一支合唱团，形成了一种多数人的恶意识，把镇子变成了一口充满怨恨的大锅。这些作品，加上《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的千锤百炼的故事，若干年后变成了实现想象力大飞跃——《百年孤独》的纯粹跳板。在整个这部作品中，作者敞开了门，推开了窗，废除了堤坝和界限，一切都和马孔多相联系，马孔多也许是整个哥伦比亚的象征；但是马孔多几乎就是拉丁美洲，差不多就是全世界。布恩迪亚家族的但也是人类的历史，孤独地持续了不止一百年，而是数千年。在作为隐喻的一百年间，奥雷利亚诺们、阿卡迪奥们、乌苏拉们和阿玛兰达们像月球的周期一样一代代延续着。

当然，归根结底，隐喻并不重要。从各方面讲，《百年孤独》主要是一本完全是娱乐性的读物。所讲的故事，出人意料，无法估量；运用的语言，既纯净又不深奥；在结构上，宏伟壮观，但又不让人对它的巨大感到沉重；在幽默方面，它是那些长寿的、慌忙不安的创造物的真正休息；在象征上，作品里有为一切放大镜准备的标记和附加标记；创作上，其自由的笔触是无拘无束的。

后来他写的是《纯真的埃伦迪拉》的故事，是《家长的没落》的无情的寓言故事，和一流的消遣作品《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但是，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样的文学创作历程的话，我想应该是这个词：冒险。作者像个快乐的鼓动者，他具有充分的冒险天性，仿佛他掌握着历史，支配着地理，容许着想象。可信的和难以置信的，一切的一切，由于他的冒险精神而毫无差别地被表现出来。偶然事件像雨水那

么自然地从天而降。但是不应忘记，马孔多的一场雨居然下了4年11个月零2天。谁会想到俏姑娘雷梅迪奥斯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会躲在同一把伞下？

开 幕 词

我们又一次在“美洲之家”召开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作家会议，^① 举行这样的会议成了一个传统，但是我们相信它没有成规。这样的会议每年是不同的，尽管会议日程中有些内容看似重复，但每次会议都有自己的特点。说它不同，因为一年又一年，评奖委员会和“美洲之家”（虽然像科塔萨尔说的那样，每次会议都忠于它的宗旨）都有变化，因为诸位的出席、发言和贡献加强了这个机构的活力，由于活力的加强，这个机构也不断发生变化。

21 年来，“美洲之家奖”发生的许多变化是诸位或诸位的前任发表的意见、见解和建议的结果。主要是由于这些努力，“美洲之家奖”——最初只有 5 项——今天才有了 10 项或 10 种。也是由于这种努力，“美洲之家奖”在结构上才有

^① 1980 年召开。

了变化。最初它更突出的特点是竞争，它目前的形式则更有利于优秀文学作品的出版和传播。

除了每年的这些很有特点的、有助于说明我们的文化发展进程的某个特殊阶段的话题外，在日程中最后总有一项能够使与会者介绍本国的情况。这种交流不仅有益于每个与会者同另一些现实相接触，而且尤其有利于“美洲之家”更好和更有效地履行其加强在我们美洲存在和共存的文化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职能。

就像近期经常发生的那样，今年出席会议的有许多流亡作家。就在“美洲之家”里，也有好几位拉美国家的流亡作家担任工作。出席会议的还常常有另外一类作家，虽然他们能够幸运地在本国生活，但是在过去某些时期曾饱受流亡之苦。有些作家现在没有流亡，过去也不曾流亡，但是仍然忍受着迁徙为他们带来的痛苦和不安。所以我请求诸位允许我把关于这个问题的某些想法传达给大家。

在其著名长篇小说《太阳老爷》中，雅克·斯蒂芬·亚历克西斯^①通过一个移居圣多明各的海地人之口，说过一句朴实而真实的话：“当你在国外感到完全孤独时，友谊就获得了它的全部意义。”后来，当独裁者特鲁希略残酷地迫害在马科里斯甘蔗田里做工的海地人时，作者又说，宪兵让所有的砍蔗工人游行，让他们说“Perehil”这个字，这样来辨认海地人并进攻他们。

我们的一些实行血腥统治的国家的无情压迫者也许想让每个流亡者、每个受政治迫害的人说 perehil（或类似的字）。

① 海地作家。

但是正如亚历克西斯在小说中写的那样，多米尼加的砍蔗工人并不觉得海地人是外国人，不只于此，他们还在那个恐怖时期冒着危险帮助他们，觉得那些不幸的受害者比特鲁希略的宪兵更容易接近；同样，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渐渐懂得了：真正的界限不是把智利同秘鲁、把乌拉圭同阿根廷、把巴拉圭同玻利维亚、把委内瑞拉同巴西、把洪都拉斯同萨尔瓦多隔开的界限。真正的界限是横在人民和专制统治、祖国和帝国主义、法西斯和革命之间的界限。

也许偶然有人写的《流亡社会学》应该研究由于家人的失散而在家庭范围、夫妻生活和父母与子女关系方面引起的和还在引起的问题。当一个人丢下家庭、朋友、工作和感情与文化方面的诸多事情突然离去而引起的紧张状态，为寻求新的工作、新的住所以及突然闯入另一种习惯、另一种环境、另一种气候、有时甚至是另一种语言而带来的不安，都是造成焦虑、烦恼甚至不满和怨恨的因素，这些因素当然会影响在拉丁美洲一向很重要、很明确的感情关系。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总是自然和自发地互相支持，在目前的如此特殊的情况下其表现就是如此。拉丁美洲人民的这种精神，把制度、禁令和制裁置之度外，勇于帮助蒙受折磨、死亡和贫困的人们，关心他们。正是由于人民的这种高尚态度——应该承认，少数几个国家的政府也如此——，我们这些拉美的流亡者才找到工作和住所。每个国家的反动派面对这一现象都惊慌不安。美国尤其惊慌，那里的国会议员甚至严厉指责人民帮助受政治迫害的人的态度，却把理解和帮助留给来自古巴的反革命分子和索摩查的刽子手。

显然，一种文化不仅仅是个性的总和；也是一种气氛，

一种相互影响，一种争论的活力，一种建设性的对话，一种受到争论和分析的过去，也是一种共有的景物，一种具有往常的星座的天空。这一切主要发生在民族文化成为富有活力的中心和知识分子构成普遍的现实的时候。相反的，流亡常常是一种失望，即使在兄弟般的帮助减轻了怀念情绪和离乡的痛苦的情况下。

居民流散时，文化也不会稳定。因为移民的离去，加上留在法西斯统治下的人的自我批判，加上两个区域间的不可避免的隔绝，就打破了对文化的发展和成熟来讲总是根本性的连续性。

那种破坏性的计划，那种通常被称为文化灭绝的东西，的确是对一个民族的现在的侵犯，尤其是对这个民族的未来的一种侵犯。我不认为什么东西或什么人能够实施毁灭一种文化的恐怖计划。但是它（他）确实能够破坏它，伤害它，损害它，重创它；却永远不能毁掉它。即使一个民族完全灭亡，也不能保证它的文化灭绝。难道不是有过某种灭绝行为在过了几个世纪后某位考古学家挖掘发现一具棺材及器皿、绘画甚至诗歌从而得以恢复那个表面被消灭的民族的生活和习惯吗？既然文化是人创造的，它就能在人之后幸存，并最终战胜杀人凶手。

也许因此我才感到这样做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文化，做出某种不是超人的、而是非常合乎人之常情的努力，来抵御破坏行为，保证我们的文学、我们的雕塑艺术和我们的音乐的连续性，让考古学家们少花费劳动，使我们的文化免于被掩埋、被埋葬在黑暗的压迫下，而让它在我们肥沃的、紫红色的土地上生存和传播。所以，流亡作家和艺术

家最终能够进行的更富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工作是创作、想象、写诗、构思故事、塑造形象、用歌曲吹拂污秽的现实，每个人都成为发展其民族文化的积极分子。这是我们能够使敌人遭受的完全无可置疑的失败：当敌人在圣地亚哥、蒙得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令人恐怖的地区对文学、绘画、音乐、戏剧、歌曲进行可怕的打击时，智利文化、乌拉圭文化或阿根廷文化都在西班牙或委内瑞拉、澳大利亚或墨西哥、加拿大或古巴产生。

流亡对所有的流亡者来说是痛苦的，对作家来说当然也是痛苦的。但是我认为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谁也不能也不愿意丢开怀念之情（要求我们割断这种感情是不人道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流亡不应该变成失望。此外，承受流亡之苦的不多的有效办法之一是和所在国家的人们建立联系，和他们一道工作，但不能是临时地、暂时地、短时地，而是真心诚意地和他们一道工作，把他当成自己国家的人（难道不是吗？）。这是我们觉得自己有用的最好形式。我个人可以这样说，为了克服失望、泄气和不满，除了这种对社会有用、对人类有用的感觉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我认为，有一种危险流亡作家应该避免，这就是牢骚满腹，哭哭啼啼，好像他的使命是引起人们对流亡群体的同情。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作家处在一个爱国者的狭窄圈中的时候，或者生活在这样的聚居区的时候，在那里，利用坏消息折磨人的事情很普遍，甚至存在一种传播坏消息病态乐趣。每个流亡者都承受着个人的一定数量的痛苦、关系的破裂、心碎肠断和焦虑；每个流亡者每天都可能进行痛苦的总

结，在其主要题目中包括他亲身经受的痛苦（肉体上和心理上），但也包括他在周围感受到的痛苦。谁没有兄弟、儿子、父亲、亲密朋友和战友呢？他们或者死在监狱里，或者在斗争中牺牲，或者被拷打致死，或者无影无踪地消失，只留下了亲人的痛苦。所以，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应该从对这种共同的不幸的认识和忍受出发。这种认识和忍受包括面对尚未愈合的伤口互相尊重。但是既然作家主要用思想、激情和形象工作，那就特别应该认识到，对于我们遭遇的政治、社会、经济上的失败，不应该再增加自己在精神上的消沉和道德上的沉沦。

所以在这样的一次会议上交流我们的经验很重要：来自正英勇地战斗的国家的作家同另一些来自表面上平静的地区的作家、遭受过监禁的作家同享受着自由的作家、暂时遭到失败的南美作家同取得坚不可摧的胜利的古巴和尼加拉瓜的作家坐在一起交流。但愿失败变成预防性的，胜利变成传染性的。我们美洲是一个有其懦夫和英雄、扫盲者和文盲、共同的敌人和非凡的人民的美洲。所以古巴现在和将来总是关心其他兄弟国家人民的失败和成功；所以我们把桑地诺人民的胜利看作我们的胜利。

帕科·乌隆多，我们最亲爱的已故作家之一，17年前写道：“谈论诗，是一种诱惑。也许是一种需要。”在此，我屈服于这种需要的诱惑，用一首诗，更确切地说，用一首歌词即《我们为什么歌唱》来结束我的讲话。在诗中，我提到了诗人、作家和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家的某种态度，这种态度也许是诸位同样坚持的。

倘若每个小时都和死亡同来
倘若时间是一座强盗的洞穴
天空就不再是晴朗的天空
生活也仅仅是一种活动的白色

你会问我们为什么歌唱

倘若我们的勇士没有人拥抱
祖国就会痛苦地死亡
在羞愧爆炸之前
人的心就化为了碎片

你会问我们为什么歌唱

倘若我们像地平线那么遥远
倘若树木和天空留在那里
倘若每个夜晚总有某种思念
倘若每次醒来总是一次离散

你会问我们为什么歌唱

我们歌唱是为了孩子为了一切
为了某种未来为了人民
我们歌唱是因为幸存者
和我们的死者愿听我们歌唱

我们歌唱是因为叫喊还不够
哭泣和争吵还不够
我们歌唱是因为相信人
因为我们能够战胜失败

我们歌唱是因为太阳承认我们
因为田野散发着春的气息
因为在这条枝芽和那只果实上
每个问题都找到了答案

我们歌唱是因为雨水降在犁沟里
因为我们是生活的斗士
因为我们不能也不愿意
让歌曲化为灰烬

忧伤的诗人

在纪念他诞生一百周年的这些日子里，我们谈到了作为现代主义的最高艺术家的达里奥，作为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达里奥，与其境况融合在一起的达里奥，作为政治的逃亡者的达里奥。但是，我有这样的印象：我们似乎还没有谈及作为人的达里奥。这种疏忽也许是由于谈论这个方面很不容易的缘故。当然，我不是指传记作品中涉及的材料，而是指应该在他的诗中出现的人，就像巴列霍的诗中和马查多的诗中出现的那样。

恰恰关于马查多，达里奥曾这样写道：“生活的美妙/爱情和娱乐的美妙/他用深刻的诗句歌唱/其中的秘密只有他知道。”在著名的《我们的堂吉诃德先生的连祷》中，他说：连祷“由每天的事情构成/由我在秘密事物中看到的另一些事情构成。”不过，那些日常的事情在何处，那种特殊的秘密在哪里呢？必须承认达里奥和马查多不同、他不用深刻的诗句歌唱、其中的秘密不属于他吗？他的诗句是具有

引人注目的光辉、具有完美无缺的音乐性、具有不可抗拒的词汇丰富性的诗句而不是具有全部深刻性的深刻诗句吗？

有一次，达里奥结束一首十四行诗时这样问道：“你没听见我忧伤的泪滴落下吗？”一个人真想这样回答：“不，我没听见。我听见的是巴列霍的诗中落下的血滴，就像我听见胡安·拉蒙的诗中落下的雨滴和忧伤的泪滴那样。但是在你的诗中，鲁文^①，我只听见你用来虚构你的忧伤的词语落下来。”

当然，达里奥有一切权利虚构一种忧伤，如同其他任何一种方式一样，这也是一种为增强其效果而掩饰真正的忧伤的方式。他有一切权利虚构隐喻性的掩身战壕，并用他的侍童和环颈雉占据它，以便使我们迷失方向，使我们相信在它们后面有一座优雅的花园，一个进口的动物园，一个永恒的狂欢节，而没有真正应该有的：一个脾气不好、孤僻、痛苦、不和人来往、伤感、本质上却很善良——为什么不是呢？——的人，他坐在他那块凄凉的石头上，竭力不注意自己。

也许因此他才承认，他的诗歌是一种流浪诗歌。跟兰波一样，达里奥是一位不靠罗盘驾驶其船只的船长。但是兰波最终把罗盘丢失，达里奥却由于怀疑而把罗盘装进大衣袋里。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我们曾多次希望他的流浪诗歌结束流浪，停下来沉思。

每当我们在此谈论达里奥笔下的宫廷和动物群的时候，

① 达里奥的全名是鲁文·达里奥。

总吹来一股不够严肃的旋风。不过，难道我们知道是什么内心的冲动能够驱使达里奥建造他的玻璃动物园、他那种充满不可能的梦幻的宫廷吗？是什么隐秘的忌恨推动他观察他那乔洛台卡土人或纳格兰达土人的手并判定是侯爵的手吗？难道我们知道对他的大烛台和辛辣的几乎是无辜的报复源于何种贫困或饥饿吗？对那头他隐喻地称为老鹰的兀鹰致意的不言而喻的犬儒主义来自什么不能平复的伤痕呢？我们知道甚至能够推测在每次放弃工作、写完每句诗——它像多孔的膏药一样贴在他那抽搐的、克制的绝望上——后他的感觉如何吗？我们知道在他的“上等香槟”和“蓝色蜂蜜”之间有多少平常的酒宴吗？

我们不能显得过分像清教徒，因为在所有的天空下，在一切时代中，宗教裁判所总是坏东西，如果人的尊严总下降，宗教裁判法庭官员的尊严首先要下降。如果（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拉丁美洲作家的不良意识被摆在橱窗里）我们用我们俗不可耐的假正经的火堆将达里奥烧死，至少我们不要欺骗他，不要卑鄙地打击他，我们要担负这样的责任：我们不能只把他作为我们后来的所有世代的小公羊烧死，而我们还有其他的材料，袖子里还藏着其他的牌；我们要负起这样的责任：我们也要把我们自己烧死。这是马克思的某个久远的、十分正派的先辈说的：“谁摆脱了罪孽，就让他丢第一块石头”。当然，我认为我们把自己烧死不是坏事，但是只把达里奥烧死，根据简单的赞同就认定他是我们复杂的、扭曲的、被掩盖的过失的唯一承担责任的人，我认为确实是坏事。

另一方面，应该提及的是，鲁文·达里奥并非只是《褻

读的散文》。如果说一方面应该破除关于达里奥的神话，另一方面也应该破除读者的懒惰，因为他们仅仅根据这本书评价他。的确，达里奥曾试图关闭一切门户，堵塞一切裂缝，掩盖一切缝隙，不让任何人探察他的店后。但是幸运的是，他没有达到目的。事实上，对他这个诗作丰富的诗人来说，他是个很穷的人。但是如果他不注意这一点，不承认这一点，他就不那么穷：“我想哭时，我不哭/有时不想哭，却又哭。”如此这般，当他不该哭而哭时，在那些不多的次数，就产生了不大的雷声，就出现了一线和解的光明。就在这样的时刻，出现了“我小时候有一天看见阉牛在呼气，”或者记起“在熟悉的家中，有两个侏儒像贝拉斯克斯的画中人”，并且他看见自己像某个“害怕的人”那样，“一声不响，躲在一个角落里”。就在这样的时刻，他在失眠中忍受着痛苦，询问自己：“黎明何时到来呢？”就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早晨死去的确信无疑的恐惧”。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无依无靠、无人帮助、无力自卫的人觉得他引为骄傲的一切十一音节诗、表现他的虚荣心的一切花环、他的侯爵夫人们的一切扇子，都落在了他头上，他终于在我们面前成了孤家寡人，孤单而软弱，一个孤独的人。

这个时候，为了感觉喉咙里那个普通而神圣的结，为了用某个诗人喜欢用的令人惊恐的叫喊之一“佛朗西斯卡·桑切斯来陪我！”表现他的无依无靠，他无需求助他那不会枯竭的修辞储备。只是在这个时候，只是当我们听见那种透不过气来的声音，那种孤独的叫喊，那种不可替代的那部分忏悔时，我们才赶去（有或者没有佛朗西斯卡·桑切斯），从白铁做的环颈雉、纸板做的侍童、纸做的波斯女帽与男帽和有

用的大烛台上走过，开始对他说，不要担心，不管怎样，我们会和他在一起，当然我们知道他已诞生一百年，不过，他的年纪看上去没那么大。

半个世纪的纪念

昨天早晨，我在奥内蒂患病垂危的医院见他陷入那种预兆死亡的状态时，一股我很久不曾有过的悲伤攫住了我。几十个和胡安^①有关系的形象，未经我有意识地召集，便纷纷聚集在我的脑海里。一天在蒙得维的亚罗多公园一家啤酒店里，我和其他作家（当时都很年轻）一起认识了他，我们深深被他那些朴实而清晰的见解所吸引。在哈瓦那相遇，他是“美洲之家奖”评委会委员，他同年轻的作家们进行了令人难忘的交谈。在墨西哥：我记得他在瓜纳华托从我们旅行坐的汽车上下来，坐在路边不想走了，他对那个奇妙的城市是那么着迷；结果，在我和安赫尔·拉玛^②的劝说下，他才离开那儿。在马德里，我们几乎是邻居，只要有可能，我总去看他。在专制统治的岁月里，他几乎每天给我打电话，评

① 奥内蒂（1909年～1994年）的全名是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② 安赫尔·拉玛（1926年～1984年），乌拉圭文学批评家。

论乌拉圭的形势；对当权的军人，他从来也不原谅。

关于他的文学成就，许多人写过文章（在若干年间，我也写过几次），现在写的人更多了。但是这一次，我想关于他的为人留下一份证据。对一些人来说，奥内蒂的孤僻是有名的，也许是因为各种媒体想会见他很困难；事实是，他总是固执地维护他的隐私，他的写作时间和阅读时间，他的家庭生活。1965年，奥内蒂本人几乎挑战地说，他的文学是“一种宽厚的文学”。今天我们可以补充说，他的一生也是宽厚的一生。他是个高尚的人，十分孤僻的人，有一颗无可争辩的爱心，不过不肯表露，而是几乎害羞地隐藏着。近些年来，他的为人依然如故，也许更好些了，可能因为他越来越经常地跨越将他的心和世界连在一起的桥梁。有人偶尔问他为什么写作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写作，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自己快乐，为了我的癖好，为了甜蜜地折磨自己。”是人的冒险吗？当然是，不过，主要是奥内蒂这个人的冒险。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作品的出版，他愈来愈加强了他那种颓丧的、忧伤的态度，直到在他最后的作品中变成对人类的一种纯洁的和有意识的同情。

在乌拉圭，奥内蒂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不自愿地担任了50多年的领导人。他的每一本书都受到欢迎，既作为漫长历史的另一个篇章，也作为对这半个世纪的普拉塔河流域的往事的另一种展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说完全是间接的展示。由于奥内蒂的故去，一种从事文化活动的方式，一种严格的训练，一种深刻的寻求，也许也随之逝去了。

关于胡利奥·科塔萨尔

“很容易发现，我写得越来越不好，这恰恰是我寻求一种风格的方式。有些批评家说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倒退，因为很自然，传统的过程是从写得不好到写得好。但是我认为，在我们中间，风格也是一个道德问题，一个体面问题。写得好是很容易的事！难道我们阿根廷作家不应该（这不仅仅有益于文学）先后退，先下降，接触最苦的东西、最令人厌恶的东西、最污秽的东西、一部背离国家的历史长期回避的一切东西（用对我们的伟大之处和我们的文化的幻想取而代之），这样，在触及到底部后，赢得向我们自己攀升、真正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的权利吗？”在接受路易斯·马利·施奈德采访时^①，胡利奥·科塔萨尔（小说家，1914年生于布鲁塞尔，父母是阿根廷人）这样说。在科塔萨尔的第一部

^① 访谈录载《墨西哥大学校刊》1963年5月号。

长篇小说《中奖彩票》（1960年）中（在此之前他出版了一部诗体剧和三本短篇小说集），那种向老实态度的后退，那种触及底部的意图，是明显的；那时他使用的取样方法似乎为了理解和拯救“被回避的”国家。在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跳房子》（1963年）中，可能存在着类似的意图，尽管已不针对国家而是针对同样回避自己的个人。然而，最后，这种意图可以理解为一种极端的、夸大的、试图通过对个人的每个细胞的拯救来救国的方式。

实际上，早在14年前，胡利奥·科塔萨尔就发表了初版《动物寓言》（1951年），这本书使他赢得最初的精湛作家的声誉。在那8篇故事中的大部分作品里，作者运用了一种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的手法：幻想发生在真实的环境中，人物使用粗俗的表达方式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特有的对话形式。在某些段落里，读者有这样的印象：连幻想也像一句粗话一样起着作用。

譬如在《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中，男主人公不时吐活小兔的细节是用第一人称和一种出人意料的荒诞手法叙述的：当人物心想他吐出的小兔不会超过10只时，他觉得完全正常，但是当第一只小兔吐出来时，他便对如此异常的事受不住了。只有这时他才决定自杀。

也许现在，当三本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秘密武器》和《游戏的结局》）持续不变地出现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该是全部重读32篇故事的时候，研究是什么巨大的秘密把科塔萨尔造造成（尽管他的名字被不可理解地排除在传播最广的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外）我们语言的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创作者之一的时刻终于到了。“我写的几乎一切短篇小说都

属于由于缺乏更确切的名称而称之为的幻想小说，”科塔萨尔声明，“这些小说反对那种虚假的现实主义。那种现实主义认为，就像18世纪的哲学和科学上的乐观主义确立的那样，即在一个由一系列规律、原则、因果关系、明确的心理学和精确绘制的地理学比较和谐地支配的世界中，一切事物都是可以描写和解释的。就我的情况而言，对另一种更为神秘、更为陌生的规律的怀疑和阿尔弗雷德·雅里^①的丰富发现——对他来说，对现实的真正研究不对于规律，而是对那些规律之外的东西——，是我在整个过分天真的现实主义之外对一种文学进行探索的全部指导原则中的一些原则。”^②事实上，一口气重读完科塔萨尔的所有短篇小说后，能够发现，称它们是幻想小说确实证明缺少一个确切的名称，因为贯串和支配它们的本质上的类似突出了另一个特点：幻想只是一种手段，一种附属的方法。在前面引证的那段话中，科塔萨尔本人负责提供了具有这种特点的名称：例外。

在1940年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及西尔维娜·奥坎波一道编辑出版的《幻想文学作品集》前言中，阿多尔夫·比奥伊·卡萨雷斯在涉及这个文学支脉的各种倾向时说，“一些作者发现这样做是适宜的：在一个完全真实的世界里，只让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而让幻想发生在惯常的和日常的生活中，如读者的生活中。”如果验证一下这个证据是否适合科塔萨尔的作品的话，就会看到它只符合其作品的一个

① 阿尔弗雷德·雅里（1873年～1907年），法国作家。

② 见《革命中的短篇小说》，载《金龟子》杂志，1963年，第21期，布宜诺斯艾利斯。

区域。为了使它适合他的其他作品，必须进一步谈到那种必要性，即在一个完全由规律支配的世界里，只让一件例外的事情发生；让例外，即意外事件突然发生在惯常的和日常生活中，如读者的生活中。在一份科塔萨尔作为他自己喜欢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必然的入选作品而提到的短篇小说目录中（包括爱伦·坡、莫泊桑、卡波特、博尔赫斯、托尔斯泰、海明威、丹森的作品，还有我们的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实现的梦》），那种对例外的崇拜就像一个共同的分母。科塔萨尔讲述说，一位非常喜欢拳击的阿根廷作家告诉他，“在一部使人激动的作品和它的读者之间进行的那种战斗中，长篇小说总是很快就取胜，而短篇小说则必须击倒对方才获胜。”^① 科塔萨尔的读者根据经验知道什么叫丧失战斗力；但是他也知道，尽管这位小说家有时运用某种幻想来达到渴望击倒对方的目的，但是强有力的打击常常和某种像实实在在的、现实那么近那么具体的东西有关系。如果你有耐心对31篇短篇小说进行一种核对性的阅读的话，就会明白在这些作品中使用的许多成分和幻想方法纯粹是现实事物的延长，或者说，难以置信的东西不是发自（像在神奇的古典文学或像中国的表现超自然的事物的古老传说中那样）一个难以置信的源泉，而是来自现实中的一种绝对可信的、确实存在的材料（一种感受、一件事情、一种紧张状态、一种神经机能病的冲动）。像《妈妈的来信》这样一篇小说，从一种可以感受的内疚出发构建了它的幻想；《女祭司》从一个集

① 见《革命中的短篇小说》，载《金龟子》杂志，1963年，第21期，布宜诺斯艾利斯。

体的、没有什么不真实的历史出发创造了它的幻想；《被侵占的住宅》把主人公退出住宅的情景转化成了幻想，在作品的焦急的故事的背景下，那种退出也许象征着某种像一个社会阶层的敦刻尔克^①，它渐渐被一些闯入的人占领，它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愿望对付他们。在《公共汽车》中，幻想只表现在那种异乎寻常的、神秘的、无名的事情上，那种事情似乎总是几乎要爆发，但是又不爆发；幻想的东西并非发生的事情，而是就要发生的事情。

但是不是科塔萨尔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求助于幻想。不仅如此：几乎我敢断言，幻想和现实主义这两个倾向是构成他的作品的紧张气氛、是他制造悬念的不可放弃的训练的又一个因素。读者一旦知道这位作家不仅仅描写现实也不仅仅描写幻想，便永远处在了对两种倾向的痛苦期待中。《仰望夜空》是一种短篇小说的典型，直到结尾才用严格的真实事物松开它的缆索。《午饭后》和《良好的服务》却相反，它们总是预示着一种非现实的结局，但是恰恰通过佣人的门引出了令人惊奇的事情。在《汽车》中，故事是这样描述的，整个故事好像非常现实主义，但后来的结果是，人物的冲动和故事本身的主题毫不留情地变成了幻想和非现实。在《奸诈狡猾的女人》中，恐怖气氛那么准确地表现在故事的浪漫主义的描写上，当意外事件在那种浪漫主义描写及其补充物恐怖气氛中间（埃斯西拉和卡里夫迪斯之间的完美等距）发展时，是艰难的平衡变成了例外。

在对“例外”的废寝忘食的探索中，经常发生科塔萨尔

① 法国城市。

打乱时序的情况。《饭后》写的是两个头脑完全清醒的人互通书信的故事。此外，书信是用绝对理智的词语写的。非现实的冲突来自双方的现实之间和双方的理智之间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势不两立；故事的幻想来自那种深思熟虑的、娴熟表现的不协调，因为如果费德里科·莫拉埃斯签署的信件是常规的话，那么阿尔贝托·罗哈斯签署的信件就是例外，反之也一样。《时间，玩牌和走卒子的小男孩》朗诵了赫拉克利托的碑文；但是作品给读者留下了面对两个棋盘的强烈而可怕的印象：两个棋盘受着不同的控制，一个由时间本身控制，另一个由时间的一位天真的合作者控制。恐怖就来自不知道谁是谁。在《秘密武器》中，安排者和事先安排者也是时间。通过及时插入一个过去的故事的简单方法，科塔萨尔就在作品中放置了一堆例外货物，那就是幻想。

但是证明这三本短篇小说集中最优秀的两篇作品（《追求者》和《游戏的结局》）依赖的是一瞬间也不脱离确凿无疑的轨道和细小的细节的故事，是有趣的。那么例外呢？在第一篇作品中，例外就是男主人公：约翰尼·卡特，萨克斯管乐手，黑人，麻醉品消费者，健忘的人，好女色，（像《一朵黄花》中的杰出人物和科塔萨尔的其他许多人物一样）关心时间。约翰尼有幻觉，看见了古怪的盒子，模模糊糊看见一扇门慢慢敞开，上帝就在门旁边，“那个穿号衣的看门人，那个换取小费的开门人。”和作家一样，人物也寻找他制造个人的幻想的办法（麻醉品、错觉、吹奏大萨克管时的陶醉）。但是，还是由于使用了这些办法，幻想才变得真实可信。为了接受它，读者没有必要离开一般常识。在《游戏的结局》这篇细腻和显然无辜地再现少男少女生活的作品

中，叙述者想象出（或回忆起）一个清晰的线型故事情节，既没有插入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在这个故事中（写三个姑娘在铁路旁玩“雕塑”和“姿势”游戏，这样来打动和暗示一位留着金色卷发、有一双和蔼的眼睛、每天二点八分乘车旅行的年轻人），似乎为一篇徐缓而轻松的故事准备好了一切。雕塑游戏是吸引人的，因为这种游戏是使轻巧的身体暂时静止不动；游戏也很快活，因为那种假装的瘫痪几乎是一个玩笑，一种戏弄性的模仿。但是在科塔萨尔的故事中出现一个例外现象：当残废的莱蒂西娅在游戏中静止不动时，她只能掩盖肉体上的缺陷。她的真正瘫痪削弱了游戏的轻松和无辜。

但是虽然对普通、平常和总可以接受的事物做了这种改变，科塔萨尔并没有打乱或破坏短篇小说的故事或价值。更确切地说，他是在贯穿爱伦·坡、莫泊桑、契可夫、基罗加和海明威的数罪并罚的经典路线上进行着创造；这条路线意味着一种从技巧到感觉、从语言的直感到坚定的自我批评的严格性（简洁的严格性，当主题要求必须简洁时；还有复杂性方面的严格性，当复杂性变成使故事成为真正有意义的某种东西的唯一手段时）；这条路线还意味着，短篇小说不是诞生和死亡在它的故事上，而是包含着“那种从小到大、从个人和周围到人类属性的本质的巨大发展”（科塔萨尔语）。这位著名作家引入短篇小说的重大新变化，不是（像《跳房子》中那样）一种形式上或结构上的革命，而是他的智慧，他的心灵，他对昔日的大师们——那些对日常事物的留心捕捉者、那些对作品深度的坚持不懈的拯救者——的经验教训的崭新、再生和前所未有地利用。

他的头两部长篇小说中的第一部即《中奖彩票》的情节不很复杂。举办了一次似乎是某个国家单位组织的抽彩活动，最高奖是乘船参加一次横越大洋的旅行。小说在马尔科姆号船上聚集了一批特别复杂的乘客。但是小说家和他的人物一样不相信偶然性；所以他选择了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文化层次、不同的辈分的典型人物。《中奖彩票》的人物具有深思熟虑的代表性。这样的取样法赋予小说以引人注目的严峻性，这种严峻性由于旅客们被关闭在马尔科姆号船中部、全被关闭在中部而变得更突出了。因为船的另一半（包括船尾），乘客去不了：进不去的门和外国海员构成的防线水泄不通，毫不留情地阻拦着人们的通行。在长达四百多页的小说中，读者不清楚（黄热病的借口总让人觉得虚假）究竟是什么神秘原因禁止旅客们到船头去。禁令抓住了旅客，也抓住了读者。

归根结底，这种旅行是一件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因为它只经历了三天，回到中奖者最初集合的地点、位于秘鲁街与阿维尼达街角上的伦敦咖啡馆就结束了。尽管科塔萨尔未病先求医（“寓言的意图不能打动我，伦理的意图更不能”），整部小说是要人们了解象征和关键。最明显的象征是用马尔科姆号船的命运象征差不多是当前的阿根廷的命运，把这个国家看作一个有一种命运、但是失去了它的国家，一个失败的国家——就像其他众多拉美国家一样——因为驾驭它的是些胆怯的人，或漠不关心的人，或唯命是从的人，或充其量是不怕牺牲的随时准备反叛的人。凡是试图调查航向改变的秘密原因（船头的秘密）的人，都付出了白废脑筋（船尾是空的）、或者还有生命的代价。到达船尾的人只有梅德拉诺

——就在他意识到置身在船只内部的时候被枪杀了——和佩卢萨，一个头脑原始而坚决的人，由于精力充沛和为人正直而得救，但是这些特点并没有使其他人摆脱不可避免的失望。通过对开始和结束于伦敦咖啡馆的这次旅行的描写，科塔萨尔似乎想对他的同胞和其他拉美人说，阿根廷的一切冒险（或者也许是拉普拉塔河流域，或者也许是拉丁美洲的冒险）受到咖啡馆的闲谈的污染；咖啡馆的闲谈是个人同他的伙伴实现交流的最大愿望，也是实现唯一而朴素的介入的最大愿望。在这一切（批评家理解，这就是科塔萨尔的小说）中，自然有一种简化倾向，但是一切文学象征主义都是简化某种东西，另一方面，只要它作为文学起作用，就有权利这样做。

另一种可能是逐字逐句地解释，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解释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当不多的反抗者决定自己去调查那么神秘的事情的原因并开始自由走动时，梅德拉诺到了船尾，确信——背后被人枪杀前一秒种——船尾是空的。“也许幸福是有的，那是另一种东西”，他想，同时触及到某种使读者不能够同自己调和的争论。因为如果船尾部没有什么，此外也没有伤寒，关闭通道、禁止通行就自动被列入了荒诞的结构：发生的一切均无缘无故（显然，这一切也包括一个人死去）。但是也许科塔萨尔正是想告诉我们这一点。和卡夫卡不同：在卡夫卡的永恒的拖延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可捉摸的上帝；在科塔萨尔的作品中，在拖延的后面却什么也没有。

无论在严格的幻想范围（他的大部分短篇小说）还是在这种克制的隐喻方面，科塔萨尔都表现出了他的叙述才能。（从这个观点看，只应该责备他把佩西奥的独白写得太杂乱、太乏味了）。在论其象征意义之前，《中奖彩票》的人物的价

值首先是他们的文学性。有的人物，如佩卢萨或豪尔赫（孩子的俏皮话是作品的最大魅力之一），作者是怀着喜爱的感情看待和描写的；另一些人物，如克洛迪娅和梅德拉诺，似乎不相信他们显然具有的高尚的精神；最后，如洛佩斯、费利佩、保拉和劳尔，作者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客观描写，他们充当了对照物，此外，他们也逃不出他们的封闭的、不容申辩的世界。其他方面是章节开头或结尾的花饰（有一些是令人难忘的），风俗主义对话，关于当今阿根廷生活的既那么快活又那么忧伤的简单描述。“我厌恶寓言，”科塔萨尔的一个人物说，“除了适时写的，并非所有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奖彩票》就是适时考虑和写出的一个寓言。

然而，就像在《中奖彩票》中一样，科塔萨尔坚决否认任何隐喻意图。但是他还是制作了一个表现失望的寓言，在《跳房子》中也一样——书的折边上就预示它的反小说性质——，最后创造了一个具有不同的、奇特的、有争议的内容的世界，但是仍然是一个小说世界，尽管也许在一种更深刻、更本质的意义上说。作者在小说的“导读表”中说，按照它的读法，本书相当于许多部小说，但主要是两部。第一部可以照通常的方法去读，读到第56章结束，该章末尾印有三个醒目的星号，相当于“完”字。所以读者可以毫不后悔地放弃其余各章。第二部从第73章读起，然后按照每章末尾所注的序号读下去。第一部分为两部分，即《在那边》和《在这边》。在第一部分中，住在巴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奥拉西奥·奥利维拉靠家里寄来的支票生活，分别安排时间和两个女人做爱（注定患乳腺癌的波拉；也叫拉玛加的乌拉圭女人露西娅，爱忆往事，有一个儿子），经常光顾一个

名叫“蚊俱乐部”^①的多少具有国际性的团体，该团体由着迷的爵士乐听众、特别是度假的持不同意见者组成；此团体的活动继续到拉玛加的儿子罗卡玛杜尔死去、拉玛加去向不明可止。在第二部分中，奥利维拉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珀涅罗珀”赫克列普顿的怀抱和床上，找到了已经同塔丽姐结婚的他的朋友特拉维勒，和这对夫妻搅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生活和同居的古怪三角；他和他们一起工作，先是在马戏团，后来在疯人院，他作为文学人物的路程以几乎自杀告终。最后是《其他地方》，这是科塔萨尔为99章故意打乱的内容总汇取的标题，他称之为可以放弃阅读的章节。

科塔萨尔借助这种复杂的结构，经过精心编织，创作了这部再新奇不过的、读来令人着迷的小说，这样的小说在阿根廷文学中是空前的。首先，《跳房子》可以分为好几个方面欣赏，即：技巧的构成，人物形象，打动人的风格，对拉普拉塔河地区的语言特点的清醒的感觉，言语和形象的喜剧性，引用他人文字时运用的灵活方法。有一部小说，科塔萨尔是为“雌性读者”准备的（即为“不要问题只等答案，或别人的虚假问题，这些问题能让他坐在椅子上舒服地忍受，无需介入也应该属于他的剧情”），但是在《跳房子》中还有第二部小说，是为他称之为“合谋的读者”准备的，这种读者“可以在同样的时刻以同样的形式加入到小说家所感受的经验中去。”

在讲完他的化身莫雷利的这些见解后，科塔萨尔关于介入文学所发表的否定看法有点不可理解。相互关系这个词存在着。那么，人民（能够有的一切读者的总和）希望作家介

① 一译“蛇社”。

人（用科塔萨尔的话说）可能是他自己的戏剧不是合乎逻辑的吗？这个读者的总和希望找到一位分享和分受他们的经验的“合谋作家”不也是合乎逻辑的吗？

在一定程度上说，作为书题的词（“跳房子是必须用脚尖踢小石头的游戏。必备物：一条人行道、一块小石头、一双鞋、还有用粉笔画的美丽格子。最好使用彩色粉笔。最上面是‘天’，最下面是‘地’，很难把小石块踢到‘天’上去，几乎总是估计错，石头被踢出格子”）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和内容。它主要用来确定主人公的、也许还有作者的精神倾向。尽管有点模糊，但是他们知道瞄准的是什么天，但是会估计错，把石头踢出格子；它也用来表现可能的第二部小说的跳跃性，读者也得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踢石头。

在谈到《跳房子》的技巧时，几乎所有此作的批评家都提及奥尔德斯·赫胥黎^①的《加沙的盲人》（写的是干苦活的奴隶）。但是，很可能两者的相似仅仅是外表上的。赫胥黎对各章的叙述用的年代混乱，但是他很细心地请读者按照严格的日期顺序阅读。尽管这样，读完这部作品的人也许还是感到有些失望，因为在一种正常的有秩序的阅读中，小说几乎什么也不会失掉，所以，赫胥黎蓄意做的安排可能更像是一种随意制造的混乱。相反的，科塔萨尔并不是制造混乱，而是提出一种新的顺序。按照这种顺序，前404页应该按照其余230页的导读序号来重读。除了承认和赫胥黎的小说外表上的相似外，我认为还应承认同干预叙述的专家米歇

^① 英国作家（1894年～1963年）。

尔·布陶^①的《时间的运用》内部的类似。像布陶的小说一样，在《跳房子》中，干预不总能澄清某个情节；有时会使它更加模糊，尽管如此，这种模糊仍然是其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不是“雌性读者”（这个名称当然不是“女性读者”的同义词，而更确切地说是“被动读者”）的人来说，在读第二遍时，第一部小说各章会有一种不同的意义和紧张性。当然，像讲述拉玛加的儿子罗卡马杜尔之死的那一段，在重读时缺乏读者第一遍阅读时产生的悬念。作为补偿，那个事件在奥利维拉精神上引起的光明和黑暗，对现在手中有另一些牌的读者来说（因为作者早把牌交给他们了），会产生一种强烈得多的、几乎是戏剧性的对照。但是不仅仅放弃不读的章节使重读变得丰富。由于第338页上奥拉西奥说他对拉玛加感到的爱慕，由于奥拉西奥在船上、在圣马丁林荫道的桥上和在喜欢夜晚外出的、在疯人院玩跳房子游戏的那个塔丽姐身上想象的拉玛加的幻影，前几章中的真正的拉玛加便获得了另一种生命，另一种意义。第635页即全书的最后一页（尽管属于可以放弃不读的、应该插入第二部小说中间的一章）包括这段启示性文字，并非由于简单的偶然性：“实际上，拉玛加有自己个人的生活，我却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一点。相反的，我的生活是空虚的，我只拥有做梦和游荡的充分自由，所有的玩具都碎了，没有任何问题了。”在第二次阅读时，读者发现的就是这种个人的生活。读者也是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的。

存在着这种危险：这部作品的结构可能让人以为“可以

① 法国作家（1926年~）。

放弃阅读的章节”的做法几乎是一位作家的文学车间的开放，或者是弃之不用的草稿和各种文章、使用过的原材料、提到过的人物等等的展示；但是当科塔萨尔谈论这些章节的放弃阅读问题时，特别是当你了解他的“合谋的读者”、“读者——人物”的理论时，不可死心踏地相信在第 497 页上，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科塔萨尔的文学传声筒的作家莫雷利说：“说到我自己，我不禁自问，我写的东西应该有助于改变读者，取代读者，使读者感到惊奇，使读者着迷，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否偶尔会让人觉得我真正感兴趣的唯一的人物是读者呢？”尽管有种种相反的意见，“放弃阅读的章节”仍然是有效的小说表现形式。借口对第一部小说进行补充，科塔萨尔强迫读者进行一次新的阅读，包括“放弃阅读的章节”。不过，这样一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读者会怀着可以理解的贪婪心情在新的章节中寻找用来完善每个人物的形象的细小补充材料，一旦找到，他就会有意识无意地在原始章节中做相应的调整。

但是在第一次阅读和第二次阅读之间还有另一个重要区别：如果科塔萨尔所说的第一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部客观小说，那么第二部小说就是一部主观小说。也就是说，没有放弃阅读的章节。如果最后一部分的章节真正是可以放弃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它们列入呢？显然，科塔萨尔把它们列入，并非出于一种简单的怪癖：这意味着把它们列入归根结底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是和故事或内心独白一样合理的叙述方法。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使我联想起童年时代需要上色的人物画册：第一遍读《跳房子》时，读者在心里给人物涂上了某些颜色，但是后来，再遇到他们时，你会发

现：尽管每个人物还是他自己，但是实际上，给他们涂上另一种颜色更合适。

在一篇极端错误的文章中，胡安·卡洛斯·希亚诺认为，《跳房子》的男主人公是个典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依据是科塔萨尔塑造了奥拉西奥·奥利维拉的这种形象：“他出身中产阶级，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毕业于国立学院，这些情况是平白无故安排的。”但是典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像需要面包一样需要一种典型的轻浮态度，在这个方面，奥利维拉不附合上述定义。科塔萨尔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这很清楚，但是不是典型的；不仅因为他生在布鲁塞尔，而且还因为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特色是本质，而不是表面。科塔萨尔使用了（也许这一点使希亚诺感到茫然）粗俗的民间艺术、探戈行话和巴拉圭茶仪式拱手奉献给他的一切成分，但是他把它们用于一种真正的、更确切地说并非具有典型意义的探索。“友好地，不无悲伤地，但是漠然地窥视他们一番”，奥利维拉也这样表示。习惯于沙文主义礼拜仪式、发蜡和小牛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很可能不一定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三种东西的代表。不过，也应该承认，科塔萨尔使他的辛苦的、有时是沮丧的调查充满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特点。首先，他的大多数人物好几次被披上外国文化色彩（“芭勃斯像北齐^①那样咆哮起来”；“这种事在汤姆大叔的小屋里也没人干”；“保证出现值得塞缪尔·贝克特^②描写的场面”；“一个克尔

① 北齐：日本画家（1760年～1849年）。

② 塞缪尔·贝克特：爱尔兰作家（1906年～）。

恺郭尔^①般的瘦子”)，没有比这种外来的学识影响更具有布宜诺斯或更确切地说拉普拉塔地区特点了。不过在科塔萨尔的作品中也有一种外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特点。在小说的巴黎部分，混杂的蛇社的每个成员按照各自的民族方式思考，推理，刻苦钻研，但是（多令人惊讶）讲话总是典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味。如果这部小说被译成法文或英文，很可能失去这个独有的特点，不过现在一个乌拉圭读者很容易看出包含着某种态度的有趣的和故意造成的不一致。这位作家很熟悉和注意这样的细微差别，例如关于乌拉圭姑娘露西娅或拉玛加他说：“她口袋儿里一个铜子儿也没有，却来巴黎学唱歌”，在让画家艾蒂安说：“你能在番茄罐头里找到形而上学”，或“告诉我，我能在绘画上寻什么别的东西呢？”时，他显然失去了语言上的那种一丝不苟。我绝对不相信这是一个疏漏。科塔萨尔非常细心，决不会落到初学者的这种粗心的地步。更确切地说，我认为，科塔萨尔是试图通过这种外来的对话方式表明他不完全相信他的听觉仅仅是阿根廷的，所以世界上的语言便通过他的听觉进入了他的头脑。“对他来说，巴黎的一切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反之亦然”，科塔萨尔关于奥利维拉写道，但是“反之亦然”几乎看不到。这就像一种主观主义，不是个人的，而是民族的主观主义；科塔萨尔作为胡利奥·科塔萨尔本人，但也作为阿根廷人，作为不是典型的、而是实质上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对待世界。

在叙述效果上，这一切都被他用来表现两个非常典型的、只在表面上矛盾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特点：嘲弄的态度和

① 克尔恺郭尔：丹麦哲学家（1813年～1855年）。

通俗的表达。但在表现之前，科塔萨尔先把它们“拆开”，改变它们的标志和方向。嘲弄的态度变成纯粹的喜剧性“奥西波的母亲是一个伴随一种助消化的药消失的回忆”；有一个人“由于对克莱斯勒尔爱得太痛苦才自杀的”；“你还把你看的书藏起来。”当她知道丈夫在读《忏悔书》（玛克罗比奥·巴斯卡版）时，塔丽妲责备她丈夫，但也无情地自责。每当一个人物喜欢用强调语势、卖弄学识或博学，作者就粗暴地让他（或他自己）回到现实中来：“行动起来，老兄，来人了，这下热闹了”；“关于面包的那个梦本来可以启发我……启发我，你瞧，这个字眼儿”；“那些插话行为变得令人讨厌，因为它们只是打乱一种秩序，破坏一种结构。我讲得如何，老兄？”。除了这些例子外，还有整个第23章，即描述贝尔特·特雷帕的钢琴独奏会的那一章，从叙事的观点来说，这是全书最成功的章节。

至于通俗的表达，科塔萨尔的“拆开”用来把通俗的表达变成对亲切的事情的十分特别的说法。在这个方面，有好几个值得强调的事件，但是最清楚的是罗卡马杜尔之死（167页—205页）。情节包括情节剧的一切可能的标志：孩子不声不响地死去，母亲却一无所知，还等着给他喝药水的时刻。奥利维拉知道罗卡马杜尔死了，把消息告诉了别人，但是大家达成默契，把拉玛加的爆发推迟到给孩子服药的时刻。于是大家谈了一会儿别的事情：关于荣格、里普·范温尔、卡马、马尔罗等，但是在这种集体的执拗中有一个亲切的背景，目的是回避一会儿不幸的命运，在拉玛加的该死的但无辜的平静中再维持半个小时。

那么，归根结底，科塔萨尔写这部结构如此复杂的小说

的意图何在呢？这可能有几十种解释。有些解释显而易见，譬如由于这个简单的事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故事恰恰发生在一家马戏团和一家疯人院里，仿佛作者想让人明白，“恐怖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也许整个世界生活在跳跃和精神狂乱之中。从这部反小说或反寓言（也是小说和寓言）出发，可以提出（怎么不能？）关于与世隔绝、读者参与、想象的幽默、相异、自食其果的爱情、对美的东西的蔑视等等的多种理论。但是科塔萨尔和奥利维拉一样，也对着镜子发出了“大笑声”，然后有力量表现出无可争辩的严肃神情。“我的悲观情绪不如我的希望强烈，这一点会越来越明显”，他在一篇报道中说，但是至今斗争仍很激烈。像拉丁美洲的众多创作者一样，并且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跟他们中的一些人一样，科塔萨尔在他的疑问和矛盾中进行着斗争。他说：他从没有如此有力地感觉到，一个作家应该选择各种思潮提出的关于人类命运的一种形象，或者应该选择“什么也不选择，而创造另一种新形象。”实际上，《跳房子》一向就是那些疑问和矛盾的一种热情的展示（科塔萨尔甚至有力量对付沮丧情绪）。这位小说家就像他的化身莫雷利肯定的那样，“正在走向怀念”，那种怀念是指向“天”的（又是《跳房子》），指向一座接收的集体农场的。但是异乎寻常的是（这是一个未被写文章评论《跳房子》的人们看到的问题），那个集体农场或天堂实际上并非意味着一种逃避。科塔萨尔曾一再承认他对博尔赫斯欠下的智力债，但是他声明：“如果谈论博尔赫斯的创造和意图的话，我很早就和他相距甚远。”他和《杜撰集》的作者的区别特别表现在这个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特点上：两者都有一种抒情性的本质，

但是博尔赫斯“从根本上说是怀疑论者，但是他相信一切理论的美”（恩尔克·安徒生·因贝特的话），科塔萨尔却满怀希望，恰恰把他的怀疑留给了理论。当博尔赫斯在他的不可知论中向着美的事物逃避时，科塔萨尔却在现实的弯道上、在人的心灵的角落里、在意识的疲劳中不屈不挠地寻找他的集体农场。不管怎样，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毕竟有一个“天”，博尔赫斯的杜撰故事却只是编织和贯穿着他的“圆形废墟”。博尔赫斯的伟大教诲是他的严格，而不是他的主题，科塔萨尔说：尽管两者都是不同一般的作家，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博尔赫斯运用他的严格性来使他的迷宫的气氛越来越污浊；相反的，科塔萨尔运用严格性却是为了估计和认真估计通向他三番五次梦见的那个集体农场的道理、中介或出路在哪里。科塔萨尔和奥利维拉一样梦见一个人，那个理想的、完美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特拉维勒（“只要运用一下那可恶的想象力，特拉维勒实际上就是他本来应该成为那种人，他是领土上的人，是走错了路而又无法纠正错误的人。当他处在错误之中，处在那块一触即溃的虚假的五千年领土上时，他显得那么英俊”）。科塔萨尔和他的人物一样，和第二部长篇小说名著一样，也遇到一个重要秘密：“当演员，意味着放弃池座，他似乎是专为当头排的观众而出生的。奥利维亚心里热，糟糕的是，除此而外他还想当一名积极的观众，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是的，事情确实是那样开始的。现在所不知的是，事情如何继续下去。

巴尔加斯·略萨和他的小说

“我不佩服和读者保持距离的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于 1965 年 1 月在哈瓦那（关于《城市与狗》的一次圆桌会议期间）讲的这个看法不仅仅是一句美言妙语；几乎可以说，这是关于他的叙述艺术的一篇导言。巴尔加斯·略萨不但不和他的读者保持距离，而且差不多是强行把读者拉进他的世界。进入《城市与狗》是容易的；进入《绿房子》则要困难一些；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要从这两部小说里走出来都并非易事。有趣的是，那种给人留下深刻记忆的特点所依据的基础之一竟是作者叙述故事的不偏不倚，是他让人物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1936 年生于秘鲁阿雷基帕市。在秘鲁圣马科斯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在马德里大学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理解鲁文·达里奥的基础》（1958 年）。他曾在欧美积极从事新闻工作，在巴黎侨居数年，在法国电台对拉丁美洲播音部供职。目前他住在伦敦。到 31

岁时，他已发表四部作品：《首领们》（1959年）、《城市与狗》（1963年）、《绿房子》（1966年）和《幼兽们》（1967年），并以其长篇小说获得两项拉丁美洲小说界最渴望的奖赏：西班牙“简明丛书奖”（1962年）和《罗慕洛·加列戈斯》奖（1967年）。

《首领们》发表时，巴尔加斯·略萨 22 岁。尽管肯定地说这是一本小书，但它具有一定的价值，今天它之所以一版再版，主要是由于它作为一个先例的价值。现在人们很容易确认，题为《首领们》的短篇小说是《城市与狗》的题材的早期表现，或者说，同一本书的另一篇小说《星期天》的语言结构预告了若干年后卡洛斯·富恩特斯和胡利奥·科塔萨尔运用的结构。但是不应该指责秘鲁的批评家们没有在《首领们》中看到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的明显标志，因为除了《星期天》（人物形象的确丰满）外，这本书的其他东西没有能创造附合其人物的氛围，它们就像对用得不当的题材的不规则的展示。当然，偶尔也出现（《首领们》中的某些对话；《来访者》的有效结尾）后来成为巴尔加斯·略萨最有代表性的特点之一的东西：加强某个意外事件的自然的紧张气氛的才能。

1962年由塞伊斯·巴拉尔出版社授奖的长篇小说《城市与狗》，最初叫《英雄的住所》，后来又叫《说谎者》，最后才叫《城市与狗》。故事主要发生在秘鲁“莱翁西奥·普拉多”军校。那不是一所道地的军校，而是一所中学，不过是由军官管理的，学生们（一般而言，他们都是有名的男孩，具有反抗精神，被父母关在那里，“让他们成为男子汉”）属于利马的资产阶级，或山区的地主家庭，但是也经常有乔洛

人和黑人学生。

第一部分属于一种几乎是生动的现实主义，但是写到第167页，作者安排了一幕悲剧（在几次常规性的演习过程中，一名士官生受了致命伤），把气氛完全改变了。后来对死亡事件的调查被巴尔加斯·略萨用来在军校的气氛下表现他对秘鲁和秘鲁人的种种明显的忧虑。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态度接近罗亚·巴斯托斯对巴拉圭的态度；但是在介入态度上，巴尔加斯·略萨也许不如罗亚·巴斯托斯那么明显。

他作为见证人甚至伦理学家的身份，推动他创造了多重的和暴露性的角度，但是没有推动他提出相当清楚的檄文。这仿佛把最重要的介入留给了读者。巴尔加斯·略萨表现事件，揭示意图，但是不发表意见；归根结底，读者是决定者。但是不能由此而断言《城市与狗》是一部冷漠的或疏远的小说；相反的，它是拉丁美洲新文学中最富有激情的作品之一。更准确地讲，也许应该说它是一部介入性的、但是并非战斗性的小说。就是说：巴尔加斯·略萨拒绝把这部小说变成一篇辩护辞，他是对的；他宁肯突出小说的见证性质，从而在更深的而不是在表面的意义上介入现实。所以小说中的人物没有清楚地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就像在现实的社会阶层中一样，人的优点和缺点结合在一起，交杂在一起，混合在一起。

小说的题词之一是萨特引用的凯恩的一句话：“有人扮演英雄，因为他是个胆小鬼；有人扮演圣徒，因为他是个坏蛋；有人扮演杀人犯，因为他有强烈的杀人欲望；有人喜欢表演，因为他生来就是个骗子。”在某种程度上说，小说的第一部分是这些善于变换的态度的表现。那些少年一起过着

封闭的生活；遭受着最初的集体性的拷打；渐渐地不可避免地分裂为受害者和害人者；从最初的残暴无情的仪式起，他们就显得善于萌发一种强烈的整体性的仇恨；为抵御严格的纪律，他们想出了一系列破坏手段，他们不在乎个人恶习的廉耻，炫耀它，展示它，宣传它；在同那种坦率的戏谑行为的明显矛盾中，他们制造了一种对谎言的迷信，以狂热的连贯性和痛苦的个人主义说谎，没有丝毫悔恨的表现；那些少年就这样在虚伪的训练中变成了学校当局的第一批武器，当他们不再具有反抗精神或不再是不适应环境的人，而是适应环境的人和顺从的人时，方才要求他们过外面的世界、父母的世界、长官的世界，总之成年的和正常的骗子的世界的生活。

在何塞·马利亚·巴尔维德（塞伊斯·巴拉尔出版社评奖委员会成员）用作该社出版的版本前言的评论中说：“在此作中和卢梭的乐观主义对立的极端是败坏制度的人”。这是对的；但是制度一旦被败坏，它本身就是以腐蚀新的人或渴望成为男子汉的人，他们将慢慢进入败坏制度者的势力范围。军校不制造腐败：每个军官，每个士官生，都来自某个地方，某个家庭，某个阶级，某个社会阶层。每个人带来他自己的腐败菌，带来他自己的过去。所以巴尔加斯·略萨不时地插入属于每个不同的过去的形象，他似乎有意告诉读者，腐败来自远方：来自一位说谎的父亲，一位盗窃的兄弟，一位祈祷时厌恶用拷打治病的胆怯做法的母亲，一个堕落的不幸女人的形象。学校把外部世界的那些中间产品集中在它的院子里和大房间里；把它们聚集起来，面对着它们，把每件产品扔进大家的怀里，但不是为了理解它们，尊重它

们，而是让它们毁掉和变坏。旧日的仇恨和轻蔑（比如利马人对山区人的仇视），巨大的社会鸿沟（比如一个黑孩子和一个米拉弗洛雷斯街的幸福男孩之间的鸿沟），流传下来的大男子主义法典，这一切在学校里都有其微缩的再现。正如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在《中奖彩票》里虚构的那样：一次横越大西洋的旅行，那条船为他用来在一个有限的时空中幽禁和对付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出身、不同世代的代表人物；巴尔加斯·略萨亦然：他在小说中借助军校的封闭性来展示秘鲁和秘鲁人的优点和缺点。

从叙述效果这个角度来看，人物的幽禁包含着一个不可否认的优越性。被迫生活在一起，最初让人感到昏沉、疲惫，后来让人感到恼火，谁也躲不开谁；被迫面对某个人，会变成一种折磨。在这种情况下，或多或少平白无故的残暴行为或像一种美术表现的血海深仇就成了一种生活的唯一刺激；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那种生活不过是厌倦、压迫和被玷污的亲情。《城市与狗》中的少年是残暴行为的专家。父母、监护人和军官，似乎一致认为，“把他们培养成人”几乎是为确定真正的军阶和学校的根本职责——把他们培养成残忍的人而使用的委婉手法。

现在应该说明那种学习的一些特点。首先，在军校学员中间有一种喜欢群居的态度，但是这和同志友谊或手足之情关系不大；更确切地说，那是一种凄楚的杂居。对那些少年来说，存在着一种分享和展示他们自己的坏行为的低级趣味；学校渐渐在每个士官生头脑中造成了一种对做个温和的人和善良的人、对偶尔落入可憎的感情脆弱的境地感到莫大耻辱的观念。对于不参加那种游戏、不接受法则的人来说，

军校的气氛就隐含着轻蔑、嘲笑、惩罚，甚至死亡（好像小说负有证明它的责任）。对大男子主义的迷信被提高到出乎意料的、极端强大的程度。然而，面对里卡多·阿拉纳也叫“奴隶”的士官生诉说的恐惧，面对他最初不能和下流行为搅在一起的心情，巴尔加斯·略萨使读者依稀看到了某种东西：那种表面上软弱无力的道德，可能比其他人的强烈而公开的冲动更有价值，更为坚定。为了不假装勇敢，为了承受恐惧本身带来的羞愧，同样需要勇气。但是作者也成功地使环境污染和毒害了那个坦率的人；当然是在奇怪的意义上毒害他，因为环境迫使他面对自己而不是面对别人蒙受了耻辱。环境把他变成了说谎者，有意识的告发者。

显然，谁也逃脱不了。连阿尔贝托也不能。他也叫“诗人”，是士官生，他的同学死后，他想查明真相，为此他打出了所有的牌，除了一张；当上校讹诈他，并恐吓他说不撤回他的指控就开除他（“由于腐化堕落，由于精神上的毛病”）时，阿尔贝托退缩了，他想到他的职业，便永远服软了。清楚明了，客观公正的尾声写他回到他的阶层和繁华的米拉弗洛雷斯街，总之，重新恢复了他那种虚伪的人格。他这个曾经是感情脆弱的人，终于学完了残忍的课程；尽管还残留着几丝正派的气息，但是腐化堕落却安逸地在他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当然也在他未来甜蜜的家中扎下了根：他家将有游泳池、敞篷式汽车、在格里尔·博利瓦尔度过的星期六、工程师职称、同一个阶层的妻子、一大群情妇、去欧洲旅行。当他想到“若干年后我一点也不会记得曾经在莱翁西奥·普拉多军校呆过”时，这不仅表达了一种希望，而且包含着一种决心。

不可思议的是，唯一得救的人（虽然未完全得救）竟然是集罪过和残忍行为于一身的士官生“美洲豹”。进军校时，他是个臭名昭著、卑微不堪的痞子（他起码是个扒手，并把他的教父和保护人变成了“乌龟”），但是毕业时他没有故态复萌。在无情的洗礼仪式上，他对残忍的行为并不感到意外；相反的，他让那种行为有益于他，从中得到好处，利用它来提高他的威望。和他的同学们不同。他们只了解那种行为的虐待意义，就像履行一种义务，“美洲豹”却认为残忍行为不是权宜之计，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一种生动的经验。他不是法律的受害者，而是一种秘密法律本身的创造者，这种法律的严厉性不取决于任何人，它的发布永远不会把他的孤独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置于危险。显然，在一个充满残忍者的世界中，他是最残忍的，但在本质上，他也是最不腐化堕落的。他为学校带来一种下层社会的道德（“我不是告密者，也不和告密的人说话”），三年后他原封不动地遵循着这种道德。的确，三年中间发生一起杀人案，但是军校的虚伪道德并没有污染他。由于他自己的努力，他变好了；也是由于他自己的努力，他学会了清楚地看待别人和他自己的良心。他在小说中最后说的那句话（“我是你的朋友。如果我能帮你什么忙的话，你只管说话好啦”）不是对他的狐朋狗友们说的，而是对他昔日扒窃和逃窜的同伙讲的。在小说的最末页，“美洲豹”显然已是一个恢复原状、对生活有信心的人。讲完全部故事后（每翻一页都能读到残酷无情的东西），这样的结尾（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结尾，而是一种纯粹的开放的可能性）是小说的可以期望的不多的特点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一点是清楚的：面对挽救他的某个人物

的可能性，巴尔加斯·略萨决定选择“美洲豹”，他不是来自米拉弗洛雷斯区，而是一个有罪的人，来自一个卑微的社会阶层。作者把得救的机会留给了这个固执而强壮的男孩，因为归根结底他是出于善意的和原始的理由在学校里干了那些蠢事的（“我干的事情都是为了全班”他对甘博亚上尉说，坦诚的呵气扑向读者），最终抛开了其他人：接受训练准备对人施暴的人，告密的人，背叛自己的人。

在洗礼仪式上，军校的新学员被高年级的学员逼迫着在地上爬行，学狗叫，疯狂地互相咬，此外，还被他们逼着喝尿，舔地板，让人踢，以及其他种种同样凌辱性的仪式。在入学后的第一个阶段，人们管他们叫“狗”。但是那种长达8个小时的残暴的仪式，成了整个军校生活的永久性的标志，因为它一方面引起新生对高年级学员的仇恨，另一方面也激起一种由于详细的复仇安排而维持着的修道院式的同情心，而那种复仇的思想必将扩展到所有留校的士官生中去。这样，所有的学员就都是或者曾经是“狗”。另一边是外面的世界，即“城市”。这两个字出现在影射性的书题中，就把两个世界并列在一起，一个庞大，一个很小，但是事实上，它们彼此效力，相互依赖。外部世界为军校制定法律。军校官员——法律的解释者，对表面的东西保持着狂热而麻痹的忠实态度：只要形式受到维护，内容散发废物的臭气和腐烂气味是无关紧要的。所以，当士官生阿尔贝托产生一股正直冲动、试图说明一件十分肮脏的事情时，他只遇到一位愿意为他的要求办手续的军官，附带的后果是，这位上尉最后被调任，受到侮辱，失掉了前程。

是的，“城市”为“狗”制定了法律；但是这些“狗”

又回到“城市”中去，成了它的统治阶级的成员，成了政权的精华。当然，不会都成为军人，但是大多数都默然地赞成危害拉丁美洲共同生活的军事暴动，推迟着最终觉醒的时刻。习惯于严格的制度的属民们都鼓掌赞成严格性。但是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旨在揭露隐藏在那种严格性下面的那种卑鄙行为。在最为关键的时刻，恰恰在演习中一个士官生杀死另一个士官生的时候，军校的首领们加强了团结，以图隐瞒真相，忘记“不光彩的历史”。对校长，对军队最高当局来说，耻辱不是学校的杀人案，而是对案情调查的热情。

《城市与狗》最可贵的特点一定和它强有力的节奏、严谨的风格、完美无缺的结构有关，尤其和一种不寻常的气氛的创造有关。何塞·马利亚·巴尔维德正确地指出巴尔加斯·略萨在小说中“将先锋派小说的全部经验同故事的经典性结合在一起，经典性建立在小说艺术的两个基点上：必须讲述一种在想象中体会时令我们激动的深刻经验，必须艺术地讲述它。”证明这位西班牙批评家的说法正确的最可靠的标志也许是得到读者对作品的认可：当读完作品时，他会产生一种突然被置于一个曾经使他着迷的世界之外。

并非整个小说保持同样的水平，所有的场景也并非全都完美无瑕。譬如说，尽管描写两个士官生即阿尔贝托和“奴隶”同特雷莎谈情说爱无可指责，但是又描写第三个士官生“美洲豹”在不同的时期采用另一种方式常去见同一个姑娘，似乎是画蛇添足。实际上，批评界一致指出了这一瑕疵。1964年6月我在巴黎写一篇关于巴尔加斯·略萨的报道时（那篇报道后来刊登在《明天》杂志的《逐字逐句》栏目中），我询问了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没有为自己辩护，

只是解释了他的意图：“没有一部小说其主题本身是难以置信的。失败者，使故事写得让人不能接受的人，总是创作者。在我的小说中，面对某种总是不变的刺激，人物总有所反应。我的意图是造成不同性格的对立：“面对性问题，面对纪律，面对责任感。此外，我也想在感情方面这样做：面对一个出身中产阶级的姑娘。阿尔贝托的阶级比她高。‘奴隶’的阶级跟她一样，‘美洲豹’属于下层社会。实际上，真实性取决于表现形式，取决于风格上展示的激情的强弱。也许这是小说失败的地方”。事实上，每当小说的故事来自军校的范围，紧张性就降低，风格似乎就受到破坏；相反的，当小说故事发生在城市时，读者读到的常常是具有很强的叙述力量，有时甚至具有难以置信的诗的激情的篇章。对士官生守灵的描写（第 220 页 ~ 226 页）也许是作者的最娴熟的技巧将两种效果结合在一起的段落。一种吸引人的语言魅力使某些具有不寻常的、实际上在拉美小说中罕见的生硬段落变得无可非议和有价值。《城市与狗》文笔精湛，形式有力，内容丰富，人物形象极其生动，所做的揭露虽非大喊大叫，但是显而易见，是拉丁美洲对当代文坛新小说的某些病态的、令人厌倦的、过分追求修辞的形式的代表的智力挑战的模范回答。

“我深信，文学在本质上是违反常情的。”巴尔加斯·略萨在前面提到的圆桌会议上说。我不认为这一信念可以用集体手淫或母鸡的场面这样的辅助情节为例来说明。对秘鲁军人（比如费利佩·德·拉·巴拉，他说《城市与狗》的语言不知羞耻，令人作呕），或对《文学邮差》（1964 年 2 月，马德里）的一位读者（在给主编的信中说，“这部小说既富有

诗意又肮脏”)来说,这可能是违反常情的。但是对作者来说却不然。不管他有意还是无意,反正他对虚伪资产阶级尊严做了无情的鞭鞑。

然而,我认为,巴尔加斯·略萨要求于文学的违反常情,更典型地表现在他的第二部小说《绿房子》中。在性爱关系和性描写方面,这部作品少得多,但是由于其他原因,它却是大量而典型地违反常情。首先在句法习惯方面,叙述者在句子中间改变时态,(毫无提醒地)把过去时的句子和现在时的句子混合在一起,将标点规则打乱,把时态破坏。就是在语言方面也违反常情。不是因为有时是一种唐突的言语,而是因为词语常常脱离轨道,自己行动,强行引进一种本来不属于它的含义,表达比怯懦的词典所允许的多得多的意思。这是一种反修辞、反学术气的违反常情。但是此外,也是一种朴实的民族的违反常情。如果说《城市与狗》中的秘鲁离官方的动听的说法已经相当远的话,那么《绿房子》中的秘鲁则触及到了深得多的根基,没有局限于一个像莱翁西奥·普拉多军校那么狭小的范围。

我不怀疑小说运用了若干隐喻。把这种有趣的研究留给象征的占卜者们吧。如果此作不以其神奇的人物画廊、精彩的时间游戏和使最生动的对白和最不平常的对话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技巧狂怒地抓住我的话,我是很想着重谈谈它们的。我认为在《城市与狗》和《绿房子》之间存在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明显过程,这表现在对风格和结构形式的掌握上,塑造人物形象的自然而复杂的程度上和描写的情感上。有时像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以朴素的笔触细致描写景物或人物,这已经是老生常谈。

在名叫“绿房子”的皮乌拉妓院和另一种广阔的绿房子即丛林之间，巴尔加斯·略萨让时间（他的小说时间）像一股强大的气流，像一阵随意改变方向的狂风一样，围绕着受益人和受害者流动。当时间向某个方向流动时，有些人物似乎变得很纯洁；当时间向另一方向流动时，这同一些人物则变坏和堕落。也许因此有些人物很像风向标，根据时间的流向改变名字；这样，博尼法西娅就变成了“丛林姑娘”，“军曹”就变成了利杜马。

在这部小说中，法国新小说的某些手法对巴尔加斯·略萨的影响要比在《城市与狗》中明显得多。尽管我没有看到过该小说家在这方面的任何讲话，但是我觉得他接受米歇尔·布陶的影响最大，布陶不是一位浅薄的作家，而是一位极富创造性的作家：他是《时间的运用》和《变》的作者。路易斯·洛埃萨（在利马《阿马鲁》杂志第一期上）清楚地看到，在《绿房子》中，“我们预先目睹了一个事件的后果，读过许多页后才了解这个事件。”同布陶在《时间的运用》中采用的手法的根本区别是，这位法国作家在整个故事中不断暗示所表现的事件，巴尔加斯·略萨则一再推迟它，最后才把关键问题告诉读者。“丛林姑娘”博尼法西娅和“军曹”利杜马的故事也都呈现出一个人生活的双重意义，其手法和《变》中的双重旅行有明显关系。在《变》中，同一个人物的过去和现在交叉在一起。但是巴尔加斯·略萨也在小说中表现了他的独特的贡献，因为和《变》不同的是，在《绿房子》中只有人物知道那个过去是他的；在小说的大部分篇章中，除了具有敏锐的触觉外，读者会认为博尼法西娅和“丛林姑娘”是两个不同的人；后来才知道，实际上，那是同一

个人物的两个不同的时代。

也就是说，巴尔加斯·略萨同法国新小说的关系绝不是一个信徒的关系，而是这种人的关系：当某些结构方式适合他的目的时，他便使用，但从不采取囿于那种新修辞的态度，那种新修辞对它自己的维护者、创造者和思想家们来说就很不成功。实际上，巴尔加斯·略萨（在某种程度上，就像科塔萨尔、富恩特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做的那样）对法国新小说的表现手法进行了挑选，部分地引入了他的小说创作，即仅仅作为结构和风格的表现手段，而不作为某些类别的法国小说如《窥视者》或《嫉妒的女人》中应用的狂热信仰的法则。

批评界有些人恰恰指责巴尔加斯·略萨那种对材料的回避态度（特别是和“丛林姑娘”博尼法西娅有关系的材料），那种可能被认为是欺骗读者的逃避做法。我认为，倘若巴尔加斯·略萨想写侦探小说的话（在前面提及的关于《城市与狗》的圆桌会议上，巴尔加斯·略萨曾说：“实际上，听人说我这部小说可能是一部侦探小说，我感到很吃惊”），那种指责是有意义的，因为在那种小说中，重要材料是不能回避的。但是巴尔加斯·略萨在写一种 20 世纪的骑士小说（在《城市与狗》中比《绿房子》中明显得多），也许值得提起的是，回避的做法是用于史诗的虚构、神话情节的突变和构成早期小说情趣的神奇变化的一种正常手段。坦白地说，在读《绿房子》时，当然我觉察到了作者使用的技巧，不过，我并感到不快，因为尽管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秘鲁的种族与地理材料是确实的、可以验证的，但是小说的气氛是神奇的（归根结底，老妓院不是一个复活的神话又是什么呢？竖琴

师安塞尔莫不是一位游唱歌手又是什么呢?），并且不知不觉地把你引入了他的小说创作体制。

和《城市与狗》不同。在《城市与狗》中，至少在表现特雷莎的三角恋爱关系方面，作者使用的那种写法让人不能相信。在《绿房子》中，叙述手法自然而然地构成了小说为自己创造的体制的一部分，巴尔加斯·略萨没有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那样借助魔幻手法。但是他的戏法就像那种魔幻的代替物一样。就如某人揭开一个难解的秘密那样，我们突然翻到一页，博尼法西娅变成了“丛林姑娘”，“军曹”变成了利杜马。两个人物在皮乌拉的关系，一旦同所处的场景及其矛盾的柔情结合在一起，就变得丰富了。巴尔加斯·略萨似乎告诉我们，倘若减少现实的材料，或者仅仅临时扣下一副牌中的几张牌，真实的东西就会变成神奇的东西，平常的东西就会变成令人惊异的东西，通俗的东西就会变成奇特的东西。

无论卡洛斯·马丁内斯·莫雷诺（在《明天》杂志上）还是安赫尔·拉马（在《前进》杂志上），都强调说，《绿房子》是一部有节制的、克制性的作品。的确，在小说中有一些材料和情境好像为了填满整个小说。当人物达到可能有的发展的一半时，巴尔加斯·略萨就丢下他们；当趣闻可能榨出更多的液汁时，他就中断叙述。似乎这还不够，他还把小说初稿八百页压缩到最后出版的四百页。之所以如此，因为巴尔加斯·略萨渴望（确有充分的理由）写一种全面小说。他曾对路易斯·哈斯说（《我们的作家》，196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伟大的小说是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不可能的小说的小说”。在那种伟大的配合中，有一种比孤立的故事更

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故事的交叉。在《绿房子》中，这一点似乎越来越清楚：中心的、全面的、总体的情节就像一条动脉贯穿所有的小故事。它的路线合适时，就横穿它们；但是当每个情节或每个人物自身的力量使之离开主道时，它就没有必要坚持那样做了。

这位小说家不强行把人物塞入他选择的小说结构内，但是他同样不认为必须跟踪人物到最后的结局。“所有的人物都是自由的。”洛埃萨关于《绿房子》的人物尖锐地说。作者也是这样。小说是巴尔加斯·略萨的自由同他的人物的自由的交汇点；经过这种可能是短暂的相遇后，各自沿自己的方向继续前进。富西亚、安塞尔莫、盲女安东尼娅等人物在小说中走到了他们的命运的尽头；但是“丛林姑娘”、利杜马或拉利塔，却不是这样；甚至琼加或加西亚神父也不是这样。

《绿房子》是一部难读的小说。技巧上的困难是一个障碍，特别是在前几章；但是一旦跨过这个障碍，一旦熟悉了组装、剪接的关键，就可以稳固地置身在它的土地上：小说表现的是拉丁美洲最牢固最世俗的土地之一。但是从这样的信心出发，小说还不能变成易读的作品。情节依然很复杂，许多隐喻还保持着它们的神秘性，每一次对白中都有一个交谈者突然从另一个地方，从另一个时代降临；总是有些小故事好像刚刚凭空而降，有些人物闯入或无影无踪地消失。的确不好读，但是决非不可理解。困难就像一个过滤器。“那些善于读一部作品的人，”安赫尔·拉马说，“只要坚持读下去就行。作品中，一个故事不仅贯穿其中，而且要缓缓被展现出来：一行一行地整理提到的现实，上百次地回头验证使

用的材料，检查资料，弄清楚组成作品的成分。”困难也是推动读者的一种方式。读者一旦战胜障碍，或者至少参加寻求任何一个谜，他同小说的关系就牢不可破了。他觉得（和其他读者一起——凭直感了解他们是同伙，当然也和作者本人一起）参加了一个探险队，他所分担的任务终于鼓舞了他。巴尔加斯·略萨说，人们一直希望的是“讲故事，让故事存在，使变成文字的那种冷漠而静止的经验消失。”这位非凡的创作者为读者营造了他的客观场景，但同时也营造了他的发生了变化的现实；于是读者努力在相距很近的人物中间前进，那些人物散发的不是文学味儿，而是丛林味儿，汗味儿，肉体味儿，有害的气息味儿，但是同时，当表达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怀念、他们一时的快乐时，他们却变成了纯洁的、相距甚远的、几乎不相识的人。

路易斯·哈斯说，像竖琴师安塞尔莫这样一个人物，是作品中最软弱的人物之一。他很不坚强；马丁内斯·莫雷诺却相反，他认为安塞尔莫是小说中写的最出色的人物。可能两个人都有道理，因为哈斯读过的小说显然不是马丁内斯·莫雷诺读的那部小说。当后者和人交好时，他同竖琴师进行了交谈；但是前者没得到他的信任，便远远地站在一边。“当叙述松散时，”智利批评家说，“人物就会趋于泄气。”但是叙述并不松散，而是紧凑、丰富、没有空隙；人物不泄气，很简单，因为人物从没有膨胀过，他们保持着固有的基本体态，（用艺术语言说）真实的体态。他们原本就存在。小说家不过是那种存在、人物使用的、有时重复使用的目光和听觉的一位暂时的见证。譬如富西亚，即那个精力充沛的倒霉的天花患者，无疑是小说最感人的人物之一。巴尔加

斯·略萨描写他时既无恨也无爱。富西亚是依靠自己的软弱的力量获得自由的。这个无所顾忌的人完全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为他带来不幸的总是别人。他敬佩雷亚特吉，雷亚特吉跟他一样也无所顾忌，但是相反，他的命运不坏。在同阿基利诺进行的没完没了的交谈中，富西亚坦率地打开了他那把未能实现的可能性的扇子，快乐地谈论着早就被毁掉的胜利；他单纯地无拘无束地讲述他的传记，那是一系列在纯真的状态下干的下流行为。富西亚是个固执的倒霉鬼，几乎是个令人厌恶的圣徒。他是那么让人恶心，以致读者不能忍受他的败落，他的腐烂臭味，但是能忍受他的合作者即那个令人敬佩的、主意多的、爱提问题的、最后可以理解地逃走的老人阿基利诺的超人的耐心。富西亚从一个肢体健全的罪人变成一个没有性、没有手指、生脓疮、被虫咬、体无完肤的人，变成了“一堆流血的活肉”。但是无论谁无论什么也不能迫使他放弃希望，不能阻止他的信心。他虽然身患麻疯病，肢体残缺，但仍然怀着希望。但是在他最后一次、惶惑不安地出现时，即在阿基利诺离去、富西亚一动不动地站在远方的时候，一个人会觉得从这个时刻起，期待的也能像一个残肢一样离开那个肉体，也将被一个无用的最后一个肢体取代。巴尔加斯·略萨取得的非凡效果之一是，由于对残肢的描写，他赢得读者一丝好感（尽管难以置信，但是他赢得了）。不是同情，也不是内疚，更不是慈悲。也许是一种宝贵的理解，因为对残肢的那种描写决不是我们固有的利己主义，我们的麻风病。富西亚也是“本质上违反常情的文学”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一次，违反常情发生在读者的意识里。

显然，可能性太多了，自相矛盾太多了，欲望太多了，好像为了使巴尔加斯·略萨不致在某次冲动中讲不下去，或者使他的材料不致在某个时候失去控制，或者使他那些令人不安的手法不致有时陷入机械，或者使某一次紧张气氛的间歇不致达到使文学关节失去平衡的程度。提出相反的要求几乎不近人情。但是我不愿意支持某种正在变成批评的口头禅的陈词滥调：这种尝试无疑是一个好兆头，它预示着有朝一日将成为拉丁美洲的伟大小说的东西的诞生。简单地说，我不赞成。我认为，伟大的拉美小说已经写出。今天哪一种文学能够显示相当于《消失的足迹》、《佩德罗·帕拉莫》、《造船厂》、《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人子》、《英雄与坟墓》、《跳房子》、《绿房子》和《百年孤独》的总体水平呢？哪一种文学能够显示这样的一位作家呢？早在三十年前他就写出了一部像《绿房子》那么成熟、那么丰富、那么熟练、那么紧贴它的大地、那么富于创造性的小说。

巴尔加斯·略萨不让我们喘一口气。当他在伦敦的寓所里（像往常那样：有条不紊地、顽强地、不留情地）修改他的新作长篇小说——据他说“写的是关于一名保镖的故事”（几个月前他在伦敦对我说，他相信这部新作将比《绿房子》的部头还大）——时，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幼兽们》一书，这是一部上百页的小说（用哈维尔·米埃塞拉奇斯的著名照片做插图）。在小说范围内，这是一部完美的成功之作，是在拉丁美洲写的最紧张最有力的故事之一。巴尔加斯·略萨在小说中表现的依然是在《首领们》和《城市与狗》中表现过的少年帮派活动主题。《首领们》和《幼兽们》之间在艺术上，甚至可以说在职业上的距离是巨大的：是一

部胆怯的草稿和一部杰作之间的距离。但是，即使把它同《城市与狗》这样一部杰出的作品相比，并且注意到两者的不同规模、不同需求和允许的界限，《幼兽们》也好一些。因为作品中既没有零散的坑洼，也没有巡游路上的让步^①。什么也不多，什么也不少。

故事取材于利马一所教会学校发生一桩意外事件。主人公皮丘拉·库埃拉尔当时还是个小男孩，在洗澡时受到学校的丹麦狗胡达斯的攻击，睾丸被咬掉。故事没有局限于学校的范围，而是伴随着库埃拉尔的生活及其和来往密切的一群朋友的关系发展。叙述者熟练地讲述着故事发展的过程。一开始，被狗阉割一事是个细节，只是取外号的一个借口（在太平洋沿岸地区，皮丘拉的意思是男孩的小鸡儿），几乎是一个玩笑。随着年龄的增长，被阉割的可怕缺陷倒变成一个长处，一种特权，男教友们什么都容忍他，即使他不学习也给他打高分；在家庭中，父母满足他的一切爱好，给他买冰鞋、自行车、摩托车。但是这种涅槃突然结束。姑娘们出现了，性觉醒，帮派的成员纷纷交女朋友，几乎可以说是集体地进行。皮丘拉·库埃拉尔从此开始忍受他的痛苦命运，他的无可救药的孤独。他的悲剧不仅来自丹麦狗的咬伤，也来自虚伪的法律。在这种法律下，他自己被不同方式的外部压力左右着，其他人也无能为力。朋友们给他出的不言而喻的主意，不过是厚颜无耻的虚假的练习，就是说：追求女孩子，向特雷莎表白爱情，（这时，本质上坦诚而痛苦的孩子突然发问：“可是，然后呢？”）然后，当然是离开她。库埃

① 意为没有什么缺点和疏漏。

拉尔的接二连三的碰钉子、对暴力活动的蓄意和无益的参加、对生活环境以某种方式驱使他懂得的那种不能实现的大男子主义的替代物（体育运动、徒劳的挑衅、令人头晕的汽车运动）的感人寻找，终于打垮了他的意志，搅乱了他的神经，把他的生活乐趣永远变苦了。的确，他的男性特征在诞生之前就被狗的牙齿夺去了；但是夺走他的生命的，却是人的牙齿。

为了讲述这个故事，巴尔加斯·略萨写了他的作品中最艰巨、最严酷的一部。马丁内斯·莫雷诺指出（在为秘鲁杂志《阿马鲁》写的评论中），巴尔加斯·略萨和一切同类作家一样，具有“创造对表现他的主题必不可少的幻想的奇特天赋：随着（尽管预先知道结尾）我们进入《幼兽们》的紧张的悬念，为表现小说家给我们讲述的故事而采用的另一种方法找到可行的选择，我们会花费愈来愈多的想象力。但是，只要事先想到它的明显的事件示意图，这种方法足以产生。在此，我可以草拟四五种，但面对小说家的万无一失的本能，都没有用，巴尔加斯·略萨凭着他的本能选择、并把他的方法强加于我们。作家面前也许有好几种方案，他选择了一种；其秘密在于提前说服我们相信他选择的道理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完全成功在于几乎从头几个句子起就消除了所有其他不同的和对立的可能性的踪迹，使我们屈服于他那种虚假的宿命论，把他的解释作为唯一的、主要的和真正的解释转嫁给我们。”是的，可能在选择一种方法、一种命运、一种结局的重要时刻，巴尔加斯·略萨选择了最残酷的，从一开始他就竭力说服我们相信它的不可避免性；但是同样可行的是，对作者最终想告诉我们的事情来说，对他反对“忌讳

的事物和虚伪”的崇高圣战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说，可能有这种情况：早在作者想把那条路的不可避免性强加给我们时，主题本身，意外事件（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不十分重要），就把那种不可避免性强加给了作者。

为了对一个充满偏见的世界、对无比荒唐的陈词滥调称为“肉体的精神”的东西进行这种无情的解释，巴尔加斯·略萨创造了一种方法，根据这种方法，在此作中他也把他的社会侵入（不仅是介入）推进到了语法，使之在好几个方面发生爆炸，这些方面也许比《绿房子》中爆炸的方面还重要。在《幼兽们》中，只有库埃拉尔是从外部描写的。其他人，他的“朋友们”，是一个集体的大人物，有时用第三人称提及，有时用复数第一人称讲话。但是为了实现这种变化，既不需要一个新的段落，也不需要连字符号，更不需要“句号接着写”。在一种紧张而不停的转换中，作者把故事的那种双重意义交给了读者，也许这是他再现一种集体责任的方式，或者也是——我觉得这一点更可能——他把他的读者置于那种部落的过失、使读者以某种方式感觉别人的苦恼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认为，无论在《绿房子》的崭新的表现中还是在《幼兽们》的这种实验中，巴尔加斯·略萨都不能被认为是一个随心所欲、引人注意地把他的创造抛向天空的杂耍演员，更不是一个开始创造新的修辞学的反常规的人。对方法的需求似乎总是先于发现，这本身就是一个良好保证。此外，对确定巴尔加斯·略萨的意图来说，这样的验证似乎具有决定意义。至于在技巧的采用方面，他作为创作者的态度基本上是灵活的、开放的。尽管他的发现，尽管在这方面他的两部新作所代表的顶尖，但还是应该承认，形式的革新并不是他的故事的最重要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它是为叙述的故事谦

敬地服务的。“所有的技巧,”巴尔加斯·略萨 1965 年说,“都应该竭力消除读者和叙述的东西之间的距离,不要让读者在阅读时成为法官和见证,要使叙述的故事这般吸引他,读者的生活就是故事里讲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对故事的感受就像是一种新经验。”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事业发展到这个水平,成就愈来愈大,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认为他执著地始终如一对待自己的结果。为了避免疑问,我要说明,我说这话,并不是说,也绝对不是说,他的短篇故事和长篇小说是自传体的(尽管比如说《城市与狗》在资料方面具有自传成分,在趣闻方面却丝毫没有),而是说,在作品中,巴尔加斯·略萨依然忠实于他对文学创作的明确态度,这种态度和他的为人、他的宇宙观、他的个人生活的内外规律、他对非正义的忧虑和他对一切教条的排斥是一致的。

在这种纯净的一致中,铭刻着,比如说,他对古巴革命的拥护,他对作家达涅尔和西尼亚夫斯基案件的郑重态度,或者他在加拉加斯接受罗慕洛·加列戈斯奖时发表的出色演说。尽管取得了完满的成就,获得了美好的奖项,赢得了很高的名声,巴尔加斯·略萨仍然拒绝(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参与在选择流亡欧洲的拉丁美洲作家中那种司空见惯的破坏性很大的轻浮过程;他同样拒绝对现在人们怀着固执的不良意识称之为“人际关系脱节”、其实不过是背弃社会责任的倾向采取拥护态度。归根结底,人类的这种根本性的本质,(借用卡洛斯·富恩特斯喜欢用的一个术语,尽管在另一种意义上)才是拉丁美洲作家真正的“神圣地区”,如果不忽视,如果不减少一些创作力量,这个地区是不能承受的。如果为确定这种相互关系的重要性而需要什么证明的话,这里有巴

尔加斯·略萨的文学创作足以为证（从来不是宣传性的，总是为现实忧心）。他以一种对拉丁美洲人的有节制的、合理的表现支撑着他的艺术创作的价值。

守寡的美人鱼

从 1980 年起，我多次去哥本哈根，每次都是为了出席纪念神奇的埃里克森小美人鱼的仪式。然而，我应该承认，只有这最后一次我才觉得在她的面孔上甚至在她的姿态上发现了一种几乎难以觉察的寡妇的表情。

一天晚上，也许因为喝了几口敞口耳罐酒，在好几位流亡丹麦的真正有经验的拉美朋友面前，我大胆地提起了这个话题。出于怀疑，也是为了不让他们认为我比实际情况还要醉，我便使谈话带上一丝自嘲的意味，但是使我吃惊的是，大家却严肃起来，其中有一个叫阿尔弗雷多的圣菲人像掂量着每个音节似的慢慢说：“问题不是她仅仅有寡妇的表情；事实上，她就是寡妇。”

这时，我的醉意已经消失。流亡的智利人胡利奥接过了话碴儿：“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是我的同胞。尽管你认为是胡扯，但确实是皮诺切特把他推向小美人鱼的。孔塞普西翁人罗德里戈在智利监狱里受尽折磨和侮辱后来到哥本哈根。

来到这儿还不到 24 小时，他就狂热地爱上了小美人鱼。乍一看，这是一种爱情，尽管存在着种种不可能，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总是有人会爱上一个高不可攀的名人。比如凯瑟琳·德内维、安娜·贝伦、索尼亚·布拉加。或者还有哥本哈根的小美人鱼。当然，罗德里戈有他的怪癖，但是你，不久前你也是流亡者，你很清楚，在流亡中，怪癖仅仅是正常中的一点小小的变化。另一方面，罗德里戈也很少谈论他新产生的爱情。

简单地说，每个工作日他总要留出一小时去欣赏小美人鱼，仿佛这样能够证明，他心中会渐渐萌生一种爱情，既异乎寻常又牢不可破的爱情。此外，当他得知小美人鱼在遥远的过去和不久以前受过侮辱、惩罚甚至肢体伤残时，他便在那样的过去中找到了一个和他自己的受惩戒的历史类似的新地区。如此这般，终于有一天，他决定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事情。正值寒气逼人的冬天（实际上，这里的冬天不宜居住），但是他认为把他的计划推迟到春天不合适。出于明显的理由，他选择了黎明的时刻。因为他不愿意冒那种让众人（包括某个好事的警察）围观的危险，不愿意让几十双或几百双眼睛玷污他最光辉的内心。在一月份的一个星期日凌晨三点十五分，罗德里戈实现了他的爱情。小美人鱼像往常那样无辜地赤身裸体；罗德里戈心想，他可怜巴巴地穿着衣服也不合适。于是，他不顾零下 12 度的寒冷，一件一件脱掉了所有的衣服，并把衣服叠好，整齐地放在他那双被冻僵的赤脚边。现在好了，他和他的意中人的处境完全一样了。他们一丝不挂，忍受着严寒，全身发抖。此时此刻，罗德里戈应该咬紧牙关，免得打牙战，最后他还应该在他的新

生活最幸福的时刻温柔地拥抱他的小美人鱼。那个时刻当然不长，因为几个小时后，人们发现他在甜蜜中被冻僵在那里，既没有了新生活也没有了老生活。由此，你可以明白你看见的可怜的小美人鱼那副寡妇的表情了吧？此外，我还要告诉你，从此以后她就成了我们当中的一员，一个一动不动地坐在海边、梦想回国的女流亡者。”

一个见过海的玻利维亚人

这件事，我始终未能证明。但是据说，在马尔维纳斯战争正激烈进行的时候，有人曾问博尔赫斯，关于这场冲突，他有什么解决办法。他以他那种惯常使用的讽刺口吻回答：“我认为阿根廷和大不列颠应该达成协议，把马尔维纳斯群岛判给玻利维亚，好让这个国家终于得到它的出海口。”

实际上，博尔赫斯的嘲讽（只要引证是真实的），是以所有的玻利维亚人内心的愿望为基础的。玻利维亚人似乎总在窥视着地平线，寻找着被拒绝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大海。当然，玻利维亚有的的喀喀湖，但是这个湖只能使它的失望情绪越来越重，因为湖泊不能把它引向别的世界，而只会把它引向自己。

不管怎样，当某个玻利维亚人来到海边时，（尽管海是别国的），那个人往往总是一个白人，决不是一个印第安人。然而，有一个出生在奥鲁罗矿区附近的印第安人，由于一种奇怪的偶然性，幸运地看到了被禁止接近的大海。

他准是一个可爱的、穿戴整齐的小男孩，因为有一位出身富豪之家的夫人路过奥鲁罗时偶尔看到他，把他带到首都拉帕斯。那是在五十年代。他接受了第二次洗礼，取名瓜尔维托·阿尼塞托·莫拉莱斯，他学会了看书，学会了侍候人。他干得那么出色，当他的主人们去欧洲时便带上了他，但不是为了开阔他的眼界，而是为了让他替他们做家务活。

这样，这个男孩（当时他已经满 15 岁）就在他的脑海里收集了许多大海的形象：从温暖碧绿的地中海，到冰冷的波罗的海海湾。当一年后他的保护人回来时，瓜尔维托·阿尼塞托便请求他们准许他回他的故乡探望父母。

在他的贫穷的出生地，在卑微而破败的故居，面对亲人们的惊异目光和鸦雀无声，他详细地讲起了礁石、海浪、海豚、造船厂、潮水、飞鱼、地下蓄水池、渔民的码头、闪烁的灯塔、鲨鱼、海鸥、巨大的远洋海轮。

但是，到了—一个晚上，他头脑空空，没有什么可讲了，便沉默了。可是他的亲人们仍然期待着，继续望着他，排成一行坐在地上等待着，他们由于饮用了古柯而面颊浮肿。从房屋的深处传来爷爷的声音：“还有什么呀？”尽管他的肺脏已被腐蚀，他仍然毫不留情地催问。

瓜尔维托·阿尼塞托觉得不能让他们失望。根据经验他知道，对大海的怀念是无止境的。于是这时，只有这时，他才讲起了美人鱼们的故事。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让我们坠入诱惑

作者= (乌拉走) 马里奥·贝内德蒂著 朱景冬译

页数= 4 7 9

S S 号= 1 1 4 4 6 1 3 6

出版日期= 1 9 9 7 年 0 7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短篇小说

星辰和你
大迁徙
预算
预感
这里空气新鲜
恋人
难道无法弥补吗？
阿内西阿美女皇后
安魂曲
如同格林威治
告别单身汉聚会
让我们坠入诱惑
一片茫然
幻影
咖啡杯
欣赏莫扎特
权当证词
伊里亚特家的女人
玛格丽特·苏亚文的鳏夫们
百叶窗
他没有让步
报应
收藏
看马戏
天真无邪
格洛丽亚的星期六
午餐和疑问
主人的狂怒
他们如此友好
艾莉莎的照片
佩克布
惜别
布洛梅街上的小客栈
死
顶楼
戏弄的愿望
消防队员

表情
丑陋人的黑夜
另一个我
我要把毛里西奥叫来
诗歌
每个城市都可能成为另一个
你有
罗多尔弗把现实变成
诗人们
不吓鸟的稻草人
打在窗上的小石块
缓慢但是到来
天堂
维护快乐
天真的国家
综合症
四面
宣传者何塞·马蒂
海上的瓶子
英雄
陈词滥调
那场战斗
可能性
新的洋际运河
回击
让我们破除关于银河的神话
当场
另一个天空
异常状态
手风琴
郊外
做什么？
语义学实践
两种语言的时间疗法
没有时间的时间
踪迹
遥远
日常生活（一）
日常生活（二）
我在彼岸
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
明天
鲁文祖父

我和小蜥蜴一起
恒久的蟋蟀
现在一切都清楚
儿子
唉叹
挖掘记忆
沙
地震
谜
岩石
仇恨

随笔 文论

纪念卡彭铁尔
纯真的加夫列尔的可信可乐的故事
开幕词
忧伤的诗人
半个世纪的纪念
关于胡利奥·科塔萨尔
巴尔加斯·略萨和他的小说
守寡的美人鱼
一个见过海的玻利维亚人